

休克主义

娜奥米·克莱恩——著

吴国卿 王柏鸿——译

克莱恩是化身作家的控诉天使。
这是一本全世界都该读的书。

——约翰·伯格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THE **SHOCK**
DOCTRINE

本书荣获2009年首届华威大学写作奖：“对这个时代的重大暴行所作的杰出研究，令人热血沸腾。”

休克主义

书名: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作者: (加) 克莱恩 ， 吴国卿， 王柏鸿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

ISBN: 9787563393640

开本: 16开

定价: 45.00元

内容简介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作者简介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记者、畅销书作家、社会活动家、反全球化分子、电影制片人，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处女作《NO LOGO》（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引起全球广泛回响。她被《泰晤士报》誉为“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纽约时报》亦称她“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在大卫·赫尔曼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克莱恩排行第11位，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2007年所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对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发起最有力的挑战，2009年赢得了首届华威奖，再次赢得巨大的声誉。

目 录

[引言：空白之美 3](#)

[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 研究和开发 13](#)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13](#)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25](#)

[第二篇：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38](#)

[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38](#)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51](#)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60](#)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66](#)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66](#)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71](#)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78](#)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84](#)

[第九章 捍拒历史 84](#)

[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91](#)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102](#)

[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116](#)

[第十三章 让它烧——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125](#)

[第五篇 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133](#)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134](#)

[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146](#)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154](#)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155](#)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164](#)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174](#)

[第七篇 移动的绿色 缓冲区与防爆墙 185](#)

[第十九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186](#)

[第二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197](#)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206](#)

[结论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216](#)

引言：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记》第6章第11节（中文和合本）

震慑（Shock and 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慑。
——《震慑：迅速制敌之道》（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理论

2005年9月，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佩里（Jamar 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s）*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因为没有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而被抓住，因此现在我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佩里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山达基，一种信仰与修行活动的体系，贺伯特于1953年在新泽西建立山达基教会。

他在新奥尔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17岁，但他告诉我是23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广场中心，这里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却挤满了两千顶帆布床，以及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出身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Richard Baker）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新奥尔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巨大的商机。”一周来，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以及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城市”——实际上就是铲平公共住房项目，以高楼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废墟、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佩里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吞鲁日这些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新奥尔良洪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现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93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破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

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t）。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时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

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

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 Abdul 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道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 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巴托斯（Mike 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位34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全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 Battles），从联邦政府弄到约一亿美元的合约。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类似的亲商政策透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IMF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做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透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大自然灾害。9·11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他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借震慑的武力强加于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人权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起义，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1999年攻击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

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讲，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 capitalist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体系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

3512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万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是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96年12月大胆宣称。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 King）和必胜客（Pizza 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所需的经费。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击黎巴嫩，还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随着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不断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灾难，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的新兴市场，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给非盈利机构了——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这就是9·11前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提供商机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借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200亿美元营业收入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的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 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t），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一切

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t）。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休克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90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们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休克状况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时间可能极短暂——这是一种心理休克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抗拒来源比休克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休克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9·11的打击，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9·11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9·11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体系。

这就是休克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休克之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遭受打击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佩里和他在巴吞鲁日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游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陷入震惊和畏惧而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休克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弗里德曼奉献一生致力于一场思想上的和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

道”。1929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主义征服了东方，西方信奉了福利国家的理念，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弗里德曼和他的导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恩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弗里德曼1975年写信给皮诺切特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1969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弗里德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80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弗里德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弗里德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到欢迎，以致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想要大麦克汉堡（Big Mac）和实施里根经济政策。

苏联终于崩溃时，“邪恶帝国”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弗里德曼式的革命。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弗里德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弗里德曼死时，《财富》杂志（Fortune）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2007年1月29日是加州的弗里德曼日，数个城市和乡镇也这么做。《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 Man）。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申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应变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在那些民主政治遥不可及的时刻。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

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自己把你填充。

——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工业革命这场有史以来最极端和激进的革命，只是刺激各种学派思想的开端，但这些问题只要有无限的物质商品就能解决。

——波兰尼（Karl Polanyi），《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 Cyril J. C. 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 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

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其中包括柯林斯（Anne Collins）赢得总督文学奖的《沉睡房》（In the Sleep Room）、马科斯（John Marks）的《寻找满洲候选人》（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薛福林（Alan Schefflin）与欧普辛（Edward Option Jr.）合著的《心智操纵者》（The Mind Manipulators）、波华特（Walter Bowart）的《心智控制行动》（Operation Mind Control）、托马斯（Gordon Thomas）的《疯狂之旅》（Journey into Madness），以及温斯登（Harvey Weinstein）的《父、子与CIA》（A Father, a Son and the CIA），最后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精神科医师，他的父亲是当时卡梅伦的病人。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

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今日的ECT已经改良很多，并纳入确保患者安全与舒适的程序，且已变成精神病治疗中受推崇和经常有效的方法，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暂时丧失短期记忆的副作用。一些患者仍然报告，他们的长期记忆也受到影响。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如果卡梅伦在他的领域里影响力小些，他的“心理驱力”录音带一定被当作廉价的笑话看待。他的整个概念来自一则“大脑电话”（Cereborophone）广告，就是一具床边留声机配备了枕头扩音器，宣称是“一种在睡觉时学习外国语言的革命性方法”。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 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 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 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是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

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誰。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恐惧的科学

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 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 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 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

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1983年的版本显然是专供教室内使用，还附上随堂测验题和体贴的提示（“每一次审讯永远要记得换上新电池”）。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W.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定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了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

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 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本身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 [Garry Wills] 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 [original sinlessness] 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r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及最高法院的压力下，布什政府被迫在2006年国会通过军事委任法（Military Commissions Act）时软化其立场。但尽管白宫利用新法案宣称已禁绝使用刑讯，却仍网开一面，容许中情局和承包商继续使用库巴克式的知觉剥夺与超载，以及其他“创造性”的技巧，包括模拟溺水（水刑 [water-boarding]）。在签署法案前，布什还附加一份“签署声明”，宣称他有权诠释《日内瓦公约》的定义和适用性。《纽约时报》形容这是“片面改写逾二百年的传统与法律”。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 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 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被脚镣手铐，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Mamdouh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他们实验的是洗脑。”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 Block），专门用来关“至少50名”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James 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ofthe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MustafaOsama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记述他遭到虐待。

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新娘’的铁制拷问台，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据国际特赦组织，他的睾丸也遭电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哮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

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混淆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遭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 W. 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那一天永远没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Harberg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

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Schoolof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Is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许多人老爱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贝克回忆说，“我回答：‘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

弗里德曼2006年去世时，讣闻作家忙着摘记他丰富的遗教。有一则讣闻这么写：“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消费者选择及经济自由，为世界带来我们今日享有的繁荣。”这只对了一部分。世界繁荣的性质——谁享有它，谁没有，它从何处来——当然具有高度争议。无可争辩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他实施原则的独到策略，确实让一些人极为繁荣，为他们带来几近完全的自由——可以无视国界存在、避开法律规范与税金，以及蓄积新的财富。

这种思考赚大钱理论的本事，显然源自弗里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在新泽西州罗韦市（Rahway）买下一家成衣厂，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厂同一栋建筑。弗里德曼后来写道：“以今日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血汗工厂。”对血汗工厂老板来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帮移民工人组织工会，要求制订安全规范和周末休假——还在放工后开会讨论工人所有权的理论。身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无疑听到许多与这些辩论大不相同的观点。后来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但弗里德曼经常在演说和电视节目谈到它，并且援引作为放任式资本主义好处的例子——证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规范的工作，都能提供人们攀上自由与繁荣阶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主张工人权力的激进左派思想席卷世界各地时，它提供了既得利益者防卫的方法，而且其性质也一样激进，本身也充满理想主义。弗里德曼自己就说，他的想法不是保护工厂主人支付低薪的权利，而是追求尽可能纯粹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每个人可以投票决定他喜欢的领带颜色”。左派人士许诺工人免于老板宰割、公民免于独裁统治、国家免于殖民主义压迫，而弗里德曼许诺的是“个人自由”，把个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体企业之上，使他们能借由消费者选择表达绝对的自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它具有跟马克思主义吸引当代年轻人一样的特质，”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经济学家帕廷金

（Don Patinkin）回忆说，“纯粹和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结合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工人乌托邦，而芝加哥学派也有他们的创业家乌托邦，双方都宣称如果能实现理想，将为世界带来完美与平衡。

一个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通达那个神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革命——推翻既有的

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答案可没那么直接。美国虽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还不完全是。在美国，以及所有理论上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芝加哥学派都处处看到干涉。为了让产品更负担得起，政治人物设定价格；为了减少工人被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确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们由国家来掌控教育。这些措施通常看起来是为了帮助人民，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而且以他们的模型“证明”——它们对市场的平衡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也危及市场传达各种信息、互相沟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就是净化这一切——扫除市场的干扰，让自由市场大鸣大放。

因为这个理由，芝加哥学派并未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来源将是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当时称作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这些人信仰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是混杂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与流通、社会主义的教育、由国家经营水服务等基本民生事业，以及用各种法律来节制极端资本主义的丑八怪。芝加哥学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不情愿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及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却鄙视不纯粹的信仰者，所以他们向这些拼凑混搭型的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到未受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粹主义一大部分来自弗里德曼的导师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阵子书。这位严峻的奥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都将导致社会“走向奴役之路”，必须彻底去除干涉。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哈伯格说，“这些奥地利人”（当时大家如此称呼这个学派中的学派）极端狂热，认为任何的国家干涉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的……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复杂的画，本身有着完美的和谐，然而却有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斑点，万分可惜……完美被一点瑕疵玷污了”。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Pelerin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

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先进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在这段大刀阔斧的扩张期，南锥国家逐渐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势力庞大的工会，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小孩则被送进新盖的公立大学念书。这个地区的马球俱乐部精英，与广大的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拥有南美洲最大的中产阶级，而邻国的乌拉圭人民识字率高达95%，且所有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这段期间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锥变成全世界贫穷国家鲜明的象征：证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裂确实可以弥合。

这些成功的管理经济体——北半球的凯恩斯学派国家，以及南半球的发展主义国家——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走进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学派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死对头，纷纷被总统们和总理们延揽，以协助驯服市场怪兽；弗里德曼的应该放任市场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胆主张，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不过，仍然有少数人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感兴趣——而且这些人还位高权重。

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主管来说，必须与明显较不友善的发展中世界竞争，又得面对国内势力强大且要求较多的工会，使得战后的繁荣年代反而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成长迅速，创造出庞大的财富，但企业主和股东却被迫透过企业税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财富。所有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统治，少数人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定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

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借由“发现”新领土和不必支付代价即攫取土地，然后无需补偿当地住民即从地下开采财富。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战争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议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道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他们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抑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阻挡在边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表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推翻伊朗的摩萨德，以残暴的国王取代之。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赞助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直接应联合水果公司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家公司因昔日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关系而能上达杜勒斯兄弟，而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征收该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给予全额补偿），用于改造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计划，因而触怒该公司。古斯曼称他的计划是为了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封建经济主宰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显然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目标。古斯曼遭罢黜后，联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远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 [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兹（Theodore W. 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这个目标与舒尔兹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达成它们的经济的发展。”他说。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简单：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

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GunderFrank）回忆说。智利的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著名的肯尼迪政府经济学家海勒（WalterHeller），曾嘲笑弗里德曼追随者的狂热教派特质，把他们分类为：有一些是弗里德曼派，一些是弗里德曼化，一些是弗里德曼式，一些是弗里德曼型，还有一些是弗里德曼狂。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

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锥的投票所和街上，这些国家迅速靠向左边。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作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完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theeconomy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HocCommitteeon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拨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

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 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政权更迭的教训：巴西与印度尼西亚

有两套经过仔细研究的“政权更迭”模式，被阿连德的反对者视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度尼西亚。当美国支持的巴西军政府由布兰科（Humberto Castello Branco）将军领导，在1964年取得权力后，军方不仅计划扭转古拉特的亲贫民计划，而且要打开巴西供外国投资。起初巴西的将领尝试采取相对较和平的进程——没有

明显的残暴，没有大规模逮捕，虽然后来发现有若干“颠覆分子”在那段期间遭残酷刑讯，人数却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们遭受待遇的传闻几乎未散播到监狱外。军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遗迹，包括有限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场所谓的绅士政变。

在60年代末期，许多公民决定利用这种有限的自由，表达对巴西贫穷加深的愤怒，他们怪罪军政府亲企业的经济计划，而其中许多计划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所规划。到1968年，街头经常挤满反军政府的示威群众，尤其是由学生领导的游行规模最大，使政权的稳定岌岌可危。想紧抓权力的军方四面受敌，于是断然改变策略：全面封杀民主，镇压所有公民自由权，刑讯变成体制化，而且据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政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二次大战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由苏加诺总统领导，他是那个年代的查韦斯（Hugo Chavez，编按：委内瑞拉总统），虽然少了查韦斯对选举的兴趣。苏加诺因为保护印度尼西亚经济、重分配财富和赶走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而激怒富裕国家。他指控IMF和世银是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傀儡。虽然苏加诺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不过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印度尼西亚有300万名活跃的共产党员。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心终结苏加诺的统治，根据解密的文件显示，中情局曾接获高层指示，要“视情势发展和可得的机会，清除苏加诺总统”。

经过数次不成气候的尝试后，机会终于在1965年10月降临，由中情局支持的苏哈托将军展开夺权和肃清左派的计划。中情局已暗中列出印度尼西亚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单，这份文件最后落在苏哈托手中，而五角大楼则以供应更多武器和战场无线电协助他，让印度尼西亚军方在群岛最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讯。然后苏哈托派遣他的士兵，追捕被列在中情局“猎杀名单”上的4000到5000名左派分子，并且向美国大使馆定期报告进展状况。每当有新信息传来，中情局便划去名单上的名字，直到中情局对印度尼西亚左派已被消灭感到满意。参与这项行动的人士之一，是在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马廷斯（Robert J. Martens），他在25年后告诉新闻记者卡丹妮（Kathy Kadane）：“那对军方真的帮忙很大。他们可能杀了很多人，我自己的手上可能也沾满血，但这不见得有那么坏。有时候你在关键时刻必须下毒手。”

猎杀名单列出的是追杀的目标；但苏哈托更恶名昭彰的屠杀是针对非特定人，其中大部分是假借狂热派宗教学生之手进行。他们接受军方的短期训练，然后派到许多村庄，听从海军司令的指示以“扫除”乡间的共产党员。有一位记者写道：“他们兴致勃勃地召唤追随者，把刀子和手枪塞在腰间，肩上扛着棍棒，出发执行他们期待已久的任务。”在短短一个月间，至少有50万人遭杀害，甚至多达100万人。据《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人遭屠杀”，在东爪哇，“来自那些地区的旅客描述，小河和溪流浮满死尸；有些地方的河上运输因而受阻”。

印度尼西亚经验吸引在华府和圣地亚哥密谋推翻阿连德的人的注意，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苏哈托的残暴，还有一群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受教育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被称为“柏克莱帮”（Berkeley Mafia）。苏哈托在铲除左派上成效显著，但为他拟订印度尼西亚日后经济蓝图的则是柏克莱帮。

这与芝加哥男孩的相似实在太明显。柏克莱帮在美国读书是因为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赞助者是福特基金会。他们回国也建立一个忠实翻版的西方式经济学系，地点则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福特派遣美国教授到雅加达建立这所学系，就像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圣地亚哥协助设立经济学系。福特国际训练与研究计划主任霍华德（John Howard）直率地解释：“福特觉得是在训练苏加诺下台后可以领导国家的人。”

福特资助的学生变成参与推翻苏加诺的校园团体领袖，而柏克莱帮在政变前也与军方密切合作，负责拟订万一政府突然垮台的“应变计划”^{*}。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对苏哈托将军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苏哈托对高层次的财政一窍不通。据《财富》杂志报道，柏克莱帮把经济课录在录音带上，让苏哈托在家里听。一位柏克莱帮成员得意地回忆，当他们会面时，“苏哈托总统不只是听，还做笔记”。另一位柏克莱毕业生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我们“对陆军领导阶层——新秩序的关键人物——提出处理印度尼西亚重大经济问题的‘食谱’或‘秘方’。苏哈托将军是最高陆军指挥官，他不但接受这份食谱，还希望食谱的作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他确实这么做。苏哈托的内阁充满柏克莱帮成员，他把所有主要财政职位交给他们，包括贸易部长和驻华府大使。

^{*}不是每个该计划派遣出去的美国教授都喜欢这个角色。被指派担任福特印度尼西亚经济计划主持人的柏克莱教授杜伊尔（LenDoyle）说：“我觉得柏克莱大学不应参与基本上已变成叛乱的活动。”这种观点导致杜伊尔遭撤换并召回加州。

这个经济团队在一所意识形态较不鲜明的学校受教育，因此不是像芝加哥男孩那种反国家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政府应致力于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经济，确保稻米等基本物资的价格人人负担得起。不过，柏克莱帮对想挖掘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矿产与石油的外国投资人极尽欢迎能事，尼克松因此形容印度尼西亚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奖赏”。^{*}他们通过容许外国公司独资拥有这些资产的法律，授予它们“税务假期”，以致在两年内，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铜、镍、硬木材、橡胶和原油——开始遭到全球各大矿业和能源公司瓜分。

^{*}有趣的是，哈伯格在1975年被苏哈托的财政部聘为顾问。

对于在苏哈托的计划展开时正策划推翻阿连德的人来说，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是极为有用的对照研究。巴西人很少利用休克的力量，他们等了数年才展现对残暴的兴趣。这是几乎致命的错误，因为那给了对手重新集结的机会，甚至形成左派的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扫荡街道，但反对势力头迫使它减缓经济计划。

另一方面，苏哈托证明，如果及早采用大规模镇压，国家将陷入某种休克状态，抗拒必须在还没发生前就加以铲除。他利用恐怖如此无情，甚至远超过最糟的预期，以致那些几周前还集体呼吁国家独立的人，现在都吓得把所有掌控权交给苏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变那段期间担任中情局行动部高级主管的麦克基（RalphMcGehee）说，印度尼西亚是“典型的运作手法……你可以追踪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头，从华盛顿一路到苏哈托上台。这种手法的成功意味着它可以一再重复使用”。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在政变前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伙伴关系。由于他们已准备好在新政府担任高级“技术官僚”，并且已让苏哈托接受他们的世界观，政变所达成的不只是去除国家主义者的威胁，它还把印度尼西亚转变成全世界最欢迎跨国公司的环境。

罢黜阿连德的势力开始逐渐累积，圣地亚哥街头的墙壁开始出现怵目惊心的警告：“雅加达来了。”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

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 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第二篇：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弗里德曼的理论带给他诺贝尔奖，却为智利带来皮诺切特将军。

——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a），《爱与战争》，1983年

我认为我从不曾被视为“邪恶”。

——《华尔街日报》引述弗里德曼，2006年7月22日

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君王论》，1513年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中攻击。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 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虽然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24枚火箭。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覆盖着用担架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勒特里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战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阿连德被发现时，头部已炸得支离破碎，至今仍有人议论他究竟是被射进总统府的子弹打死，或他是自杀身亡，不想留给智利人他们的民选总统向叛军投降的最后印象。后者是较可信的说法。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一群本土的“内敌”。事实上，真正变成内敌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遭逮捕，而且未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勒特里尔和其他“贵宾”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

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闭政府对智利的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

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新主席宣布说。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mal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部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宣称，第一个休克治疗实验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的西德。当时西德财政部长埃尔哈德（Ludwig Erhard）取消大部分价格管制，并引进新货币。这些措施既突然又未事先警告，对德国经济造成强大震撼，导致广泛的失业。但模拟也仅止于此：埃尔哈德的改革只限于价格和货币政策，并未伴随削减社会计划或迅速引进自由贸易，而且也采取许多保护大众免于冲击的措施，包括提高薪资。甚至在震撼之后，西德仍完全符合弗里德曼对准社会主义福利国的定义：西德仍提供住房补贴、政府年金、公共医疗和国营教育体系，政府也经营并补贴从电话公司到制铝厂等各类企业。推崇埃尔哈德发明休克疗法是很动听的说法，因为他的实验发生在西德刚从暴政中得到解放。不过，埃尔哈德与今日经济休克疗法的全面变革截然不同——后者的方法由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首创，而且发生在刚失去自由的国家。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

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n ation of owners）。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内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联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

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阵子，下一针来自拉丁美洲南锥的其他国家，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在那里快速扩散。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几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学生位居要津。弗里德曼1973年访问巴西的时候，正是当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时候，他也宣称巴西的经济实验是“一项奇迹”。在乌拉圭，军方1973年发动政变，并在次年决定走芝加哥路线。由于乌拉圭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太少，将领们邀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和（经济学教授）史佳斯塔德（Larry Sjaastad）及他们的团队，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学生，来改革乌拉圭的税制与商业政策”。乌拉圭过去的平等主义社会立即遭到冲击：实质工资锐减28%，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编按：乌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现成群的拾荒者。

紧接着加入实验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军政府从庇隆手中夺得政权。这表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曾经是发展主义橱窗的国家——现在都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而且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活体实验室。

据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将领夺取政权前几周，他们与皮诺切特和巴西军政府联系，并“拟订未来政权将采取的主要步骤”。

尽管有紧密的协调合作，阿根廷军政府并未像皮诺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实验；例如，它未把该国的石油蕴藏或社会安全私有化（这些都在后来才实行）。不过，在攻击曾把阿根廷贫民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政策和机制方面，军政府都遵循皮诺切特的做法，这也要归功于众多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参与芝加哥计划。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军政府占据重要的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央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以及数个较低级的经济职位。不过，虽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热烈参与军政府，最高经济职位却由狄霍兹（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担任。狄霍兹是隶属农村社会组织（Sociedad Rural，是长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经济的牧场协会）的地主阶级，这些相当于阿根廷贵族阶级的家族宁愿维持封建经济秩序——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肉类的价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负担得起。

狄霍兹承袭他的父亲和祖父，长期担任农村社会组织主席；他也担任数家跨国企业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当他环顾自己在军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信这场政变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反抗，是对40年来阿根廷劳工势力扩张的反革命。

狄霍兹当上经济部长的第一项措施是禁止罢工，以及容许雇主任意裁撤员工。他取消价格管制，导致食物价格飙升。他也决定再度让阿根廷变回欢迎外国跨国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资所有限制，并在初期几年出售数百家国营企业。这些措施为他赢得许多华盛顿的强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显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政变后不久告诉他的长官基辛格：“狄霍兹是个好人。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咨询关系。”基辛格大为赞赏，因此在狄霍兹访问华盛顿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会面，以表达对他的礼遇。基辛格也表示愿意打几个电话，提供对阿根廷经济的协助。“我会打电话给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诉军政府的外交部长，洛克菲勒当时担任大通银行总裁。“我也会打电话给他哥哥，美国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为吸引投资，阿根廷在《商业周刊》刊登31页的广告增刊，由公关业巨擘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制作，在广告上宣称“历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励民间投资……我们正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我们正寻找伙伴。我们正挣脱国家统治主义的桎梏，并深信民间部门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军政府如此急切地想把国家变卖给投资人，甚至在广告上说“60天内动土的土地价格打折10%”。

同样的，平民大众遭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在一年内，工资损失40%的价值，工厂关闭，贫穷蔓延。在军政府掌权前，阿根廷的贫民人数比法国或美国少——只有9%——失业率只有%。现在这个国家开始出现被视为落后的发展不足迹象，贫穷的小区没有水供应，可预防的疾病四处蔓延。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过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诉诸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他们，带他们到隐秘的集中营，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尸体被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就会让社会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踪已成为南锥各国芝加哥学派军政府的主要执法工具——而最热切采用这种做法的是盘踞阿根廷总统府的将领。到他们统治结束时，估计失踪的人数已多达3000人，其中有许多跟智利的失踪者一样，是从空中被抛进拉普拉塔河（RiodelaPlata）混浊的水里。

阿根廷军政府擅长于公开与私下制造恐怖双管齐下——公开进行恰到好处的恐怖，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同时也隐瞒足够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认。在掌权初期，军政府便清楚展现它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一个人被从一辆福特猎鹰轿车（一种因为秘密警察使用而恶名昭彰的汽车）推出，然后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著名的地标、高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众目睽睽下被机枪打死。

从此以后，军政府的杀戮转入地下，但永远在进行中。许多人目睹官方否认的失踪，整个街坊也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每当有人被列为消灭目标，就会有一队军方车辆出现在那个人家门口或工作场所，整个街区被划为警戒区，经常上空还有一架嗡嗡盘旋的直升机。在大白天和邻居注视下，警察或士兵撞开大门，拖出受害者，他们在被推进等候的福特猎鹰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传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动还更嚣张：大家都知道警察会登上拥挤的市公交车，抓住乘客的头发拖下车；在圣塔菲市（SantaFe），一对夫妻结婚当天在教堂的圣坛前，当着满室的宾客被绑架。

在大众间展示的恐怖不限于逮捕。一旦遭羁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个遍布全国的酷刑集中营。许多集中营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最恶名远播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闹区大街一家歇业的运动俱乐部，一个位于中部布兰卡港（BahiaBlanca）的学校校舍，另一个则在一所营业中的医院侧厢建筑。在这些酷刑中心，军方车辆经常深夜疾驶进出，尖叫声不时从隔音不佳的墙内传出；有人目睹身体形状的怪异包裹被搬进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蝉的附近居民眼中。

乌拉圭的政权也同样肆无忌惮：该国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个海军兵营，毗邻许多蒙得维的亚市民众喜欢散步与野餐的海滨区，但在独裁统治期间，这个美丽的地方空无一人，因为居民不想听到尖叫声。

阿根廷军政府在处理受害者方面特别笨拙。在乡间散步可能以一场惊吓收场，因为集体坟场经常掩盖不全。尸体可能出现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齿（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况），或者可能被冲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边，在军政府的“死亡飞行”后，经常一次出现半打尸体。它们甚至会从天而降，被直升机丢到农户的田里。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况下，目睹他们的同胞惨遭抹除，但大多数人宣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年内心明白、却因恐惧而闭上眼睛的矛盾：“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否认的事。”

由于各国军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难到邻近国家，这里的政府便借恶名昭彰的大兀鹰行动（OperationCondor）彼此合作。南锥国家的情报单位在这个行动中分享“颠覆分子”的信息——靠华盛顿提供的最新式计算机系统帮忙——并且给彼此的情报员自由出入边界，以方便绑架和刑讯。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规引渡”网络，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拉丁美洲的行动模仿自希特勒的“夜与雾”（NightandFog）。1941年，希特勒下令在纳粹占领国家俘虏的反抗军必须带到德国，并且让他们“消失在夜与雾”中。由于有数名高阶纳粹军官逃到智利和阿根廷，有人揣测他们可能训练南锥的情报单位使用这些技巧。

军政府也交换如何从囚犯榨取信息的方法。政变之后数天曾被关在体育馆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

描述当时房间里有巴西士兵，建议如何以最科学的方法施加痛楚。

这段期间南锥国家有许多机会可进行这类交流，有些还透过美国，并牵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国参议院调查美国干预智利，发现中情局训练皮诺切特的军队“控制颠覆分子”的方法。美国训练巴西和乌拉圭警察审讯技术，也出现在许多文件的记录。巴西法院的证词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巴西：毋忘教训》

（Brazil:NeverAgain）说，部队军官参加陆军宪兵单位举办的正式“刑讯课程”，观赏幻灯片展示各种折磨方法。在这些课程中，囚犯被带进来作“现场展示”——在多达100名陆军士官观看和学习下，被残暴地刑讯。报告说，率先把这种做法引进巴西的是美国警官米特廖内（DanMitrione）。巴西军政府掌权初期，他在贝罗奥里藏特

（BeloHorizonte）担任警方教官，经常从街上抓来乞丐在教室折磨，让当地警察学习如何制造囚犯身体与心理的极度矛盾。米特廖内后来转到乌拉圭担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图帕马洛（Tupamaro）游击队绑架并杀害。图帕马洛是极左派革命团体，他们策划掳杀米特廖内，以揭露他参与酷刑训练。*他的一名学生说，米特廖内就像中情局手册的作者那样，坚称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学。他的座右铭是：“正确的痛苦，正确的剂量，在正确的地方。”

*这段历史被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当作蓝本，在1972年拍成《戒严令》（StateofSiege）这部精彩的电影。

酷刑训练的成果，在这段阴暗期所有南锥的人权报告都斑斑可考。它们再三证实库巴克手册上记录的独门手法：清晨的逮捕、戴头巾、严格的隔离、施药、强迫裸体、电击等。而且在每个地方，麦吉尔大学的刻意引发退化实验，都留下恐怖的痕迹。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Grimaldi）监狱看到——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随时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Rosencof）回忆说。他在11年半期间总共看到太阳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期间被剥夺到他“忘记颜色——当时没有任何颜色”。*

*自由城的监狱管理当局与行为心理学家密切合作，设计专为个人心理特质定作的刑讯技术——这种方法现在被用在关塔那摩湾。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学校，隔离室被称作头罩（capucha）。在头罩里待三个月的米兰达（JuanMiranda）告诉我那个黑暗的地方说：“他们把你套上眼罩和头罩，手和腿锁上链子，让你在监狱的顶楼整天躺在泡棉垫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们以夹板隔开。守卫带食物进来时，他们命令我面对墙壁，然后取下头罩让我吃东西。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坐起来的时候；其他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躺着。”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关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称作管子），以隔绝他们的知觉。

隔离房里唯一的安慰是审讯室里更糟的待遇。南锥地区所有军政权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术是电击。电流通过囚犯身体的方式有数十种变化：用一般电线、军方野地电话线、从插入指甲下的针通电；把通电的夹子夹在牙龈、乳头、生殖器、耳朵、嘴巴、伤口；通电到泡在水里的身体以强化电流；通电到绑在台子或巴西式铁“龙椅”的身体。拥有牛群的阿根廷军政府对他们独特的贡献很自豪——囚犯在一张称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属床上接受电击，同时用赶牛棒刺他们。

体验南锥酷刑体制的人数无法精确计算，但约略的数字在10万人到15万人之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杀害。

一位困难时期的目击证人

在那个年代身为左派分子注定会被猎杀。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抢先秘密警察一步，过一种依靠藏匿所、电话密语和假身份勉强度日的生活。靠这种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该国传奇性的调查记者华尔特（Rodolfo Walsh）。这位喜爱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说作家以及得奖的短篇小说作者；他也是超级侦探，能破解军方密码，反过来调查周遭窥伺的特务。华尔特最成功的调查发生于他在古巴当新闻记者时，他在那里拦截并破解一份中情局的电报，因而揭发猪猡湾侵略计划。这个信息让卡斯特罗能够防备美国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军政府禁止庇隆主义并钳制民主时，华尔特决定加入武装的蒙特内罗（Montonero）运动，担任他们的情报专家。*华尔特因此而名列军政府猎捕名单的榜首，而每次名单上有人被划掉，他就得更担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报，会引导警察找到他和伴侣费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庄。

*蒙特内罗运动的成立是为了对抗前独裁政权。庇隆主义被禁止后，流亡的庇隆呼吁年轻支持者武装起来，为恢复民主而战斗，而他们也纷纷响应号召。蒙特内罗运动虽然从事武装攻击和绑架，但对迫使阿根廷1973年举行有庇隆派候选人参选的民主选举，贡献却很大。不过，庇隆夺回大权后，却感觉受到蒙特内罗运动广受支持的威胁，因此鼓励右派行刑队搜捕他们，使这个备受争议的团体到1976年政变时，势力已经大幅削弱。

华尔特从他遍布各地的消息来源，尝试追踪军政府的许多罪行。他编纂死者和失踪者名单，记录集体坟场与秘密酷刑中心的地点。他自认对军方了如指掌，但1977阿根廷军政府加诸同胞的狂暴与残酷，仍令他大感震惊。在军事统治的第一年，他的数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营消失，他26岁的女儿维基也身亡，令华尔特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猎鹰盘旋下，宁静的早晨对他而言是奢想。华尔特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于是想出纪念即将到来的军政府统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报纸一片歌功颂德中，他要亲自写下未受检查的报道，揭发导致他的国家沉沦的种种恶行。这篇文章的标题将是“一位作家给军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华尔特写道，写这篇文章“并不指望有人听，而且确定会遭到迫害，但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诺，要为苦难的时代作见证”。

这封信将成为对国家的恐怖手段和它们所服务的经济制度最强烈的谴责。华尔特计划用过去他散布地下公报的方式，散布他的“公开信”：印制十份，然后从不同的邮箱寄给挑选的联络人，由他们进一步散布。“我想让那些混蛋知道，我还在，还活着，而且还能写。”他坐在他的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前告诉费雷拉。

信一开始就记叙将领们的恐怖活动，它们使用“没有止境、精密复杂而且极大量的酷刑”，并由中情局参与训练阿根廷警察。在详细列出惨不忍睹的方法和坟场地址后，华尔特突然改变语气：“然而，这些已激发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们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才真正让人发现，它不但解释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计划性悲剧（planned misery）以惩罚数百万人的穷凶极恶……只要花几个小时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这种政策多快就把这个城市变成1000万人口的贫民窟。”

华尔特描述的体系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一个即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模式。随着它未来数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后它将把半数的人口推到贫穷线下。华尔特发现它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个审慎执行的计划——“计划性悲剧”。

这封信签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变满一周年。第二天早上，华尔特和费雷拉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分头把信投入市区各处的邮箱。几个小时后，华尔特赶赴他与一位失踪同僚的家人安排的会面。结果这是

一个圈套：有人在刑讯中招供，十名武装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华尔特。“活捉那个杂种，他是我的。”三名军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马塞拉（Emilio Massera）海军上将据说这样命令士兵。华尔特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恶；被捕才是罪恶。”他立即拔出枪，开始射击。他枪伤一名士兵，逼他们开火；当汽车开到海军机械学校时，他已气绝身亡。华尔特的尸体被火焚烧，然后丢入河中。

“反恐战争”的封面故事

南锥的军政府毫不掩饰想改造社会的革命野心，但它们仍精明地公开否认华尔特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达成经济目标。然而，这些经济目标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吓大众和铲除障碍的体制，势必激起公众的反抗。

国家进行的杀戮逐渐揭露后，军政府的理由是它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凶险的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的战争，幕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资助和操控。如果军政府使用“肮脏”手段，那是因为它们的敌人更凶残。马塞拉上将使用今日听来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语言，称呼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对抗暴政的战争……一场由爱生命者对抗爱死亡者的战争……我们是在对抗虚无主义者，对抗毁灭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毁灭本身，虽然他们以社会十字军作为掩饰”。

在智利政变策划期间，中情局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独裁者，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利用宪法体制下的民主夺取权力，但却准备实施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智利人民将无法逃脱被钳制的命运。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和图帕马洛——被指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威胁，导致将军别无选择，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国家，并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镇压它们。

在每个例子中，威胁都被极度扩大，或完全由军政府捏造。在众多揭发的真相里，美国参议院1975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显示，阿连德并未威胁到民主政治。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和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它们是广获支持的武装组织，有能力对军队和企业目标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在军方取得绝对权力时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在持续长达七年的独裁政权头六个月，就已被消灭（这是华尔特必须躲藏的原因）。国务院解密的文件证明，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已被瓦解”，但军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后仍继续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失踪。

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也把在南锥的“肮脏战争”，描述成军方与凶恶的游击队间的战争，偶尔战斗会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华盛顿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2006年3月，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SA）公布一份刚解密的国务院会议记录，会议日期就在阿根廷军政府发动1967年政变的两天前。在会议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我们必须预期阿根廷不久后会出现大镇压，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们必须下手很重，不只对恐怖分子，也对工会和政党的异议分子。”

他们果然这么做。南锥恐怖政权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不是武装组织的成员，而是在工厂、农场、贫民窟和大学工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经济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左派政党的坚贞支持者。他们遭杀害不是因为拥有武器（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诞生当代资本主义的南锥，“反恐战争”是一场铲除这个新秩序所有障碍的战争。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专制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双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许多国家的刑法禁止种族屠杀行为，包括葡萄牙、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定义中清楚包括政治群体或“社会群体”。法国法律规范甚至更广，把种族屠杀定义为，意在摧毁“一个以任何独断标准决定的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人。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

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玻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作者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入起杀鸡儆猴作用。”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整肃。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作“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仔细”，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as），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特别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e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由于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受刑责”，并很快以无与

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作证说，一个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将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卓伊安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这种手段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工厂内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遭电击。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月。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期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其在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卓伊安尼说。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从此未再寻获。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赖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空前的获利。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小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作者，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面对的危险。”这种“新国家面对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杀害。2006年终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镇压。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促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罗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dela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升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当政策尝试把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切除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将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社论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电击治疗因此绕了一圈，回到最早出现时被当作一种驱魔技术。最早的医疗电刑始于18世纪的一位瑞士医生，他相信精神疾病是由魔鬼造成，于是让一名患者抓住一条以静电机供电的电线，对每一个魔鬼施以电击一次。这名患者当时被宣告治愈。

整个区域内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拜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越神学”。

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是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用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怜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打破个性的现代版也出现在美国管理的监狱，在这里则是伊斯兰信仰被用于对付穆斯林囚犯。堆积如山的证据从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流出，有两种虐囚方式不断被提起：裸体和刻意干扰伊斯兰习俗，包括强迫囚犯剃胡须、践踏《古兰经》、用以色列旗帜裹住囚犯、强迫男性摆同性性交姿势，甚至用假经血涂抹男性。前关塔那摩囚犯贝格（MoazzamBegg）说，他经常被剃胡须，一名警卫会说：“这是最让你们穆斯林受不了的，是不是？”伊斯兰信仰被亵渎不是因为警卫恨它（虽然有此可能），而是因为囚犯爱它。由于酷刑的目的是再造个性，任何构成囚犯个性的东西都必须去除——从衣服到珍视的信仰。在70年代是攻击社会团结；在今日则是攻击伊斯兰信仰。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营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转移一个群体的儿童到另一个群体”。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营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5月广场的祖母（AbuelasdePlazadeMayo），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营里遭杀害。盗窃婴儿并非出于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作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小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iasPacífico）地下室，惊悚地误闯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珠宝，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Dior）、劳夫罗伦（RalphLauren）到耐吉（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本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营上。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以自由。

—贾利安诺，1990年

有一阵子，南锥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作者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勒特里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应该为政策的人力损失负责。在那几年间，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勒特里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接受表扬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汀特纳（Gerhard Tintner）。汀特纳比较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下的德国，得出的结论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不过，谈到他们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人力损失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这是公然篡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勒特里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作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被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成狭隘的“侵犯人权”，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进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

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写出，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各自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记录了军政府的残暴，并因此使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奖，但却充分暴露范围狭隘的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对“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在检验证据后，报告作出结论说，左派游击队造成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未加着墨。事实上，在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作者。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本身面临失踪的危险。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著名的是5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亲们”著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在独裁统治结束后，“5月广场的母亲”变成阿根廷新经济秩序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作者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学习使用“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即使采取这类预防措施，人权主义者仍无法免于恐怖迫害。智利的监狱关满人权律师，而在阿根廷，军政府派遣一名高级酷刑手渗透到“5月广场的母亲”组织，假扮成悲伤的家属。在1977年12月，该组织遭突击；12位母亲永远失踪，包括组织领导人达文森提（Azucena de Vicenti）和两位法国修女。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那些行动主义者有他们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

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期间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部经济系学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当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枪杆下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它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却扮演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却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这是在短短几年内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学系里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福特基金会训练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出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两个计划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以法律手段为“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奋斗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干部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会直接溯及福特

基金会，以及它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在1950年代，福特基金会经常扮演中情局的门面组织，允许中情局输送资金给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艺术家，而这些人并不知道钱来自何处，这种做法在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写的《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中斑斑可考。国际特赦组织并未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最激进的拉丁美洲人权捍卫者“5月广场的母亲”也未在资助名单。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透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期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努力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谁能获利？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传述的方式，这种局限扮演了破坏的角色，导致它们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大体上被遗漏。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反映在这段期间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根据的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作者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大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纳（Claudia Acuna）告诉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完全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侵犯人权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华尔士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以一个比喻来看，拉丁美洲南锥在70年代发生的事被以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纳告诉我：“那就好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加上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克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透过选举而取得政权也能适用。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理密（Gisele Halimi）为数名遭强暴并在监狱受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

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对遏阻使用它们的人也丝毫未产生影响。”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也表达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暗示了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 / 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并经常使用。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

这个问题最动人的证词之一来自托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烟农兼前阿根廷农地联盟秘书长，曾遭到酷刑和监禁长达五年，并牵连他的妻子和许多朋友及家族成员。*1990年5月，托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农业省份柯利安特斯（Corrientes），准备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发表意见，该法庭当时正听取独裁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证词。托马塞拉的证词与其他人不同，他穿着农场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听众前，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一方是想要土地以开辟合作农场的贫穷农民，另一方则是势力庞大、拥有当地省份一半土地的牧场业主。“战线是连续不断的--那些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的人，继续借他们的封建结构压迫我们。”

*有关这段记述，我必须感谢费德罗维兹发人深省的书《恐怖词典》（A Lexicon of Terror）

他坚称自己与农地联盟的会员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联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令我们害怕，但经济战争和武装冲突一样恐怖。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经济战争是持久的折磨，其破坏力的可怕不亚于文学作品描述的战争。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过另一种战争，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其致命的影响……反战的运动声势浩大，我祈求它能成功，但我忍不住忧心如焚，害怕如果它未能触及所有邪恶的根源——人的贪婪——则运动终归于失败。

——甘地，《非暴力——最伟大的力量》（Non-Violence: The Greatest Force），1926年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元首即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人。

--施密特（Carl Schmitt），纳粹法学家

芝加哥学派的守护圣人哈耶克1981年访问智利回国时，他对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让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国家为模型来转变英国的凯恩斯经济体制。撒切尔和皮诺切特后来建立坚定的友谊，皮诺切特面对大屠杀、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控诉后，撒切尔还曾亲往探视这位遭软禁的老将军。

撒切尔很熟悉她所称的“智利经济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改革典范，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训”。但尽管她对皮诺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议她仿效休克疗法政策时，撒切尔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尔在一封给她的思想导师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释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施民主体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议，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这里相当不可行。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程序可能显得缓慢得令人受不了。”

结论是，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在英国这种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尔当时第一任任期已进入第三年，民调数字滑落，因此绝不会采取哈耶克提议的激进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选举惨败的风险。

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运动，这是令人失望的评估。南锥的实验已带来如此可观的获利，虽然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新领土的胃口却极其饥渴--不仅是对发展中世界，也对西方的富裕国家，在那里国家掌控的资产还更丰饶，可以转变成营利的事业：电话、航空、电视频道、电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动这个目标，那就非英国的撒切尔或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莫属。

1981年，《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赞扬“智利的里根经济学美丽新世界”，称许圣地亚哥“闪闪发亮、满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崭新发亮的日本汽车”，但对遍及各地的镇压和贫民窟快速扩展却视若无睹。文章问：“我们从智利的正统派经济实验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小型未开发国家能借竞争优势理论生存，那么我们资源远为雄厚的经济当然也能。”

不过，就像撒切尔给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民选领导人必须担心选民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尔掌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响力的顾问，在南锥以如此凶残的暴力实施的激进经济政策，能不能在英国和美国推动仍是一大问题。

时间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运动曾遭到重大挫折，而当时掌权的人是尼克松，这次挫折似乎已证实上述这一点。虽然尼克松曾协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权力，在国内他却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弗里德曼日后从未原谅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时，弗里德曼以为他领导国内反革命对抗新政遗绪的时代终于来临。弗里德曼写信给尼克松：“很少总统表达的思想，与我的理论如此契合。”两人定期在椭圆办公室会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几位与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担任重要经济职务。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兹（George Shultz），由弗里德曼协助招揽来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当时37岁的拉姆斯菲尔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的座谈会，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诚恭敬的语气描述的聚会。拉姆斯菲尔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称“小狗”（young pups）的人则“进来趴在他们脚下学习……我感觉自己如此受到恩宠”。有得意门生制定政策，加上与总统紧密的私人情谊，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构想即将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付诸实行。

然而在1971年，美国经济陷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推升物价飙涨。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实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建议，数百万愤怒的人民将投票让他下台。他决定设定基本民生项目的价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气急败坏：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价格控制绝对是最恶劣的。他形容它们是“能摧毁经济体系运作能力的癌症”。

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这些凯恩斯政策的执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同时，他对当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局长的舒尔兹负责。有一次，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在白宫的拉姆斯菲尔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据拉姆斯菲尔德转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这位新手技术官僚回答说，政策似乎很管用--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经济开始成长。弗里德曼驳斥那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会想到是你在做这些.....他们会学到错误的教训。”民众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在次年以60%的选票让尼克松连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还继续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统派理论，通过一连串新法以实施更高的产业环保与安全标准。“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也是对弗里德曼最无情的一刀。这种背叛之痛，深切到让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为“20世纪美国最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 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 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斯）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 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

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 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政商财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维纳斯（Malvinas）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在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从军事观点，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场战争。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格尔蒂埃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格尔蒂埃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上，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发现那是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这之前，她只表达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颇不以为然。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显然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班恩（Tony 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内部本身的政治歧见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英国没落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表示“甩掉这婊子”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的T恤销路却一路长红。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摊牌。撒切尔不理睬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日后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应，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不感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果。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捧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过程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的选举打下压倒性胜利的基础。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企业行动”（Operation 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政商财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不得不对抗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现在我们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派遣8000名挥舞警棍的镇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纠察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者达到数千人。正如《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密恩（Seumas 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史卡吉尔（Arthur 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遭到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家，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干部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

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 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而备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破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站在冲突第一线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这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毁灭性的挫败，并对其他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撒切尔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生产较不重要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航管员不肯上工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企业行动”。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将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泽详细解说这种哲学：“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以作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值得努力实现。”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根据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推与拉--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十分严重--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

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 zone）--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协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市场崩盘可扮演革命性改变的触媒这种想法，在极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为人熟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把大众更进一步带向资本主义本身的毁灭。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传承的左派分子，随时在预测资本主义会在何种情况陷于“危机”，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远在等待开悟的迹象。在80年代中期，这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开始经历强烈的复苏，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接手，宣称就像市场崩盘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们也可以用来激发右派的反革命。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危机假说”。

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兴趣显然也是想向大萧条后左派的胜利学习：市场崩溃后，过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凯恩斯及其门徒，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业赞助者曾尝试效法这个过程，准备好他们独家品牌的灾难理论。他们不辞劳苦地建立一个新右派智库网络，包括传统基金会与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十集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电视节目--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赞助，包括盖帝石油（Getty Oil）、泛世通轮胎（Firestone）、百事可乐、通用汽车、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当下一个危机发生时，弗里德曼决心要让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经准备好理念和解决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机理论的80年代初，美国正陷于经济衰退，受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而今日称作里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政策，在华盛顿确实势力庞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实行弗里德曼梦想的全面休克治疗，如同他在智利所开出的药方。

同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将再度成为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试验场--这一次将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带领，而是新一代的震撼医生，一种较适合新民主时代的震撼医生。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玻利维亚的情势可以很贴切地以罹患癌症的病人来比喻。他知道自己面对最危险和痛苦的手术，因为货币稳定措施和几种别的措施无疑是既危险又痛苦。然而他别无选择。

—森达格 (Cornelius Zondag)，美国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1956年

在政治论述中使用癌症会鼓励宿命论，以及为“严厉的”措施合理化——同时大为强化这种疾病必然会致命的普遍看法。疾病的概念从来就不单纯。但值得争论的是，癌症的隐喻本身就隐含着集体屠杀。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7年

1985年，玻利维亚置身于席卷发展中世界的民主浪潮。在之前21年中有18年，玻利维亚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在全国大选中选择自己的总统。

不过，在这个特定时机赢得掌控玻利维亚的经济大权，看起来像是惩罚而非奖赏：它的债务高到玻利维亚积欠的利息超过国家总预算。在一年前的1984年，里根政府资助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攻击该国种植可提炼出古柯碱的古柯农，而把这个国家推到边缘。这场围剿把玻利维亚的一大部分变成战区，不只是断绝了古柯交易，也切断约半数的出口收入，引发经济崩盘。正如《纽约时报》报道：“陆军在8月开进查帕尔 (Chapare)，截断毒品走私资金的路线时，震波立即重创欣欣向荣的美元黑市……占领查帕尔不到一周，政府被迫调降比索的官方汇价超过一半。”几个月后，通货膨胀上扬十倍，成千上万人离开这个国家，前往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找工作。

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14000%），玻利维亚进入它历史性的1985年全国选举。玻利维亚人对这场选举的两位竞争者都很熟悉——一位是他们的独裁者班塞尔 (Hugo Banzer)，另一位是前民选总统埃斯登索罗 (Victor Paz Estenssoro)。得票数极为接近，最后结果将交由玻利维亚国会决定，但班塞尔的政党相信他们已经获胜。在结果尚未宣布前，班塞尔的政党求助于一位籍籍无名的30岁经济学家萨克斯 (Jeffrey Sachs)，请他拟订一套反通货膨胀经济计划。萨克斯是哈佛经济学系蹿升的明星，曾获得许多学术奖项，并且是哈佛历来最年轻的终身职教授。几个月前，玻利维亚政界的代表团访问哈佛，萨克斯抓住这个机会；他对他的虚张声势印象深刻——他告诉代表团，他可以一天内扭转他们的通货膨胀危机。萨克斯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但他自己承认，对于通货膨胀，“我以为我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

萨克斯曾深受凯恩斯的著作影响，尤其是诠释恶性通胀与法西斯主义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蔓延的关系。德国接受的和平协议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1923年高达325万个百分点的恶性通胀——接着几年后又发生大萧条。在失业率30%和举国弥漫国际阴谋论的愤怒下，德国变成孕育纳粹主义的沃土。

萨克斯喜欢引述凯恩斯的警句：“要推翻既有的社会基础，没有比让货币贬值更阴险、更容易的方法了。这个过程牵涉所有经济法则看不见的破坏力量。”他与凯恩斯的看法一致，认为尽一切努力压制这些破坏力量是经济学家的神圣职责。“我从凯恩斯学到的是，”萨克斯说，“世界可能完全脱序这种深沉的悲哀和危机感，还有我们让德国陷入绝望状态实在蠢到无以复加。”萨克斯也告诉新闻记者，他认为凯恩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是他追求事业生涯的典范。

虽然萨克斯认同凯恩斯以经济学的力量对抗贫穷的信念，他也深受里根时代的美国影响；在1985年，美国正值一波由弗里德曼领导、反对一切凯恩斯所代表事物的浪潮。芝加哥学派宣扬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市场，已迅速成为常春藤名校经济学系理所当然的正统思想，包括哈佛大学，而萨克斯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景仰弗里德曼“对市场的信心，他永远坚持良好的货币管理”，说它“远比模糊的结构主义论述，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常听见的伪凯恩斯论述正确”。

那些“模糊的”论述，正是十年前在拉丁美洲遭到暴力镇压的相同论述——也就是相信为了摆脱贫穷，拉丁美洲必须以土地改革、贸易保护与补贴、自然资源国有化，以及工作场所合作化经营等干涉主义政策，打破殖民时代的所有权结构。萨克斯没有时间推动这类结构化改革。因此虽然他对玻利维亚及其殖民剥削与镇压原住民的悠久历史，以及1952年的革命辛苦得来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仍然相信除了恶性通胀外，玻利维亚受到“社会主义浪漫思想”的茶毒——与30年前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尝试在南锥打造发展主义乌托邦一样。

萨克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家不同之处是，他相信自由市场政策必须有免除债务和大量援助的配合——对这位

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来说，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还不够。这个歧异最后导致萨克斯与他更放任主义的同僚分道扬镳，专心一意在援助上。但这个歧异是在多年以后才出现。在玻利维亚，萨克斯的混种意识形态只造成一些奇怪的矛盾。例如，他在拉巴斯（LaPaz）下了飞机，第一次呼吸安第斯山稀薄的空气时，他想象自己是现代的凯恩斯降临，来拯救玻利维亚人民免于通胀带来的“混乱和失序”。*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教义是，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应该花钱刺激经济，萨克斯却反其道而行，主张政府在危机中厉行节约和提高价格--与《商业周刊》当年形容智利政权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采用同样的紧缩药方。

*打败恶性通胀并未拯救德国免于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这个矛盾在萨克斯不断使用此一模拟时从未提及。

萨克斯给班塞尔的建议直截了当：只有突然的休克治疗可以治好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他提议提高石油价格十倍，以及解除一系列的物价管制，并削减预算。在对玻利维亚美国商会的演说中，萨克斯再度预测他可以在一夕间终结恶性通胀，并报告说：“听众感觉很惊讶，并对这种预测很满意。”和弗里德曼一样，萨克斯坚决相信，在突然的政策休克下，“经济可以从绝路重新找到方向，从社会主义的绝路，或严重贪腐的绝路，或是中央计划的绝路，重新走向正常的市场经济”。

在萨克斯作出这些大胆承诺时，玻利维亚的选举仍在未定之数。前独裁者班塞尔对胜选信心满满，但他的对手埃斯登索罗仍未放弃。在竞选期间，埃斯登索罗并未提出如何克服通胀的具体办法，但他曾三度担任玻利维亚的民选总统，最后一任是在1964年被一场政变推翻前。埃斯登索罗是玻利维亚发展主义改革的代表，他把大矿场收归国有，并开始把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农民，同时争取让所有玻利维亚人拥有投票权。和阿根廷的庇隆一样，埃斯登索罗是一位个性复杂、在政坛上无役不与的人物，经常为了抓住或重新掌控权力而突然改变忠诚。在1985年的选举，老迈的埃斯登索罗宣誓效忠他过去的“国家主义革命”，并对财政方针作出模糊的声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至少玻利维亚人这么认为。

由于谁将出任总统的最后决定将交给国会，这段期间党派和国会参众两院展开密室谈判，进行赌注极高的讨价还价。结果一位新当选的参议员桑契斯（Gonzalo Sanchez de Lozada）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很久，甚至说西班牙语时会夹带浓重的美国口音。桑契斯返回玻利维亚时成了该国最富有的商人，拥有玻利维亚第二大民间矿场，且不久后将变成第一大。桑契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却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并且发现这套思想可以为矿业带来庞大的获利，而玻利维亚的矿场在当时大部分仍由国家掌控。当萨克斯为班塞尔的团队拟出休克计划时，桑契斯大为欣赏。

密室协商的细节从未披露，但结果却十分明显。1985年8月6日，埃斯登索罗宣誓就职成为玻利维亚总统。四天后，他指派桑契斯领导一个最高机密的跨党派紧急经济小组，负责大幅改造国家经济。该小组初期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但后来的做法却远超过他的建议。事实上，日后小组提议完全拆解埃斯登索罗数十年前建构的国家中央经济模式。当时萨克斯已经返回哈佛，但他说他“很高兴听到（班塞尔的）国家民主行动党（ADN）与新总统及其团队，达成我们的稳定计划协议”。

埃斯登索罗的党不知道党领袖作了这项密室交易。除了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是机密小组成员外，埃斯登索罗甚至未告诉新组成的内阁有这个紧急经济小组。

紧急小组连续17天在桑契斯豪华宅邸的客厅开会。计划部长贝德雷格（Guillermo Bedregal）在2005年的访问中回忆说：“我们躲在那里，小心谨慎得像在搞秘密活动。”这是第一次有人披露当年的细节。*他们密集商讨一套激进的国家经济改革计划，激进到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曾尝试过。埃斯登索罗总统相信，计划成功唯一的希望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让玻利维亚以激进闻名的工会和农民组织措手不及，没有机会采取抵制行动；至少他希望如此。桑契斯后来回忆说，埃斯登索罗“一直说‘如果你准备这么做，现在就动手，我没有第二次机会’”。埃斯登索罗在选举后态度180度转变的原因，至今仍是谜。他在2001年去世，从未解释他是否为了坐上总统大位而同意采用班塞尔的休克治疗计划，或者只是他的意识形态出现大转变。当时的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柯尔（Edwin Corr）的说法让我恍然大悟，他记得曾与所有政党会面，并表明如果他们实行休克政策，美国将很快提供援助。

*过去20多年，玻利维亚人不知道他们的休克治疗计划是如何拟定的。在2005年8月，即拟定最初的命令20年后，玻利维亚新闻记者波提罗（Susan Velasco Portillo）访问紧急经济小组原始成员，其中有几个人说出那次秘密行动。此处的记述主要根据那些人的回忆。

17天后，计划部长贝德雷哥已拟出休克治疗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取消食物补贴，解除几乎一切物价管制，以及提高油价300%。虽然明知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生活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套计划还冻结了原已偏低的公务员工资一年。此外，计划也要求大砍政府支出，并开放玻利维亚边界不设限制地让外国产品进口，以及缩小国营公司规模来

为私有化铺路。玻利维亚错过了70年代其他南锥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现在它将弥补那段失落的时代。

紧急小组完成草拟新法律时，他们还没准备好告诉玻利维亚的民选代表，当然更不知如何向从未把选票投给这类计划的选民开口。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小组成员一起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驻玻利维亚代表的办公室，把准备做的事告诉他。这位代表的反应是忧喜参半：“这是每一个IMF代表梦寐以求的事。但如果它行不通，我很庆幸有外交豁免权可以搭飞机逃走。”

拟订这套计划的玻利维亚人没有这样的退路，有些人害怕公众可能的反应。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帕拉度（Fernando Prado）预测：“他们会杀了我们。”计划主要起草人贝德雷哥尝试把小组比喻成攻击敌人的战斗机驾驶员，借以为众人壮胆。他说：“我们必须像轰炸广岛的驾驶员，当他丢下原子弹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看到冲上云霄的烟时，他说：‘糟糕，抱歉！’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推动这些措施然后说：糟糕，抱歉！”

政策变革必须像发动出其不意的军事攻击，这是经济休克治疗师不断提到的比喻。在1996年出版、后来变成2003年入侵伊拉克行动蓝本的美国军事理论《震慑：达成快速掌控》中，作者群说明入侵的所有兵力应“掌控环境，并使敌人对事件的感觉与了解瘫痪或不胜负荷，让敌人无力抗拒”。经济休克也以类似的理论运作：其前提是会对渐进的改变作出反应--例如这里削减一些医疗福利，那里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如果数十项改变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便会产生难以招架的感觉，使所有人陷于慌乱无措。

为了制造这种绝望的感觉，玻利维亚的规划者必须同时进行所有的激进措施，在新政府上任的100天内达成。埃斯登索罗的团队不以零散的新法律（新税法、新价格法，等等）提出各部分计划，而把整套革命纳入单一的《D.S.21060号》行政命令中。这道命令包括220项不同的法律，涵盖国内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在规模和雄心上足以媲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政变准备的厚重蓝图“砖块”。根据命令拟订者的要求，计划必须整套被接受或拒绝；内容不得修改。它是经济版的震慑。

写完计划书后，小组印制了五份：一份给埃斯登索罗，一份给桑契斯，另一份给财政部长。另外两份的下落则透露出，埃斯登索罗和他的小组很确定许多玻利维亚人会把这个计划视为宣战：一份送交陆军总司令，另一份则给了警察首长。不过，埃斯登索罗的内阁仍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还在为同一个人效命，而那个人当年曾把矿场国有化，把土地重分配给人民。

在宣誓出任总统三周后，埃斯登索罗终于召集他的内阁，让他们接受他所准备的惊奇。他下令把总统府会议室的门关上，并“指示秘书暂不接听所有部长的电话”。贝德雷哥对目瞪口呆的听众宣读全部60页的计划。他承认自己紧张到“甚至念完几分钟后就开始流鼻血”。埃斯登索罗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项命令的内容不容辩论；他已经在另一次秘密交易中取得班塞尔的右派反对党支持。他说，如果内阁成员不同意，可以辞职。

“我不同意。”工业部长宣布。

“请离开。”埃斯登索罗回答。那位部长留了下来。在通货膨胀仍然飙升、加上华盛顿暗示采取休克治疗方法将可获得大量金援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离开。两天后，在一场以“玻利维亚命在旦夕”为题的总统电视演说中，埃斯登索罗对完全不明就里的大众丢出玻利维亚版的“砖块”。

萨克斯对提高价格可以结束恶性通胀的预测很正确。在两年内，通胀已下降到10%，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很了不起。但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革命范围更广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通胀快速上扬具有极大破坏性，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个在调整期间会带来许多痛苦的过程。争议的重点在于，如何推行一套可行的计划，以及不管在哪一种社会，谁将被迫承受最多痛苦。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教授格林斯潘（Ricardo Grinspun）解释说，凯恩斯学派或发展主义传统的社会会动员支持的力量，并透过“由主要的利益攸关者--政府、雇主、农民、工会等--参与协商过程。以这种方法让各方对工资和物价等所得政策达成协议，让稳定措施得以执行”。格林斯潘说，正统派的做法却呈鲜明对比，“是把所有社会成本透过休克治疗加诸在穷人身上”。他说，玻利维亚的情况正是如此。

和弗里德曼在智利作的承诺一样，更自由的贸易原本应为新失业的人创造工作，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选举时的失业率为20%，两年后上升至25%到30%间。单是国营矿业公司--埃斯登索罗在1950年代收归国有的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就从2.8万人缩编到只剩6000人。

基本工资从未恢复其实质水平，计划施行两年后，实质工资下降40%，后来还一度下降70%。在进行休克治疗的1985年，玻利维亚的人均所得为845美元；两年后减少为789美元。这些数字还是萨克斯和政府的统计，但已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窘境，实际上根本未反映许多玻利维亚人日常生活水平的退步。人均所得是计算该国的总所得，再除以人口总数的结果；它掩饰了休克治疗对玻利维亚和过去该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同样效应：一小群精英变得远比其他更富裕，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则被经济完全摒弃，成为剩余人口。在1987年，玻利维亚的农民每年平均所得只有140美元，不到“平均所得”的五分之一。这是只计算“平均”的问题：它完全抹杀悬殊的所得差距。

一位农民工会领袖解释说：“政府的统计数字未反映愈来愈多家庭被迫住在帐篷里；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只吃一片面包和喝一杯茶；数以百计的农民涌向首都寻找工作，落得在街头乞讨。”这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背后的故事：数十万个有退休金的全职工作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临时工。从1983年到1988年，玻利维亚有资格接受社会福利的人数减少61%。

萨克斯在转型期间回到玻利维亚担任顾问，他反对提高工资以追赶食物与汽油价格的上扬，而支持以紧急基金协助受打击最深的人，尝试在扩大的伤口上贴急救胶布。萨克斯是应埃斯登索罗的要求回玻利维亚，直接为总统工作。他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个顽强不屈的人物。据桑契斯（日后他也出任玻利维亚总统）回忆，当休克治疗引发公众反对的压力升高时，萨克斯协助加强了决策者的决心。“（萨克斯）在考察时说：‘渐进派的方法根本不管用，情况失控时，你们必须阻止它，像医生一样。你们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否则你们的耐性会被耗光。’”

这种决心的立即结果之一是，许多玻利维亚最穷的人被迫变成古柯农，因为可以拿到十倍于种其他作物的工资（这有点讽刺，因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起于美国资助围剿古柯农）。到1989年，据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工人重操种古柯或生产古柯碱的旧业。这些工人包括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家人，他后来从激进派古柯农工会领导人变成玻利维亚总统。

古柯产业在玻利维亚经济复苏和击退通胀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已被今日的历史学家承认，但萨克斯在解释他的改革如何成功压抑通胀中从未提及）。在投下“原子弹”短短两年后，非法毒品出口为玻利维亚创造的收入已超过其他合法出口的总和，且估计有35万人靠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工作维生。一位外国银行家评论说：“玻利维亚经济已染上古柯碱瘾。”

在休克治疗进行之初，很少玻利维亚以外的人谈论其造成的复杂影响。他们谈的是一个远为单纯的故事：《波士顿杂志》（Boston Magazine）报道，一位大胆、孩子气的哈佛教授，几乎单枪匹马地“挽救了玻利维亚遭通胀摧毁的经济”。萨克斯协助对抗通胀的胜利已足够使玻利维亚变成一则惊人的自由市场成功故事，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描述的，是“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玻利维亚奇迹”让萨克斯在势力庞大的金融圈很快跃升到明星地位，成为当红的危机经济体专家，事业蒸蒸日上，在往后几年经常进出阿根廷、秘鲁、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萨克斯赢得的赞誉不是在贫穷国家打败通货膨胀，而是他达成许多人宣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在民主政体的环境下，未靠战争而协助推动一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且造成的改变远比撒切尔或里根尝试过的更彻底。萨克斯很清楚他的成就在历史上的意义。“以我的看法，玻利维亚是真正第一个同时达成民主改革与改变经济体制的国家。”他在数年后说，“玻利维亚比智利更能证明，政治解放与民主可以和经济解放结合在一起。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两者同时运作，彼此互相强化。”

与智利作比较并非偶尔。拜萨克斯所赐--《纽约时报》形容他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传道者--休克治疗终于摆脱独裁统治与死亡集中营的恶臭，洗刷弗里德曼十年前历史性的圣地亚哥之行后如影随形的污名。萨克斯已经证明，与批评者的说法相反，自由市场的十字军不止能打胜仗，而且还驾驭着正席卷世界的民主浪潮。萨克斯更因为他对凯恩斯的推崇，以及从不讳言他怀抱增进发展中世界福祉的理想主义，所以是带领这支十字军进入这个更仁慈、更和平时代的最佳人选。

玻利维亚的左派把埃斯登索罗的命令，称为经济皮诺切特主义。就包括玻利维亚国内和国外的企业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玻利维亚引进了皮诺切特式的休克治疗，但少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而且是在中间偏左的政府治理下。一位玻利维亚银行家赞叹地说：“皮诺切特以刺刀做的事，埃斯登索罗在民主体制下完成了。”

玻利维亚奇迹的故事不断流传转述，透过报纸和杂志文章、萨克斯的简介、萨克斯自己的畅销书，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三集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这类纪录片。

但有一个大问题：那不是真的。玻利维亚确实证明休克治疗可以在一个刚经过选举的国家实施，但并未证明可以透过民主方式、或不借镇压而实施--事实上，它再一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

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埃斯登索罗总统未获得玻利维亚选民授权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以国家主义的政纲竞选，然后突然在密室交易中背弃承诺。几年后，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为埃斯登索罗的作为创造一个名词：他称之为“巫毒政治学”（Voodoo politics），但大多数人则直接称作说谎。而且所谓民主主体制这样的说法绝对不只有这个问题。

可想而知，许多投票给埃斯登索罗的选民对他的背叛极为愤怒，当命令下达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尝试阻止这个意味着裁员和更多饥饿的计划。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该国的各大工会，它们发动全面罢工，导致工业生产陷于停顿。埃斯登索罗的反应让撒切尔对待矿工的手段相形失色，他立即宣布“戒严令”，陆军坦克开进首都街上，而首都则实施严格的宵禁。玻利维亚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旅行，现在需要特别通行证。镇暴警察突击工会总部、一所大学、一家广播电台，以及数座工厂。政治集会和游行被禁止，其他集会则需要国家许可。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禁绝--就和班塞尔独裁统治期间一样。

为了净空街道，警察逮捕5000千名示威者，以催泪弹驱散群众，并向据说攻击警察的示威者开枪。埃斯登索罗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抗议永远停止。当工会领袖进行饥饿罢工时，埃斯登索罗下令警察和军队围捕玻国最主要的200名工会领袖，用飞机将他们载到亚马逊偏远的监狱。据路透社报道，被囚禁的人包括“玻利维亚劳工联盟（Bolivian Labor Federation）的领导阶层，以及其他资深工会干部”，他们被带往“玻利维亚北方亚马逊盆地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里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是大规模绑架，赎金则是：如果工会停止抗议，囚犯就能获得释放，最后他们也都屈服。艾斯科巴（Filemon Escobar）是当年的矿工和走上街头的工会活动分子，他近日在玻利维亚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们把工会领袖从街上掳走，送他们到丛林去喂虫子。当他们被释放时，新经济计划已经实施。”艾斯科巴说：“政府不应把人民送到丛林去施以酷刑或杀害，但这样他们才能推动经济计划。”

非比寻常的戒严令实施三个月，而因为计划要在100天内彻底执行，这表示整个国家在休克治疗的关键期完全被管制。一年后，埃斯登索罗政府进行锡矿场大规模裁员时，工会再度走上街头，激烈的事件再度上演：戒严令颁布，然后两架玻利维亚空军的飞机载运100名主要工会领袖，到玻利维亚热带平原的俘虏营。这一次被绑架的领袖包括两位前劳工部长和一位前参议员--令人联想起皮诺切特在智利南部曾关过勒特里尔的“贵宾监狱”。这些劳工领袖在俘虏营被拘留两周半，同样的直到工会同意取消示威和饥饿罢工。

这有点像阳春版的军政府手法。为了让政权可以实施休克治疗，有些人必须失踪--即使只是暂时的。虽然残暴程度轻微些，这种失踪达成了类似70年代的目的。拘禁玻利维亚的工会领袖使他们无法抗拒改革，为在经济上抹除整群的劳工人口铺好了道路--他们很快就丢掉工作，并沦落到拉巴斯周围的陋巷小屋和贫民窟。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时，曾引述凯恩斯的警告说，经济崩溃会孕育法西斯主义，但他仍然拟订带来这么多痛苦的计划，以致必须靠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执行。

国际媒体曾披露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镇压行动，但只当作拉丁美洲的一般暴动报道了一两天。不过，在报道“自由市场改革”胜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事件已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与智利的“经济奇迹”如影随形的皮诺切特暴力，经常被轻轻带过）。虽然萨克斯不是下令动用镇暴警察或宣布戒严令的人，但在他写的《终结贫穷》（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花了一章讨论玻利维亚如何战胜通货膨胀，但在他似乎乐于自居功劳时，却只字未提执行计划所需的镇压。他最迂回暗示镇压的词句只是“稳定计划初期几个月的紧张时刻”。

至于其他人，连如此迂回的承认也付诸阙如。桑契斯甚至宣称“稳定化已经在民主状态下达成，未曾违背人民的人权，而且让人民能自由表达”。一位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部长则作了未加美化的评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像独裁猪猡”。

这种不协调将永远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实验历史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已证明，激烈的休克治疗要想实行，必须依靠对无辜的社会群体和民主体系发动休克式的攻击。它也显示，政商财团十字军可以采用这些恶劣的独裁统治手段，而仍然被赞美为民主，只因为举行过选举，而不管公民自由权在选后是否遭到镇压，以及民主的期望是否完全被忽视。（这个教训对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的叶利钦 [Boris Yeltsin]，将特别有用。）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更合世界口味的新独裁统治模式，一种文人政变，由穿西装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发动，而非穿军服的军

人--一切都在民主政府的外衣下进行。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把我的脑袋毁了，抹去作为我本钱的记忆，让我生意停摆，这有什么用处？这是很了不起的治疗，但我们却毁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杀前不久谈论他的电击治疗，1961年

对萨克斯来说，他第一次国际冒险的教训是，恶性通胀在采用严厉而极端的措施后确实停了下来。他到玻利维亚猎杀通胀，而且办到了。故事结束。

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右派经济学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主要顾问的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一直密切注意萨克斯的实验，并且从玻利维亚看出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形容这个休克治疗计划为“大爆炸”--是把芝加哥学派教条散播到全世界的运动的一大突破。其原因与经济学无关，最重要的是技术。

尽管萨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证明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绝对正确。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借口，以便推动一套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不可能推动的计划。玻利维亚是一个拥有强大、激进工会运动和势力庞大的左派传统的国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终点站。但它被迫接受严酷的休克治疗，假借的名义是为稳定失控的货币。

到80年代中期，有几位经济学家已发现，真正的恶性通胀危机会造成类似军事战争的效果--恐惧和混乱蔓延，制造难民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玻利维亚的情况极其明显，恶性通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战争”，以及撒切切尔的马尔维纳斯战争--它创造了采取紧急措施的环境，一种民主法则可以暂停、经济控制可以暂时交给桑契斯专家小组的例外。对死硬派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如威廉森来说，这表示恶性通胀不是像萨克斯认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善加把握的大好机会。

80年代一点也不缺这类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处在濒临恶性通胀边缘。这种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都源自华府的金融机构。第一是它们坚持把独裁统治下累积的违法债务转移给新民主政府。第二则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采用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政策，容许利率大幅升高，使这些债务一夕间暴增。

转移恶债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战争后垮台，阿根廷人选举阿芳辛（Ral Alfonsn）出任新总统。但这个刚解放的国家已被暗埋一颗所谓的债务炸弹。在准备下台的军政府宣称“有尊严地转移”给民主政府声音中，华府坚持新政府必须同意支付将领们所累积的债务。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外债从政变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移交时的450亿美元--积欠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设在美国的民间银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都很类似。在乌拉圭，军政府夺得权力时的5亿美元债务暴增到50亿美元，变成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沉重的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权的将军承诺恢复财政秩序，但债务却从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在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时期，舆论曾表达强烈的反对看法，包括从道德和法制观点，认为这些债务是“恶债”（odious debt），刚获解放的人民不应被迫承担压迫者与制造痛苦者的账单。反对声浪在南锥尤其强烈，因为有太多外债在独裁统治期间直接交给军方和警方--用以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酷刑营。例如在智利，军事支出的贷款增为三倍，用来扩充智利的陆军，从1973年的4.7万名员额，变成1980年的8.5万名。在阿根廷，世界银行估计，军方借贷的钱有约10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

大部分未用于采购武器的钱则凭空消失。军政府统治期间贪渎成风--预示了日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蔓延到俄罗斯、伊拉克占领区的“舞弊免责区”（借用一位不满的美国顾问的用语）时同样堕落的情况。据美国参议院2005年的报告，皮诺切特拥有一个复杂的银行账户网络，至少有125个秘密外国银行账户，登记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这些账户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是在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存款估计有2700万美元。

在阿根廷，军政府被指控还更贪得无厌。经济计划策划者狄霍兹1984年被以诈欺罪名逮捕，涉嫌把巨额的国家补贴给予他过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后来被撤销）。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后来追查军政府借的350亿美元外国贷

款，发现其中190亿美元--占总额46%--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员证实，那些钱大部分流入几个账户。美国联储会发现，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债务就增加9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额却增加67亿美元。曾亲自调教许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斯塔德（Larry Sjaastad），形容这些失落的数百亿美元（在他的学生眼前被偷走）为“20世纪最大骗案”。*

*在当时可能是如此，但20世纪还未结束——俄罗斯的芝加哥学派实验还未发生。

军政府侵吞公款者时甚至还命令受害者协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SMA酷刑营，语文能力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囚犯经常被拉出囚室，为他们的掳掠者做文书工作。一位幸存者达利欧（Graciela Daleo）曾被指示为一份文件打字，内容是建议官员如何把他们贪渎的钱汇往海外隐匿。

剩下的外债大部分花在支付利息，及暗中提供民间公司金援上。1982年阿根廷独裁统治垮台前，军政府施予企业最后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总裁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宣布，国家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当时许多国内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鱼一样，已举债多到濒临破产边缘。这项“德政”意味这些公司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获利，但人民却必须代它们偿付150亿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获得优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

支持让这些非法债务违约的人宣称，放款机构知道，或应该知道，钱都被花在镇压和贪渎上。美国国务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证明这种主张更不是空穴来风；该会议由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以及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外交部长顾塞提举行。在讨论过国际人权组织对政变的谴责后，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希望你们成功。我有一个老式的观念，就是应该支持朋友.....你们愈快成功愈好。”然后基辛格谈到贷款的主题，他鼓励顾塞提尽快申请愈多外援愈好，赶在阿根廷的“人权问题”绑住美国政府手脚之前。“现在银行有两笔贷款，”基辛格说，指的是泛美洲开发银行（IDB），“我们不想投反对票。”他也指示顾塞提：“继续进行你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要求。我们希望你们的经济计划成功，而且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这份记录证明美国允许贷款给军政府，明知它们会被用于恐怖运动上。但在80年代初期，华府坚持阿根廷的新民主政府必须偿付这些恶债。

债务休克

这些债务本身就已经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负担，但这个负担很快还会变得更加沉重。新类型的震撼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经济学人》杂志用这个词来形容联储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大幅提高美国利率带来的冲击，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达到高峰，并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美国，提高利率导致一波破产潮，1983年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的人数增为三倍。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背负沉重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沃尔克震撼--也被称作“债务震撼”或“债务危机”--就像一把巨大的塔瑟（Taser）电击枪从华盛顿发射，让发展中世界陷入痉挛。劲升的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更多债。恶性债务循环于是开始。在阿根廷，军政府留下的450亿庞大债务快速增加，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而这种情况在全球贫穷国家都如出一辙。沃尔克震撼也导致巴西外债暴增，在六年间从500亿美元变为1000亿美元。许多在70年代大量举债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同样的困境：尼日利亚的债务在同样短的期间，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

80年代打击发展中世界的经济震撼还不只这一种。只要任何一种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锡，价格下跌10%以上，就会造成“价格休克”（price shock）。据IMF的资料，发展中国家从1981年到1983年遭遇20次这类休克；从1984年到债务危机最高潮的1987年，这类休克的次数更多达140次，使它们更深陷债务中。其中一次在1986年冲击玻利维亚，正好是该国吞下萨克斯的苦药、屈服于资本主义转型时。玻利维亚仅次于古柯的主要出口产品锡，价格下跌了55%，使该国经济遭到重创。（过度依赖原料出口的问题，正好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想尝试解决的，但这个观念却被北半球的经济学术机构斥为“混乱不清”。）

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在这个阶段变得自我强化。全球经济愈遵循他的处方，采用浮动利率、出口导向经济、解除价格管制，体系就愈容易发生危机，制造出更多经济崩溃，而此等崩溃正好是他认为政府应采取其激进建议的情况。

危机便以这种方式被内建在芝加哥学派的模式。当不受限制的金钱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动，投机者可以在从可可豆到货币等每一种东西的价格上押注，造成市场大幅度的波动。而由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贫穷国家继续仰赖咖啡豆、铜、石油或小麦等原料资源的出口，它们就特别容易落入持续处于危机的恶性循环。咖啡豆价格突然大跌会让整个经济体陷入萧条，外汇交易商看到该国的财政恶化，便开始抛售其货币，导致汇率暴跌，进而加深经济萧条。若再加上利率飙升，国家债务一夕间膨胀，经济崩盘就已不远了。

芝加哥学派的信仰者往往说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帆风顺、每战皆捷：在同一时期，又有许多国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们产生一种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场携手并进的集体幻觉。但幻觉毕竟是虚构的，真正发生的是，当人民终于赢得长期失落的自由、从菲律宾马克斯和乌拉圭博达维里（Juan Mara Bordaberry）这些人的酷刑休克逃脱时，他们却遭到一场金融休克的完美风暴袭击--债务休克、价格休克和货币休克--而制造这场风暴的是愈来愈动荡不安、不受规范的全球经济。

阿根廷遭遇的债务危机结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芳辛在1983年上任，正当沃尔克休克肆虐，使新政府从第一天就处于危机模式。1985年，通货膨胀高到阿芳辛被迫发行全新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赌新的开始能让他重新掌控局势。但物价在四年内涨到如此之高，以致爆发大规模抢粮暴动，一些阿根廷餐厅甚至用钞票当壁纸，因为它比纸还不值钱。1989年6月，通胀比前一个月上涨203%，此时距阿芳辛任期届满还有五个月，但他宣布放弃：辞职并要求提早举行大选。

处于阿芳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选择其他出路。他可以让阿根廷庞大的债务违约，他可以结合面临相同危机的邻国政府，组成债务国联盟。这些政府可以依照发展主义原则建立共同市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凶残的军事政权蹂躏该地区时就已展开。但当时有一部分挑战在于新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恐怖遗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仍陷于某种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仍笼罩在戒慎恐惧的气氛。好不容易逃脱了独裁统治的黑暗，很少民选政治人物愿意冒险推动在70年代引发政变的那些政策，以免引来另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尤其是那些当年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部分并未被关进牢里，而是经由协商取得豁免，正在他们的军营中虎视眈眈。

面临危机的新民主政府不愿与持有债权的美国金融机构宣战，只得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然而在80年代初，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变得严格得多，原因是债务危机刚好（但却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关系的新时代，使得军事独裁统治大体上变得已非必要。当时正好是“结构调整”--或是所谓债务独裁--时代的开始。

理论上，弗里德曼并不相信IMF或世界银行：它们是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细微讯号的典型例子。但很讽刺的是，有一条隐形的输送带，把芝加哥男孩送到这两家机构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十九街庞大的总部，让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高级职务。

主持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的哈伯格，经常吹嘘有许多他的学生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高级职位。“有一度世界银行的四位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 Selowsky）担任新成立的前苏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是当时整个世银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位。结果呢？他后来又被我另一个以前的学生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取代。看到这些人出头真的很棒，我以培养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为傲。”另一位明星是罗瑟（Claudio Loser），他是197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阿根廷人，后来担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最高级职位。*芝加哥派也占有IMF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第二高级的首席副总经理，以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资深经济学家。

*罗瑟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崩溃后遭解职。各界一致的看法是，IMF在他管理下执迷于自由市场政策，只要有国家不断削减支出和把经济私有化，他便继续拨给巨款，忽视它们显而易见的经济缺点，如高失业率和猖獗的贪渎——更别谈积欠IMF难以持续的债务了。

弗里德曼可能在理论上反对这些机构，但在实务上，没有别的机构更适合执行他的危机理论。当许多国家在80年代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它们除了向世界银行和IMF求助外别无选择。然而当它们这么做时，却撞上一堵正统派芝加哥男孩的墙，而这些芝加哥男孩被训练成不把经济灾难视为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来开辟自由市场新领土的大好机会。危机机会主义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指导原则，虽然这背叛了它们创建的宗旨。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与IMF是国际目睹二次大战的恐怖而创立的。为了不重蹈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兴起的覆辙，世界强权1944年在英国新罕布什尔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以创立一个新经济架构。由43个初始会员国资助成立世界银行和IMF，被赋予明确的使命，就是预防未来再发生导致德国威玛共和倾覆的经济震撼与崩溃。世界银行将提供长期发展投资，以协助国家摆脱贫穷，IMF则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协助推动可减

少金融投机和市场动荡的经济政策。当有国家出现即将陷入危机的迹象，IMF将立即介入提供稳定援助和贷款，在危机发生时加以化解。坐落在华盛顿同一条街对面的两个机构，将协调彼此的措施。

率领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相信，世界终于认清若放任市场管理自己将会带来政治灾难。“过去很少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凯恩斯在会议结束后说，但如果国际金融机构坚守创立的宗旨，“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IMF和世界银行并未履行这种全球一致的共识；从一开始它们就未像联合国大会那样以“一国一票”的基础分配权力，而是根据各国经济的大小--这种安排给美国实际上有权否决任何重要决定，其他权力则由欧洲和日本掌控。这表示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掌权时，他们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府实际上能支配两个机构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迅速地增强它们的力量，并转变成推进政商十字军的主要工具。

世界银行和IMF被芝加哥学派殖民，大体上是一个暗中进行的过程，但1989年威廉森揭示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后，使这个过程转为台面化。威廉森说，这个共识是两个机构认为维持基本经济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这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国家企业应私有化”和“应去除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的障碍”之类的意识形态主张。当政策清单拟出后，内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这个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威廉森说，这是“华盛顿当权者敦促拉丁美洲”实行的政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此种新正统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写道：“凯恩斯如果看到他的结晶沦落至此，他会从坟里爬出来。”

世界银行与IMF的官员在拨贷款时向来会提出政策建议，但在80年代初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走投无路让他们把这种建议转变成激进的自由市场要求。当遭遇危机的国家向IMF要求打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时，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疗计划，其规模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起草的“砖块”，以及在玻利维亚桑契斯的客厅所拟订包含220项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国际货币基金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后续的20年间，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必须从上到下翻修经济。在整个80年代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设计结构调整计划的IMF资深经济学家布德夫（Davison Budhoo）后来承认：“我们从1983年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据让南方‘私有化’或者任其灭亡的新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1983年到1988年我们可耻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制造经济动乱。”

尽管采取这种激进（且获利相当可观）的新原则，IMF和世界银行向来宣称所作所为是为了协助稳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预防危机--不是进行社会工程或意识形态改造--因此必须以稳定作为表面的理由。实情是，国际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有系统地利用来推动芝加哥学派的目标，且无情地以弗里德曼的休克主义为手法。

虽然常使用经济术语表达，且局限在专业论坛和供“技术官僚”同事阅读的刊物，但世界银行与IMF的经济学家当时就承认有这种情形。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描述整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建构就是一个巧妙的营销策略。他在1994年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世界银行发明并成功地营销了‘结构调整’的概念，一个把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改革包装在一起的概念。结构调整被当成国家必须推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的过程来促销。对购买这套方案的政府来说，维持外部平衡与价格稳定的健全总体经济政策，以及决定开放（如自由贸易）的政策，两者很难区分。”

这个原则很简单：陷于危机的国家迫切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货币。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与金融纾困包装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最聪明的部分是，经济学家自己知道自由贸易与解决危机毫无关系，但这种了解被刻意“模糊化”。罗德里克说那些话的本意是赞许。这种夹带包装不只迫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为它们选择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罗德里克有数字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研究了所有在80年代采用激进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发现“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没有一个不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令人错愕的承认。在那段期间，世界银行和IMF公开坚称世界各国政府已看到希望，并体认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通往稳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华盛顿的机构内部却自己承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屈就于伪装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国家吗？照单全收。罗德里克甚至承认，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结构调整方案的两大核心计划--与创造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据罗德里克的说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将是“拙劣的经济学”。

这段期间的IMF“模范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这种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恶性通胀危机迫使阿芳辛总统辞职后，梅内姆（Carlos Menem）取而代之，这位庇隆主义者原本是一个小省份的省长，穿着皮夹克，留着络腮胡子，似乎强悍到足以挺身对抗影响力仍无所不在的军阀和债权银行。阿根廷历经长期暴力迫害庇隆党人和工会运动的痛苦，终于出现一位曾领导工会运动、承诺恢复庇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统。当时许多阿根廷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维亚人在埃斯登索罗就职时可以比拟。

结果证明是空欢喜一场。就任一年后，在IMF的强力施压下，梅内姆展开一场“巫毒政治学”操作。梅内姆在选举时被视为反对独裁统治的象征，但一年后他指派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担任经济部长，重新重用这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赦免大企业债务--独裁统治的告别礼物--的前朝官员。他的任命被经济学家视为“讯号”--一个不可能误解的指标，即新政府将重拾由军政府推动的政商统合实验。布宜诺斯艾利斯股票市场出现庆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布当天暴涨30%。

卡瓦洛立即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并延揽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门生，几乎政府的所有高级经济职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担任：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的央行总裁佛南德兹（Roque Fernandez）；曾为独裁政权效力的央行副总裁波乌（Pedro Pou）；央行首席顾问贵德提（Pablo Guidotti）则直接从IMF延揽过来，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穆萨（Michael Mussa）的弟子。

阿根廷在这方面并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学派的国际校友中有超过25国政府的部长，以及从以色列到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十多位央行总裁，对一个大学学系来说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庞大势力。就像许多别的国家一样，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的民选政府内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钳子，一群从内施压，另一群则从华盛顿施加压力。例如，IMF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男孩罗瑟带领，这表示当他与财政部和央行开会时，会议不再是对手间的谈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学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间的讨论。一本阿根廷出版的书讨论这种全球经济兄弟会的影响，就以《好兄弟》（Buenos Muchachos）为书名，暗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的经典黑手党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

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一致赞成对阿根廷经济该做哪些事，以及该如何完成，皆英雄所见略同。卡瓦洛计划（Cavallo Plan）就是世界银行和IMF玩弄包装手法的例子：利用恶性通胀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急迫，把私有化夹带在救援计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为了稳定货币体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并推出新的货币阿根廷比索，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年内，通胀跌回17.5%，几年后完全获得控制。失控的货币问题获得解决，但也“模糊”了计划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独裁政府虽然尽全力取悦外国投资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价值的经济留在国家手中，包括从国营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量石油蕴藏。但对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来说，革命只完成一半，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危机来毕其功于一役。

在90年代初期，阿根廷变卖国家资产的快速和彻底，远超过十年前发生在智利的情形。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民间公司，买主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的苏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西班牙的雷普索尔（Repsol）和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在出售资产前，梅内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为买主提供一项价值不菲的服务：据卡瓦洛自己估计，一共解雇了约70万名国营企业员工，有人估计数字还更高。光国营石油公司在梅内姆在位期间就减少2.7万名员工。很崇拜萨克斯的卡瓦洛称这个过程为“休克治疗”。梅内姆使用更残酷的词句：在这个仍对大规模酷刑深恶痛绝的国家，他称这个过程为“无麻醉的大型手术”。*

*2006年1月，卡瓦洛和梅男早已不在位，阿根廷人得知一些出人意料的消息。事实上卡瓦洛的计划不是出自卡瓦洛，也非出自IMF：阿根廷在90年代初期的休克治疗计划，是由阿根廷两家最大的民间债权人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秘密草拟的。在与阿根廷政府打官司的过程中，著名的历史学家贾欧纳（Alejandro Olmos Gaona）惊讶地发现一份由这两家美国银行为卡瓦洛写的1400页文件，内容是阿根廷政府从1992年以后执行的政策……公共事业私有化、劳动法改革、退休金制度民营化等，所有机会都巨细靡遗。外界一直认为1992年以来推动的经济计划都由卡瓦洛拟定，实际并非如此。

在转型期间，《时代》杂志以梅内姆作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并以向日葵作背景衬托，标题写着“梅内姆的奇迹”。那确实是奇迹--梅内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进而痛苦的私有化计划，而且未激起国内的反抗。他们怎么办到的？

几年后，卡瓦洛解释说：“在恶性通胀时期，人民生活极其艰困，尤其是低所得者和小储蓄户，因为他们发现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他们的工资就被以惊人速度上涨的价格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要求政府‘请想想办法’。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稳定计划，那就是顺便推动其他改革的机会……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开放经济、解除管制，以及

私有化。但在当时，推动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恶性通胀创造的情势，因为所有人都已准备好接受剧烈的改变，以消灭恶性通胀和恢复正常生活。”

长期来看，卡瓦洛的整个计划证明将为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他稳定货币的方法--让阿根廷比索紧盯美元汇率--使国内制造的产品昂贵到本土工厂无法与涌进阿根廷的廉价进口产品竞争。许多工作因此流失，导致全国逾半数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不过，在短期内，这套计划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内姆趁着举国陷于恶性通胀休克之际，偷偷带进私有化。危机达成了它的效用。

阿根廷的领导人在这段期间完成的是一项心理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出身军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机时刻人们愿意把极大的权力交给任何拥有神奇药方的人--不管危机是金融崩溃，或像布什后来善加利用的恐怖攻击。

这就是弗里德曼十字军能够安然度过民主转型期的原因--不是他的拥护者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从一个危机转移到下一个危机，利用经济情势的急迫性，来推动让脆弱的新民主体制动弹不得的政策。沃尔克休克之后紧接着是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Tequila Crisis）、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倒债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债务危机。当这些休克和危机威力逐渐退去时，更可怕的危机紧接着发生：海啸、飓风、战争和恐怖攻击。灾难资本主义已经成形。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破坏的时代带来最好的机会，为那些了解需要重大经济改革的人。

——哈嘉德 (Stephan Haggard) 与威廉森 (John Williamson)，《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994年

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与中国大屠杀

我住在现在已经自由的波兰，而我认为弗里德曼是吾国自由的主要思想设计师。

——巴尔舍诺维奇 (Leszek Balcerowicz) 前波兰财政部长，2006年11月

当你赚的钱增加十倍时，你的胃会释放某种化学物质。这会让你上瘾。

——布罗德 (William Browder)。美国基金经理人谈论波兰资本主义初期他在当地的投资我们当然不会因噎废食。

——人民日报，国家官方报纸，出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继续自由市场改革的需要

(*此引文中译本已删节，下面的中文为电子书编者所译，俗陋之处敬请包涵，英文为：

We certainly must not stop eating for fear of choking. — People's Daily, the official state newspaper, on the need to continue free-market reforms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在柏林围墙倒塌成为共产主义彻底崩溃的象征之前，还有一个代表苏联铁幕终将被推倒的象征，那就是瓦文萨 (Lech Walesa)，一位留着八字胡和蓬松乱发，被工厂裁员的电机师。他在波兰格但斯克(Gdansk)攀越一道装饰了花朵与旗帜的铁制围墙。那道围墙护卫了列宁造船厂和数千名工人，他们在厂里构筑防御工事，抗议共产党决定提高肉品价格。

工人罢工是前所未见的东西，展现他们对被莫斯科控制长达35年的波兰政府顽抗不屈。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莫斯科会派出坦克？他们会对罢工者开枪，强迫工人工作？罢工发动以后，造船厂已变成这个极权国家里的一座民主孤岛，但工人继续提出更多要求。他们再也不希望工作被控制在自称为劳动阶级代言的党细胞手中。他们要独立的工会，要谈判、协商和罢工的权利。他们不等获得许可便投票组织工会，为它取名团结工会 (Solidarnosc)。当时是1980年，整个世界爱上了团结工会和它的领导人瓦文萨。

当时36岁的瓦文萨与波兰劳工投契到似乎能心灵相通。“我们吃同样的面包！”他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对着麦克风吼叫。这指的不只是瓦文萨不容置疑的蓝领身份，也是说天主教信仰在这场披荆斩棘的新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共产党干部对宗教嗤之以鼻，工人们则以信仰作为勇气徽章，在防御工事后面列队领受圣餐，混合粗鄙与虔诚特质于一身、令人耳目一新的瓦文萨，一手拿着木制十字架，另一手持一束鲜花，为团结工会办公室举行启用仪式。当团结工会与政府签订第一份划时代的劳动协议时，瓦文萨以“一支上面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肖像的巨大纪念笔”，签署他的名字，他们惺惺相惜。这位生于波兰的教宗告诉瓦文萨，他为团结工会祈祷。

团结工会以燎原之势扩展到波兰的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在一年内会员达到1000万人——几乎是波兰工作年龄人的一半。赢得谈判的权利后，团结工会开始获得具体成果：每周工作天数从六天减为五天，在管理工厂上也有更大发言权。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厌倦于活在一个崇拜劳工阶级意识，但在现实中却虐待劳工的国家，他们谴责党机器贪腐、野蛮、仰远方莫斯科官僚的鼻息，却漠视波兰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被一党统治压抑的民主与自决渴望，现在全倾注在团结工会，引发一波共产党党员大规模出走潮。

莫斯科发现这是它的东欧帝国遇过最严重的威胁，当时苏联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仍来自人权活动分子，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仍未与当局相左，团结工会的成员不容易被抹黑为资本主义的傀儡——他们是手持榔头，身染煤灰的工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人应该是党的基石。*更具威胁性的是，团结工会的理念是党完全欠缺的：民主相对于独裁，权力下放相对于中央极权，参与相对于官僚，而且，它的1000万名会员有能力让波兰经济陷于瘫痪。就像瓦文萨声称，他们可能输掉政治战争，“但他们不能强迫我们工作。因为如果有人要我们制造坦克，我们会制造街车。卡车会倒着走，如果我们故意这样制造。我们知道如何打败体制。我们是那套体制的学生”。

*团结工会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话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团结工会对民主的承诺甚至激励共产党内部的人起而反抗。“以前我天真到以为少数几个邪恶的人要为党的错

误负责，”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阿伦特（Marian Arendt）对一家波兰报纸说，“现在我不再有这种幻想。我们的整个体制、整个结构出了问题。”

1981年9月，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准备好将运动推向下一个阶段。900名波兰工人再度于格但斯克集会，这也是工会首度召开全国大会。团结工会这时候已变成一个革命运动，热切地想以自己为波兰拟订的经济与政治计划接管国家。团结工会在计划中说：“靠我们要求在每个管理阶层进行自治与民主改革，并以一套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将这套计划，自治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计划的核心是一幅激进的蓝图，将建立庞大的国营公司，雇用数百万名团结工会成员，脱离政府控制，并建立民主的劳工合作社。计划中说：“这种社会化企业应该是经济的基本组织单位，它应该由代表集体的劳工会议控制，经营的理事是经由会议竞争而指派或罢免。”瓦文萨反对这个主张，担心它对党控制的挑战会招来镇压。其他人辩称运动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非只有一个敌人。瓦文萨输掉这场辩论，这套经济计划正式成为团结工会的政策。

瓦文萨对镇压的担心后来证明有充分道理。团结工会变大的野心吓坏并激怒了莫斯科。在强大压力下，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1年12月宣布戒严。坦克隆隆压过冬雪，包围工厂和矿场，成千上万的团结工会成员被围住，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领袖遭逮捕和囚禁。据《时代》杂志报道：“士兵和警察使用武力肃清抗拒的工人，矿场工人在卡托维兹（Katowice）以斧头和铁锹反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八年的警察国家统治只让这个运动更具传奇性。1983年，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他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因而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和平奖得主的座位是空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因此让我们尝试更仔细聆听他在空位上发表的无言演说。”

空位是很恰当的比喻，因为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从团结工会看到他们想看的：诺贝尔委员会看到一个“只信奉和平罢工而不相信任何武器”的人。左派看到救赎，一种未受斯大林的罪行污染的社会主义，右派看到共产主义国家以暴力对付温和和反对意见的证据，人权运动看到囚犯为了信仰而被关入牢里，天主教会看到一个对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盟友，而撒切尔和里根则看到机会，一道苏联盔甲的裂缝。虽然团结工会奋战所争取的权力是这两位领袖在国内极力压制的，禁制愈久，团结工会的神话就愈强而有力。

到1988年，镇压初期的恐怖已经淡去，波兰工人再度发动大规模罢工。这一次正当经济急速坠落，而莫斯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温和派共产党新政权作出让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同意举行临时选举。团结工会分裂为二，现在除了工会外，另有一个新派系叫公民委员会团结工会（Citizens Committee Solidarity）也将参加选举，两个团体关系密切，候选人都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而且因为竞选纲领模糊不清，唯一能展现团结工会远景的具体东西只有工会的经济计划。瓦文萨本人不参与竞选，他选择继续扮演工会派首领的角色，但仍然象征这个以“交给我们，你们更安心”为口号的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对共产党是羞辱的惨败，对团结工会则是光荣胜利：开放竞选的261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其中之260席。*幕后操盘的瓦文萨安排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出任总理，他缺乏瓦文萨的群众魅力，但身为团结工会周报的编辑，他被视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这次选举虽是一大突破，但仍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会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会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权力休克

就像拉丁美洲已经学到的教训，独裁政权习惯在经济计划即将内爆时拥抱民主，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共产党错误的经济管理已延续数十年。制造出接连不断且代价高昂的灾难，当时已濒临崩溃边缘。“出乎我们的不幸，我们获得胜利！”这是瓦文萨的名言（也是预言）。当团结工会上任时。债务高达4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600%，粮食严重短缺，黑市则欣欣向荣。许多工厂生产没有人购买的产品，任由它们在仓库腐坏。对波兰人来说，这种情势造就了引进民主政治的悲惨时机。自由终于来临，但很少人有时间或心情庆祝，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一文不值，他们把时间花在排队买面粉和奶油，而且还得是商店刚好有货物的日子。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挑起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但就像拉丁美洲的情况，在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之前，波兰就需要债务赦免和经济援助，以便摆脱立即的危机。理论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核心宗旨：提供稳定基金以化解经济灾难。如果有任何政府值得这种援助，那就是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因为它是40年来第一个推翻共产政权的东欧集团国家。当然，在听过冷战时期这么多咒骂铁幕内极权主义的论调后，波兰的新统治者应该可以期待获得一些协助。

但没有人提议这类援助。已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掌控的IMF和美国财政部，正从休克主义的透镜看波兰问题。经济崩溃和沉重的债务，加上政权快速更迭造成的迷失，意味波兰正处于完美的弱势，可以接受激进的休克治疗计划。而波兰的财务赌注甚至比拉丁美洲还高，东欧尚未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费市场可言。其最宝贵的资产则由国家掌控——这是私有化最理想的目标，抢先进入者快速获利的潜力无可限量。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老布什领导的白宫祝贺团结工会对抗共产党成功。但明白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团结工会偿付曾禁止工会并囚禁其成员的前朝政权累积的债务——美国只提供1.19亿美元的援助，对一个面对经济崩溃和需要根本整顿的国家有如九牛一毛。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从他在玻利维亚立下彪炳功绩后，各界对萨克斯的推崇已达到狂热程度。《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赞叹于他能担任半打国家的经济休克医生，同时还能继续他的教职，因此宣告萨克斯——外表看来还像哈佛辩论队队员——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那琼斯”。

萨克斯在波兰的工作始于团结工会选举胜利之前，而且是应共产党政府的要求。他访问波兰一天，与共产党政府和团结工会分别会面，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他力邀萨克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索罗斯和萨克斯一起前往华沙，据萨克斯回忆：“能我告诉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愿意进一步参与协助解决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索罗斯同意出钱让萨克斯和同事利普顿（David Lipton）在波兰设立一个常驻办事处。利普顿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当时在IMF任职。当团结工会赢得压倒性的胜选，萨克斯便开始与团结工会密切合作。

尽管萨克斯是自由工作者，没有领IMF或美国政府的薪水，但在许多团结工会高级干部眼中，他几乎拥有救世主的权力，凭着他能与华府高级官员接触和传奇性的声誉，萨克斯似乎握着新政府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援助和赦免债务。萨克斯当时说，团结工会应断然拒绝继承债务，并且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可募集30亿美元的援助——比起布什提供的援助是一笔大钱。他曾协助玻利维亚获得IMF贷款和重新协商债务，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耐。

不过，协助是有代价的：团结工会政府要取得萨克斯的关系和说服的力量，先得采用波兰媒体所称的“萨克斯计划”或“休克治疗”。

这套计划甚至比加诸玻利维亚的还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这与团结工会的工人所有权经济计划直接冲突，而且虽然该工会的全国领袖已不再谈论该计划中引发争议的构想，它仍然是许多团结工会成员的信条。萨克斯和利普顿花一个晚上写出波兰休克治疗的转型计划，计划有15页，萨克斯宣称：“我相信，这是首度有人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为市场经济体拟订的全面计划。”

萨克斯相信，波兰必须立即“跃过体制性的裂缝”，因为除了有众多问题外，波兰正濒临恶性通胀边缘，他说，一旦陷入其中，将发生“根本的崩溃……出现完全且无法复原的灾难”。

他举行数次一对一的讨论会，向团结工会的主要干部解释他的计划，有些长达四小时，并且聚集波兰的民选官员发表演说。团结工会的许多领导人不喜欢萨克斯的构想——工会对共产党实施的大幅提高价格已形成厌恶的情绪——而现在萨克斯告诉他们要做同样的事，而且是全面实施，萨克斯辩称他们不会碰上问题，因为以团结工会累积

了雄厚的公众信任，绝对很惊人也很重要”。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从未打算利用这种信任，采取会导致他们会员极度痛苦的政策，但多年来从事地下工作、被关在牢里和流亡海外，已使他们逐渐疏离基层。就像波兰编辑韦尔戈兹（Przemysław Wielgosz）解释的，运动的最高阶层“实际上已经脱队……他们的支持不是来自工厂和生产线，而是教会”。领导人也迫切需要快速的解决方案，即使会带来痛苦。而萨克斯建议的正是如此。“这会有用吗？这是我想知道的。会有用吗？”团结工会最知名的智囊米克尼克（Adam Michnik）问。萨克斯面不改色说：“这是好计划，这会有用。”*

*米克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早的事是发生在它结束之后。

萨克斯经常举玻利维亚作为波兰应该效法的模范，频繁到波兰人听厌了那个国家。“以我很想到玻利维亚去看看，”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当时告诉记者，“我相信那里一定很漂亮，很有异国情调，我只是不想在这里看到玻利维亚。”多年以后。当瓦文萨和桑契斯在一项高峰会上见面（两人都担任总统），他向桑契斯承认自己对玻利维亚特别嫌恶。“他朝着我走过来，”桑契斯回忆道。“然后对我说：‘我一直很想认识玻利维亚人，尤其是玻利维亚总统，因为那些人一直让我们吃好苦的药，说非吃不可。因为玻利维亚人就是这么吃的，现在我认识你了，你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我以前恨死你们了。’”

萨克斯谈论玻利维亚时，他没有提到为了推动休克治疗计划，政府曾两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绑架和囚禁工会领袖——就像共产党秘密警察在不久前的紧急状态下。逮捕并囚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许多人现在回忆说。当时最有说服力的是萨克斯的承诺。他说，如果接受他严厉的建议。波兰将不再与众不同。而会变得“正常”——就像“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如果萨克斯说得对，波兰只要敲掉旧国家的结构，就可以快转前进变成一个像法国或德国的国家，那么痛苦不是很值得吗？快餐版的欧洲计划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取用。为什么还要采取渐进方式去做很可能失败的改变，或尝试没有人做过的新方法？萨克斯预测休克治疗将造成物价飙升带来的“暂时混乱”，然后会“趋于稳定——大众将明白所处的情势”。

他与波兰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巴尔合诺维奇结盟，后者原本是华沙规划与统计大学（Ma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政治倾向鲜为人知（那里所有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很快大家才发现他自认是荣誉芝加哥男孩。曾熟读被查禁的波兰文版弗里德曼著作《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巴尔合诺维奇后来解释。那本书“启发我和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敢于梦想一个自由的未来”。

弗里德曼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与瓦文萨那年夏天对所有国人的承诺有着天壤之别。瓦文萨仍坚持波兰应该走更缓和的第三条路，并曾在接受芭芭拉·华特丝（Barbara Walters）访问时形容。那是“一种混合体……它不是资本主义。它将是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体系，会拒绝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的东西”。

许多人确实质疑萨克斯和巴尔舍诺维奇推销的快速矫正不过是个神话，休克治疗可能无法把波兰休克成健康和正常，还可能制造比以前更大量的贫穷和工业退化。“这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我们经不起这种休克。”一位知名医生和医疗保险倡导者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韦施勒（Lawrence Weschler）。

在获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并突然从亡命之徒变成国会议员之后的三个月期间，团结工会的高层不断辩论、踱步、咆哮、香烟一根接一根，无法决定该怎么做。每过一天，他们的国家就在经济危机中陷得更深。

勉强的拥抱

1989年9月12日，波兰第一届民选国会推选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团结工会干部会议终于决定处理经济的办法，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最终的决定——是萨克斯计划、戈尔巴乔夫的渐进路线，或团结工会的工人合作社政纲？

马佐维耶茨基即将宣布判决，但他在发表国政演说当中、还未谈到举国最关心的问题前，发生了可怕的事，据目击者转述，他开始摇晃，紧抓着演讲台，脸色惨白，喘着气喃喃说：“我感觉不舒服。”他的助理迅速带他离开议事厅，留下415位交头接耳的下议院议员。他心脏病突发？被下毒？共产党下的毒手？还是美国人？

在楼下的房间，一群医生检查马佐维耶茨基，并作了心电图检查。不是心脏病或遭下毒，这位总理只是出现“急性疲劳”症状，因为睡眠太少又压力太大。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焦躁不安，他再度进入国会议事厅，受到会场如雷的掌声欢迎。“抱歉”书卷气的马佐维耶茨基说，“我的健康状况好像波兰的经济情况。”

终于，宣判的时刻到了：波兰经济将以休克疗法来治疗它的急性疲劳，而且会采用特别激进的方法，包括“国营产业私有化、创立股票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可兑换的货币、从重工业转向生产消费性产品”，以及“削减预算”——尽可能快速，并且全部同时进行。

如果团结工会的梦想始于瓦文萨一跃而过格但斯克的铁围墙。那么马佐维耶茨基疲惫地屈服于休克治疗。便代表这个梦想的终结，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是团结工会的会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合作管理经济设想是错的，而是他们的领导人相信。最重要的是争取取消共产党的债务，以及立即稳定货币。合作经济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吉克（Henryk Wujec）当时说：“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可能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另一方面，萨克斯确实有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

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政治快速变化的迷失。加上经济崩溃制造的集体恐惧。使迅速而神奇的治疗承诺——不管多虚幻——变得太诱人而难以拒绝。人权倡议分子波特诺斯卡（Halina Bortnowska）描述那段期间变化的迅速。像“狗的年龄与人的年龄的不同。我们在那些日子的生活……你会开始目睹这类半疯狂的反应。当人们已经如此迷失时，你再也无法预期人会依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关心——什么对他们才是最好的”。

财政部长巴尔舍诺维奇后来承诺，利用紧急的情势是刻意的策略——像所有震撼战术一样。是清除反对的方法，他解释说，他能够推动完全违背团结工会设想的内容与形式的政策，是因为波兰处在他所称的“特殊政治”情势。他说这种为时短暂的情势不适用“正常政治”的法则（咨商、讨论、辩论）——换句话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不适用民主的特殊情势。

他说：“特殊政治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段很明确的裂缝。它可能是一段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前一个体制崩溃，或从外来的支配当中解放（或战争结束）。在波兰，三种现象在1989年同时出现。”由于这些特殊状况，他才能把正常程序摆一旁，强力推动“立法程序的大幅加速”，通过休克治疗法案。

在90年代初期，巴尔舍诺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吸引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译注：美国MTV公司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从虚空中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上半，‘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下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许多人宣称，这些变迁以及种种实质与譬喻的围墙倒塌。将导致意识形态信仰的终结。摆脱超级强权决斗极化效应的国家。终于能够选择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某种政治自由与经济安全的混合。就像戈尔巴乔夫说的：以数十年来被教条催眠。照着固定的规矩行事。造成了许多结果。今日我们要引进真正的创新精神。”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吗，这类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让果断的人得以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拥抱这种世界观的人在一次类似培灵会（revival meeting）的集会中相聚；地点正是芝加哥大学。这次集会的主题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演讲，题目是：“我们正在接近历史的终点吗？”

*对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资深政策制定者的福山来说。提倡放任资本主义的策略很明显：别与主张第三条路的众人辩论。要先发制人宣告胜利。福山深信不应放弃极端。不能混合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不能妥协。他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三年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基础。

这场讨论由欧林基金会（John M. Olin）赞助，该会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十字军的长期资助者，是右派智库勃兴的背后金主。这种协力合作顺理成章，因为福山基本上是重新陈述弗里德曼的主张，说自由市场与自由的人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部分。福山把这种论述带到一个厚颜的新境界，宣称在经济领域中解除市场管制，并结合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民主政治与激进资本主义不仅彼此融为一体，也与现代化、进步和改革密不可分。反对这种融合的人不但是错误，而且就像福山说的“仍留在历史中”，有如在众人都已进入天国时落后的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已超越到一个像天国般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国度。

这些论述是芝加哥学派渴望逃避民主的绝佳例子，正如IMF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借紧急“稳定”计划的掩护，暗中推动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福山尝试在从华沙到马尼拉各地兴起的民主化潮流中，走私同一个引发强烈争议的目标。正如福山说的，确实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共识正在兴起，认为所有人民都有权利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但只有在国务院生动的幻想中，这种对民主的渴望才包含了人民热烈要求一套剥夺就业保护，导致大量裁员的经济体制。

对摆脱了左派和右派独裁统治的人民来说。如果真的有任何共识。那就是民主代表了终于有机会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而不是让别人的意识形态片面强加在身上。换句话说，福山定义为“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也包含人民可以选择国家的财富该如何分配的主权。从国营公司的命运，到国家应提供学校与医院多少经费。好不容易，全球各地的人民都准备要行使他们得来不易的民主力量，自己决定国家的命运。

1989年，历史正展开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转折，进入一段真正开放和充满可能性的时期。所以福山从他在国务院的职位，选择这个时刻尝试用力阖上历史之书并非偶然。世界银行和IMF选择同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揭露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明显的企图。想阻止自由市场外一切经济观念的讨论与辩论。这些抑制民主的策略目的在于削弱不受节制的自决，而自决则是——也永远是——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最大的威胁。

天安门广场的震慑（The Shock of Tiananmen Square）*

*此节中译本已删节，下面的中文为电子书编者所译，俗陋之处敬请包涵，英文也附后，以备大家参考，并欢迎高手根据英文重译补遗。

让福山大胆的宣称最先的丢脸的是中国。福山的演讲是在1989年2月；两个月后，一场民主运动在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发生大规模抗议静坐。福山宣称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进程，无法分开。然而，在中国，政府恰恰已经做到了后一点：即努力推动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管制并扩大了市场经济范围；但同时它却下定决心抵制选举和公民自由。而对于示威者来说，他们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却反对政府走向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西方新闻机构对运动的报道之外。在中国，民主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并非手拉手；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路障的两边。

One place where Fukuyama's bold pronouncement came in for early discrediting was China. Fukuyama's speech took place democracy movement exploded in Beijing, with mass protests and sit-ins in Tiananmen Square. Fukuyama had claimed that democratic and "free market reforms" were a twin process, impossible to — but it was fiercely determined to resist calls for elections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emonstrators, on the other hand, demanded

在80年代早期，那时已经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就极力避免蹈波兰覆辙——那里工人已经形成一个能够挑战党的权力垄断的独立运动。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保护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基础的国有工厂和农村公社。事实上，邓热衷于（把中国的计划经济）变成为一个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为此，1980年，他的政府就邀请密尔顿·弗里德曼来中国，向数百人的高级官员、教授和党的经济学家传授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原理。“所有人都是特意邀请的，必须出示邀请函才能获准进场”弗里德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说。他的中心主题是“比之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他用的例子是香港——一个弗里德曼一直赞叹不已的地方，

一个拥有纯粹资本主义的地方，一个“因为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以及最小的政府干预而产生的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地方。他声称，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却比比美国还自由，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少。

In the early 198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n led by Deng Xiaoping, was obsessed with avoiding a repeat of what had destroyed the economy—so committed that, in 1980, his government invited Milton Friedman to come to China and tutor hundreds of top-level civil servants, professors and party economists in the fundamentals of free-market theory. "All were invited guests, who had to show a ticket of invitation to attend," Friedman recalled of his audiences in

在弗里德曼的自由定义中，政治自由只是附加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但必须有不受限制的贸易自由。这与中国政治局正在成形中的自由图像恰好一致。党要实施一个维持对权力的掌握的同时向私有制和消费主义开放经济的方案。这个方案能够确保一旦国有资产被拍卖，党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将首先获得最好的交易和最大利润。根据这一“改革”方案，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控制国家的人将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控制国家，同时享受生活方式的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打算仿效并非是美国，而是更接近皮诺切特控制的智利：自由市场与政治独裁，后者通过铁腕镇压实现。

Friedman's definition of freedom, in which political freedoms were incidental, even unnecessary, compared with the freedom—a plan that ensured that once the assets of the state were auctioned off, party officials and their relatives would snap up the best repressed.

从一开始，邓小平非常清楚镇压将是至关重要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控制，摆脱对手并对持异议者进行再教育。但是毛的镇压是站在工人的一面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党正在调转枪口，实施反革命政策，要求工人放弃他们的众多利益和安全，以便少数人可以聚敛巨额财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所以，在1983，当邓小平实施对外国投资开放并削减劳动保护时，他还下令建立了多达40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一个新的，负责镇压“经济犯罪”（即罢工和抗议）任何迹象的巡回暴力队伍。根据中国史专家迈里斯-迈斯纳所述，“人民武装警察配备美国直升机和电棍”，并“多次派遣小分队赴波兰进行防暴训练”。在那里他们学习波兰戒严时期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战术。

From the start, Deng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repression would be crucial. Under Mao, the Chinese state had exerted brutal strong People's Armed Police, a new, roving riot squad charged with quashing all signs of "economic crimes" (i.e., strikes and riot training)—where they studied the tactics that had been used against Solidarity during Poland's period of martial law.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是成功和受欢迎的。农民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有更多的自主，城市也恢复了商业和贸易。但在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开始采取明显不受欢迎的措施，尤其不受城市工人欢迎。物价放开导致物价飞涨；就业保障取消导致失业浪潮；以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到1988年，面对强有力的反弹，党被迫重新恢复了部分价格管制。愤怒同时也产生于党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许多中国公民想要更自由的市场，但“改革”越来越像成为党的官员的遮羞布，他们通过“改革”非法侵占原来自己管理的国有资产而变成商业大亨。

Many of Deng's reforms were successful and popular—farmers had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and commerce returned to the cities. But in the late eighties, Deng began introducing price controls were lifted, sending prices soaring; job security was eliminated, creating waves of unemployment; and deep in

因为自由市场的实验的困境，密尔顿-弗里德曼再次受邀访问中国，就如同在1975年的智利，当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们的计划已经引发了国内反抗时，需要他出手一样。一个来自世界闻名资本主义权威学者的高调访问正是中国的“改革者”急需的推进剂。

With the free-market experiment in peril, Milton Friedman was once again invited to pay a visit to China—much as the Chicago Boys and the profile visit from the world-famous guru of capitalism was just the boost China's "reformers" needed.

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1988年9月抵达上海，他们有些眼花缭乱，因为中国大陆竟然如此迅速地开始看起来

和感觉像香港。尽管愤怒憋在基层，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坚定了“我们对于自由市场魔力的信念”。弗里德曼把这一刻称为“中国（改革）实验最有希望的时期”。

When Friedman and his wife, Rose, arrived in Shanghai in September 1988, they were dazzled by how quickly mainland C

在官方媒体面前，弗里德曼受到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2个小时的会见，同时会见的还有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中国未来的国家主席。弗里德曼传递给江的讯息，重复了当智利改革刹车时他给皮诺切特的建议：不屈服于压力，不要动摇。“我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自由就在这一击”弗里德曼回忆。在一个给共产党总书记的备忘录中，弗里德曼强调，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休克疗法。“中国最初步骤的改革已获得惊人的成功。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信任自由私人市场以获得更突出的成就。”

In the presence of official state media, Friedman met for two hours with Zhao Ziya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

他返回美国不久后，带着他给皮诺切特提建议的热心，弗里德曼写了“纯粹出于恶作剧”的一封信给一份学生报纸的编辑，指责他的批评者的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只在中国待了十二天，在那里“主要是作为政府机构的客人，”会见了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尽管这些会见在美国大学校园激起了没有人权的强烈抗议，弗里德曼指出，“顺便说一句，对智利和中国，我准确地给出了完全相同的意见。”他最后问讽刺地说，“难道我自己应该事先准备好面对雪片般的抗议，只因为我已经愿意给予如此邪恶的政府建议？”

Shortly after his return to the U.S., Friedman, remembering the heat he had taken for advising Pinochet, wrote "out of sheer

几个月后，随着中国政府开始效仿皮诺切特的许多声名狼藉的政策，恶作剧信件呈现出了邪恶的弦外之音。

A few months later, that devilish letter took on sinister overtones,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emulate many of Pin

弗里德曼的行程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官方文件中给党的官僚提供祝福的教授形象并没能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几个月，抗议变得更加坚决和激进。反对派最明显的标志是罢课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这些历史性的抗议被国际媒体普遍描绘为一场向往西方式民主自由的现代理想主义学生与想保护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保守的独裁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最近，出现了对天安门事件含义的另一个解释，一个挑战主流版本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弗里德曼主义成为故事核心。这种叙事正在被完善，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汪晖，一个1989年抗议组织者，现在是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Friedman's trip did not have the desired results. The pictures in the official papers of the professor offering his blessing to style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old-guard authoritarians who wanted to protect the Communist state. Recently, another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Tiananmen has em

在他2003年出版的书——《中国新秩序》中，汪晖解释说，抗议者涉及中国社会多个领域，并不只是重点大学的学生，还包括工厂工人，小企业主和教师。他回忆说，激起抗议的是对邓的经济“改革”结果的普遍不满。这些改革降低工资，抬高价格，导致“裁员和失业危机。”根据汪晖的论述，“这些结果是1989社会运动的催化剂。”游行并不反对经济改革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弗里德曼式的改革——它的快速，残酷和高度反民主进程。汪晖说，抗议者对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呼吁是与对经济改革的异议紧密相连的。之所以要求民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党极力推动的变革是一场涉及广泛的革命，却完全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之所以存在对民主参与的普遍要求，是为了监督社会改革和利益重组进程的公平性。”

In his 2003 book, China's New Order, Wang explains that the protesters spanned a huge range of Chinese society—not just elite university students but also factory workers, small entrepreneurs and teachers. What ignited the protests, he reca—their speed, ruthlessness and the fact that the process was highly antidemocratic. Wang says that the protesters' call for electic

这些要求迫使政治局作出明确的选择。不是如经常声称那样，选择民主共和还是共产主义，选择“改革”还是“固守”，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权衡：党是否应当通过辗过抗议者的身体来强力推进自由市场进程？还是应该屈服于抗议者的民主要求，放弃它对权力的垄断并使经济改革计划遭受重大挫折？

These demands forced the Politburo to make a definite choice. The choice was not, as was so often claimed, between dem

market agenda, which it could do only by rolling over the bodies of the protesters? Or should it bow to the protesters' demands

党内一些自由市场改革派，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似乎愿意在民主问题上赌一把，相信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继续并行。但党内更有实力的势力，不愿意承担风险。最终结果是：通过镇压示威者来保护其经济“改革”计划。

Some of the free-market reformers within the party, most notably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 appeared willing to gamble on democracy, con

1989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戒严，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碾向抗议人群，并对所有人开枪射击。士兵们冲进学生示威者用以隐蔽的公共汽车，用棍棒殴打他们；更多的部队冲破路障突进天安门广场，那里的学生竖立着自由女神雕像，围成圆圈保护那些组织者。类似的镇压同时发生在全国各地。

That was the clear message when, on May 20, 1989,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d martial la

在那些日子里，死者和伤者的数目永远不会有可靠的估计。党承认有数百，目击者报告称死亡人数在两千到数千，受伤人数高达三万。抗议者接下来遭受的是一场针对批评者和反对者的政治迫害运动。约有四万被逮捕，数千人入狱，许多人（可能数百个）被处决。和拉丁美洲一样，政府对工人保持了最严厉的镇压，因为他们表现了对解除管制资本主义的最直接的威胁。莫里斯·迈斯纳写道：“大部分被捕的人和几乎所有被处决的人都是工人。对被逮捕的人实施系统的殴打和酷刑已经成为了一个广为宣传政策，目的显然是为了恐吓人民。”

There will never be reliable estimates for how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and injured in those days. The party admits to hun—possibly hundreds—were executed. As in Latin America, the government reserved its harshest repression for the factory workers, who represente publicized policy to systematically subject arrested individuals to beatings and torture," writes Maurice Meisner.^{4 8}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下这次大屠杀是作为共产党暴行的又一例证：正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摧毁他的对手，现在“北京的屠夫”邓，在毛泽东的巨型画像的注视下粉碎了他的批评者。一份华尔街杂志标题声称：“中国的恶劣行动威胁要从10年的改革道路上倒退回去”，犹如邓是一个这些改革的敌人而不是它们最坚定的捍卫者，坚决把它们带入新领域。

For the most part, the massacre was covered in the Western press as another example of Communist brutality: just as Mao Year Reform Drive"—as if Deng was an enemy of those reforms and not their most committed defender, determined to take their

血腥镇压后五天，邓对全国发表演说，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通过镇压正在保护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把抗议者作为“大量的社会渣滓”解散后，中国国家主席重申党继续经济休克疗法的承诺。“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邓说，并补充道，“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电子书编者注：此处对邓的讲话引文没有按照英文翻译，而是直接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邓有一些著名的捍卫者。大屠杀后，基辛格撰文辩护道，共产党没有选择。“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容忍其首都的主广场被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占据八个星期……因此镇压不可避免。”

Five days after the bloody crackdown, Deng addressed the nation and made it perfectly clear that it wasn't Communism he door policy at a more steady, better, even a faster pace. . . . We haven't been wrong.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four cardina

* Deng had some notable defenders. After the massacre,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op-ed arguing that the party had no choice. "No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would have tolerated having the main square of its capital

奥维尔，一个从在中国学习过的新闻记者，总结邓小平的选择：“大屠杀后1989，他实际上说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但我们将停止政治改革。”

Orville Schell, a China scholar and journalist, summarized Deng Xiaoping's choice: "After the massacre of 1989, he in eff

对邓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来说，导向自由市场的改革现在已经没有限制了。正如皮诺切特的白色恐怖扫清了通向

彻底改革的道路，天安门通过对反抗施加白色恐怖铺平了激进改革的道路。即使将来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们也只能选择沉默，否则就须面对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残酷镇压。于是，通过对公众的白色恐怖，邓强行推进他的最彻底的改革。

For Deng and the rest of the Politburo, the free-market possibilities were now limitless. Just as Pinochet's terror had cleared the streets for revolutionary change, so Tiananmen

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他被迫采取一些缓和措施；大屠杀过后三个月，他又杀回来，实施了一些弗里德曼的其他建议，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在汪晖看来，“八十年代后期未能实现的市场改革却能在后八九年代的环境下完成”有一个明显的原因，“那就是1989的暴行服务于阻止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动乱，最终新的价格体系得以成形。”换句话说，大屠杀的冲击使休克疗法得以实施

Before Tiananmen, he had been forced to ease off some of the more painful measures; three months after the massacre, he killed again. In Wang Hui's view, "the reason for the market reforms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as a clear one: the violence of 1989 served to check the social upheaval brought about by this

大屠杀接下来的三年，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大肆开放，开发区遍布全国。当他宣布了这些新举措时，邓提醒，“如果有必要，可采取任何手段，来消除混乱的所有苗头。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措施都可以实行。*

*纽约大学人类学家戴维记录道，正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邓进行他著名的“南巡”时，“中央政府开始倾全力于推动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In the thre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bloodbath, China was cracked open to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special export

* As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anthropologist David Harvey notes, it was only after Tiananmen, when Deng went on his far

正是这场改革浪潮，把中国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生产工厂的首选地点。没有国家比中国的条件更有利：低税收和关税，容易收买的官员，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出于对最暴力报复的恐惧，这些劳动力在很多年中，都不敢要求体面的工资或工作场所最基本的劳动保护。

It was this wave of reforms that turned China into the sweatshop of the world, the preferred location for contract factories and a wage workforce that, for many years, would be unwilling to risk demanding decent salaries or the most basic workplace protection.

对外国投资者和党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双赢的安排。根据2006年的一个研究，90%的中国亿万富翁（以人民币计算）是中共官员的子女。大约2900名“太子党”，控制了2600亿美元0的资产。这是又一个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由皮诺切特在智利首创：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们互相勾结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合力剥夺工人。今天，这一组合还体现在如下事实：国外跨国传媒和技术公司帮助中国对公民进行监视，以确保当学生在网上搜索像“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甚至“民主”这样的短语时，没有文件可以搜到。“今天自由市场社会的产生不是自发事件的结果，”汪晖写道，“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

For foreign investors and the party, it has been a win-win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a 2006 study, 90 percent of China's billionaires (calculated in Chinese yuan) are the children of nine hundred of these party scions —known as "the princelings" — control \$260 billion.5 4 It is a mirror of the corporatist state first pioneered in Chile under Pinochet.

天安门事件揭示了一个事实：独裁共产主义和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之间政策的赤裸裸的相似——同样致力于消灭反对者，清洗所有抵抗，然后重新开始。

One of the truths revealed by Tiananmen was the stark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actics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m and Chicago School Capitalism—a shared willingness to disappear opponents, to blank the slate of all resistance and begin anew.

尽管事实上在弗里德曼鼓励中国政府推动痛苦且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后仅仅几个月就发生大屠杀，他也从来没有面对“因为愿意给如此邪恶的政府建议而受到的雪片般的抗议”。和往常一样，他视而不见他的建议和必须执行的暴力之间的联系。谴责中国使用镇压的同时，弗里德曼继续把中国作为“自由市场政策有效促进繁荣和自由”一个范例。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massacre happened just months after he had encouraged Chinese officials to push forward with market policies, Friedman never did face "an avalanche of protests for having been willing to give advice to so evil a government market arrangements in promoting both prosperity and freedom."⁵⁶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的同一天——1989年6月4日，团结工会的历史性大选横扫波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休克主义的两种非常不同的作品。两国都需要利用休克和恐惧推动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使用真刀真枪的恐怖、酷刑和暗杀，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只得到不合格的成功。在波兰，只有经济上危机和速变的休克被使用——没有公然的暴力，休克的影响最终消失，成果更加不明朗。

In a strange coincidenc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ook place on the same day as Solidarity's historic election sweep—June 4, 1989. They were, in a way, two very different studies in the shock doctrine. Both countries had needed to exploit shock marke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where the state used the gloves-off methods of terror, torture and assassination, the result was, from a market perspective, an unqualified success. In Poland, where—and there was no overt violence—the effects of the shock eventually wore off, and the results were far more ambiguous.

在波兰，实行选举后休克疗法尽管可被强行推进，但它使民主进程成为一个笑柄，因为它与投票给团结工会的选民中压倒性多数的意愿直接冲突。直到1992年，60%的波兰人仍然反对重工业私有化。对于自己不得人心的行动，萨克斯辩称他没有选择，自己就如同急诊室的医生。“当一个家伙被送入急诊室而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你只能打开胸腔，而不能因为担心留下伤疤而离开”他说。“这是一个让这个家伙的心脏再次跳动的办法。你确实制造了血腥混乱，但是你没有选择。”

In Poland, shock therapy may have been imposed after elections, but it made a mockery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since it

然而波兰人从最初的手术中一恢复，他们就对医生和治疗产生了怀疑。休克疗法不会给波兰造成“一时的混乱”，萨克斯曾预测。（确实不是“一时”），它造成了持久的衰退：第一轮改革后的两年内工业生产缩减30%。随着政府削减开支和廉价进口商品充斥，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到1993年一些地区甚至达到25%——对于一个曾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尽管有很多弊端和艰辛却没有公开失业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即使当经济再次开始增长，高失业率仍然持续。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波兰的失业率为20%——在欧盟中是最高的。对于那些二十四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更为严重：2006年40%的年轻工人失业，是欧盟平均数的两倍。最引人注目的是贫困人口总数：1989年，波兰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3年，这一数字变成了59%。削弱劳动保护和使日常生活成本更昂贵的休克疗法，不可能使波兰成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它们都有强大的劳工法律和慷慨的社会福利），而只会成为一个破裂的国家，跟从智利到中国所有反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一样。

But once Poles recovered from the initial surgery, they had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doctor and the treatment. Shock therapy blown depression: a 30 percent reduction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two years after the first round of reforms. With government—a wrenching change in a country that, under Communism, for all its many abuses and hardships, had no open joblessness. Even—the highe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For those under twenty-four, the situation is far worse: 40 percent of young workers were unemployed in 2006, twice the EU average. Most dramatic at

正是团结工会，这个由波兰的蓝领工人建立的政党，塑造了这一永久的下层阶级。这一事实展现的是一个苦涩的背叛，一个在绝望的国家中培育犬儒主义和愤怒的背叛。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往往淡化本党的社会主义出身，瓦文萨现在声称，早在1980年，他就知道他们将“不得不建立资本主义。”莫泽莱夫斯基，一个蹲了八年半共产党监狱的激进且睿智的团结工会成员，愤怒地反驳，“我决不会为资本主义蹲一星期，甚至一个月，更别说八年半监禁！”

The fact that it was Solidarity, the party built by Poland's blue-collar workers, that oversaw the creation of this permanent underclass represented a bitter betrayal, one that bred a deep cynicism

团结工会统治的头一年半，工人们相信他们的英雄，他们保证疼痛是暂时的，是使波兰融入现代欧洲道路上必须的步骤。即使面对失业率飞升，他们耐心地等待休克疗法的治疗部分生效，社会只有零星的罢工。当承诺的恢复没有来到，至少在工作方面没有恢复，团结工会的成员也只是困惑：他们自己通过斗争运动争取来的生活怎么能比共产主义下的生活更糟糕呢？“1980年，当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给我提供保护，”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现在当我寻求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为了改革我只能忍受。”

For the first year and a half of Solidarity rule, workers believed their heroes when they were assured that the pain was ten [Solidarity] defended me in 1980 when I set up a union committee," one forty-one-year-old construction worker said. "But when I went to them for help this time, they told me that I have to suffer for the sake of reform

经过大约十八个月的“特殊政策”时期，团结工会的基础群众已经受够了，他们要求停止试验。极端的不满，体现在显著增加的罢工次数上：1990年，当工人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时，只有250次；到1992年，这样的罢工抗议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底层的压力，政府被迫减缓其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截止1993年底，62%的波兰工业仍然保持公有制，这一年罢工次数是7500次。

About eighteen months into Poland's period of "extraordinary politics," Solidarity's base had had enough and demanded an—a year that saw almost 7,500 strikes —62 percent of Poland's total industry was still public.^{6 2}

事实上，波兰工人成功阻止了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意味着他们避免了更加严重的痛苦。罢工大潮无疑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如果这些所谓的低效率的企业被关闭或裁员或出售，这些岗位都将丢失。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这同一时期开始迅速增长。按照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前团结工会成员塔德尔瓦历克（Tadeusz Kowalik）的解释，这证明，那些以国有企业过时和效率低下为由随时准备注销的人是“明显错误的”。

The fact that Polish workers managed to stop the wholesale privatization of their country means that as painful as the reform

除了持续罢工，波兰工人发现另一种方式向他们从前的盟友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们利用他们斗争取得的民主在投票时果断地惩罚了这个政党，以及他们曾经敬爱的领袖瓦文萨。最引人注目的痛击是在1993年9月19日，一个包括前执政共产党（更名为民主左翼联盟）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赢得了66%的席位。团结工会却于此时分裂，各派都没能获得超过5%的选票，在议会中失去了席位。一个以首相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为首的新政党，只赢得了10.6%的选票。这是对休克疗法的一个响亮的耳光。

Besides going on strike, Polish workers found another way to express their anger with their onetime allies in Solidarity: the beloved leader Lech Walesa. The most dramatic trouncing came on September 19, 1993, when a coalition of left parties, including—a resounding rejection of shock therapy.

然而，在未来几年，几十个国家奋斗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一切困苦——罢工，选举失败，政策逆转——都将会消失。同时，波兰将作为榜样证明，以民主、和平的方式，激进的自由市场完全可以改头换面。

Yet somehow,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dozens of countries struggled with how to reform their economies, the inconvenient—would be lost. Instead, Poland would be held up as a model, proof that radical free-market makeovers can take place democratically and peacefully.

像许多关于转型中国家的故事一样，这像是一个神话。但它确实是一个真实无比的事实：在波兰，民主是用来作为在街上和选举中反对“自由市场”的武器。与此同时，在中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车轮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惊和恐怖启动了一个现代史中最有利可图的和持续的投资者繁荣。一个诞生于大屠杀中的奇迹。

Like so many stories about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this one was mostly a myth. But it was better than the truth: in Poland, democracy wheeling capitalism rolled over democracy in Tiananmen Square, shock and terror unleashed one of the most lucrative and sust

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和解意味着那些曾被历史压在下层的人，必须看到压迫与自由间出现本质上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自由必须转变成可获得干净水源、随时可用的电力；能住在像样的住宅和拥有一份好工作；能送你的孩子上学，并可获得医疗。我是说，如果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没有提升和改善，这种转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便毫无用处。

——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2001年

在转移权力前，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想削弱它。该党尝试谈判某些交换条件，用放弃统治国家来换取阻止黑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治国的权利。

——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南非新闻记者

1990年1月，71岁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他的牢房里坐下，写一封信给外面的支持者。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平息一场争论，说明在被囚禁了27年后（大部分时间关在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这位黑人领袖追求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经济转型的决心是否已经软化。这封信只有几句话，却立即平息了争论：“矿场、银行和独占性工业的国有化是非洲民族议会（ANC）的政策，改变或修改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无法想象的。提升黑人经济力量是我们完全支持和鼓励的目标。但以我们的情况来看，国家控制经济的某些部门是不可避免的。”

结果证明，历史并未像福山所说的已经终结。在非洲大陆最大经济体的南非，似乎有些人仍相信，自由应包括收回并重分配压迫者的不当利得。

这个信念在过去35年一直是非洲民族议会政策的基础，从它宣读其核心原则的声明《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以来就是如此。这篇宪章起草的故事变成南非民谣的素材其来有自，故事始于1955年，当时这个政党派遣5万名志愿者到城镇和乡下，任务是向人民搜集“自由诉求”——他们对后种族隔离世界中所有南非人都有同等权利的设想。这些要求手写在一一片片的纸上：“发放土地给所有没有土地的人”、“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和缩短工时”、“免费和强制教育，不分肤色、种族或国籍”、“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还有许多。当诉求搜集回来后，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整理成一份最终的文件，并于1955年6月26日在柯利普城（Kliptown）召开的人民议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上正式采用为宪章。当时柯利普城是为保护白人、隔开约翰内斯堡拥挤的黑人居住区而兴建的“缓冲”城镇。

约3000名代表——黑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少数白人——一起坐在一片旷野。投票通过文件的内容。据曼德拉描述历史性的克利普城会议：“宪章被大声朗读，一段接一段，以英文、塞索托语（Sesotho）和科萨语(Xhosa)对大家念出。每念完一段，群众便大声表示赞同。并呐喊着‘非洲（Afrika）!’和‘回来吧（Mayibuye）!’《自由宪章》第一个坚决的要求是：“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

在50年代中期，这个梦想距离实现还有数十年。在议会的第二天，群众便被警察以暴力驱散，官方宣称代表们正密谋叛国。

南非白人（Afrikaners）和英国人掌控的南非政府，30年来禁止非洲民族议会和其他主张终结种族隔离的政党活动。在这段高压统治期间，《自由宪章》仍然持续流通，在地下革命分子间传递，它激发希望与抵抗的力量丝毫不减。在1980年代，它由新一代出身城市的年轻激进派传承。受够了耐心等待和安分守己，愿意挺身为推翻白人统治而奋斗的年轻激进分子。以无惧的气概吓坏他们的父母辈。他们抛弃幻想，走上街头，高唱：“子弹或催泪瓦斯都无法阻止我们。”他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埋葬朋友，仍继续唱歌向前进。当这些激进分子被问及反对什么时。他们回答“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被问及为什么而战时，许多人回答“自由”，也经常提到“《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确立了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以及更激进的分享非洲最富裕国家的财富，包括世界最大金矿等珍宝的权利。宪章宣示：“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人的遗产，应该归还给人民，土地下的矿产财富，银行以及独占性工业，应该转移给全体人民，所有其他产业和贸易的掌控应有助于人民福祉。”

在起草时，《自由宪章》被解放运动里的一部分人视为有建设性的中间路线，被另一些人视为不可饶恕的软弱。泛非洲主义者（Pan-Africanist）谴责非洲民族议会对白人殖民主义者让步太多。（他们质疑，为什么非洲属

于“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如同牙买加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维（Marcus Garvey）所主张的。他们认为宪章中应要求“非洲是非洲人的”。）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驳斥宪章的要求“太资产阶级意识”：把土地所有权分给所有人民不符革命思想；列宁说，私有财产本身应该废止。

但解放运动各派别一致的观点是，种族隔离不但是规定谁才有权投票和可以自由迁徙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利用种族歧视来执行高获利协议的经济制度：一小群白人精英长期从南非的矿场、农场和工厂攫取庞大获利。就是因为占多数的黑人被禁止拥有土地，且被迫提供劳力以换取极低的报酬——并在勇敢反抗时遭到殴打和囚禁，在矿场里，白人获得的工资十倍于黑人。而且就像在拉丁美洲，大工业家与军方密切合作，让不听话的工人失踪。

《自由宪章》的主张是解放运动的基本共识，亦即自由不会因为黑人统治国家而降临。而必须等到收回被非法没收的土地财富，并重分配给整体社会时才会降临。南非再也不能像种族隔离的年代那样，是一个白人过着加州般的生活，黑人过着刚果似生活的国家，自由意味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正是曼德拉在牢里写下那两句话所确认的：他仍然相信不重分配就不会有自由的基本原则。在这么多国家也同时在“转型”的情况下，这项宣示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曼德拉领导非洲民族议会取得权力，并把银行和矿场收归国有，这个例子将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更难将其他国家的这类提议驳斥为落伍的想法，也难以坚持只有放任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有能力解决高度不平等的问题。

1990年2月11日，写了那封短信之后两周，曼德拉以自由人身份走出监狱，声望有如世上其他地方的活圣者一样。南非的城镇大肆庆祝，人们重新燃起解放运动无可阻挡的信念。和东欧的运动不同之处是，南非的运动未曾被击溃，而是不断向前推进。曼德拉本人则身受文化休克之苦，甚至误把一支摄影机麦克风当成“某种我坐牢时发展出来的新武器”。

世界与他27年前入狱时已大不相同。曼德拉1962年被逮捕时，一波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浪潮正横扫非洲大陆；如今非洲却因战争而四分五裂。他在狱中时，社会主义革命曾被引燃而后又被扑灭；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遭杀害；阿连德在1973年的政变身亡；莫桑比克的解放英雄兼总统马谢尔（Samora Machel），1986年在一次神秘飞机失事中罹难。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年发生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崩溃。接二连三的改变给他的时间却非常有限：曼德拉获释后马上得领导人民争取自由，同时避免内战和经济崩溃——两者似乎都极可能发生。

如果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第三条路一条使国家民主化，同时重分配财富的道路——那么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下的南非，看起来似乎得天独厚处在实现这个长期梦想的情势。当时不仅全世界对曼德拉倾注以仰慕和支持，而且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独特方向在之前几年已经形成。在80年代，它已变成真正的全球群众运动，而且在南非以外的地方，行动主义者最有效的武器正是抵制企业，包括针对南非制产品以及与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做生意的国际公司。抵制策略的目标是对企业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它们愿意游说强硬的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但这个运动也包含道德成分：许多消费者坚信，应该给从白人至上主义法律获利的公司财务上的打击。

这种态度给非洲民族议会独特的机会，以拒绝当时自由市场的正统派思想。由于对企业应分担种族隔离罪行的责任已有广泛共识，舞台已为曼德拉布置妥当。可以让他向世界解释。为什么南非经济必须实施像《自由宪章》所要求的收归国有。他也可以利用这套论述。解释何以在种族隔离下累积的债务不应加诸在任何由普选产生的新政府，这种大胆的做法应会引来IMF、美国财政部和欧盟激烈反对，但曼德拉是一位活圣人——他能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些力量能否被证明更强大，在曼德拉从监狱递出短信。到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选举大获全胜，他当选总统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些事让党高层相信。他们无法利用草根声望收回并重分配国家被窃占的财富，因此，非洲民族议会并未寻找加州和刚果间的平衡点。反而采取了导致不平等和犯罪爆炸般增加的政策，使现在南非的分裂达到像比弗利山庄和巴格达的程度。今天，这个国家是经济改革与政治转型断裂的活见证，在政治上，南非人民拥有投票权，公民自由权和多数统治。然而在经济上，南非已超越巴西，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我在2005年走访南非，想了解从1990年到1994年转型最关键的几年间发生什么事，使曼德拉走上一条他曾明确形容为“无法想象”的道路。

非洲民族议会与执政的国民党展开谈判。决心避免类似邻国莫桑比克独立运动之后的梦魇。1975年葡萄牙被迫

结束殖民统治，撤出时曾心怀恶意地大肆破坏，把水泥倒进电梯通道，砸烂曳引机，从莫桑比克带走一切能搜括的东西。在协商出相对和平的政权转移上，非洲民族议会确实功不可没，但还是免除不了种族隔离时代统治者在撤出时的大破坏。和莫桑比克的前殖民者不同。国民党并未倾倒水泥——他们破坏力同样强大的联合抵制更加隐晦。而且都白纸黑字写进那些历史性协商的合约里。

结束种族隔离条件的谈判分成两个平行但经常交织的方向进行：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经济，大部分的注意力自然落在曼德拉与国民党领袖戴克拉克（F.W.de Klerk）备受瞩目的政治高峰会上。

戴克拉克在这些谈判的策略是尽可能保留更多权力。他用尽一切办法——把国家打散成一个联邦，保证多数党有否决权，在政府架构中为每一个族群保留特定比例的职位——任何可以避免单纯多数统治的方法，因为他确信那势必带来大规模土地征收和企业国有化，正如曼德拉后来描述：“国民党想尽办法让我们同意维持白人的控制权。”戴克拉克有枪炮和钱作后盾。但他的对手拥有一个数百万人的运动。曼德拉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拉玛波萨（Cyril Ramaphosa）几乎全盘获胜。

与这些经常充满火爆场面的高峰会同时进行的，是低调许多的经济谈判，而代表非洲民族议会这方的主要是当时党内的新星、现在是南非总统的姆贝基（Thabo Mbeki）。随着政治谈判的进展，国民党发现国会显然很快会落入非洲民族议会的掌控。这个南非精英组成的党开始倾注全部精力和创意在经济谈判上。南非的白人无力阻止黑人接管政府。但对于保卫在种族隔离统治下累积的财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方面的谈判，戴克拉克政府采取两面策略。第一，援引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共识所谓只有一种方式能管理经济的说法，把经济决策的主要层面——如贸易政策和央行——描述为“技术”或“行政”性质。然后它利用一系列的新政策工具——国际贸易协议、宪法创制和结构调整计划——把这些核心权力交给表面上公正的来自IMF、世界银行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以及国民党的专家、经济学家和官员，就是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民族议会的解放斗士。这是一套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策略，但牵涉的不是南非的地理划分（像戴克拉克原本尝试的），而是南非的经济。

这套计划在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的面前通行无阻，因为他们很自然把精力全放在赢得控制国会的战役。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民族议会未能防备到一个更狡诈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一套保险计划，避免《自由宪章》的经济条款变为南非法律。“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很快会实现，但他们统治的范围正快速缩小。

正当双方进行互相角力的激烈谈判时，非洲民族议会内部也忙着安排一旦接管政府后的事情。成群的非洲民族议会经济学家与律师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想出如何把《自由宪章》笼统的承诺——安居乐业和医疗保险——变成务实的政策。这些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让民主运转”（Make Democracy Work），这是为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拟订的一套经济蓝图，在高层谈判的时候写就。党的坚贞拥护者当时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催生高瞻远瞩的计划，协商小组却在谈判桌上接受让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让步。“它在还没推出前就已胎死腹中。”经济学家帕达雅奇（Vishnu Padayachee）跟我谈起“让民主运转”计划时说，等草案完成后，“已经换了一场新球赛”。

身为非洲民族议会中少数受过古典训练的经济学家。帕达雅奇被征召在“让民主运转”计划扮演领导角色（如他所说的，“做分析数字工作”）。与他在那些冗长的决策会议共事的人。后来大多担任非洲民族议会政府的要职，但帕达雅奇没有，他婉拒所有政府职务的聘约。宁可选择在德尔班过学术生活。教学、写作并经营甚受欢迎的艾克书铺（Ike's Bookshop）。这家书铺最早由第一位非白人南非出版商艾克·梅耶特（Ike Mayet）创办。现在里面堆满了许多小心保存的绝版非洲历史书，我们就是在那里会面讨论转型期的情况。

帕达雅奇在70年代加入解放运动，担任南非工会运动的顾问。“那时候我们都把《自由宪章》贴在门板后面。”他回忆道。我问他何时才知道运动的经济承诺将不会实现。他说在1993年底他先是起了疑心，因为在与国民党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他与一位“让民主运转”工作小组的同僚接到谈判小组成员的电话。那通电话要求他们写一份让南非央行变成独立机构、超然于民选政府之外的正反立场报告——而且谈判小组第二天早上就要。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现在50岁出头的帕达雅奇回忆说。他曾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研究所学业。他知道当时即使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认为央行独立仍是刚萌芽的概念。是少数芝加哥学派理论家的实验政策。他们认为央行应该变成国家内的独立主权机构。不受民选议员干预。*帕达雅奇和他的同僚深信。货币政策应为新政府的“成长、就业与重分配等大目标”服务，因此对他们而言，非洲民族议会的立场不用想也知道：以南非

绝不会有独立的中央银行。”

*弗里德曼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他能决定，央行将完全根据“经济科学”来运动，由巨大的计算机来管理，不需要用人。

帕达雅奇和一位同僚挑灯夜战，写了一份报告给谈判小组，列出必须抗拒国民党投出来的变化球的所有理由。如果央行（在南非称作储备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将束缚非洲民族议会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能力。此外，如果央行不对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负责，它究竟要对谁负责？对IMF？对约翰内斯堡证交所？显然国民党想找一条即使输掉选举也能掌控大权的后路——所以是一个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抗拒的策略。“他们想，能抓住多少就抓多少，”帕达雅奇回忆说，“这很明显是目标的一部分。”

帕达雅奇第二天早上传真那份报告后，有几周之久没有回音。“后来我们问发生什么事。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放弃那一部分。’”央行不但要在南非受到新宪法保障成为独立机构，而且将由种族隔离时期的同一个负责人史塔尔斯（Chris Stals）掌管。非洲民族议会放弃的还不只是央行：在另一个重大让步中，种族隔离统治下的白人财政部长凯斯（Derek Keyes）也将继续留任——很像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的财长和央行首长，在民主政府时都设法恢复职位。《纽约时报》赞扬凯斯是“南非低支出、对企业友善的政府的杰出传道者”。

直到那个时候，帕达雅奇说：“我们仍然很欢欣，因为，我的天，这是一场革命运动；至少我们已经达成一些结果。”当他得知央行和财政部仍然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旧长官掌控时，那意味“在经济转型上的一切都将丧失”。我问他是否认为谈判代表知道他们损失有多大，他犹豫一会儿才说：“坦白说，我不认为。”那只是单纯的讨价还价，“在谈判中必须放弃一些东西，而我们这边给了那些东西——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

从帕达雅奇的观点，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因为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的刻意背叛，而只是他们在一连串当时看来似乎较不重要的议题被蒙蔽——但这些议题后来却证明攸关南非长远的自由。

当时谈判发生的状况是，非洲民族议会发现自己身陷新的罗网中，一种由艰涩难懂的法则与规范构成的网。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捆绑民选领导人的权力。当罗网罩住这个国家时。甚至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当新政府取得权力并尝试自由行动、给予选民所期待并自认已投票选择的有形利益和解放时。罗网的束缚便加紧。让政府发现它的权力受到重重捆绑。在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第一年担任曼德拉办公室经济顾问的邦德（Patrick Bond）回忆说，政府内部的人挖苦说：“噢，我们已掌控国家，但权力在哪里？”当新政府尝试实现《自由宪章》的梦想时，它发现权力在别的地方。

想重分配土地？不可能。在最后一刻。谈判代表同意在新宪法增加一则保护所有私有财产的条款。使土地改革实际上动弹不得。想为数百万失业劳工创造就业机会？办不到。成百上千的工厂濒临关厂困境。因为非洲民族议会签署加入关税贸易总协议。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使补贴汽车厂和纺织工厂变成违法。想获得免费的艾滋病药物，供应给疫情以惊人速度蔓延的城镇？这违反（WTO）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因为非洲民族议会已在未经公共辩论的情况下延续GATT而加入WTO。需要钱为穷人兴建更多、更大的住宅，并为城镇供应免费电力？抱歉，预算已被种族隔离时代政府默默留下的庞大债务耗尽。想印制更多钞票？去找种族隔离时代就已在位的央行总裁谈。免费供水给所有人？不太可能。拥有众多南非国内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和训练师的世界银行（自称为“知识银行”），已经把与私人公司合作变为公共事业的标准规范。想采取货币管制对抗猖獗的投机？这会违反8.5亿美元的IMF纾困协议，而协议早在选举前就已轻松达成和签署。提高基本工资以缩短种族隔离时代的所得鸿沟？行不通。IMF协议承诺“工资管制”。别妄想不理这些承诺——任何擅自改变都将被视为国家不可靠的危险证据、不遵守“改革”承诺，以及缺乏“以规范为基础的体系”。这些都会导致货币崩溃、援助减少和资本外移。结论是，南非已经自由，但同时又变成俘虏；所有神秘难测的术语缩写都代表罗网的不同丝线。紧紧缠缚着新政府的肢体。

长期倡议反种族隔离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讳地向我描述这个陷阱：“他们从未让我们自由。他们只是把锁链从我们的脖子移到我们的脚踝。”著名的南非人权运动人士苏卡（Yasmin Sooka）告诉我，这场转型“实际上是说：‘我们会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们（非洲民族议会）来统治……你们可以拥有政治权力，可以有统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统治将在别的地方进行’”。*这是一个在所谓转型国家常见的幼儿化（infantilization）过程——新政府实际上取得进屋子的钥匙，却得不到保险柜的密码。

*率先实验这种不受民主约束的资本主义，或打造他们所谓新民主的人，正是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军政府统治17年后，在还未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时，芝加哥男孩便借由操纵宪法和法院，合理地确保他们革命性的法律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们给这个程序许多名称：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民主政治”、“受保护的民主”，或像皮诺切特的年轻部长比费拉所说的，确保“与政治区隔”。皮诺切特的经济部副部长巴东（Alvaro Bardon）解释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理论：如果我们承认经济是一门科学，这立即意味政府或政治结构的权力变小，因为两者都将丧失这类决策的责任。”

我想了解的事情有一部分是，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为自由的奋斗后，怎么能容许这些事发生？不只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如何弃守经济阵线，非洲民族议会的基层——已作了莫大牺牲的人民——何以容许他们的领导人放弃。为什么草根运动未要求非洲民族议会遵守《自由宪章》的承诺，反抗他们所作的让步？

我向一位非洲民族议会的第三代活动分子甘米德（William Gumede）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转型期间曾担任学生运动领导人，在动荡的年代经常活跃于街头。“所有人都密切注意政治协商，”他回忆戴克拉克与曼德拉的高峰会说，“如果有人对进展不满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示威。但当经济协商的消息传出时，大家会认为那是技术问题，没有人感兴趣。”他说，姆贝基强化了这种认知，把谈判描述为“行政”性质，不被社会大众关心（很像智利人看待他们的“技术官僚民主政治”）。他十分无奈地告诉我，其结果是：“我们错过了！我们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甘米德今日已是南非最受敬重的调查记者，他说，他后来了解，就是在这种“技术”会议里，南非真正的前途被决定了一一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这点。和许多我谈话的人一样，甘米德提醒我，南非在转型期间濒临内战——城镇遭到由国民党提供武器的黑帮恐吓，警察的屠杀仍时有所闻，领导人仍遭到暗杀，且不断有谣言散布国家将陷于一场血腥的战争。“我专注在政治上——群众行动、赶往毕索（Bisho，曾是一场示威者与警察大对决的地）、高喊‘那些家伙必须滚蛋！’”甘米德回忆说，“但那不是真正的斗争所在——真正的斗争是经济。我对自己很失望。竟然如此天真。我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成熟到可以了解这些议题。我怎么错过这件事？”

此后。甘米德努力弥补失去的机会。当我们见面时。他正处在一场由他的新书《姆贝基与非洲民族议会灵魂的战争》引发的全国风暴。它彻底揭穿非洲民族议会如何在他当时忙碌到无暇顾及的协商会议中。丢掉国家的经济主权。“我写这本书是出于愤怒。”甘米德告诉我，“对我自己和对党的愤怒。”

现在很难判断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发展。如果帕达雅奇的看法正确。非洲民族议会的谈判者不知道他们在讨价还价中错失的重要东西。那么解放运动的街头斗士又有多少胜算？

在那段签订协议的关键年代。南非处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摆荡于看着曼德拉以自由之身重现政坛的欢欣鼓舞。以及听到许多人期待接替曼德拉领导地位的年轻斗士哈尼（Chris Hani）在种族暗杀中身亡的愤怒。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外。没有人想谈论央行独立。因为即使在正常情势下这个题目也会令人昏昏欲睡。甘米德指出。大多数人只是假设。不管为了取得权力而作出多少让步。一旦非洲民族议会掌控大局后就能重写游戏规则。“政府将是我们的——我们以后可以修改。”他说。

非洲民族议会的活跃分子当时不了解的是。民主政治的规则在协商中已经改变，变成——一旦捆绑的罗网罩住他们的国家后——实际上不会有以后了。

在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的头两年。这个党仍尝试利用有限的资源履行重分配的承诺。当时有一连串的公共投资——为穷人兴建了逾十万户住宅。有数百万人获得水、电力和电话线路的供应。但这里同样避免不了的是。在债务的沉重负担和国际要求将这些服务私有化的压力下。政府很快便开始提高价格。非洲民族议会执政十年后。数百万人不久前才接通的水和电力被切断。因为他们无力支付账单。*到2003年，至少有40%的新电话线已不提供服务。至于曼德拉保证收归国有的“银行、矿场和独占工业”，仍然牢牢掌握在四家白人拥有的大财团手中，这四大财团同时掌控80%的约翰内斯堡股市。在2005年，这个股市的上市公司只有4%由黑人掌控。到2006年，70%的南非土地仍由白人独占，而白人只占全国人。10%。最悲惨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花在否认艾滋病危机严重程度的时间，远超过努力为约500万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人取得治疗药物，直到2007年初才出现一些进展的迹象。也许最惊人的统计数字是这个：从1990年曼德拉出狱以来，南非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减少13年。

*被切断的公共服务的人数是否多于接通的人数，在南非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至少有一项可信的调查发现，切断人数超过接通人数：南非政府说接通水的人有900万人，该调查计算的切断人数则多达1000万人。

这些事实与数字底下。是非洲民族议会在经济谈判落败后所作的不幸抉择。在当时，党原本可以尝试发动第二波解放运动，以挣脱转型期间编织的重重罗网，否则就只得接受被绑住的权力，拥抱新经济秩序。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选了第二个选项。这个党没有把国内财富重分配变为重大政策——这是它赖以当选的《自由宪章》的核心要求——反而在组成政府后立即接受主流的想法，认为唯一的希望是吸引可以创造新财富的外国投资人，寄望带来的利益能滴漏到贫民阶级。但为了让滴漏模式能发挥效果，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必须大幅改变行事方法才能吸引投资人。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曼德拉在走出监狱的当时就已发现这点。他一被释放。南非股市就因为惊慌而崩盘。南非货币兰德（rand）剧贬10%。几周后，大型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De Beers）把总部从南非移到瑞士。这类市场的立即惩罚在30年前曼德拉刚入狱时是无法想象的。在60年代，跨国公司随意改变国籍是闻所未闻，当时世界货币体系仍然与黄金本位紧紧连结，现在南非货币已不受管制，交易障碍已被撤除，且大部分交易属短期的投机。

不仅波动的市场不喜欢曼德拉被释放。而且只要他或非洲民族议会高层的同僚说错几句话。就可能导导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准确地形容为“电子兽群”（the electronic herd）的投资人争相逃窜。释放曼德拉引发的投资人奔逃。只是日后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与金融市场间的呼与应（call-and-reponse）的开始——是训练这个党认识新游戏规则的一种震撼性对话。每次某位高级党干部说出暗示《自由宪章》仍然可能变成政策的话。市场就以大震荡作为响应。让兰德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规则既简单又赤裸。就好像电子版的单音节唱和声：正义——太贵。卖出；维持现状——好，买进。曼德拉获释后没多久在一次与企业领袖的午餐中公开表示。他支持国有化。股市的黄金类股指数立即暴跌5%。

即便与金融市场似乎毫无关系的动作。只要无意中透露出一丝激进主义。就足以造成市场地震。当非洲民族议会的部长曼纽尔（Trevor Manuel）因为南非的橄榄球队全由白人组成。而形容它是“白人少数的运动”，兰德也遭到一波重创。

在所有对新政府的捆绑中，市场的力量证明是最大的一种——就某个角度看。这正是放任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是自动运作的事。一旦国家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开放后。任何违背芝加哥学派正统教条的措施。立即会遭到纽约和伦敦对赌兰德汇率的交易员惩罚。导致陷于更深的危机而需要更多贷款。而且还附带更多条件。曼德拉在1997年指出这个陷阱。在非洲民族议会全国会议上说：“资本的机动性和资本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全球化。使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无法不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

非洲民族议会内部最懂得如何让震荡停止的人似乎是姆贝基。他是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的左右手。且不久后便成为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曾长期流亡英国。在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念书。然后搬到伦敦。在吕。年代南非的城镇弥漫催泪瓦斯时，他嗅闻的是撒切尔主义的香水。在所有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中。姆贝基是最容易与企业领袖打成一片的人。而且在曼德拉获释前。他曾与担心黑人多数统治成真的企业主管举行数次秘密会议。知名的企业杂志编辑墨瑞（Hugh Murry）1985年曾与姆贝基和一群南非企业人士。在一家赞比亚的俱乐部彻夜畅饮威士忌。他评论说：“这位非洲民族议会的最高领导人很有安抚人心的本事。即使是在最扰攘不安的状况下。”

姆贝基深信安抚市场的关键在于。非洲民族议会要把这种笑谈间建立的信心扩及更大的范围。据甘米德的说法。姆贝基在党中扮演自由市场导师的角色。姆贝基常解释。市场的怪兽已被放出。没有方法可以驯服它。只能喂它想要的东西：成长和更多成长。

因此。曼德拉和姆贝基不再谈论矿场国有化，开始定期与英美矿业（Anglo-American）和戴比尔斯的前董事长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会谈，后者正是种族隔离统治的经济象征。1994年的选举后不久，他们甚至把非洲民族议会的经济计划交给奥本海默认可，并作了数项重大修改，以消弭他和其他工业家的疑虑。为了避免再度引发市场震荡，曼德拉在他担任总统后的首度施政检讨中，小心地撇清他以前发表的支持国有化言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我们从未提过像国有化这类事情，而这并非偶然。”他说，“没有任何可以把我们牵扯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金融媒体对这种转变报以持续的鼓励。《华尔街日报》说：“虽然非洲民族议会仍有一支势力庞大的左派。曼德拉先生近日的谈话似乎像撒切尔更甚于他过去扮演的社会主义革命家。”

*事实上，非洲民族议会选举时的正式经济政纲，呼吁“透过国有化之类的策略，提振公共部门”。另外，《自由宪章》仍然是该党的宣言。

激进的往日回忆仍然缠绕非洲民族议会。且尽管新政府极力表现不具威胁性。市场仍继续施加痛楚的震荡：在1996年的一个月內。兰德贬值20%，忧心忡忡的富人把钱汇往国外。导致南非的资产持续大失血。

姆贝基说服曼德拉必须断然与过去切割，非洲民族议会需要全新的经济计划——一套大胆。具有震撼性，能以掷地有声、大开大阖的方式向市场传达。非洲民族议会已经准备好要拥抱华盛顿共识。

玻利维亚的休克治疗计划是以军事行动般的秘密方式拟订。在南非也一样。只有少数几位姆贝基最亲近的同僚。知道有一套新经济计划正在草拟。一套与1994年选举时所作的承诺截然不同的计划。甘米德写道，参与小组的人“都宣誓保密。而整个过程都以最隐秘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左派风闻姆贝基的计划”。参与拟订新计划的经济学

家吉尔伯（Stephen Gelb）承认：“这是一套完全‘由上而下的改革’，采取极端的隔绝和决策者作主的方式。排除公众的压力。”（强调秘密和隔绝特别显得讽刺。因为在种族隔离的暴政下。非洲民族议会曾采取令人刮目相看的开放与参与程序。制订了《自由宪章》。现在，在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下，这个党却选择以隐瞒自己干部的方式制订经济计划。）

1996年6月，姆贝基公布结果：一套为南非定作的新自由主义休克治疗计划，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劳动市场“弹性”自由贸易，甚至再放宽资金流动管制。吉尔伯说。其优先目标是“对潜在投资人传达政府（尤其是非洲民族议会）对正统派经济的承诺”。为了确保信息让纽约和伦敦的交易员听得清楚而明白，姆贝基正式公开这项计划时打趣说：“叫我撒切尔信徒好了。”

休克治疗永远是一种市场操作——这是它的基本理论之一。股票市场喜爱大肆吹捧、精心策划而可以推升股价飙升的时刻。这些时刻通常发生在某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宣布一桩大并购或雇用某个知名的总裁。当经济学家敦促国家宣布全方位休克治疗计划时。这种建议有一部分是想模仿这类高度戏剧性的市场事件。并希望刺激一波市场热潮——但他们不是想卖出某支股票。而是想卖出一个国家。他们期待的反应是“买进阿根廷股票！”“买进玻利维亚债券！”另一方面，缓慢、较审慎的方法可能较不粗暴。但却激不起市场产生这种热潮的泡沫。让投资人从中赚进真实的获利。休克治疗通常是一项豪赌。但在南非却不管用：姆贝基大张旗鼓的计划未能吸引长期投资；它只带进抢短线的投机客，最后兰德的贬值幅度还更深。

基层的休克

我与住在德尔班的作家狄赛（Ashwin Desai）会面，讨论他对转型期的回忆时。他说：“刚改变信仰的人往往对这种事较狂热，他们更想取悦别人。”狄赛在解放运动时坐过牢，他发现坐牢时的心理和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的行为有类似之处。他说，在监狱里，“如果你愈能取悦狱吏，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个道理显然转移到南非社会做的某些事情上。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较好的囚犯。甚至是比其他国家更守规矩的囚犯”。

不过，非洲民族议会的基层实际上桀骜难驯多了——也因此需要更多管教。据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苏卡（Yasmin Sooka）指出，守规矩的心态深入转型的每一层面——包括追求正义。在听了许多年有关酷刑、杀戮与失踪的证词后，这个真相委员会开始探讨哪一种态度可以疗愈不公义，真相与宽恕很重要。但补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也是，要求新政府赔偿说不通，因为罪行并非新政府所犯。而且任何花在补偿种族隔离暴行上的钱，都将排挤新解放的国家用来为贫民兴建住宅和学校的钱。

部分委员认为应该强迫从种族隔离获利的跨国公司支付赔偿，最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温和的建议，要求一次性的1%企业加税以筹措赔偿受害者的经费，称之为“团结税”（solidarity tax），苏卡期待这个温和的建议获得非洲民族议会支持。但当时由姆贝基领导的政府拒绝任何企业补偿或团结税的建议，担心会对市场传达反企业的信息。“总统决定不要求企业负责，”苏卡告诉我，“就这么简单。”最后政府勉强应允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如委员会担心的，是从政府预算支应经费。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常被视为成功“建立和平”的楷模，并被引介到从斯里兰卡到阿富汗等冲突区，但许多直接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却充满矛盾情绪。2003年3月发表最终报告时，委员会主席图图总主教面对新闻记者追问自由之后未完成的目标：“你能不能解释。在获得自由之后近十年，一个黑人为什么醒来发现自己仍住在肮脏的贫民窟？他到城里工作。整个城市主要仍是白人的，他们住的是豪宅，等一天结束，他回到的是污秽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说：去他的和平，去他的图图和真相委员会。”

苏卡现在担任南非人权基金会主席，她说，她感觉听证会处理了她形容的“酷刑、严重的恶劣对待和失踪等种族隔离的外在表征”，但遭到同样蹂躏的经济体系至今却“完全未改变”——这与勒特里尔30年前对“人权”盲点的关切遥遥呼应。苏卡说。如果她能让这个过程重来一遍。“我的做法会完全不同。我会调查种族隔离的体制——我会调查土地问题。我会调查跨国公司的角色，我会非常，非常仔细调查矿业的角色。因为我认为那是南非真正的病根……我会调查种族隔离政策的体制影响，而我只会花一次听证会在酷刑上，因为我认为当你专注在酷刑上，你就看不到它所服务的体制，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改写实际发生的历史”。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要求，但却是非洲民族议会同意让步的数个“技术”问题之一。这个让步意味新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要负担两个政府的成本——自己的，以及已交出政权的幽魂白人政府。政府每年的债务支出有40%用在庞大的退休金。绝大部分年金受益人是前种族隔离政

府的雇员。

到头来，南非得到的是一个反过来赔偿的扭曲结果。在种族隔离年代从黑人劳工攫取暴利的白人企业，不仅未支付一分钱赔偿金，反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继续寄高额支票给他们的加害者。南非的国家资产则经由私有化继续遭剥夺——非洲民族议会同意协商时最担心的是，发生类似莫桑比克的劫掠。然而私有化正是这种劫掠的现代版，与莫桑比克不同的是，那里的公务员砸碎机器，装满荷包然后离去。而在南非，国家的拆解和国库的掠夺却持续到今时今日。

我抵达南非时。《自由宪章》签署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非洲民族议会已决定邀请所有媒体参加这场盛会。计划是在那一天把国会从平时在开普敦富丽堂皇的总部。迁移到远为偏僻简陋的柯利普城，即当年通过《自由宪章》的地方。南非总统姆贝基将利用这个场合。把柯利普城的主十字路。改名为席苏鲁（Walter Sisulu）广场，以纪念这位备受敬重的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姆贝基也将为《自由宪章》纪念碑揭幕。这是一座砖造的高塔。上面的石板刻着宪章文字，并燃着一把永不熄灭的“自由之火”。紧邻这座建筑的是正在施工的另一座纪念塔，叫自由之塔，是一座有黑白两色柱子的亭阁，象征宪章最著名的条款：“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的黑人和白人”

整个庆典的信息极为清楚：50年前，这个党承诺带给南非自由，现在它已实现诺言——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庆祝“任务达成”的时刻。

然而这件盛事却有点奇怪。柯利普城——一个贫穷、房屋破败、街道排水沟裸露、失业率高达72%（远高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镇——似乎更像《自由宪章》违背诺言的象征，而不像如此刻意安排的庆典应有的布景。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庆典并不是由非洲民族议会筹划和导演。而是出于一个称作蓝IQ（Blue IQ）的奇怪组织。虽然蓝IQ表面上是一个省级政府机构。但根据它极为简略的蓝色小宣传册上写的，它“在一种刻意制造的环境下运作，使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像一家民间公司”。它的目标是在南非促进新的外来投资——是非洲民族议会“透过成长重分配”计划的一环。

蓝IQ挑选观光业作为投资的主要成长领域，而它的市场研究也显示，吸引旅客到南非的主要因素是，非洲民族议会战胜压迫的故事闻名世界。为了善加利用这个强大的吸引力，蓝IQ认为没有比《自由宪章》更能象征南非战胜逆境的故事。有了这个构想，它拟了一套把柯利普城变成《自由宪章》主题公园的计划，准备把那里改造为“世界级的观光地点和遗址，提供本地和国际旅客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加上一座博物馆、一个以自由为主题的购物商场，以及一家以玻璃与钢铁为建材的自由旅馆（Freedom Hotel）。目前还是贫民区的地点将改建成“美轮美奂、繁荣热闹”的约翰内斯堡郊区，许多居民将迁往较没有历史纪念价值的贫民区。

蓝IQ重新为柯利普城打品牌的做法，是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则——提供企业投资的诱因。希望未来可以借此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个计划与众不同之处是。在柯利普城。整个滴漏式设计的构想建基在一份50年历史的文件，而这份文件要求的是以更直接的方式消灭贫穷。《自由宪章》要求重分配土地，以使数百万农民可以供养自己；收回矿场，把收益用来兴建住宅和基础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就业。换句话说，去掉中间商。许多人可能觉得那些理想很像乌托邦平民主义，但经过如此多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实验以失败收场后。真正的梦想家也许是那些仍然相信《自由宪章》主题公园之类计划的人，他们提供救济给企业，却进一步剥削最贫困的人，认为如此可以为2200万仍生活在贫困中的南非人，解决急迫的医疗与经济问题。

反过来赔偿

苏卡指出，特别不公平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拒绝真相委员会所提的企业赔偿。而政府还继续支付种族隔离时期留下的债务。在政权移交头几年，新政府每年花费300亿兰德（约45亿美元）偿债——而政府最后支付给逾1.9万名种族隔离的杀戮与酷刑的受害者及家人。总共才8500万美元，比起前者显得微不足道。曼德拉曾说债务负担是无法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最大障碍。“那300亿（兰德）我们无法用来兴建在执政前规划的住宅。无法让我们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解决失业问题，让我们拥有就业的尊严，有足够的收入，能够提供居所给所爱的人，给他们食物……我们被继承的债务所捆绑。”

虽然曼德拉承认支付种族隔离时代的债务已变成难忍的负担，党却反对所有违约的建议。他们担心的是，尽管有强力的法律理由证明这些债是“恶债”，采取违约的做法会让投资人视南非为危险的激进国家。刺激另一波市场震

荡。非洲民族议会的长期党员、也曾在罗本岛坐牢的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便直接冲撞这道恐惧之墙。1998年，眼看新政府财政艰困，他和一群南非行动者认为，他们支持长期运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起一个“债务大赦”运动。“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天真。”现在已70多岁的布鲁特斯告诉我，“我期待政府会感谢我们，因为草根运动挑起债务问题可能凸显政府承担债务的困难。”出乎他的意料，“政府拒绝我们，并说：‘不，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支持。’”

最让布鲁特斯这些倡议分子愤怒的是。非洲民族议会决定继续偿付债务造成的有形牺牲。例如，在1997年到2004年间，南非政府出售18家国营企业以筹资40亿美元，但近半数的钱用来偿债。换句话说，非洲民族议会不但未履行曼德拉当初承诺的“矿场、银行和独占工业国有化”，而且为了偿债而反其道而行——变卖国家资产以偿付压迫者留下的债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钱真正的去处。在转型的谈判期间，戴克拉克的小组要求，保证所有公务员在政权移交后能保住工作；他们宣称，想离职的人应该获得优渥的终身年金。对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网可言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要求，但却是非洲民族议会同意让步的数个“技术”问题之一。这个让步意味新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要负担两个政府的成本——自己的，以及已交出政权的游魂白人政府。政府每年的债务支出有40%用在庞大的退休年金。绝大部分退休年金受益人是前种族隔离政府的雇员。*

*事实上，这个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负担，同时也导致南非整体债务增加，每年消耗数10亿兰德公帑。1989年的一次“技术性”会计制度改变，把国家年金制度从“随收随付制（pay as you go）转变成”完全提存“（fully funded）——也就是年金从该年提拨的金额支付的制度，改成必须随时拥有足以支付70%到80%总应付年金的资金，尽管绝不会出现必须同时支付这么多年金的状况。其结果是，年金基金从1989年的300亿兰德，膨胀到2004年的超过3000亿兰德——绝对足够造成一场债务震荡。对南非人来说，由退休年金基金独立管理的庞大资金已被扣押，放在不能用来支付住宅、医疗或基本服务的地方。退休年金协议在非洲民族议会这方的谈判者，是南非共产党的传奇人物斯洛弗（Joe Slovo），而协议本身到今日仍然是国内民怨的主要来源之一。

到头来，南非得到的是一个反过来赔偿的扭曲结果，在种族隔离年代的从黑人劳工攫取暴利的白人企业，不仅未支付一分钱赔偿金，反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继续寄高额支票给他们的加害者。南非的国家资产则经由私有化继续遭剥夺——非洲民族议会同意协商时最担心的是，发生类似莫桑比克的劫掠，然而私有化正是这种劫掠的现代版。与莫桑比克不同，那里的公务员砸碎机器、装满荷包然后离去，而在南非，国家的拆解和国库的掠夺却持续到今日。

我抵达南非时，《自由宪章》签署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非洲民族议会已决定邀请所有媒体参加这场盛会。计划是在那一天把国会从平时在开普敦富丽堂皇的总部，迁移到远为偏僻简陋的科利普城，即当年通过《自由宪章》的地方。南非总统姆贝基将利用这个场合，把科利普城的主十字路口改名为席苏鲁（Walter Sisulu）广场，以纪念这位备受敬重的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姆贝基也将为《自由宪章》纪念碑揭幕，这是一座砖造的高塔，上面的石板刻着宪章文字，并燃着一把永不熄灭的“自由之火”。紧邻这座建筑的是正在施工的另一座纪念塔，叫做自由之塔，是一座有黑白两色柱子的亭阁，象征宪章最著名的条款：“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黑人和白人。”

整个庆典的信息极为清楚：50年前，这个党承诺带给南非自由，现在它已实现诺言——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庆祝“任务达成”的时刻。

然而这件盛事却有点奇怪。科利普城——一个贫穷、房屋破败、街道排水沟裸露、失业率高达72%（远高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镇——似乎更像《自由宪章》违背诺言的象征，而不像如此刻意安排的庆典应有的布景。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庆典并不是由非洲民族议会筹划和导演，而是出于一个称作蓝IQ（Blue IQ）的奇怪组织。虽然蓝IQ表面上是一个省级政府机构，但根据它极为简略的蓝色小宣传册上写的，它“在一种刻意制造的环境下运作，使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像一家民间公司”。它的目标是在南非促进新的外来投资——是非洲民族议会“透过成长重分配”计划的一环。

蓝IQ挑选观光业作为投资的主要成长领域，而它的市场研究也显示，吸引旅客到南非的主要因素是，非洲民族议会战胜压迫的故事闻名世界。为了善加利用这个强大的吸引力，蓝IQ认为没有比《自由宪章》更能象征南非战胜逆境的故事。有了这个构想，它拟了一套把科利普城变成《自由宪章》主题公园的计划，准备把那里改造成为“世界级的观光地点和遗址，提供本地和国际旅客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加上一座博物馆、一个以自由为主题的购物广场，以及一家以玻璃与钢铁为建材的自由旅馆（Freedom Hotel）。目前还是贫民区的地点将改建成“美轮美奂、繁荣热闹”的约翰内斯堡郊区，许多居民将迁往较没有历史纪念价值的贫民区。

蓝IQ重新为科利普城打品牌的做法，是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则——提供企业投资的诱因，希望未来可以借此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个计划与众不同之处是，在科利普城，整个滴漏式设计的构想建基在一份50年历史的文件，而这份文件要求的是以更直接的方式消灭贫穷。《自由宪章》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以使数百万名农民可以供养自己；收回矿场，把收益用来兴建住宅和基础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就业。换句话说，去掉中间商。许多人可能觉得那些理想很像乌托邦平民主义，但经过如此多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实验以失败收场后，真正的梦想家也许是那些仍然相信《自由宪章》主题公园之类计划的人，他们提供救济给企业，却进一步剥削最贫困的人，认为如此可以为2200万仍生活在贫困中的南非人，解决急迫的医疗和经济问题。

从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转向撒切尔主义以来，滴漏式正义的实验结果惨不忍睹：

☆从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执政以来，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一倍，从200万人到2006年变为400万人。

☆从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业率上升逾一倍，从23%变为48%。

☆南非3500万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所得超过6万美元，而在这个所得级距的白人人数是20倍，其中许多人的所得远超过这个金额。

☆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已兴建180万户住宅，但在同一时期失去住宅的人高达200万人。

☆在民主政体头十年，将近100万人被逐出农场。

☆这类驱逐事例意味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许多没有自来水和电力。

也许违背自由承诺最好的判断标准是，南非社会不同的部分对《自由宪章》的看法，不久前，这份文件还被视为对南非白人特权阶级最大的威胁。今日它在商务俱乐部和高级小区却大受欢迎，被视为善意，几乎带着奉承意味而完全不具威胁性，像是装饰用的商业行为准则。然而在像通过这份文件的柯利普城这类偏远城镇，它曾象征无穷可能性的承诺。如今却充满不堪回首的苦楚，许多南非人完全抵制这项政府筹划的周年庆典。“《自由宪章》写的东西很好，”德尔班刚萌芽的贫民窟居民运动领导人齐柯德（S'bu Zikode）告诉我，“但我所看到的尽是背叛。”

到最后，放弃《自由宪章》承诺的重分配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却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个：所有国家都这么做。帕达雅奇帮我整理出非洲民族议会领导阶层当初从“西方政府、IMF和世界银行”得到的信息。以他们会说：“世界已经改变；这些左派的玩意儿已经毫无意义；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就像甘米德写的：“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完全未加防备的攻击。主管经济事务的重要干部经常进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的总部，1992年和1993年，有几位非洲民族议会的幕僚（其中几位完全没有经济资历）还参加外国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的短期主管训练计划。他们在那里被‘不断喂养新自由主义观念’。那是一段天旋地转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等着执政的政府被国际社会如此百般诱惑。”曼德拉在199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时，便受到这种精英版的强大校园同侪压力。当他指出南非想做的事激进程度还比不上二次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时。荷兰财政部长驳斥这种模拟说：“那是我们当时所知的情况，但现在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全球化的过程已经生根，没有经济体可以自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

像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周游列国时，他们不断被灌输连最左派的政府都已拥抱华盛顿共识的观念：越南的共产党已这么做，波兰的工会和终于摆脱皮诺切特掌控的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是。即使是俄罗斯人也向新自由主义看齐——在非洲民族议会如火如荼进行协商时，莫斯科正陷于政商集团争食大饼的狂热，快速把大批国家资产卖给党官僚改行的企业家。如果连莫斯科都已屈服，南非这支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又如何抗拒如此强大的世界潮流？

至少这是律师、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工作者兜售的信息，这些人形成了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一群群的专家往返奔走于遭战乱蹂躏的国家和陷入危机的城市，提供惊惶未定的新政治人物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新特效对策、来自华沙最振奋人心的成功故事，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国家最让人敬畏的怒吼。“转型学家”（transitionologist，这是纽约大学政治学者柯恩[StephenCohen]给他们的称呼）天生就有一项优势可以凌驾他们提供建议的政治人物：他们是高度机动的族群，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天生就倾向往内看。基于这种特质，领导大规模国家转型的人大都专注于自己的故事和权力斗争，无法注意到国界以外的世界。这确实不幸，因为如果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能透视转型学家的说辞，自己发现莫斯科、华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首尔真正发生的状况，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将大大不同。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有生命的城市不能一块块被变卖而不考虑其固有传统，即使这些传统与外国人格格不入……但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城市。有好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下，但现在我们发现生活在生意人的极权统治下并没有更好过。他们毫不在乎自己身在哪个国家。

——葛林(Gigory Goring). 俄罗斯作家，1993年

散播真相——经济学的法则就像工程学法则一样。一套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1年

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飞往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G7)峰会时，他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一场英雄式的欢迎。在之前的三年，他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很少昂首阔步，反而经常步履轻飘地向媒体施展魅力，忙着签署解除军备条约，接受和平奖项，包括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甚至做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赢得美国大众的心。这位俄国领导人彻底挑战了邪恶帝国的讽刺漫画，美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一个可爱的昵称“戈比”(Gorby)，而《时代》杂志在1987年作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让这位苏联总统当上这份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编辑群解释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戴着毛板帽的石像怪)不同，是俄罗斯的里根——“克里姆林宫版的伟大沟通者”。诺贝尔奖委员会宣称，拜戈尔巴乔夫所赐，“我们希望我们正在庆祝冷战结束”。

到90年代开始，戈尔巴乔夫以开放和改革两大政策，领导苏联经历一段了不起的民主化过程：新闻媒体解禁，俄罗斯国会、地方议会、总统和副总统都改为民选，且宪法法庭也独立化。在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推动自由市场与强大社会安全网的混合，把关键产业置于国家控制下——他预测这个过程将花上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他的最终目标是斯基的纳维亚模式建立社会民主体制，成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灯塔”。

刚开始西方也希望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放宽苏联经济，转型为接近瑞典模式的经济。诺贝尔委员会明白表示，颁奖给他是为了支持苏联转型，也就是“在需要时伸出援手”。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布拉格时说，他无法独力完成大业：“就像同一条绳子上的登山者，世界上的国家必须一起爬上山顶，否则就一起坠入深渊。”

因此1991年在G7峰会上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意料。戈尔巴乔夫从他的友邦元首同伴得到的一致信息是，如果不立即采用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他们将切断绳索，让他坠落。“他们对转型步调与方法的建议令我大吃一惊。”戈尔巴乔夫记述那次会议时说。

波兰刚在IMF和萨克斯监督下，完成第一回合休克治疗，而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加拿大总理穆罗尼(Brian Mulroney)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共识是，苏联必须追随波兰的做法，甚至以更快的速度进行。高峰会后，戈尔巴乔夫从IMF、世界银行和每一个主要放款机构得到同样的开拔令。那一年稍晚，当俄罗斯要求赦免债务以度过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时，却得到债务必须履行的严厉回答。从萨克斯为波兰寻求援助和赦免债务以来，政治气氛已经大为改变——变得更加苛刻。

接着发生的事——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由叶利钦取代，以及俄罗斯展开经济休克治疗的混乱过程——已成了现代史详细记录的一章。不过，这则故事经常被说成稀松平常的“改革”，平板到掩盖了一个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犯下的重大罪恶。俄罗斯被迫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和真正的民主革命中作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俄罗斯的民主革命早已展开——为了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戈尔巴乔夫已在进行的和平改革进程必须以暴力打断，然后大幅度反转。

戈尔巴乔夫知道，要实施G7和IMF提倡的休克治疗，唯一的方法是诉诸暴力——就像许多西方国家推动这类政策的手段。《经济学人》杂志在1990年一篇影响甚巨的文章中，呼吁戈尔巴乔夫采用“强人统治……粉碎阻碍积极经济改革的抗拒”。诺贝尔委员会宣告冷战结束短短两周后，《经济学人》就敦促戈尔巴乔夫以冷战时代最恶名昭彰的屠夫为榜样。这篇以“米卡尔·瑟基维克·皮诺切特?”(Mikhail Sergeevich Pinochet, 译注：Mikhail Sergeevich为戈尔巴乔夫的教名与本名)为题的文章作结论说，虽然采取这个建议可能导致“放血……它却可能——只是可能——为苏联带来所谓的皮诺切特式自由经济”。《华盛顿邮报》还更进一步，在1991年8月刊登一篇评论，标题是“皮诺切

特的智利是苏联经济的务实楷模”，支持以政变推翻慢吞吞的戈尔巴乔夫，但该文作者许瑞吉(Michael Schrage)担心，苏联总统的反对者“并没有采取皮诺切特选项的精明，也没有多少支持”。许瑞吉写道，他们应该“效法一位深谙政变个中三昧的独裁者：退休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

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他面对一位很愿意扮演俄罗斯皮诺切特角色的对手。叶利钦虽然担任俄罗斯总统职位，知名度却远不如整个苏联的元首戈尔巴乔夫。这种情况在1991年8月19日大为改观，也就是G7高峰会后的一个月。一群保守派共产党员把坦克车开到称为白宫(White House)的俄罗斯国会大厦前，扬言要攻击俄罗斯首届民选国会，以阻止民主化过程。叶利钦带领一群决心保护新民主的群众，站到一辆坦克车上，谴责这场侵略是“一群愤世嫉俗的右派企图政变”。坦克撤退后，叶利钦被捧为民主的捍卫者。一位当天走上街头的示威者描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影响国家情势。我们的精神飞扬。那是一种团结一心的感觉。我们觉得可以战胜一切。”

叶利钦也有同感。身为领导人，他向来表现出反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戈尔巴乔夫给人儒雅、稳重的印象(他最引人争议的措施是大力反对喝伏特加酒)，叶利钦则以贪吃和嗜饮闻名。在政变前，许多俄罗斯人对叶利钦有所保留，但他在共产党政变中协助挽救了民主，使他至少暂时成了人民英雄。

叶利钦立即把他赢得的战果全部下注，扩增他的政治实力。只要苏联体制不变，他的权力永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下，但在政变挫败四个月后的1991年12月，叶利钦使出政治妙招。他与另外两个苏联共和国结盟，这个举措实际上等于让苏联解体，因而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废除“大多数俄罗斯人一辈子只认定的国家”苏联，对俄罗斯人心理造成强烈震撼——就像政治学者柯恩说的，这是俄罗斯在接下来三年间要承受的“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一个。

叶利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当天，萨克斯也莅临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厅堂。萨克斯回忆这位俄罗斯总统说：“各位，我要宣布苏联已经结束……”而我说：“哇，你知道，这是百年仅见的大事。这是你所能想象最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真正的解放；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人民。”叶利钦邀请萨克斯担任顾问，而萨克斯态度很认真，他宣称：“如果波兰可以办到，俄罗斯也能。”

但叶利钦想要的不只是顾问，他要的是靠萨克斯的金字招牌为波兰募得的资金。叶利钦说：“唯一的希望是七大工业国承诺很快提供我们更巨额的财政援助。”萨克斯告诉叶利钦，他有信心如果莫斯科愿意采取“大爆炸”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他可以筹得约150亿美元。俄罗斯必须有雄心壮志，而且必须迅速行动。叶利钦不知道的是，萨克斯的好运已快用完。

俄罗斯转型到资本主义的背景，与其国内的贪渎有关。莫斯科市长勃波夫(Gavriil Popov)宣称，打破中央管理式经济的方式只有两个选择：“财产可以分给社会所有成员，或者把最好的财产送给领导人……总而言之，有一种民主方式，还有一种权贵式(nomenklatura)、共产党官僚式的方法。”叶利钦选择后者——而且匆忙作了这项选择。1991年底，他前往国会并作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如果他们给他一年的特别权力，让他以命令方式颁布法律而不必提交国会通过，他便能解决经济危机，还给人民有效而健康的体制。叶利钦要求的是独裁者享有的行政权，而非民主政治，但国会仍然感激这位总统在政变阴谋期间扮演的角色，而且国家迫切需要外援。答案是：好，叶利钦可以拥有一年绝对权力以改造俄罗斯经济。

他立即召集一批经济学家，其中有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后几年曾组织某种自由市场读书会，阅读芝加哥学派思想家的基本著作，并讨论如何把这些理论应用在俄罗斯。虽然他们未曾在美国念书，却成了弗里德曼的狂热信仰者，甚至俄罗斯媒体称呼叶利钦的小组为“芝加哥男孩”，张冠李戴地使用这个词，但对俄罗斯欣欣向荣的黑市经济而言却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则称呼他们为“年轻的改革者”。这批经济学家的头是盖达尔(Yegor Gaidar)，叶利钦任命他为两位副总理之一。1991年到1992年担任部长的埃文(Pyotr Aven)也在这个内部圈子里，他谈到这群人说：“他们自认替天行道，而且从他们的信仰自然地流露出超越一切的优越感，很不幸的，这是我们改革者的典型。”

俄罗斯报纸《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观察这批突然从天而降在莫斯科掌权的人时，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发展：“俄罗斯首度在政府中任用一批自由派，他们自认是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他们的政策“十分明显——以‘休克治疗’作为药方的‘厉行财政稳定化’”。该报指出，在叶利钦任命这群人的时候，他也让恶名昭彰的强人史柯可夫(Yury Skokov)担任国防与主管镇压的部门：陆军、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决定显然互有关联：“也许‘强人’史柯可夫可以‘确保’在政治上厉行稳定化，而‘强人’经济学家则能保证经济上的稳定化。”这篇文章以预测作为结束，“如果他们尝试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皮诺切特体制也不会令人意外，其中盖达尔的小组将扮演‘芝加哥男孩’的角色……”

为了提供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支持，美国政府资助自己的转型专家，交付他们为俄罗斯撰写私有化命令、设立纽约式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俄罗斯共同基金市场等工作。在1992年秋天，美国国际发展署授予2100万美元的合约给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由它派遣年轻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小组，到俄罗斯协助盖达尔小组。1995年5月，哈佛聘请萨克斯担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这表示他在俄罗斯的改革期扮演两个角色：先是叶利钦聘请的自由顾问，然后又接掌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在俄罗斯的前哨站。

又一次，一群自称改革家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草拟一套激进的经济计划。其中一位重要的改革者华西里夫(Dimitry Vasiliev)回忆说：“刚开始时，我们没有任何雇员，连秘书也没有。我们没有设备，甚至没有传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一个半月内写出一套全面私有化计划，我们必须拟订20项法律……那真的是一段浪漫期。”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宣布解除价格管制，并预测“解除价格管制将使一切回归到正确的位置”。这些“改革家”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到一周就推动他们的经济休克治疗计划——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二个。这套休克治疗计划也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把全国约22.5万家国营公司迅速私有化的第一阶段。

“‘芝加哥学派’计划让俄罗斯措手不及。”一位叶利钦早期的经济顾问回忆说。这种措手不及是刻意制造的，是盖达尔突然并迅速进行改革策略的一环，使得抗拒根本不可能。他的小组想解决的是同一个老问题：民主成了阻碍他们计划的威胁。俄罗斯人不希望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管制他们的经济，但大多数人仍坚定相信财富重分配，以及政府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和波兰人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一样，1992年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有67%说，他们相信工人合作社是把共产国家资产私有化最公平的方式，79%的人则说，他们认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全民就业。这表示如果叶利钦的小组把他们的计划提交民主辩论，而非对已深感迷失的大众发动秘密攻击，芝加哥学派革命将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叶利钦在这段期间的顾问之一马乌(Vladimir Mau)解释说，“最有利于革命的情况”是“由于过去的政治斗争而筋疲力尽的疲倦大众……这是何以政府在解除价格管制前如此有信心，因为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政府不会被平民反抗推翻”。他解释说，绝大多数俄罗斯人——70%——反对解除价格管制，但“我们当时和现在都很清楚，人民都专注在他们私人(园圃)土地的收成，以及个人的经济状况”。

斯蒂格利茨当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简单地总结指导休克治疗师的思维。他的比喻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只有在‘转型迷雾’所提供的‘机会窗口’采取奇袭策略，才能在人民有机会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之前达成改变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休克主义。

斯蒂格利茨称呼俄罗斯的改革家为“市场布尔什维克”(Market Bolsheviks)，因为他们钟爱大地震式的革命。不过，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想在旧时代的灰烬中建立中央计划国家，市场布尔什维克却相信某种神奇的东西：如果创造出获利的最理想条件，国家将自动重建自己，无需任何计划。(这个信念将在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

叶利钦大胆承诺“在约六个月内，情况会恶化”，然后复苏将展开，俄罗斯很快又会是经济巨人，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这种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理论，其结果是稀少的创造和恶性循环的破坏。短短一年后，休克治疗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俄罗斯数百万中产阶级在货币贬值中丧失毕生积蓄，数百万工人因突然削减补贴几个月领不到工资。1992年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比1991年减少40%，有三分之一的人民落入贫穷线下。中产阶级被迫在牌桌或街头变卖个人财产——这些走投无路的行为却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赞许为“创业家精神”，证明资本主义复苏已经发生，每卖出一样传家宝或一件二手运动夹克都是证明。

和在波兰一样，俄罗斯人最后终于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并开始要求终结这种虐待狂式的经济冒险(“停止实验”在当时的莫斯科是最常见的墙壁涂鸦)。在选民的压力下，民选的国会——支持叶利钦取得权力的同一个国会——决定该是节制总统与他的冒牌芝加哥男孩的时候了。1992年12月，他们投票罢黜盖达尔；在三个月后的1993年3月，国会议员投票取消他们给叶利钦以命令执行经济法律的特别权力。宽限期已经届满，而成果是民不聊生：从现在起法律必须经由国会通过，这是任何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做法，也是遵循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程序。

国会议员只是执行他们的权利，但叶利钦已习惯于扩大的权力，并开始自认像皇帝多于总统(他已习于自称鲍里斯一世[Boris I])。他借上电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报复国会的“叛变”，轻易地恢复他帝王般的权力。三天后，俄罗斯独立的宪法法庭(创立宪法法庭是戈尔巴乔夫最重大的民主突破之一)以九票对三票，用八项不同的罪名判决

叶利钦夺权的举动违反他宣誓遵守的宪法。

在此时之前，世人还有可能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同一个计划的部分，但叶利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两个计划已经走上冲突的道路，叶利钦和他的休克治疗医生直接对上了民选国会与宪法。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全力支持叶利钦，因为借用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说法，叶利钦仍然自称扮演“真正致力于自由与民主，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角色。大多数西方媒体也支持叶利钦对抗整个国会，把国会议员贬斥为“共产主义强硬派”，尝试开民主改革的倒车。《纽约时报》莫斯科办事处主任报道说，他们还没有摆脱“苏联心态——怀疑改革、对民主的无知、蔑视知识分子或‘民主主义者’”。

事实上，这些国会议员尽管有各种缺点(而且共有1041位议员，缺点一定很多)，却是1991年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反抗强硬派政变的同一批人，他们曾投票解散苏联，而且直到不久前还全力支持叶利钦。然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用“反政府”来形容俄罗斯国会议员——好像他们是闯入者而非政府的一部分。

1993年春季，当国会通过一项未遵守IMF要求厉行节约的预算法案后，冲突逐渐呈现山雨欲来之势。叶利钦的反应是尝试根除国会。他在新闻媒体的奥威尔(Orwell)式支持下，匆忙筹备一次公民投票，问选民是否同意解散国会并举行提前选举。投票的人数不足以赋予叶利钦需要的权力。不过他仍宣称胜利，说这场投票证明整个国家支持他，因为他悄悄置人一个完全没有约束力的问题，问投票者是否支持他的改革。回答是的投票者以些微差距占多数。

在俄罗斯，公民投票普遍被视为宣传手法，而且是失败的宣传。事实是，叶利钦和华盛顿之间，还横梗着拥有宪法权利的国会可以采取制衡作为：减慢休克治疗转型的速度。一场高压的行动随即展开。当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桑莫斯警告说：“俄罗斯改革的动力必须重新振作并加强力道，才足以获得持续的多国支持。”IMF得到这个信息后，一位匿名的官员泄露消息给新闻界，说一笔15亿美元的承诺贷款已被取消，因为IMF“对俄罗斯开改革倒车感到不满”。叶利钦的前部长埃文说：“IMF对预算与货币政策几近疯狂的偏执，以及对其他每一件事绝对要求表面功夫和一板一眼的态度……在这整件事中扮演不小的角色。”

IMF泄露消息后的第二天，自信能获得西方支持的叶利钦跨出了无法撤回的第一步，即直到今日仍被公开形容为“皮诺切特选项”的措施：他下达1400号命令，宣布废止宪法和解散国会。两天后，国会的特别会议以636票对2票弹劾叶利钦不可饶恕的行为(相当于美国总统片面解散国会)。副总统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宣布，俄罗斯已为叶利钦和改革者的“政治冒险主义付出沉重代价”。

叶利钦与国会间爆发某种武装冲突已无可避免。尽管俄罗斯宪法法庭再度判决叶利钦的行为违宪，克林顿仍旧继续支持他，美国国会也投票通过给叶利钦25亿美元援助。受到鼓舞的叶利钦派遣军队包围国会，并命令市政府切断国会大厦白宫的电力、暖气和电话线。莫斯科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卡佳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持俄罗斯民主的群众涌进，尝试突破封锁。持续两周的和平示威群众和军队与警方对峙，使国会大厦的封锁有一部分被打开，好让人们送食物和饮水到里面。和平抵抗的势力愈来愈大，响应的支持者愈来愈多。”

双方阵营日益壁垒分明，可以解决僵局的唯一妥协方法是达成提早选举的协议，让大众来评断是非曲直。许多人呼吁采取这个方案，但正当叶利钦权衡该如何选择，且据报道他倾向选举时，波兰传来的消息却是选民用选票严厉惩罚以休克治疗背叛他们的团结工会。

目睹团结工会在选举惨遭滑铁卢后，叶利钦和他的西方顾问已经很清楚提早选举的风险太大。在俄罗斯，牵涉的财富极为庞大：大油田、约占全世界30%的天然气蕴藏、20%的镍，更别说共产党曾赖以控制广大人口的武器工厂与国家媒体体系了。

叶利钦放弃谈判，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由于刚提高一倍军饷，军队几乎全都站在他这边，因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以成千上万名内政部的军队、带刺铁丝网和镇暴喷水车，团团围住国会大厦，不准任何人进出。叶利钦的头号对手鲁茨科伊在国会里，这时候已武装起他的护卫，并欢迎近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他的阵营。他呼吁支持者对叶利钦的“独裁统治”绝不妥协。参与抗议并写书谈到这个事件的卡佳利茨基告诉我，在10月3日，国会的支持群众“游行到奥斯坦金诺(Ostankino)电视台，要求报道这则新闻。群众有些人有武装，有些人没有；群众里还有小孩。他们遭到叶利钦军队的机关枪攻击”。约100名示威者和一名士兵被杀害。叶利钦的下一步是解散

所有城市和地方行政区的议会。俄罗斯刚萌芽的民主政治已被一块块摧毁。

确实有部分国会议员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显出对和平解决的嫌恶，但即使是前美国国务卿盖尔布(Leslie Gelb)也写道，国会“并非由一群右派疯子所掌控”。是叶利钦非法解散国会和违抗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才使俄罗斯陷入这场危机——由于人民不甘于放弃得来不易的民主，他的作为势必激发铤而走险的反应。*

*在众多离谱的耸动报道中，《华盛顿邮报》指出：“约200名示威者涌向俄罗斯国防部，那里是该国的核子武器控制中心，许多高级将领正在开会。”——这则报道强化了俄罗斯群众尝试捍卫民主可能引发核子战争的荒谬想象。邮报报道，国防部锁上所有门，让群众无法进入，避免了意外事件。

华盛顿或欧盟若发出明确信息，应可迫使叶利钦坐下来认真与国会谈判，但他获得的只有鼓励。最后，在1993年10月4日早上，叶利钦实现了他早已注定的命运，成为俄罗斯版的皮诺切特，他制造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无疑与整整20年前发生的智利政变相呼应。在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第三个创伤性震撼中，他下令不情愿的军队突袭俄罗斯白宫，纵火焚烧，使他两年前借保卫它而扬名立万的同一栋建筑变成一片焦黑。共产主义崩溃可能未耗一兵一卒，但芝加哥式的资本主义却需要大量枪炮来防卫自己：叶利钦招来5000千名士兵、数十辆坦克和武装运兵车、直升机和配备自动机关枪的精锐震撼部队——全都为了保护俄罗斯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免于民主政治的严重威胁。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这样报道叶利钦包围国会：“昨日有长达十个小时，约三十辆俄罗斯陆军坦克车和武装运兵车，团团包围莫斯科闹区的国会大厦，即俄罗斯人所称的白宫，并以一轮轮炮火猛烈攻击，同时步兵以机关枪扫射。在下午四时十五分，约300名警卫、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排成一列，举着手走出建筑。”

那天结束时，这场猛烈的军事攻击共造成约500人死亡，伤者约1000人，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雷德威(Peter Reddawy)与格林斯基(Dmitri Glinski)曾为叶利钦年代写出最权威性的记叙(《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市场布尔什维克对抗民主主义》)，他们指出：“在白宫里面和四周的扫荡行动中，1700人遭逮捕，查扣了11件武器。部分遭逮捕者被羁押在一个体育馆，令人想起1973年智利政变皮诺切特使用的方法。”许多人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被痛殴。卡佳利茨基回忆说，他的头部遭到重击时，一名警官咆哮道：“你们想要民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让你们见识一下民主!”

但俄罗斯并非智利的翻版——它是智利的颠倒版本：皮诺切特发动政变，解散民主体制，然后实施休克治疗；叶利钦在民主体制中实施休克治疗，然后借解散民主体制和发动政变来保卫它。两种情况都获得西方热烈支持。

“叶利钦的攻击获得广泛支持，”《华盛顿邮报》在政变之后一天的新闻标题这么写，“民主可望赢得胜利。”《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是“俄罗斯逃过跌回昔日地牢的劫难”。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走访莫斯科，与叶利钦和盖达尔站在一起宣布：“美国不会轻易支持暂停国会运作，但这是非常时期。”

俄罗斯的事件看起来也不同。叶利钦借保卫国会而取得权力，现在却放火烧掉它，使它焦黑到被戏称为黑宫。一位中年莫斯科人告诉一群惊讶不已的外国摄影小组：“人民支持叶利钦是因为他承诺给我们民主，他却关闭民主之门。他不但违反民主，而且让民主封口。”尼曼(Vitaly Neiman)1991年政变时在白宫大门口担任守卫，他如此形容这种背叛：“我们得到的是与我们梦想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为他们赶赴临时构筑的路障，以我们的性命保护防线，但他们未履行承诺。”

萨克斯因为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能与民主兼容而备受赞誉，他在叶利钦攻击国会后继续公开支持他，将他的反对者贬抑为“一群中了权力毒瘾的前共产主义者”。在萨克斯的著作《终结贫穷》中，他完整记述自己参与俄罗斯的过程，却完全遗漏这段戏剧化的插曲，一次也未曾提及，就像他漏掉在玻利维亚伴随着他的震撼计划发生的围捕与攻击劳工领袖。

在政变之后，俄罗斯处于不受节制的独裁统治：民意机构遭解散，宪法法庭中止运作，宪法也束诸高阁；坦克巡逻街道，宵禁实施中，虽然公民权很快恢复，但新闻却遭到全面审查。

那么，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西方顾问在这个关键时刻做了什么?与当年圣地亚哥烽火延烧时做的一样，也与后来巴格达燃烧时相同：摆脱民主的干预后，他们继续埋头制定法律。政变后三天，萨克斯说，他们发现直到当时俄罗斯“还没接受过任何休克治疗”，因为计划“才刚实施，既不协调也前后不连贯。这正是做一些事的好机会”。

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这些日子来，叶利钦的自由经济小组进展十分顺利，”《新闻周刊》报道，“这位俄罗

斯总统解散国会的第二天，就指示市场改革家开始草拟命令。”该杂志的报道是引述一位“意气风发、与政府密切合作的西方经济学家”，他很明确地表示民主在俄罗斯永远是市场计划的阻碍：“摆脱国会的阻力后，现在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地的经济学家原本十分沮丧，现在我们夜以继日工作。”确实好像没有任何事能像政变这样让人高兴，正如世界银行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布里泽(Charles Blitzer)对《华尔街日报》说的：“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这种开心才刚开始。俄罗斯人还在为攻击事件晕头转向时，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强行实施计划中最引起争议的措施：大幅削减预算支出、解除包括面包等基本食物的价格管制，以及加快和扩大私有化——一切能造成立即悲惨的标准政策，似乎这是警察国家避免反抗的必要条件。

叶利钦政变后，IMF的第一副总裁费歇尔(Stanley Fischer)主张“从各战线全速推动”。在克林顿政府协助拟订俄罗斯政策的桑莫斯口径也一致，他说：“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这‘三化’(three-ations)必须尽可能快速完成。”

变化如此迅速，俄罗斯根本不可能赶得上。劳工往往在还没搞清楚前，他们的工厂和矿场已经被变卖——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卖或卖给谁(和十年后我在伊拉克国营工厂所见的茫然与混乱如出一辙)。理论上，这些转手买卖和交易应该能创造经济繁荣，使俄罗斯摆脱绝境；在实务中，这个原本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只是换了一个政商财团主义：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仅限于一小撮俄罗斯人，其中有许多共产党高干，以及少数几个西方共同基金经理人，靠投资刚私有化的俄罗斯公司赚取暴利。一个由新暴发的亿万富豪组成的集团，其中有许多人后来以他们拥有帝王般的财富和权力，变成世人所知的“寡头”(Oligarch)。他们与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联手，剥削几乎一切有价值的资产，以每个月20亿美元的速度把庞大的获利移到海外。在休克治疗前，俄罗斯没有百万富翁；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的名单，到2003年，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已增加到17人。

有部分原因是，叶利钦和他的小组不准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收购俄罗斯资产，这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难得一见的不同；他们把战利品留给俄罗斯人，然后开放外国人投资由所谓寡头拥有的刚私有化的公司。即使到今日，报酬率仍然高得吓人。《华尔街日报》说：“想找三年内可以获利2000%的投资吗？只有一个股市提供这种希望——俄罗斯。”包括瑞士第一波士顿(CSFB)在内的许多投资银行，以及几位财力雄厚的金融家，很快设立专门投资俄罗斯的共同基金。

对俄罗斯的寡头和外国投资人来说，远方只有一朵乌云：叶利钦江河日下的声望。经济计划的效应对俄罗斯平民是如此惨酷，且其过程充满如此明显的贪腐，使他的支持率跌到个位数百分比。如果叶利钦被迫下台，取代他的人势必为俄罗斯的极端资本主义冒险踩刹车。巨富寡头和“改革家”更担心的是，许多在违宪政治条件下遭变卖的资产，可能面临重新收归国有的命运。

1994年12月，叶利钦做了有史以来许多走投无路的领导人为抓住权力都做过的事：发动一场战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夫(Oleg Lobov)曾对一位国会议员透露：“我们需要一场胜利的小战争来提高总统的支持率。”而国防部长预测，他的军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打败已宣布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这个计划至少有一阵子似乎管用。在第一阶段，车臣独立运动受到部分压制，俄罗斯军队占领格罗兹尼(Grozny)已被弃守的总统府，让叶利钦能够宣告光荣胜利。结果证明那是一场短暂的胜利，包括在车臣和在俄罗斯。当叶利钦面临1996年竞选连任，他的声望仍然十分低落，落选几乎已是定局，以致他的幕僚开始打取消选举的主意：一群俄罗斯银行家署名的信刊登在所有俄罗斯的国营报纸上，强烈暗示这个可能性。叶利钦的私有化部长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萨克斯曾以“自由斗士”形容他)是最敢于公开支持皮诺切特选项的人。他宣称：“为了让社会拥有民主，政权必须独裁。”这完全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找的借口沆瀣一气。

最后，选举如期举行，叶利钦获胜，这要归功于来自金融寡头估计约一亿美元的金援(是法定金额的33倍)，以及寡头控制的电视台对叶利钦的报道比对手多800倍。在政府可能改朝换代的威胁去除后，停工的芝加哥男孩终于能专注于最具争议性、也最有利可图的计划：出售曾被列宁称为“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资产。

一家规模与法国道达尔(ToTal)相当的石油公司，以8800万美元卖出40%股权(道达尔2006年出售的价格高达1930亿美元)。生产全球五分之一镍的诺里斯克镍矿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亿美元出售——虽然光是它的年获利很快就超过15亿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过科威特，售价为3.09亿美元；现在它一年获利超过30亿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权售价1.3亿美元；短短两年后，这些股权在国际市场价值已飙到28亿美元。一座庞大的武器工厂以3000万美元卖出，相当于亚斯本(Aspen)一栋度假豪宅的价格。

这是个丑闻不只是因为俄罗斯的公共资产被以贱价变卖——也因为它出以典型的政商财团主义手法——购买这些公共资产的钱是公帑。就像《莫斯科时报》记者毕文斯(Matt Bivens)和波恩斯坦(JonaS Bernstein)描述的：“少数几个钦点的人接管俄罗斯的国营油田，未花一分钱，像一场庞大的骗术，政府的一只手付款给另一只手。”在这场政治人物出售国营公司，以及企业人士收购它们的大胆合作中，数字叶利钦的部长把原本应该存到国营银行或财政部的巨额公款，转存到金融寡头匆忙设立的私人银行。*然后国家授与这些银行执行油田和矿场私有化标售的契约。这些银行主持标售，但同时也自己进场投标——而且不出所料，寡头拥有的银行决定让自己成为这些国家资产骄傲的新主人。他们用来收购这些国营公司的钱，很可能就是叶利钦的部长先前存进银行的公帑。换句话说，俄罗斯人为了劫掠自己的国家而提前将公帑存到银行。

*两家与大寡头有关系的银行是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梅纳蒂普银行（Menatep），和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的联合进出口银行（Uneximbank）。

就像一位俄罗斯“年轻改革家”说的，当俄罗斯共产党决定拆解苏联时，他们“用权力来换取财产”。和他的导师皮诺切特一样，叶利钦的家族也变得非常富有，他的子女和数字姻亲被指派担任私有化大公司的高级职位。

金融寡头牢牢掌控俄罗斯的重要资产后，他们再开放新公司供西方跨国企业投资，收购大部分股权。在1997年，皇家荷兰壳牌(Royal Dutch / Shell)和英国石油，与两大俄罗斯石油巨人俄罗斯天然气(Gazprom)和西丹科设立合资事业。这是高获利的投资，但在俄罗斯的大部分财富由俄方控制，不操在外国合伙人手中。IMF和美国财政部后来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私有化拍卖中，便成功修正了这项疏失。而在入侵伊拉克后，美国还更进一步，企图把地方精英完全排除在油水可观的私有化交易之外。

1990年到1994年这段关键时期在莫斯科担任美国大使馆首席政治分析师的梅利(Wayne Merry)曾经坦承，民主与市场利益的选择在俄罗斯是泾渭分明的。“美国政府选择经济优先于政治。我们选择解除价格管制、产业私有化，以及创立真正放任、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并且基本上期待法治、公民社会和代议民主政治会因此而自动发展出来……不幸的是，这个选择必须忽视人民意志，要施加压力才能推行政策。”

这段期间在俄罗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以致部分“改革家”难以抗拒分一杯羹。俄罗斯的情况的确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凸显出技术官僚的迷思，也戳破了凭着理念施行教科书模型的蛋头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神话。和在智利一样，猖獗的贪腐和经济休克治疗携手前进，几位叶利钦的芝加哥学派部长和副部长，最后都因为喧腾一时的贪腐丑闻而落到丢官的下场。

涉人者包括哈佛俄罗斯计划的神童，他们负责筹划俄罗斯的私有化与共同基金市场。两位担任计划主持人的学者——哈佛经济学教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和他的副手海伊(Jonathan Hay)——被发现直接从他们创立的市场获利。施莱佛为盖达尔小组担任私有化政策顾问的同时，他妻子则大手笔投资于私有化的俄罗斯资产。30岁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海伊，也投资了私有化的俄罗斯石油股票，涉嫌直接违背哈佛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合约。而海伊在协助俄罗斯政府设立共同基金市场时，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则取得第一张可在俄罗斯营运共同基金公司的执照，而这家公司初期的营运地点是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办公室。(技术上来说，萨克斯身为负责俄罗斯计划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他在这段期间是施莱佛和海伊的老板。不过，萨克斯已不在俄罗斯现场工作，因此未受这些可疑行为的牵连。)

这些丑闻曝光后，美国司法部控告哈佛，宣称施莱德和海伊的商业交易，违反个人不得从负责的高级工作获利的合约。经过七年的调查和缠讼，美国波士顿地方法院判决哈佛违反合约，两位学者“共谋诈骗美国”，“施莱德从事明显的自利交易”，“海伊企图透过他父亲和女友洗钱40万美元”。哈佛支付2650万美元的和解金，创下这所学府历来最高记录。施莱德同意赔偿200万美元，海伊同意支付100万到200万美元，视他的所得情况而定，但两人都未承认任何罪责。*

*不幸的是，这些钱并未进入俄罗斯人民的口袋，虽然他们是贪腐的私有化过程的真正的受害者；钱交给了美国政府——这与伊拉克的“告发者”（whistle-blower）控告美国承包商的官司，最后却由美国政府与美国的揭发者瓜分和解决金一样。

也许这类“自利交易”很难避免，因为俄罗斯实验的性质使然。当时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他宣称休克治疗能够有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诱因或诱惑，几乎能征服一切”。所以如果必须以贪婪作为重建俄罗斯的发动机，那么两位哈佛学者和他们的妻子与女友，以及叶利钦的幕僚及家族自己投入这场疯狂争夺，也只是起带头作用而已。

这指向一个令人困扰、但很重要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是被意识形态和信心驱动的“真正信仰者”，深信自由市场可以治愈贫穷落后，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或者这些观念和理论在激发利他动机的同时，也常被用来当作放任贪婪的借口？当然，所有意识形态都可能腐化（正如俄罗斯的共产党官员在共产党时代大肆搜括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肯定有诚实的新自由主义者。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确实看起来特别容易滋生贪腐。一旦你接受大规模的获利和贪婪可以为任何社会创造最大利益时，很可能任何个人自肥自利的行为，都能合理化为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创意无限的大锅饭做贡献，为它创造财富和刺激经济成长——即使只给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伙人。

索罗斯在东欧的慈善工作——包括他资助萨克斯周游该地区——也无法避免这种争议。索罗斯投入东欧集团民主化的使命不容置疑，但他在伴随民主化的经济改革中也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身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外汇交易人，当各个国家实施可兑换货币体制和解除资本管制时，他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当国营公司被送进拍卖场，他也是潜在的大买主。

如果索罗斯直接从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协助打开的市场获利，将是完全合法，但外界的观感将不会特别好。有一阵子他处理利益冲突形象的方法是，禁止他的公司在他的基金会运作的国家投资。但是当俄罗斯拍卖资产时，索罗斯再也难以抗拒。1994年他解释他的原则“已经有所修正，因为市场正在这个地区快速发展，而我没有理由或权力否决我的基金，或我的股东在这里投资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决这些国家获得部分这些基金的机会”。例如，索罗斯在1994年收购俄罗斯私有化电话公司的股权（结果是一项很糟的投资），并在波兰收购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部分股权。在共产主义垮台早期，索罗斯透过萨克斯的工作，扮演休克治疗式经济转型幕后的主要推手。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他显然已改变心意，变成休克治疗的主要批评者，并指示他的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私有化前要求设置反贪腐措施。

这种觉醒来得太迟，未能挽救俄罗斯免于赌场式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已把俄罗斯敲开，让热钱流入——短期的投机性投资和外汇交易，只为赚取高额获利。在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第13章的主题）开始扩散时，庞大的投机热钱意味俄罗斯不可能抵挡得了。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经济立即崩垮，大众归咎于叶利钦，他的支持率跌落到惨不忍睹的6%。在许多金融寡头的前途再次受到威胁之际，只有靠另一次休克治疗才足以挽救经济计划，并避免真正的民主降临俄罗斯。

1999年9月，俄罗斯发生一连串特别残暴的恐怖攻击：似乎毫无来由的，四栋公寓建筑在半夜被炸毁，近300人丧命。按照一种美国人从2001年9月11日后就十分熟悉的说词，其他所有议题都从政治地图上被炸得飞散，而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有这种能耐。“那就是纯粹的恐惧，”俄罗斯新闻记者亚巴兹解释说，“突然间，似乎所有针对民主、金融寡头的议论——所有事，都比不上对死在自己公寓里的恐惧。”

被指派负责缉捕“那些畜生”的人是俄罗斯总理，强硬而带着邪恶气质的普京（Vladimir Putin）。*公寓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普京在1999年9月底对车臣发动空袭，攻击平民区。在新笼罩的恐怖气氛中，曾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共产党时代最可怕的象征——任职17年的普京，突然间让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放心许多。叶利钦的酗酒使他渐渐无法视事，保护者普京正是接替他出任总统的最佳人选。1999年12月31日，在车臣战争压倒其他议题的情况下，几位寡头筹谋把政权从叶利钦悄悄移交给普京，无需经过选举。叶利钦在交出权力前，从皮诺切特的作战手册中拿出最后一章，要求自己的法律豁免权。普京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签署保护叶利钦免于刑事追诉的法律，不管是他的贪渎，或在他任内派遣军队杀害支持民主的示威者。

*可以想见，俄罗斯统治阶级一意孤行地犯下这些罪行后，有关这些事件的阴谋论始终挥之不去。许多俄罗斯人相信车臣人与公寓爆炸案无关，并认为这些事件是一项把普京推上叶利钦接班人位子的秘密行动。

叶利钦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一个贪腐的丑角多于凶恶的强人，然而他的经济政策和他为求自保而发动的战争，却为芝加哥学派的十字军增添许多冤魂，使从70年代智利以来的死亡人数持续稳定增加。除了叶利钦10月政变的死伤者外，车臣的战争据估计杀死十万名平民。他所造成的更大杀戮一直以慢动作进行，但死伤人数却高得多——那就是经济休克治疗的“附带破坏”。

在没有严重饥馑、瘟疫或战争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是前所未见的事。到1998年，超过80%的俄罗斯农场已破产，约70%的俄罗斯工厂关闭，制造出庞大的失业人口。在1989年休克治疗之前，俄罗斯联邦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休克治疗师开出他们的“苦药”处方后，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应该对7200万人在短短八年间陷入贫穷负责。到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

尽管近几年来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涨所赐，有数百万俄罗斯人脱离贫穷，但俄罗斯下层阶级的极贫者仍长期无法翻身——就像贱民般被压在种种社会恶疾下。共产主义下的俄罗斯人居住在拥挤、寒冷的公寓，过着悲惨的生活，但至少要有房子住；2006年政府承认，俄罗斯有71.5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的数字则高达350万名儿童。

在冷战期间，普遍的酗酒问题总被西方视为共产主义下人民生活悲惨的证据，认为俄罗斯人需要大量伏特加才能过日子。然而在资本主义下，俄罗斯人喝的酒是过去的两倍多而且他们开始吃更不容易弄到手的止痛药物。俄罗斯药品主管官员米开洛夫(Aleksandr Mikhailov)说，使用止痛药物者从1994年到2004年增加900%，达到逾40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海洛因上瘾者。药物成瘾问题带来另一种无声杀手：在1995年，5万名俄罗斯人呈现人类免疫不全病毒(HIV)阳性反应，短短两年后人数增加一倍；十年后，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估计，近100万名俄罗斯人为HIV阳性。

这些是慢性死亡人数，但快速死亡者也不遑多让。1992年休克治疗一推行后，俄罗斯原已偏高的自杀率开始攀升；在叶利钦“改革”高峰的1994年，自杀率已攀至八年前的近两倍。俄罗斯人互相杀害的比率也比以前高许多；到1994年，暴力犯罪增加为四倍多。

“我们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从过去15年的罪恶岁月得到什么？”一位莫斯科的学者在2006年的民主示威中问，“罪恶的资本主义时代已杀害我们10%的人口。”俄罗斯人口确实快速减少中——每年减少约70万人。从休克治疗第一个完整年度的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30年前，异议派芝加哥经济学家法兰克写信给弗里德曼，指控他犯下“经济集体屠杀”。今日许多俄罗斯人以类似词句描述他们的同胞慢慢消失。

这种计划性悲剧显得额外荒诞，因为莫斯科的精英炫耀财富的方式，只有在少数几个石油酋长国才见得到。在今日的俄罗斯，财富的阶层化已达到富人和穷人看起来不但像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也像来自不同的世纪。一个时区是在已快转前进成21世纪未来罪恶城市的莫斯科闹区，金融寡头坐着黑色奔驰车队，由最精锐的佣兵护卫着奔驰于街上，而西方的基金经理人在这里白天被开放投资规定所吸引，晚上则被免费招待的娼妓诱惑。在另一个时区，一位17岁乡下女孩被问及她对未来的希望时回答说：“当你坐在这里用烛光看书时，要谈21世纪很难。21世纪不重要，这里是19世纪。”

劫掠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到像在俄罗斯一样，需要极度的恐怖行动——从放火烧国会到侵略车臣。“助长贫穷与犯罪的政策，”叶利钦初期(后来合弃)的经济顾问之一埃布尔托夫(Georgi Arbatov)写道，“……只有在民主被镇压后才能生存。”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南锥，在戒严令下的玻利维亚，也在未来的伊拉克。

都怪贪腐

重读西方媒体对俄罗斯休克治疗期间的报道，会让人惊讶当时的讨论与十多年后对伊拉克的争辩竟然如此雷同。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当然还有欧盟、七大工业国和IMF来说，在俄罗斯的明确目标是抹除以前的存在状态，然后创造供资本家摄食的条件，进而开启一个欣欣向荣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由信心满满、才刚踏出校园的美国人来管理。换句话说，一个没有爆裂物的伊拉克。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狂热达到最高点时，它的拉拉队坚信只有彻底摧毁每一种机制，才能创造一个国家重生的条件——这种空白石板的梦幻以后还会在巴格达浮现。哈佛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写道：“最好是俄罗斯继续瓦解，直到它的体制结构完全消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1995年也写道：“任何改革必然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整个世界必须被抛弃，包括所有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部分的社会与政治体制，直到最后的生产、资本和科技等实体结构。”

另一个与伊拉克类似之处：不管叶利钦如何恶劣地践踏代表民主的事物，他的统治仍然被西方描述成“转型为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普京开始镇压几位金融寡头的非法活动时，这种说法才改变。同样的，布什政府向来描述伊拉克正在迈向自由，即使有难以胜数的证据显示那里有猖獗的酷刑、失控的行刑队和铺天盖地的新闻检查。俄罗斯的经济计划总是被形容为“改革”，正如伊拉克永远在“重建”中，即使美国的承包商几已全部撤走，任由基础建设

工程在肆虐的破坏中荒废。在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任何敢于质疑“改革家”智慧的人，都会被贬斥为斯大林怀旧派，就像多年来批评占领伊拉克的人，会受到指控说他们认为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代的日子比较好过。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失败再也无法掩饰时，说词便转向俄罗斯的“贪腐文化”，以及俄罗斯人“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的民主体制，因为他们背负长期极权主义的历史。华盛顿那些智库的经济学家匆忙撇清他们在俄罗斯协助创造科学怪人经济(Frankenstein economy)的责任，嘲笑它是“黑手党资本主义”——似乎这是俄罗斯特有的产物。“在俄罗斯绝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01年引述一位俄罗斯办公室职员的话报道。在《洛杉矶时报》，新闻记者兼小说家罗利(Richard Lourie)说：“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可悲的国家，即使他们做的是正常而琐碎的事，像选举和赚钱，他们都能搞得一团糟。”经济学家阿斯伦德曾宣称，光是“资本主义的诱惑”就能改造俄罗斯，纯粹靠贪婪的力量便能提供重建国家的动力。几年后他被问到出了什么问题时，回答是“贪腐、贪腐和贪腐”，仿佛贪腐与他曾经如此热烈称许的“资本主义的诱惑”的放纵表现不是同一件事。

整套可笑的掩饰将在十年后重演，用来解释在伊拉克损失的庞大重建资金，手法则是以诋毁萨达姆的遗毒和“激进派伊斯兰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和沙皇的遗毒。在伊拉克，美国对伊拉克人显然无法接受枪口下的“自由”礼物，也变得愈发愤怒——不同的是，在伊拉克这种愤怒不只出现在报纸社论咒骂“不知感恩”的伊拉克人，更由美国和英国士兵直接打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这套怪罪俄罗斯的说辞最大的问题是，它先堵住了任何严肃检验整件事的机会，让世界无从了解放任式自由市场十字军的真正面目，发现它是过去30年来最重大的一股政治趋势。许多寡头的贪腐仍然被说成一股外来力量，传染了原本应该很健康的自由市场计划。然而贪渎并非俄罗斯自由市场改革的闯入者：仓促而肮脏的交易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西方强权的积极鼓励，被视为启动经济最快的方法。当俄罗斯的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顾问完成摧毁俄罗斯的体制后，他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利用贪婪的力量来拯救这个国家。

这种悲惨的结果也非只发生在俄罗斯；芝加哥学派实验的30年历史，就是一场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与大公司间的大规模贪腐与政商勾结，从智利的食人鱼、阿根廷的亲信私有化、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安然能源骗局，到伊拉克的“舞弊免责区”。休克治疗的目的在于打开快速赚取暴利的窗口——虽然是违法，而且就是因为违法。“俄罗斯已变成国际基金投机客的淘金窟”，1997年一份俄罗斯报纸的标题写道。《福布斯》杂志则形容俄罗斯和中欧为“新边疆”。这些殖民时代的用语十分贴切。

对1950年代弗里德曼发起的运动的最好诠释是，跨国资本家企图重新掌控高获利、无法纪的边疆，而此等边疆正是建构今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最称羨的东西——只是加上一点变化。这个运动并未深入斯密说的没有西方法律的“野蛮原始国度”(这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而是有系统地拆解既有的法律和规定，以重新创造以前的无法纪状态。斯密的殖民主义攫取了他形容为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换来的“荒地”，并从中获得前所未见的利益，而今日的跨国资本家则把政府计划、公共资产和一切非卖品，视为有待征服和攫取的目标——邮政局、国家公园、学校、社会安全计划、灾难救援，以及任何国家管理的東西。

根据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国家就是殖民边疆，企业征服者以无情的决心和精力大肆劫掠，和他们的先辈满载安第斯山的黄金与白银回国没有两样。斯密眼中的肥沃绿地，变成了彭巴草原上获利可观的农场，华尔街则在智利的电话系统、阿根廷的航线、俄罗斯的油田、玻利维亚的自来水系统、美国的公共无线频道、波兰的工厂，看到“绿野商机”——全都以公共财产创建、却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被变卖。还有利用国家的权力取得专利，以及把以前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及自然资源化为商品标上价钱所创造的财富——包括种子、基因、大气中的碳等。借由永不停息地在公共领域寻找获利的新边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就好像殖民时代的地图画师，界定穿越亚马逊的新水道，找到印加庙堂里隐秘的藏金处。

贪腐在这些现代边疆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一如在殖民时代的淘金潮中那样。由于最重大的私有化交易签订的时机，总是在经济或政治危机的动荡中，明确的法律和有效的规范难以执行——气氛一片混乱，价格起伏不定，政治人物也更不可预测。我们过去30年一直生活在边疆资本主义中，边疆的地点不断从一个危机变换到另一个危机的发生处，每当法律追赶上时就变换地点。

因此，俄罗斯亿万富豪寡头的兴起并不是一则警世的故事，反而证明了露天开采一个工业化国家会有多丰厚的获利，然而华尔街要的还更多。苏联崩垮后，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其他陷于危机国家的私有化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硬和急切。截至目前最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1994年，即叶利钦政变的第一年，当时墨西哥经济发生所谓龙舌兰危机

的大崩盘：美国的纾困条件要求快速私有化，而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这个过程造就了23个新亿万富豪，“此处的教训十分明显：要预测下一批亿万富豪会在何处诞生，只要寻找开放市场的国家”。纾困条件也打开墨西哥，让外国人持有前所未有的股权比率：在1990年，墨西哥只有一家外资银行，但“到2000年，30家银行中有24家握在外国人手中”。显然唯一能从俄罗斯学到的教训是，财富转移的速度愈快和愈没有法纪，获利就愈可观。

桑契斯就是了解其中奥妙的人，这个生意人1985年在家中客厅草拟了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计划。9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他卖掉玻利维亚的国营石油公司、航空、铁路、电力和电话公司。和俄罗斯把大奖颁给本国国人不同，玻利维亚清仓大甩卖的赢家包括安然、皇家荷兰壳牌、阿莫科公司(Amoco)、花旗公司(Citicorp)——而且是直接卖给这些外商，完全无需与当地公司合资。《华尔街日报》1995年描写在拉巴斯的西部蛮荒景象说，“雷迪森广场饭店(Radisson Plaza Hotel)住满来自美国大公司的主管，像AMR旗下的美国航空公司、MCI通讯公司、埃克森公司(Exxon)和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他们被玻利维亚人邀请来，为将被私有化的产业改写管辖它们的法律，并竞标这些等待拍卖的公司”——好方便的安排。“重要的是让这些改变无法逆转，在产生抗体前把事情处理完。”桑契斯在解释他的休克治疗方法时说。为了绝对确保“抗体”不会产生，玻利维亚政府做了以前在类似情况下曾做过的事：再实施一次长时期的“戒严”，禁止政治集会，并授权逮捕所有反对这个程序的人。

阿根廷也有一段恶名昭彰的私有化杂耍表演年代，被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份投资报告誉为“美丽新世界”。那段期间的主政者是承诺要为劳工喉舌而取得权力的梅内姆总统，他缩减国营公司的规模，并出售油田、电话系统、航空公司、铁路、机场、公路、供水系统、银行、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还有最后的邮政局和国家年金计划。当国家的财富流往海外时，阿根廷政治人物的生活也愈来愈豪奢。过去以皮夹克和劳工阶级的短髭著称的梅内姆，开始穿着意大利西装，并且据报道曾出国接受整形手术(他对自己脸孔浮肿的解释是“蜜蜂叮的”)。梅内姆手下负责私有化的部长亚索嘉丽(Maria Julia Alsogaray)，曾搔首弄姿为流行杂志拍摄封面，她身披一件毛皮大衣，里头未着任何衣服；梅内姆则开始驾驶一辆鲜红法拉利德斯塔罗沙(Testarossa)跑车——据说是一位生意人感恩图报的“礼物”。

仿效俄罗斯私有化的国家，也以较温和的方式实验倒转的叶利钦政变——政府透过选举和平取得权力，但渐渐诉诸暴力以掌控权力和保护他们的改革。在阿根廷，放任式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在2001年12月19日结束，当时的总统鲁亚(Fernando de la Rúa)和财政部长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尝试进一步采取IMF处方的节约措施，遭到人民反抗，鲁亚下令联邦警察以一切必要手段驱散群众。鲁亚最后被迫搭直升机逃亡，但已造成21名示威者遭警察杀害，1350人受伤。桑契斯在位的最后几个月还更血腥，他的私有化造成玻利维亚一连串的“战争”：先是水的战争，对抗贝泰公司(Bechtel)提高自来水价格300%；接着是“税战”，对抗一项IMF拟订的计划，准备向劳动贫民加税以填补预算缺口；然后是“天然气战”，反对桑契斯计划出口天然气到美国。最后桑契斯也被迫逃离总统府，流亡到美国，但和鲁亚一样，这些战争也损失许多人命。桑契斯下令军队镇压街头示威后，士兵杀害近70人——其中许多人只是旁观者——另有400人受伤。截至2007年初，桑契斯仍遭到玻利维亚最高法院以屠杀相关罪名通缉。

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政府，都被华盛顿视为休克治疗可以和平、民主地进行，而无需政变或镇压的典范。虽然它们确实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开始的，但两者都在枪弹中结束却是意义重大。

在南半球大部分国家，新自由主义常被说成“第二次殖民劫掠”：在第一次劫掠中，财富攫取自土地，第二次则从国家掠夺。每次掠夺的狂热停息后就是许诺：下一次将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阻止国家资产遭变卖，整个过程将在明察秋毫的主管当局和刚正不阿的司法人员严密监督下。下一次在私有化前，“体制建构”将已经完备。但在财富已被移往海外后呼吁法律和秩序，实际上只是让以前的偷窃合法化的方式，就好像欧洲殖民者以条约来锁住他们攫取的土地。正如亚当-斯密的想法，边疆的无法纪不是问题，而是应有之义，与事后的悔恨和保证下次做得更好一样，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你决定接受每个国家追求匡正时弊者的委托。在既有的社会体系框架下进行理性实验。如果你失败，理性变革将受到举世的严重曲解，只剩下正统派和革命派靠斗争来解决争议。

——凯恩斯给罗斯福(F. D. Roosevelt)总统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访问萨克斯那天，整个纽约市都笼罩在灰蒙的细雨中，街上每隔约五步就点缀着鲜艳的红色。刚好那一周是波诺(Bono)的红色商品计划(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时候，纽约市也感染了广告活动的气氛。抬头就能看到广告广告牌上巨大的红色iPod和亚曼尼太阳眼镜，每个公交车亭都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佩内洛普·克鲁兹(Penelope Cruz)穿着各种红衣服的海报，市内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产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苹果商店散发着玫瑰色的红光。“一件背心可以改变世界吗？”一则广告问。是的，可以，我们确信如此，因为其中一部分获利将捐给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对抗艾滋病、肺癆和疟疾。“买到它停止！”两天前电视转播波诺与欧普拉·温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采购时，他这么说。

我有预感，那一周想采访萨克斯的记者大多数会想问这位超级巨星经济学家，对于用这种时尚新方法来筹募援助基金有什么看法。毕竟，波诺以“我的教授”称呼萨克斯，而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办公室(他在2002年离开哈佛大学)时，迎面就看见一幅两人的合照。在这么光鲜亮丽的慈善活动中，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来扰局的，因为我想谈这个教授最不喜欢的话题，一个他曾在记者访谈中威胁要挂电话的话题。我想谈俄罗斯，以及那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萨克斯是在俄罗斯休克治疗一年后，才开始自己的转型，从全球震撼医生转变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贫穷国家运动者。这个转型多年来造成他与正统派经济圈的前同僚与共事者冲突不断。就萨克斯来说，他本身没有改变——他一向致力于协助一些国家借由巨额援助和取消债务，以发展市场经济。多年来他认为有可能透过与IMF和美国财政部合作而达成这些目标，但当他来到俄罗斯现场，发现讨论的方向已经改变，而且面对的官员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惊，导致他采取与华盛顿的经济官僚较冲突的立场。

以后见之明来看，俄罗斯无疑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演进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疗实验室，美国财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它们是实验，意味将成为其他国家跟进的典范。7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裁政府因为攻击工会和开放边界，而获得持续贷款的奖赏，即使部分背离芝加哥学派的正统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国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场，还有阿根廷军政府慢动作的私有化。玻利维亚是第一个在8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的民主国家，因此获得新援助，部分债务也被免除——这发生在90年代桑契斯进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东欧集团国家波兰，萨克斯毫无困难地取得巨额贷款，而且同样的，最初的计划遭遇强力反对后，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也陷于牛步。

俄罗斯不一样。“太多震撼，太少治疗”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强权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时对回报俄罗斯的援助金额始终十分吝啬。连皮诺切特都曾以贫困儿童的粮食计划来缓冲休克治疗的痛楚；华盛顿的放款机构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叶利钦，反而把俄罗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梦魇。

与萨克斯深入讨论俄罗斯并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导谈话跨越他刚开始的防卫。(“我是对的，他们完全错了。”他告诉我。还有，“问桑莫斯，别问我；问鲁宾(Bob Rubin)，问克林顿，问切尼他们对俄罗斯的演变有多高兴”。)我也想跨越他的沮丧。(“我在当时是真的想做点事，结果证明徒劳无功。”)我的目的是想更了解，为什么他在俄罗斯会失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萨克斯出了名的好运就在那个关键时刻用完了。

萨克斯现在说，他一抵达莫斯科就知道情势已经不太相同。“我一开始就有预感……我从一开始就很生气。”俄罗斯正面临“一个第一级的总体经济危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严重最不稳定的危机”，他说。对他来说，唯一的对策很清楚：他为波兰拟订的休克治疗措施，“以便让基本市场力量尽快开始运作——加上巨额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亿美元，大致分成150亿美元给俄罗斯，150亿美元给各共和国，如此才能展开和平与民主的转型”。

我不得不说，只要牵涉到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推行的严厉政策，萨克斯的选择性记忆确实众人皆知。在我们的访

谈中，他不断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规模削减支出(简而言之，就是他现在拒绝使用的“休克治疗”，他辩称当时指的只有狭隘的价格政策，而非改造整个国家)。根据他对自己角色的记忆，休克治疗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专注于募款上；他说，他为波兰拟订的计划是“稳定基金、赦免债务、短期财政援助，与西欧经济整合……叶利钦的小组要求我帮助他们时，我提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就像卡西迪(John Cassidy)2005年在《纽约客》一片侧写中说的：“事实上，萨克斯在波兰和俄罗斯都支持大规模社会再造多于渐进改革与建立体制。灾难性的私有化政策是一个例子。虽然大多数私有化发生在萨克斯离开俄罗斯后的1994年底，但其原始政策架构在1992年1993年就已确立，当时他还在俄罗斯。

萨克斯说法里的重要事实没有争议：争取巨额援助是他为俄罗斯规划的重心——这也是叶利钦屈从整个计划的动机。萨克斯说，他的蓝图是以马歇尔计划为本，即二次大战后美国拨给欧洲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的126亿美元(相当于今日币值的13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普遍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外交作为。萨克斯说，马歇尔计划显示，“当一个国家陷于混乱时，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来。所以，我对马歇尔计划最感兴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财政挹注，就为(欧洲的)经济复苏步上轨道奠定基础”。刚开始时，他相信华盛顿有同样的政治意愿，想把俄罗斯转变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像二次大战后对西德和日本的坚定承诺。

萨克斯相信 he 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和IMF争取到一套新马歇尔计划，而且理由很充分。《纽约时报》在那段期间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记得在担任波兰政府顾问时，曾“一天内在白宫筹到10亿美元”。但萨克斯告诉我：“当我提议为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时，白宫完全没兴趣。IMF的人只是瞪着我，好像我疯了。”

虽然叶利钦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华盛顿不乏仰慕者，却没有人愿意拿出他们嘴巴说的援助。这表示萨克斯要求俄罗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就是在这时候，他开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个人错误，”萨克斯在俄罗斯的大挫败期间表示，“是对叶利钦总统说：‘别担心；援助马上会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对西方来说太重要、太关键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样搞砸。”但问题不只出在IMF和财政部没有听萨克斯的话，也出在萨克斯还未得到任何保证前，就大力促销休克治疗——一场数百万人付出惨重代价的豪赌。

当我重新拿这些问题问萨克斯时，他重申自己真正的过失是误判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他记得一场与老布什任内的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谈话。萨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罗斯的经济动乱继续沉沦，可能会引发没有人能控制的情势：大规模饥馑、国家主义复辟，甚至法西斯主义，对一个唯一过剩的产品是核子武器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智。“你的分析或许很正确，但它不会发生。”伊格尔伯格回答。然后他问萨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当时是1992年，克林顿即将打败老布什的美国大选年。克林顿竞选策略的核心是，布什忽略国内经济的破败，一意追求海外的光荣(“问题是经济，笨蛋”)。萨克斯相信俄罗斯是那场国内斗争的受害者。他也说，他现在知道还有别的因素：许多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仍在打冷战。他们视俄罗斯崩溃为地缘政治的胜利，可以确保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我没有那种心态。”萨克斯告诉我，听起来像一个童子军误入《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节一样，而他也经常给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那只是‘好极了，这是一个可怕政权的终结。现在，让我们真的来帮忙(俄罗斯人)。请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在政策规划者的心里，那种想法是疯了。”

尽管他遭受挫败，萨克斯并不觉得那段期间的俄罗斯政策是出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他说，那主要是“纯粹的懒惰”所造成。他当时很希望来一场激烈辩论，谈谈到底应该提供援助给俄罗斯，或完全交给市场解决。但是他碰到的是集体冷漠。他说，他很讶异当时没有严肃的研究和辩论可供重大决策参考。“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努力。让我们至少花两天辩论这件事——但我们从未这么做!我没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们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搞清楚怎么回事’。”

当萨克斯谈论“努力工作”时，他是在回忆新政、大社会(Great Society)和马歇尔计划的美好时代，当时来自常春藤联盟的年轻人围坐在指挥桌，卷起袖子，四周尽是空咖啡杯和成叠的政策文稿，大家针对利率和小麦价格争议得面红耳赤。这是决策者在凯恩斯主义最盛时期的行事风格，也是面对俄罗斯灾难“严重性”应该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弃俄罗斯归咎于华盛顿的集体懒惰，对提供解释没有帮助。也许了解这段过程更好的方法是，透过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偏好的“市场竞争”观点来看。当冷战如火如荼进行而苏联仍未解体时，全世界的人可以选择(至少理论上来说)他们想消费的意识形态；当时有两极，且两极间也有不少选项。这表示资本主义必须争取顾客；它必须能提供诱因；它必须是个好产品。凯恩斯主义向来代表着资本主义也必须跟其他意识形态竞争的事实。小罗斯福总

统实施新政不仅是为解决大萧条的急迫问题，也是因为在美国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场的蛮横打击后，一股要求采取不同经济模式的强大运动必须加以安抚。有些人想要激进的经济模式：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100万美国人投票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候选人。愈来愈多美国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义者参议员惠朗(Huey Long)，他主张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罗斯福在解释为什么在1935年把更多社会福利加进新政时，说他要“抢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工业家不情愿地接受小罗斯福的新政。市场锐利的锋刃，必须以提供公共部门就业，及确保没有人挨饿来软化——资本主义的存亡正面临考验。在冷战期间，自由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免于这个压力。事实上，50年代前后这段期间资本主义的成就，即萨克斯所说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医疗和国家支持最穷困的人民——是出于面对强大左派必须作出重大让步的务实需求。

马歇尔计划是在这种经济大势下使用的终极武器。战后的德国经济陷入危机，大有淹没整个西欧的危险。同一时候，许多德国人被社会主义吸引，迫使美国政府选择将德国分裂成两半，而不愿冒让整个德国崩溃或转向左派的危险。在西德，美国政府利用马歇尔计划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其用意并非为福特汽车或席尔斯(Sears)建立快速获利的新市场，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荣的欧洲市场经济，消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到1949年时，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采取任何完全非资本主义的政策：国家直接创造就业、大举投资公共部门、补贴德国企业，以及强大的工会。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对俄罗斯或占领伊拉克时难以想象的，当时政府不顾大企业的反对而延迟开放外国投资西德，以便遭战争打击的德国企业能在复苏前避免竞争压力。“当时的判断是，让外国公司进入会像放任海盗劫掠一样。”以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著作备受赞誉的作者卡罗琳·艾森博格(Carolyn Eisenberg)告诉我：“现在与当时主要的差别是，美国政府不把德国当摇钱树。他们不想激起民怨，而认为如果开放德国供劫掠，将阻碍整体欧洲的复苏。”

艾森博格指出，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利他主义。“当时苏联像一把上膛的枪，而德国经济陷于危机，还有一大群左派，他们(西方)必须很快争取德国人民归顺。他们真的认为是为拯救德国的灵魂而战斗。”

艾森博格对创造马歇尔计划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描述，道出萨克斯的工作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盲点，包括他晚近值得称赞的致力于争取大幅增加对非洲的支出。这个盲点是，大规模的平民运动几乎从未被提及。对萨克斯来说，写历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对技术官僚，执行正确的政策，就已足够。就像休克治疗计划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点草拟的一样，理所当然的，援助苏联300亿美元的计划也应只凭他向华盛顿提出浅显的理由就能实现。然而，正如艾森博格指出，提出马歇尔计划并非基于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论据，而是出于对民众反抗的恐惧。

萨克斯景仰凯恩斯，但他似乎对凯恩斯主义终于能在美国实现的原因不感兴趣：难缠、凶悍的工会的要求，以及声势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者，使原本太激进的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进而使新政看来像是可接受的妥协。群众运动迫使不情愿的政府采用萨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萨克斯不愿承认这点却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萨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罗斯面对一个昭然若揭的政治现实：俄罗斯绝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因为当年会有马歇尔计划就是因为有俄罗斯。在叶利钦废除苏联时，那把迫使马歇尔计划形成的“上膛的枪”已经解除武装。少了它，资本主义突然可以堕落到最野蛮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罗斯，而是全世界。苏联既已崩溃，自由市场现在已独占全球，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扰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这就是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承诺(亦即：如果他们接受休克治疗，他们将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正常的欧洲国家”)的真正悲剧所在。那些正常欧洲国家(拥有稳健的社会安全网、工人保障、强大的工会与社会医疗体系)的兴起是因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妥协，现在已不再需要妥协，所有西欧的温和社会政策也陷于四面楚歌，就像它们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国遭到围剿一样。这些政策不会引进俄罗斯，当然更不会获得西方资助。

基本上，这种摆脱一切束缚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或称作新自由主义，或在美国所称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去除凯恩斯附加物的资本主义，处于独占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套可以为所欲为的体系——不再需要努力争取我们这些顾客，可以反社会、反民主和恣意展现其粗鲁。只要共产主义仍是威胁，凯恩斯式的绅士协议就会继续存在；一旦这套体系崩垮，所有妥协的痕迹最后都可能被抹除，以便达成弗里德曼在半世纪前为他的运动设定的纯正主义目标。

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夸张地宣告“历史终结”的重点：他并非真的宣称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

思想理论，而只是说共产主义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义的力量强大到能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因此，萨克斯视苏联崩溃为摆脱极权统治的自由，准备卷起袖子开始帮忙，但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却视之为不同性质的自由——终于摆脱凯恩斯主义，以及像萨克斯这些昧于现实的社会改革家的自由。从这个观点看，对俄罗斯袖手旁观虽令萨克斯愤怒不平，却不是出于“纯粹懒惰”，而是在实践放任主义：放手不管，不作为。所谓袖手旁观是指所有负责俄罗斯政策的人(从前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财政部副部长桑莫斯，到IMF的费歇尔)确实有事可做：他们都在执行纯粹的芝加哥学派理论，让市场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罗斯比智利看起来更像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预告了十年后同样的这一批玩家，将在伊拉克创造的“要钱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乌托邦。

这种新游戏规则于1993年1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首度亮相。那是一场小而重要的会议，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点在杜邦圆环(Dupont Circle)卡内基会议中心十楼，距白宫只有七分钟车程，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总部也只有一箭之遥。举足轻重、为世银和IMF拟订策略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举办了这场会议，视之为新自由主义部族的历史性聚会。出席者包括许多显赫的明星“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把芝加哥主义散播到全世界。这些人有现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兰的财政部长，土耳其和秘鲁的央行总裁，墨西哥总统的幕僚长，以及一位巴拿马前财政部长。他们之中还有萨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尔舍诺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兰休克治疗的策划者，还有他的哈佛同僚罗德里克，就是曾证明每个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国家都已深陷危机的经济学家。日后出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克鲁格(Anne Krueger)也在场。最热心宣传皮诺切特的智利前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无法恭逢其盛，因为他正密切追踪智利的总统选举，但他还是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当时仍担任叶利钦顾问的萨克斯将发表主题演说。

会议参与者一整天陶醉在经济学家最爱的休闲活动，商议如何让不情愿的政治人物采用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选举过后应该多快推出休克治疗?在猝然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中间偏左政党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众，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较佳?虽然会议取名为“政治改革之政治经济学”——刻意显得有点乏味，似乎有意误导媒体的兴趣——不过一位与会者诡秘地表示，其实真正的主题是“马基雅维里经济学”(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萨克斯聆听这些讨论几个小时，直到晚餐后他步上讲台发表演说，题目带着典型的萨克斯风格：“经济急诊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绪显然很高昂，台下的听众也准备好聆听这位曾高举休克治疗火炬进入民主时代的偶像的演说。萨克斯并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后来他对我说，他决心利用这场演说，尝试让这群大权在握的听众了解俄罗斯情势的严重性。

他提醒听众二次大战后挹注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对日本日后的惊人成功极其重要”。他提及收到传统基金会——弗里德曼主义发源地——一位分析师的来信，萨克斯说，这位分析师“强烈主张俄罗斯应该改革，但不是靠外国援助俄罗斯”。“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家的共识——而我也其中之一。这言之成理，但却是个错误。市场无法包办一切；国际援助极其重要。”他说，放任主义的偏执观念正把俄罗斯带向灾难，“不管俄罗斯的改革者多么勇敢、聪明和幸运，他们不靠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快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了”。

当然萨克斯获得一轮掌声，但热烈程度只算微温。为什么他赞扬大手笔的社会支出?台下的听众正在进行一场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军，而不是再制造一个新政。在接续的讨论会中，没有一位与会者支持萨克斯的挑战，还有几位发言反对。

萨克斯告诉我，他尝试借由演说“解释一场真正的危机会是什么情景……传达急迫感”。他说，在华盛顿作决策的人往往“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动乱。他们不了解所引发的脱序状态”。他想让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有一股动力可能把情势推向失控，直到引发其他灾难，直到希特勒趁势崛起掌权，直到发生内战，或大规模饥馑，任何情况都可能……你必须采取紧急的协助作为，因为一个不稳定的情势绝对会走向愈来愈不稳定，而不会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萨克斯无法充分说服他的听众。与会者都十分熟悉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而且许多人曾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了解经济崩溃会有多混乱和动荡，但他们从俄罗斯得到一个不同的教训：痛楚和错乱的政治情势正迫使叶利钦快速变卖国家财富，这是明显而有利的结果。

会议只得靠主办人威廉森把讨论带回那些务实的优先事务。萨克斯是这场盛会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听众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威廉森头发渐秃、不适合上电视，但政治立场的偏执却相当耸动，“华盛顿共识”这个词——也许是

现代经济学最常被引用、也最具争议性的词——就是他创造的。他以主持严密的闭门会议和讲座著名，每场会议的目的都是为测试他大胆的假说。在1月的会议，他有一个急迫的目标：他想一劳永逸地测试他所谓的“危机假说”。

威廉森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警告要拯救哪个国家免于急迫的危机；事实上，他狂热地谈论引发巨变的事件。他提醒听众一些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只有真正尝到苦难的国家才愿意吞服市场苦药，只有遭到震撼的国家才会躺下来接受休克治疗。他宣称，“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创造最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必须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

威廉森以他无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潜意识，并一派轻松地指出这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问，刻意挑起灾难以铲除改革的政治障碍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已有人建议，是否值得故意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便让大众惊吓到接受这种改变……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理论上不会有人赞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国或日本走向战争，只为了获得战败后接续的飞快成长。但一场较小规模的危机能否发挥同样的功效？可不可能设计一场假危机，能够不必付出真危机的成本而带来同样的效果？

威廉森的发言代表休克主义的大跃进。在满屋子的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人数多到足以办一场经济高峰会的这个场合，主动制造严重的危机以推动休克治疗的想法已被公开讨论。

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在演说时觉得有必要撇清与这种邪说的关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托伊(John Toye)说：“威廉森建议，挑起人为的危机以触发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们最好解读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没有证据显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实上，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想法已被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级金融决策者采用。

威廉森在华盛顿开会的隔月，我们看到美国掀起一波对“假危机”的新狂热，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环。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于金融灾难，至少一般人从新闻和电视中得到的结论是如此。“债务危机迫近”，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以头版大标题疾呼。一家全国性大电视台的特别报道说：“经济学家预测明年某个时候，或两年内，财政部副部长将走进内阁，宣布加拿大的信用已经耗尽……我们的生活将急剧改变。”

“债墙”(debt wall)这个词突然变成新语汇，它的意思是，虽然现在的生活似乎舒适平和，但加拿大已严重入不敷出，影响力巨大的华尔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P)，很快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债信评等从完美的三个A调降下来。万一发生这种事，机动性超强的投资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规范下，将随时从加拿大撤资，移到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唯一的对策是大幅削减部分社会计划的支出，如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果不其然，执政的自由党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久前才以创造就业的政纲当选为执政党(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预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后两年，调查记者麦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数几个加拿大的智库缜密地煽动并操纵这种危机感，尤其是贺维研究所(C. D. 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这是弗里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库)，背后的赞助者则是几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加拿大确实有赤字问题，但并非由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计划的支出造成。根据加拿大统计局，问题出在高利率导致债务价值膨胀，就像80年代沃尔克震撼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膨胀一样。麦奎格前往穆迪的华尔街办公室，与主管公布加拿大债信评等的资深分析师涂格利亚(Vincent Truglia)谈话，涂格利亚向她透露惊人的内幕：加拿大的企业主管和银行家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发表贬低加拿大财政的报告，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加拿大是优良而稳定的投资标的。“我处理的国家中，从来没发生国民希望降低自己国家评级的例子，而且是不断要求。他们认为加拿大被评得太高。”他说，他经常接到其他国家的代表打电话，抗议他给的评级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国人更看轻自己的国家。”

对加拿大金融圈来说，这是因为“赤字危机”是发动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涂格利亚接那到些奇怪的电话前，一项要求政府削减医疗和教育等社会计划支出，以降低税率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由于这类社会计划受到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减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胁国家经济可能因此崩溃，陷于全面危机。但穆迪机构继续给加拿大最高的A++债信评级，因而使维持世界末日气氛变得极为困难。

在那段期间，投资人对混淆的信息感到很困惑：穆迪对加拿大很乐观，但加拿大媒体不断报道国家财政的惨况。涂格利亚受够了加拿大发布政治操纵的统计数字，担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质疑，于是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发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并未失控”的“特别评论”，甚至隐约批评右派智库使用的狡诈统计手法。“近日公布的数项报告，大幅夸大加拿大的预算债务部位，其中有些数字被重复计算，另一些则作了不恰当的国际比较……这些不正确的计算可能导致加拿大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穆迪发表特别报告后，“债墙”并未迫近的说法传开来一一

但加拿大的企业界并不高兴。涂格利亚说，他发表报告后，“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机构的人……打电话给我，对着我大吼大叫。这还真罕见”。*

*我必须说涂格利亚在华尔街是异数——债券和信用评级往往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常被用来提高进行“市场改革”的压力。

等加拿大人发现“赤字危机”是企业资助的智库夸大操纵的结果时，生米已煮成熟饭——预算已遭削减并实施。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给失业者的社会计划被大幅削减，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虽然后续数年出现了预算盈余。这种危机策略在这段期间不断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录像带被泄露给加拿大新闻界，内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长在一次公务员闭门会议中说，在宣布削减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改革前，必须先泄露一些描绘悲惨情况的信息，以便创造必要的惊慌气氛，虽然这些信息可能言过其实。他称这种操作是“创造有用的危机”。

华盛顿的“统计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言论都充斥债墙和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要求政府加速削减支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总是高声疾呼危机来临。不过，华盛顿最有权势的金融机构不但愿意借媒体制造危机的表象，也很乐于以具体措施创造货真价实的危机。在威廉森发表“点燃”危机的言论两年后，世界银行的首席发展经济学家布鲁诺(Michael Bruno)公开呼应这种说法，但也未引起媒体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国际经济学会(IEA)的一场演说中(后来由世界银行以论文出版)，布鲁诺告诉500位来自58国的经济学家，国际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一场够大的危机或许能震撼原本不情愿的决策者，使他们采取能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布鲁诺举拉丁美洲为“深度危机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说，总统梅内姆和财政部长卡瓦洛的表现杰出，“利用紧急气氛”推动深度私有化。为了不让听众有机会忽略他的论点，布鲁诺说：“我一直强调一个大主题：深度危机的政治经济效应，往往为激进改革带来有利的结果。”

*虽然布鲁诺没有念芝加哥大学， he 确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教授帕廷金(Don Patinkin)的门生，本书前面曾引述帕廷金比较芝加哥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完整性”。

基于这个事实，他宣称国际机构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经济危机来推动华盛顿共识，还必须先发制人，切断援助以使危机更恶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岁入或外部资金流入减少)实际上可能是好事，因为它能缩短(改革的)延迟。‘情况没有坏到底前不会好转’的想法会自然浮现……事实上，一场高通胀危机对一个国家的好处，强过在比较不严重的危机当中拖泥带水。”

布鲁诺承认，加深或制造严重的经济崩溃十分可怕——政府可能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荒废，但身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呼吁听众把这种破坏当作创造的第一阶段。“随着危机加深，政府确实可能逐渐枯萎，”布鲁诺说，“这种发展有一种好结果，就是在推动改革时，顽抗团体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个采取长期对策而扬弃短期权宜措施的领导人，可望赢得对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学派对危机的沉溺已迅速席卷知识界。短短几年前，他们才只是推测恶性通胀危机能创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慑条件，现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竟鼓吹制造失败国家，只因为危机能提供从废墟中重头来过的机会，而世界银行的经费却来自178国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强化困顿的经济体。

多年来外界盛传国际金融机构玩弄威廉森所说的“假危机”，胁迫一些国家任其摆布，但要证明其事却十分困难。最详尽的证词来自一位转为告发者的国际货币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伪造数据，只为了宣告某个贫穷但意志坚定的国家经济陷于危机。

布德夫出生于格林纳达(Grenada)，是接受伦敦政经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家，并且以不同流俗的个人风格在华盛顿智库圈特立独行：他留着一头爱因斯坦型的竖直头发，宁愿穿风衣而舍弃西装。他在IMF工作12年，职务是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国格林纳达设计结构调整计划。IMF在里根与撒切尔时代大幅右转后，思想独立的布德夫感觉他在工作岗位愈来愈坐立不安。IMF当时在忠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领导下，挤满狂热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辞职时，决定把自己奉献给揭发IMF的秘密，他先写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给康德苏，用的是十年前法兰克写给弗里德曼的控诉语气。

这封信一开始就以IMF资深经济学家罕见的热情语调说：“在我担任IMF幕僚12年，历经正式的基金现场工作1000个日子，兜售你的药方和魔术袋给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后，今天我辞去工作。对我来说，辞职是无价的解脱，因为我的解脱让我得以跨出救赎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净我自觉手上沾满的几百万名

贫困、挨饿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里的水。那些血也逐渐干涸，在我全身各处凝结；有时候我感觉全世界的肥皂也无法洗去我以你的名义做的事。”

然后他开始陈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IMF以统计数字当作“致命”武器。他不厌其烦地细数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职员的身份，参与精心计划的“统计舞弊”，在IMF的报告中夸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况，以便让这个国家显得比真正情况更不稳定。布德夫声称，虽然IMF掌握了正确的信息，但却把一项衡量劳动成本的关键数字夸大为两倍多，使该国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宣称IMF“几乎是凭空捏造”庞大的未清偿政府债务。

布德夫说，这些“明显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马虎计算”的结果，却被金融市场当作事实，并立即把特立尼达归类为高风险国家，进而切断其融资。该国的经济问题——起因于主要出口物资石油的价格下跌——很快变成灾难，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纾困。然后IMF要求该国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最致命的药”：裁员、降低工资，以及“全套”的结构调整政策。他叙述这个过程是“以诡计故意阻断该国的经济救生索”，以便“先摧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济，然后促成改变”。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诉不只是因为少数官员对待一个国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个结构调整计划就是一种大规模的酷刑，让“‘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们面前屈膝，挫败、惊惶而混乱，乞求我们以同情心和君子风范对待，但我们残酷地嘲笑他们，毫不留情地继续施以折磨”。

这封信公开后，特立尼达政府委托两项独立的研究，调查信中的陈述，并发现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实：IMF膨胀和假造数字，对该国造成严重伤害。

不过，尽管指证历历，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诉却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委内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岛，除非该国人民冲进IMF在十九街的总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这封信在1996年被改编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辞职信》的戏，在纽约东村一家小剧场演出。这出戏出乎意料获得《纽约时报》好评，称赞它“不同寻常的创意”和“别出心裁的道具”。这则简短的戏评是《纽约时报》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金钱流向机会所在之处。而现在亚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纽约瑞士银行(UBS)证券
金融机构银行家，评论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好日子订不出好政策。

——席亚(Mohammad Sea)，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的经济顾问

他们似乎喜欢简单的问题。你的薪水能买到什么?够吃和住吗?还有没有剩钱寄回给父母?往返工厂的交通费呢?但不管我怎么问，我得到的答复总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几个月前，”一位在马尼拉附近为嘉普(Gap)缝衣服的17岁工人解释，“我以前都有足够的钱每月寄一点回家，但现在我赚的几乎不够自己买吃的。”

“他们降低你的工资?”我问。

“不是，我想应该没有。”她有点困惑地说，“只是买的东西好像变少了，物价一直上涨。”

当时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亚洲研究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出口工厂工作情况。我发现工人面对一个比逾时工作或工头虐待更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国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将浮现的全面衰退。在印度尼西亚，危机甚至更严重，动荡的气氛格外凶险。印度尼西亚货币夜以继日贬值，工人的钱前一天还能买鱼和米，第二天却只够买米。在食堂和出租车里的聊天，每个人似乎对该怪罪谁都有同样的说辞，他们告诉我：“华人。”好像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商人阶级华人直接从物价上涨当中获利，所以他们成为怒气直指的对象。这正是凯恩斯警告经济混乱的意思——你永远理不清愤怒、种族偏见和革命的结合会释放出什么。

东南亚国家特别容易陷于阴谋论和种族代罪羔羊的纠缠，因为从表面看，金融危机找不到合理的原因。电视和报纸对这个地区的分析，总是好像它得了某种神秘但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亚洲流感”(Asian Flu)，市场崩溃立即被贴上这个标签，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时，又被升级为“亚洲传染病”(Asian Contagion)。

在出问题之前几周，这些国家还被高举为经济健康与活力的标杆——所谓的亚洲小龙，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经纪人还告诉他们的客户，把储蓄投资在亚洲“新兴市场”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稳赚的策略；转眼间，他们成群撤出市场，外汇交易商大举“攻击”那些货币——泰铢、马元、印度尼西亚盾——制造出《经济学人》所称的“通常只与大规模战争有关的大规模储蓄毁灭”。然而，在亚洲小龙经济体内部，可见的情势并未改变——大体来说，它们仍由相同的裙带精英掌管；它们没有遭遇重大天灾或战争的打击；它们没有庞大的赤字——部分国家完全没有赤字。许多大财团有沉重的债务，但它们仍生产从运动鞋到汽车的种种产品，且销售和往常一样强劲。那么，为什么在1996年投资人觉得很可以把1000亿美元投资在韩国，而到第二年该国却出现负投资200亿美元——足足相差1200亿美元?这种不变的货币情势该如何解释?

结果证明这些国家是纯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全球化市场凶险难料的速度与波动。从一则谣传开始——泰国没有足够的美元作货币后盾——引发一场电子兽群的大奔逃。银行收回它们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泡沫爆破。兴建到一半的商场、摩天大楼和度假中心停工；静止的营建吊车高耸在曼谷拥挤的天际线。在以往较缓慢的资本主义时代，危机可能就此停止，但由于共同基金的销售经纪人把亚洲小龙当作一套投资来促销，因此当一只小龙倒下时，其余便跟着全倒：继泰国之后，恐慌迅速蔓延，资金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灿烂明星韩国。

亚洲政府被迫倾尽央行的储备以支持自己的货币，把最初的恐慌变成现实；现在这些国家真的快破产了。市场的反应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间，亚洲股票市场有6000亿美元蒸发——这是花了数十年累积的庞大财富。

危机会激发铤而走险的行为。在印度尼西亚，贫困的民众涌进都市的商店，劫掠他们能带走的東西。在一个特

别恐怖的例子当中，一家雅加达的购物商场在遭到劫掠时失火，数百人被活活烧死。

在韩国，电视台展开大规模宣传，呼吁民众捐献黄金珠宝，以便融化后用于清偿国家债务。短短几个月内，300万人捐出他们的项链、耳环、运动奖牌和奖杯。至少有~位妇女捐出她的结婚戒指，一位枢机主教则捐出黄金十字架。电视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黄金”游戏秀，但虽然收集了足够压低世界金价的200吨黄金，韩国的货币仍继续暴跌。

就像大萧条时发生过的情况，这场危机导致家庭眼看毕生积蓄消失，成千上万小企业关门，进而引发一波自杀潮。韩国的自杀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龄分布最高的是60岁以上，因为老年的父母想为痛苦挣扎的子女减轻经济负担。韩国媒体也报道家人集体自杀比率惊悚地增加，一些债务缠身的父亲带着家人一起上吊。当局指出，由于“只有家长死亡被列为自杀，其余则列为他杀，所以实际自杀人数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

亚洲危机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循环，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谓龙舌兰危机中挽救墨西哥货币的措施：美国财政部迅速而果断地向市场证明，绝不会让墨西哥倒债。但美国并未对亚洲及时采取这种措施。事实上，危机一爆发后，重量级的金融机构放出一连串出乎意料、口径一致信息：别帮助亚洲。

当时已85岁上下的弗里德曼，罕见地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告诉新闻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对任何种类的纾困，而应该让市场自行回到正轨。“教授，我无法形容在这场睿智的讨论中获得你的支持是多么有意义。”仰慕大师到有点难看的陶布斯说。这种让它们沉沦的立场获得弗里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银行最高主管里斯顿(Walter Wriston)以及舒尔兹(George Shultz)的呼应；舒尔兹后来与弗里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担任证券经纪商嘉信理财董事。

这种看法也获得华尔街最大投资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开支持。该公司当红的新兴市场策略师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矶由米尔肯学会(Milken Institute)主办的会议上说，IMF和美国财政部绝不可救援这场规模和1930年代一样大的危机。“我们现在在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坏消息是继续刺激调整过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说。

克林顿政府照着华尔街的剧本演出。当1997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在温哥华举行时，危机爆发已四个月，克林顿轻描淡写地把这场经济灾难说成“路上的一点颠簸”，因而激怒亚洲领袖。信息非常清楚：美国财政部不急着遏阻灾难。至于为了避免这类崩溃而创设的世界机构IMF，也采取自俄罗斯以来就变成注册商标的无为策略。IMF最后确实作出反应——但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快速、紧急稳定贷款。相反的，它条列出一长串要求，内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学派深信不疑的思维：亚洲的灾难反而是潜在的机会。

在90年代初期，每当自由贸易的倡议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来引起讨论时，他们一定指向亚洲小龙。它们是以弹跳飞跃速度成长的奇迹经济体，而假设的原因就是它们对不设防的全球化大开边界。这是一则很好用的故事——亚洲小龙确实飞速成长——但说它们快速成长是基于自由贸易则纯属虚构。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仍然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政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它们也让国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亚洲小龙在培养自己的国内市场时，也阻止许多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它们无疑是成功的经济故事，但证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经济体可以成长更快速和更公平，远胜过那些遵行西部蛮荒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

这种情况让西方和日本的投资银行与跨国公司大感不悦：看着亚洲消费性市场爆炸性的发展，可想而知它们渴望长驱直入这个地区贩卖产品。它们也想拥有买下亚洲小龙好公司的权利——特别是韩国令人称羨的财团如大宇、现代、三星和乐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创的世界贸易组织施压下，亚洲政府同意区别对待不同的分歧：它们将继续坚持保：保护国营公司免于外国持有的法律，同时拒绝把主要国营公司私有化的压力，但它们将撤除金融产业的障碍，容许大量纸上投资和外汇交易涌进。

1997年涌入亚洲的热钱突然出现流向大逆转，正是这类在西方压力下合法化的投机性投资所造成。当然，华尔街的看法不是这样。红牌投资分析师立即看出，这场危机是大好机会，可以彻底铲除亚洲剩下的保护障碍。摩根斯丹利策略师裴洛斯基对这个逻辑特别直言不讳：如果任由危机恶化，所有外国货币就会从该地区流光，而亚洲公司若不是倒闭，就是得被迫把自己卖给西方公司——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会让摩根斯丹利获益。“我希望看到企业倒闭和出售资产……出售资产非常难得；通常业主不想卖，除非他们别无选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压迫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亚洲的崩溃。皮涅拉是皮诺切特捧为明星的部长，现在为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于色地评论这场危机，宣称“最终审判日已经来临”。在皮涅拉眼中，这场危机是他与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发动的战争的最新章节。他说，亚洲小龙陨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墙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场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主权间有‘第三条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观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格林斯潘形容这场危机是“极戏剧化的事件，其发展将趋近我国的市场制度”。他也评论说：“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加速许多亚洲国家残存体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导的投资仍占一大部分的经济体制。”换句话说，亚洲管理式经济的毁灭，实际上是创造一个新美国式经济的过程——借用一个几年后被用在更暴乱背景下的词：新亚洲诞生前的阵痛。

有人说IMF领导人康德苏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他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在一次难得的访问中，他说这场危机是亚洲蜕去旧皮、重新诞生的机会。“经济模式不会永远不变，”他说，“有时候它们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们会变得过时而必须扬弃。”这场由谣传引发、并由虚构变成事实的危机，显然就是该扬弃的时机。

为了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IMF在一连数月坐视危机恶化后，终于开始与病弱气虚的亚洲政府展开谈判。这段期间唯一拒绝IMF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这要归功于该国相对较少的债务。经常惹来争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说，他认为不应该“摧毁经济以便让它变得更好”，这些话在当时已足够让他被打为疯狂的激进派了。其他遭危机重创的亚洲经济体因为迫切需要外国货币，无法拒绝IMF提供上百亿美元的可能性：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坐上谈判桌。“你无法强迫一个国家要求帮忙，它必须自己开口。但在缺钱的时候，它已经走投无路。”IMF的谈判代表费歇尔(Stanley Fischer)说。

费歇尔是最大力主张在俄罗斯采用休克治疗的人之一，虽然在那里造成庞大的人力损失，他对亚洲的态度仍同样坚强不屈。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建议，由于危机源自放宽资金大量进出的管制，而且没有减缓资金流速的机制，也许应该恢复若干障碍——可怕的“资本控制”。中国一向维持这种控制(在这方面未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因此是亚洲唯一未遭危机蹂躏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定恢复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费歇尔与IMF团队的其他人立即驳斥这个构想。IMF表现出对危机的起因毫无兴趣，而完全专注在如何利用危机带来的机会。经济崩溃迫使许多原本强硬的国家摇尾乞怜；对掌管IMF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来说，错失这个机会之窗无异于玩忽职守。

IMF关心的是，国库空虚的亚洲小龙已被打碎，现在是重造它们的最佳时机。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就是政治学家贝洛(Walden Bello)所说的，铲除这些国家所有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以及当初造就‘亚洲奇迹’不可或缺的国家干预”。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导致一些自杀率已经激升的国家大量裁撤公务员。费歇尔承认IMF获致的结论是，在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危机与政府浪费无关。尽管如此，他利用危机赋予的权力，强行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痛苦的节约措施。就像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写的，IMF的行为“有如心脏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半途，决定顺便也为肺脏和肾脏开刀”。*

*IMF往往被说成是美国的财政部的傀儡，但操纵傀儡的线很少像在这些谈判期间那样明显。为了确保美国公司的利益反映在最终协议中，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利普顿(David Lipton，他也是萨克斯以前在波兰休克治疗计划中的搭档)飞到韩国，住在首尔的希尔顿酒店，即IMF与韩国政府举行谈判的地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布鲁斯登(Paul Blustein)报道，利普顿的出现就是美国对IMF政策施加影响的明证。

在IMF拔除亚洲小龙的旧习惯和做法后，它们已准备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务私有化、独立的中央银行、“弹性”的劳动力、低社会支出，当然还有完全的自由贸易。根据新协议，泰国将开放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0%的员工(后来降至：30%)。这种要求对许多西方跨国公司很重要，因为它们要确定未来能大幅度缩编想并购的亚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围墙”倒塌了。

这类措施在危机爆发之前一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韩国工会的强悍正达到颠峰。它们曾以一连串韩国史上最激进的罢工，顽抗将降低就业安全的新劳动法案。但拜危机所赐，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经济瓦解的情势如此险恶，于是工会同意(正如从玻利维亚到俄罗斯类似危机一样)政府暂时的独裁统治；这段期间没有持续太久——久到刚好够开始实施IMF的计划。

例如，泰国的休克治疗方案是在国会强行通过，未经由正常的辩论程序，而且采取四项紧急命令的形式。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们已丧失自主权，丧失我们决定自己总体经济政策的能力。”(素帕猜因为这种合作态度后来被任命为WTO主席。)在韩国，IMF颠覆民主还更明显。IMF在韩国谈判结束时正好碰上总统大选，有两位候选人以反IMF的政见竞选。IMF采取非比寻常的干预主权国家政治程序的动作，要求所有四个主要候选人必须承诺当选后会坚守刚谈妥的协议，否则将拒拨贷款。韩国实际上是待赎的人质，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个候选人都以书面保证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学派保护经济事务不受民主干扰的核心使命，从未表现得如此明白：IMF告诉韩国人，你们可以投票，但你们的选票影响不到对经济的管理和组织。(协议签订那天很快被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在另一个受创严重的国家，连这种限制民主的动作也用不着。印度尼西亚是区域中最先对外国投资敞开大门的国家，当时仍在掌权30多年的苏哈托控制下。不过，年事已高的苏哈托对西方已不再那么顺服(独裁者经常如此)。经过数十年变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矿藏给外国公司后，他对图利外人渐感厌倦，开始转而照顾自己、子女和他的高尔夫球友的利益，时间已长达十年之久。例如，苏哈托给他儿子汤米(Tommy)拥有的汽车公司大量补贴，让福特和丰田公司大感惊慌，认为必须跟这家分析师戏称为“汤米的玩具”的本土车厂竞争实在毫无道理。

一连几个月，苏哈托尝试抗拒IMF，自行公布一项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减支出的预算案。IMF对此是加倍还击。IMF规定代表不准在谈判期间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因为任何谈判进展的迹象都会严重影响市场。但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资深IMF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市场正在揣测印度尼西亚领导高层对这个计划有多认真，尤其是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篇报道接着又预测，IMF将扣住数百亿美元的承诺贷款来惩罚印度尼西亚。报道刊出后，印度尼西亚货币立即直线坠落，在一天内贬值25%。

受到重大打击的苏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帮我找了解当前情势的经济学家吗？”媒体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如此哀求。苏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找了许多位。在保证最后阶段的IMF谈判会顺利进行后，苏哈托把掌权早期曾经重用、但年老时逐渐疏远的柏克莱帮重新找回来。经过这么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莱帮重掌大权，由已经70岁、在印度尼西亚人称“柏克莱帮校长”的尼蒂萨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领导。“在情势大好时，尼蒂萨斯卓和那些经济学家被打入冷宫，苏哈托只听从亲信的话。”苏哈托昔日的部长萨德利说(Mohammad Sadli)解释说：“这群技术官僚在危机期间发挥了最大作用，苏哈托暂时对他们言听计从，并命令其他部长闭嘴。”但尼蒂萨斯卓团队的一位成员说，和IMF谈判需要的绝不只是讲道理的学者，“不像思想论辩，对方不会施加压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几乎所有想得到的——总共140项“调整计划”。

IMF火上添油

对IMF来说，这场危机进行得一帆风顺。在不到一年间，它谈判成功的经济大改造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最后它已准备要面对这种改造戏码的考验时刻：宣布，也就是终于要对饱受震撼的大众公开这个锱铢必较、字字斟酌的主题了——就这个例子来说，重点是全球股市和外汇市场。如果一切顺利，当IMF拉开最新创作的布幕时，前一年逃离亚洲的热钱将急着回流，抢进亚洲小龙现在又魅力难挡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但情势的发展却非如此：市场反而开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认为小龙已无可救药，必须从最根本重新改造，那么亚洲的情况显然比所有人以前担心的还严重。

因此钱非但没有回流，交易商对IMF重大宣布的反应是立即撤出更多钱，以及进一步攻击亚洲货币。韩国每天流失十亿美元，债信被降到垃圾债券等级。IMF的“帮忙”已把危机变成灾难。或者，照当时已经向国际金融机构公开宣战的萨克斯说的：“IMF不但没有灭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的机会主义在亚洲造成的人力损失，与在俄罗斯不相上下。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在这段期间丢掉工作的人数高达惊人的2400万人，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从4%飙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国每天损失2000个工作——一个月6万个。在韩国，每个月遭解雇的员工有30万人——主要因为IMF毫无必要地要求削减政府预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在两年内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亚洲这些国家消失的就是当初为此区造就“奇迹”的事物：为数众多且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在1996年，63.7%的韩国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到1999年，比率已剧降到38.4%。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这段会被华尔士称作“计划性悲剧”期间，有2000万人沦为贫民。

每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有一则痛苦牺牲与拙劣决策的故事。和绝大多数例子一样，女性和儿童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许多菲律宾和韩国的农村家庭贩卖女儿给人口贩子，带她们到澳洲、欧洲和北美从事性交易。在泰国，政府卫生官员报告，雏妓在短短一年内增加20%——这是实施IMF改革后的一年。菲律宾也发现相同的趋势。“景气好时富人受益，危机时却是我们这些穷人付出代价。”泰国东北部一位小区领导人说，她在丈夫失去工厂的工作后，被迫送女儿去做捡破烂的工作。“甚至我们有限的求学和医疗机会，现在也逐渐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访问泰国时，觉得应该斥责泰国人从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奥尔布赖特以充满道德勇气的语调说：“女孩不应被剥削和虐待，并暴露在艾滋病风险下。反抗是极其重要的事。”她显然觉得这么多泰国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访问中表达“强烈支持”的节约政策没有任何关联。这与弗里德曼当年表达对皮诺切特违反人权的不满，同时又赞扬他们大胆拥抱经济休克治疗如出一辙。

在废墟中搜括

亚洲危机的故事通常说到这里就结束——IMF尝试帮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的内部稽核也得到这个结论。该基金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总结说，结构调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计划建议并不完善”，同时“似乎已多过必要的范围”，且“对解决危机并非绝对重要”。它也警告，“危机不应该只因为很适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为寻求长期改革目标的机会，不管它们的好处有多合理”。*内部报告有一个措词特别强烈的章节，指控IMF被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蒙蔽，以致认为资本控制的体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场未以理性和稳定的方式影响世界资本的说法被视为邪说，那么考虑资本控制就变成了道德的罪恶。”

*因为某些原因，这份严厉批判的报告直到2003年才出炉，危机已经过了5年。到这时候，对危机机会主义发出警告已经迟了一些；IMF已经在阿富汗实施结构调整，同时正拟定伊拉克的计划。

当时很少人肯承认的是，虽然IMF确实辜负了亚洲的人民，但它：却并未辜负华尔街。IMF的极端措施可能吓走了热钱，但大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大受鼓舞。“当然这些市场极为动荡，”伦敦安石投资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说，“那是让它们特别有趣的原因。”这些追求乐趣的公司了解，IMF的“调整”结果是，几乎亚洲的一切东西现在都等着变卖；而市场愈惊慌，更多走投无路的亚洲公司就会出售，把价格压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说，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压迫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要感谢IMF。

究竟IMF是否预先计划加深亚洲的危机，或只是鲁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个引起辩论的话题。也许最宽容的解释是，IMF知道它稳赢不输：如果它的调整导致新兴市场的股市又吹起另一个泡沫，将带来许多利益；如果这些调整刺激更多资本外流，这对秃鹰资本家则是大丰收。不管哪一种，IMF面对大崩盘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稳地掷骰子。现在已经很清楚谁赢了这场赌博。

IMF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后两个月，《华尔街日报》注销一篇以“华尔街清理亚太灾后现场”为题的文章，报道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数家知名的银行，“已派遣大队银行家到亚太地区搜寻证券经纪商、资产管理公司，甚至于银行，以便以低价并购。亚太并购机会的搜括极为急迫，因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为首的许多美国证券公司，把海外扩张列为第一要务”。数桩大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美林买下日本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国一家大证券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则以极低的折扣价格拿下曼谷投资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购起亚汽车(Kia Motors)部分股权，而旅行家集团(Traveler Group)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买下韩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和数家别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罗门美邦这段期间负责建议公司并购对象的国际监事会主席是拉姆斯菲尔德(1999年5月获任用)。切尼也是理事会成员。另一个赢家是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总统和前部长辞职后的安身处所而闻名，顾客从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前英国首相梅杰到担任顾问的老布什，洋洋大观。凯雷利用高层关系抢下大宇(Daewoo)的电信部门、双龙信息通讯(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韩国最大科技公司之一)，并成为一家韩国大银行的大股东。

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贾登(Jeffrey Garten)预测，等IMF的计划完成后，“亚洲的面貌将大大不同，美国公司在新亚洲的布局将更深入，更四通八达”。他不是开玩笑。在两年内，亚洲的许多面貌已大为改观，数百家当地银行

被国际大银行取代。《纽约时报》形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商业周刊》则称为“买企业市集”。事实上，它只是9.11事件后灾难资本主义将变成市场标准的预览：一个可怕的悲剧被利用来让外国公司入侵亚洲。它们在那里不是为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竞争力，而是要攫取几十年来由韩国公司建立的整个规制、劳动力、顾客群和品牌价值，而且往往采取拆解、缩小编制或完全关闭它们的方式，以便为自己的进口产品铲除竞争。

例如，韩国企业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门，庄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药部门，奇异(GE)则买下照明部门。几年后，大宇集团过去十分壮盛、估价高达60亿美元的汽车部门，被以区区4亿美元卖给通用汽车(GM)——比起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盗窃规模毫不逊色。不过，不同于俄罗斯发生的状况，本地企业是被跨国公司所掠夺。

其他从亚洲危机分食到大饼的重量级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鲁(Interbrew)和诺华(Novartis)、家乐福(Carrefour)、特易购(Tesco)和易立信(Ericsson)。可口可乐以5亿美元买下一家韩国装瓶厂；宝洁(Porcter and Gamble)买下一家韩国包装公司；日产买下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汽车公司。奇异拿下韩国电冰箱制造商LG的控制股权；英国的电力发动公司(Powergen)吞并韩国大型电力与天然气业者LG能源(LG Energy)。据《商业周刊》，沙特阿拉伯亲王阿华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喷射机，奔走于亚洲各地寻找便宜货”——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于倡言加深危机的摩根斯丹利也参与许多交易，赚进庞大的佣金。它担任大宇出售汽车部门的顾问，也负责中介数家韩国银行的私有化。

被卖给外国人的不只是亚洲的民间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东欧的危机一样，亚洲危机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务以筹措迫切需要的资金。美国政府——开始就热切期待这种效应，并表现在强调国会应授权拨出庞大经费给IMF以用于改造亚洲，美国贸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还保证IMF的协议“会为美国公司创造新商机”；亚洲将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门的私有化——包括能源、运输公共事业和电信”。

果然，危机引发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国跨国公司也大赚一票。贝泰(Bechtel)拿到马尼拉东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合约，以及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si)兴建一座炼油厂。摩托罗拉取得韩国Appeal电信的全部股权。纽约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国国营天然气业者汽电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印度尼西亚的水系统被英国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与法国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个大电力厂计划。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分别收购马来西亚以及韩国邮政的大股。加拿大贝尔(Bell Canada)分到韩国电信业者韩松(Hansol)的一部分。

总计短短20个月内，外国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伦敦政经学院(LSE)经济学家韦德(Robert Wade)和经济顾问温纳罗索(Frank Vneroso)观察这波如火如荼的并购潮时预测，IMF的计划“预告了一波各国资产在承平时期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其规模是过去50年来世界各地所仅见”。

IMF虽然承认初期对危机的反应犯了若干错误，但宣称已很快矫正错误，并宣称“稳定”计划十分成功。亚洲的市场最后确实平静下来，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续的代价。弗里德曼在危机最高峰时曾提醒大家别惊慌，坚称“一切都会过去……等这场金融风暴尘埃落定，你们将看到亚洲恢复成长，但究竟需要一年、两年或三年，没有人能铁口直断”。

实际情况是，十年后，亚洲危机并未过去。2400万人在短短两年内失去工作，新的绝望感已深入社会，没有任何文化能轻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亚洲各地，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到雏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失业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在危机期间丧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裁员持续进行，因为外国企业主要求他们的投资要得到更高的获利。自杀率也未见下降：在韩国，自杀现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机前自杀率的两倍多，每天有38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IMF称为“稳定计划”的政策未被说出的故事。称“稳定计划”就好像国家是在市场惊涛骇浪中的船，它们最后确实稳定下来，但新的平衡是靠着把数百万人抛到船外得来的：公共部门的员工、小企业主、低收入农户、工会

运动者。“稳定”的丑陋秘密是，绝大多数人从未再爬回船上。他们沦落到现在住了超过十亿人的贫民窟；他们沦落到娼馆，或货船的货柜里。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人”。

IMF要求在亚洲施行正统主义的受害者还不只这些人。在印度尼西亚，我1997年目睹的排华情绪持续升高，背后则有乐见注意力转移的统治阶层在煽风点火。苏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后，情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暴发动乱，许多人以华裔少数民族群为目标；大约有1200人遭杀害，数十名华裔女性被轮暴。他们也应该计人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印度尼西亚人的愤怒最后还是转向苏哈托和总统府。过去30年来，印度尼西亚人基于对苏哈托上台时血腥镇压的记忆，大致很少发生暴乱，且这种记忆因为东帝汶省份不时发生的屠杀而历久弥新。反苏哈托的怒火在这段期间一直在焖烧，但最后泼洒汽油的是IMF——讽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要求提高汽油价格。此后印度尼西亚人奋起把苏哈托推下台。

和监狱的审问官一样，IMF利用危机带来的极度痛苦粉碎亚洲小龙的意志，迫使这些国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审问手册警告说，这种方法可能用过头——加诸太多痛苦，导致非但没有产生退化和顺服，审问者面对的却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度尼西亚，那条界线似乎已经超过，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疗可能已经施用过量，引发一股从玻利维亚以至于日后伊拉克的经验里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过，自由市场十字军是反应迟缓的学生，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时。从斩获丰厚的亚洲大甩卖学到的唯一教训，似乎是对休克主义更加肯定，更多灾难即机会的证据(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它是打碎一个社会、开辟新边疆的绝佳搅拌器。危机高峰之后几年，几位知名的评论家甚至还说，亚洲发生的事尽管带来许多破坏，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济学人》评论说：“韩国需要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足以从封闭的国家转向一个拥抱外国资本、改变和竞争的国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凌志汽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他写道，并且又说：“暴露韩国的亲信资本主义，在我的书中不是危机。”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逻辑，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导弹，不是外汇交易。

亚洲危机确实证明灾难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崩溃的破坏力和西方事不关己的反应，也激发强烈的反对运动。

跨国资本的力量在亚洲肆虐，但它们激发高涨的公众愤怒，而这种愤怒最终也直接指向推动放任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构。《金融时报》在一篇平衡得异乎寻常的社论中指出，亚洲是“大众对资本主义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达到令人忧虑程度的警讯。亚洲危机向世人展现，即使最成功的国家也可能在资本突然流动下屈膝，民众对秘密的避险基金显然可以导致世界另一边的大规模贫穷感到愤怒。”

在前苏联地区，休克治疗刻意的计划性悲剧可以推给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市场民主的“痛苦转型”，亚洲危机却纯粹是全球化市场的创作。然而当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传教士到灾区时，他们想做的却是加深痛苦。

其结果是，这些传教士丧失了过去隐身幕后的安详与自在。IMF的费歇尔回忆他在谈判之初访问韩国时首尔希尔顿饭店的“喧闹气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我打开门，外面会有1万名摄影师。”根据别的报道，为了赶赴谈判进行的会议厅，IMF代表被迫“绕道从后面的门进入，其间必须上下数段楼梯，穿过希尔顿的大厨房”。在当时，IMF官员还不习惯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级旅馆与会议中心当囚犯的经验，在往后几年将成为华盛顿共识特使的家常便饭，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迎接他们。

1998年以后，要靠和平手段——透过IMF惯用的威吓或在贸易高峰会上施压——施行休克治疗式的改造已愈来愈困难。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挫败，让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绪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虽然那些大学生年纪的示威者获得大篇幅的媒体报道，真正的反抗却发生在会议中心里，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投票集团，拒绝在开放贸易上作更多退让，除非欧洲和美国停止补贴和保护自己国内的产业。

在当时，西雅图的挫败还可能被解释为政商财团主义稳定前进中的小顿挫，然而，短短几年后，情势的逆转已

不容否认：美国政府创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野心已被搁置，一套全球投资条约，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也都胎死腹中。

也许所谓反全球化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强迫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登上国际辩论的焦点。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全球没有急迫的危机来转移注意——债务震撼的威力已经消退，“转型”已经完成，而新的全球战争尚未发生。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场十字军在现实世界留下的痕迹：不平等的凄惨景况，以及一个接一个接受弗里德曼建议的政府留下的贪腐和环境恶化——他在多年前给皮诺切特的建议是，“用别人的钱行善”是个错误。

回首这段期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段资本主义再也不必与其他思想或势力抗衡的独占期，只有极为短暂的8年，从1991年苏联崩溃到1999年WTO谈判失败为止。但升高的反对并未削弱一些人追求这种暴利目标的决心；它的倡导人相信，他们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制造出更大的恐惧和混乱。

第五篇 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创造性破坏是我们的别名，在国内外都一样，我们每天摧毁商业、科学、文学、艺术、建筑、电影、政治、法律等领域的旧秩序……他们必须攻击我们以求生存，就如同我们为了完成使命而必须消灭他们。

——迈克-莱丁 (Michael Ledeen)，《对付恐怖头目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Terror Masters)

布什在牧场碰到任何问题，都用链锯解决，我认为这就是他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合得来的原因。

——布什夫人2005年4月30日在白宫记者协会晚会上的谈话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他是无情的小王八蛋，这点你可以确定。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谈拉姆斯菲尔德 1971年

恐怕我们现在一觉醒来，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处在随时随地有人监视的社会中。

——英国信息大臣托马斯(Richard Thomas) 2006年11月

国土安全产业可能刚刚到达1997年因特网投资热潮的阶段，当时你只需要在公司名称前面加上e字，你的股票初次公开发行就会飞跃上涨，现在你加上“堡垒”(fortress)这个字眼就会有相同的效果。

——格罗斯(Daniel Gross)，史雷特网站(Slate) 2005年6月

某个闷热的星期一，拉姆斯菲尔德正准备要和属下参谋谈话，他很讨厌这件事；接掌国防部长后，他更是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树立了这样的风评：姿态很高，神秘兮兮，还有大家不断抨击的傲慢自大。参谋首长的敌意可以理解，拉姆斯菲尔德踏进五角大楼后，抛弃领导和鼓励的应有角色，变成了残酷的刀斧手，部长变成了执行人事精简任务的企业总裁。

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位时，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他已经68岁了，有五个孙子女，个人财产大约有2.5亿美元，而且他在福特总统时代，就坐过同样的位置。然而，拉姆斯菲尔德无意当个传统的国防部长，不愿受到由他监督和发动的战争左右，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十多年来，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领导过好多家跨国公司，并且担任这些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经常都是经历剧烈并购和痛苦整顿的大企业。90年代里，他自认已成为新经济的代表人物，主持一家数字电视公司，在另一家前途光明的电子化企业解决方案公司担任董事，同时也是一家很有科幻小说意味的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的专利权，也拥有好几种重要艾滋病药物的专利权。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加入布什政府的内阁，他满怀雄心壮志，想要彻底改造21世纪的战争，把战争变成比较偏重心理、不偏重实质，比较好看、却比较不辛苦的事情，而且要把战争变成利润远高于过去的事业。

很多人撰文探讨拉姆斯菲尔德引发争议的“转型”计划，这个计划促使八位退休将领呼吁他辞职，最后逼迫他在2006年期中选举后下台。布什宣布拉姆斯菲尔德辞职时指出，拉姆斯菲尔德最大的贡献是这些“全面转型”计划，而不是伊拉克战争或更广泛的“反恐战争”。布什说：“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并不常成为头条新闻，但是转型引发的改革却是历史性成就。”的确如此，但是这些改革的内容如何，却总是不清不楚。

高级将领嘲笑“转型”是“空洞的口号”，拉姆斯菲尔德似乎经常决心以近乎可笑的方式，证明这些批评正确无误。2006年4月，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从以师为重点的部队，变成模块化的旅级战斗力量……从以勤务为中心的作战，变成消除冲突的战争，再变成联合作战和互相依赖，这点是难得的成就。”但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像拉姆斯菲尔德说的那么复杂，在重重艰涩术语的背后，这个计划只是想把企业界行之有年的外包与品牌革命，引进美国军中。

1990年代，很多一向自行制造产品、维持庞大而固定劳动力的公司，转而拥抱后来号称“耐吉模式”的方法：不再自己拥有工厂，而是透过大包商和小包商的复杂网络生产产品，同时把所有资源投入设计和营销。其他公司选择另一种叫作“微软模式”的方法：维持一个由入股员工所构成的紧密控制核心，展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他的一切都外包作业，从收发室的运作到程序代码的撰写无一例外。有些人把经历这种剧烈改革的公司叫作“空壳企业”，

因为这些公司大致上只是形式，没有剩下多少有形的内容。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美国国防部需要同样的整顿；他到五角大楼上任时，《财富》杂志说得好：“总裁先生打算在国防部里，同样展开他在企业界推行极为顺利的改革。”其中当然有一些不同。企业可以摆脱受到地域限制的工厂和专职员工，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在这方面，军队可以摆脱大量常备部队，由小规模核心幕僚取代，支撑幕僚的是由后备部队和国民兵构成的较低成本临时部队；同时，利用“黑水”(BlackWater)和“哈利伯顿”(Halliburton)之类的国防承包商，负责执行各种任务：从高风险运输、讯问人犯、供应伙食到医疗，无一不包。企业把节省的劳工成本投入设计和营销，拉姆斯菲尔德则希望把减少兵员和坦克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民间部门提供的最新卫星技术以及奈米科技上。拉姆斯菲尔德谈到现代军队时说过：“我们在21世纪里，不能再思考物资、物资数量和兵力，应该优先思考速度、敏捷和精确。”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像过冬的管理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1990年代末期，彼得斯宣称，企业必须决定“要当纯脑力的玩家，还是要当笨重物品的供货商”。

在五角大楼中一向举足轻重的将领们全都了解：打仗时，“物资”和“兵力”仍然很重要。他们很快就对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空壳化”设想深恶痛绝。拉姆斯菲尔德上任才七个多月，就得罪了极多有力人士，因此传言纷纷，说他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召开罕见的五角大楼参谋“荣誉团结会”。大家立刻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要宣布辞职？是不是想来一场精神讲话？还是为了补救？想对顽固派宣扬转型？一位参谋告诉我，那个星期一早上，几百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参谋走进礼堂时，“充满了好奇观望的气氛，大家的感受是：看你要怎么说服我们？因为大家已经对他满怀敌意”。

拉姆斯菲尔德进场时，“我们客气地站起来、再坐下去。”大家很快就知道，这次会议不是宣布辞职，也绝对不是精神讲话，却可能是美国国防部长所发表过最怪异的一次演说，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严重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计划的堡垒，由具有支配性的五年计划所规范。这个敌人试图把自己的要求，从某国首都贯彻到各个时区、大陆、海洋和其他地方。这个敌人极为一贯，不但扼杀自由思想，更粉碎新的观念。它瓦解美国的国防，威胁军中袍泽的生命。

这个敌人听起来可能像前苏联，但是前苏联已经消失。我们现在的敌人比较精明、比较难以安抚、离我们的家园比较近。这个敌人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

拉姆斯菲尔德表现演说技巧之际，听众的脸孔变得铁青。他们大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献身军旅，不能了解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被人比喻成共产党。拉姆斯菲尔德还没说够：“我们认识这个敌人，我们了解这种威胁，我们必须以对抗死敌所需要的坚定决心，对付敌人，和敌人周旋……我们今天要对官僚宣战。”

拉姆斯菲尔德达成了目的，他不但把五角大楼说成是美国的严重威胁，也对他任职的机构宣战，听众呆住了。那位参谋告诉我：“他说我们就是敌人，敌人就是我们，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为国效劳。”

拉姆斯菲尔德不是想替纳税人省钱，他刚刚要求国会把预算增加11%；他是遵循反革命的政商财团主义原则，也就是要大政府和大企业联手把资金重新往高层分配，他希望减少用在人员身上的开支，把多出很多的公款直接转移到民间企业的金库。拉姆斯菲尔德就根据这种理念，发动了他所谓的“战争”：每个部门的人员都必须减少15%，包括“世界各地每一个基地的总部大楼，这不只是规定，也是好主意，我们一定要做到”。

他已经下令高级幕僚“评估整个国防部，找出哪些功能可以透过商业外包做得更好、更便宜”。他想知道“为什么国防部是少数几个还自己印支票的部门？外面已经有经营良好的整个仓储管理业，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拥有和管理这么多仓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里，为什么还自己收垃圾、擦地板，而不是像很多企业一样，把这些工作外包？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把更多的计算机系统支持业务外包办理”。

他甚至攻击军方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也就是军人医疗。他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军医？“部分医疗需求，尤其是可能涉及一般医疗、或是与战斗无关的专科医疗，由民间部门提供，可能比较有效。”至于军人与军眷的住宅，当然可以由“公私合作”的方式提供。

国防部应该把重点放在核心能力“打仗”上，但是在所有其他领域中，都应该寻找能够“有效能、有效率提供这

些非核心活动的供货商”。

拉姆斯菲尔德演说完后，五角大楼很多参谋抱怨说，拉姆斯菲尔德把军队大胆外包的设想只有一个障碍，就是美国宪法中的一小部分条文——宪法清楚说明国家安全是政府的职责，不是民间企业的职责。我的消息人士告诉我：“我想这场演讲会让拉姆斯菲尔德丢掉工作。”

实际上并没有，很少媒体报道他对五角大楼宣战的消息，因为他这场争议性演讲的发表日期是2001年9月10日。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9月10日的晚间新闻中，以“国防部长对五角大楼官僚宣战”为题，简短报道这则消息，结果变成了奇怪的历史性注脚。隔天早上，CNN将会报道国防部遭到真正的攻击，造成五角大楼125位员工死亡，110位员工重伤，不到24小时前，拉姆斯菲尔德才把他们描述成国家的敌人。

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原型灾难资本家

拉姆斯菲尔德早已为人忘却的这场演说，其核心观念与布什政权完全相同：政府的职责不是治理，而是把任务转包给比较有效能、通常也比较优异的民间部门。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清楚，这种任务不像削减预算那么平凡，对拥护这种信念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圣战，重要性可以媲美击败共产主义。

布什团队就任前，80和90年代的民营化热潮(受到克林顿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全力拥护)已经成功将很多部门的公有大型企业卖掉或外包经营，涉及的企业涵盖供水、电力、公路管理与垃圾收集。砍掉国家的这些手足后，剩下的就是“核心”，也就是跟治理的概念最紧密相连的一些功能，包括军队、警察、消防、监狱、边境管理、秘密情报、疾病控制、公立学校系统与政府官僚机构的管理；把这些交给民间企业处理，将对国家的意义带来相当大的挑战。然而，民营化热潮初期创造了极大的利润，很多公司吃下国有事业后，继续虎视眈眈，贪婪地看着国家的这些基本功能，当成下一步快速致富的来源。

到了9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要打破“核心”不能民营化的禁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只不过是现状的合理延伸。就像俄罗斯的油田、拉丁美洲的电信事业和亚洲的产业，为90年代的股市带来超高利润，现在美国政府应该扮演这种核心经济角色；因为反民营化和反自由贸易的怒火在发展中世界迅速蔓延，关闭了其他成长管道，美国政府的这种角色变得更为重要。

这股推力把休克治疗带入自我指涉的新阶段。在此之前，灾难和危机发生后被利用来推动激烈的民营化计划，但是有能耐创造和因应巨变的机构仍是公共控制的最后堡垒，像是军队、中央情报局、红十字会、联合国、负责紧急“优先反应”的机构等单位。现在这些核心部门即将遭到吞噬，过去30年所发展出的危机利用方法，现在用来推动“灾难创造与反应”基础建设的民营化。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也进入了后现代阶段。

如此创造出来的只能说是民营化警察国家，最先锋的推手正是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与布什本人。

拉姆斯菲尔德把“市场逻辑”运用在美国军队的想法，起源于40年前。196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经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研讨会，跟弗里德曼培养出特别亲密的关系。拉姆斯菲尔德30岁当选国会议员后，弗里德曼把这位少年得志的共和党人纳入门下，协助他发展出大胆的自由市场政见，教导他经济理论。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都很亲密，拉姆斯菲尔德每年都会参加由传统基金会主席傅尔纳(EdFeulner)举办的弗里德曼生日庆典。弗里德曼90大寿时，拉姆斯菲尔德谈到自己的恩师说：“弗里德曼与众不同，我跟他在一起谈话时，觉得自己比较聪明。”

双方互相欣赏，拉姆斯菲尔德致力推动市场解除管制，弗里德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甚至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向里根大力推荐，要里根提名拉姆斯菲尔德为竞选伙伴，而不是提名老布什；而且他一直不谅解里根漠视他的建议。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里根选择布什当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事实上，我认为这不但是他

在选战中最糟糕的决定，也是他总统任内最差的决定，我属意的候选人是拉姆斯菲尔德，要是他选择了拉姆斯菲尔德，我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会继里根之后出任总统，令人难过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就绝对不会出现。”

拉姆斯菲尔德错过担任里根竞选伙伴的机会，转而投身于欣欣向荣的企业生涯。他担任国际制药与化学大厂席尔制药公司(Searle Pharmaceuticals)总裁，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确保备受争议而利润极为庞大的阿斯巴甜(aspartame)申请案获得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核准，以NutraSweet为名上市；拉姆斯菲尔德担任中间人，把席尔制药卖给孟山都化学公司时，个人大约赚了1200万美元。

这笔高价交易确立了拉姆斯菲尔德有力企业掮客的地位，使他成为席尔(Sears)与家乐氏(Kellogg'S)等绩优公司的董事。同时，国防部长的资历，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产体系”企业的宠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飞机制造商湾流公司(Gulfstream)董事，也以19万美金的年薪担任瑞士工程巨擘艾波比公司(ASEA Brown Boveri)董事。这家公司被人揭发它把铈的生产方式在内的核能科技卖给朝鲜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受到外界关切。那笔核能反应器的买卖是在2000年成交，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艾波比公司中唯一的美国董事；他宣称自己不记得董事会讨论过核能反应器的交易，但是公司坚称“曾经把这个计划告诉董事”。

1997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生物科技企业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董事长，确立了原型灾难资本家的地位。这家公司取得了克流感(Tamiflu)的专利，这种药可治疗多种流行性感冒，也是大家偏爱的禽流感用药。*如果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禽流感爆发(或是可能爆发)，各国政府一定会被迫向吉利德科学购买这种药品，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克流感已经变成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药品，愈来愈多的病历报告指出，服用这种药的年轻人会变的神思昏乱、妄想、幻想和偏向自杀。2005年11月到2006年11月间，全世界一共有25个跟克流感有关的死亡案例，美国现在开立这种药品时，都要加上健康警告，告诉病人“这种药具有致残与昏乱的风险”，敦促病人“密切注意不寻常行为的迹象”。

公共卫生紧急灾变的治疗药品和疫苗能否申请专利，一直是争议性很大的问题。美国曾有几十年都没有流行病，但是1950年代中期，小儿麻痹爆发成大流行时，靠着疾病获取暴利的伦理争议引发激烈辩论。美国当时有将近6万个小儿麻痹病例，家长们吓得要死，担心自己的子女染上这种会让人残障而且经常会致命的疾病，专家们拼命寻找治疗药品。1952年，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科学家沙克(Jonas Salk)找到了救命良方，发展出第一种小儿麻痹疫苗，他没有为这种救命的药品申请专利。沙克告诉广播记者莫洛：“这种药不会有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

我们可以确信，如果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拉姆斯菲尔德一定早就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申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任职的吉利德科学公司也拥有四种艾滋病药品的专利，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阻止这些救命药品的学名药版本(generic drug, 编按：专利期过后，非原厂生产的相同药品，主要成分相同，但价格较便宜)在发展中国家流通。这件事是美国公共卫生行动主义者打击的目标，他们指出，吉利德是靠着纳税人的捐款，发展出一些重要药品。吉利德却认为，流行病药品是成长市场，还积极发动营销攻势，鼓励企业与个人囤积，以防万一。拉姆斯菲尔德再度进入美国政府任职前，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种热门的新产业，甚至协助成立了好几档私募基金，专门投资生物科技与制药业者。这些公司图谋将来会爆发可怕疾病，到时候政府会被迫以最高价，购买民间部门拥有专利的任何救命产品。

切尼是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政府任职时栽培的爱将，他也根据“悲惨未来是获利展望”的理念而赚到大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认为瘟疫是发财的市场，切尼却以战争的前景为基础。切尼在老布什总统麾下担任国防部长时，裁减战斗部队的人数，大幅提高对民间包商的依赖。他找上总部设在休斯敦的跨国企业哈利伯顿公司，以及该公司旗下的工程部门布朗鲁特公司(Brown & Root)签约，要他们找出美军执行的任务中有哪些可以由民间代劳，还能从中获利。不出所料，哈利伯顿真的找出民间企业可以代劳的所有工作，这些发现促成了五角大楼发出大胆的新合约，也就是民间支持后勤计划(LOGCAP)。五角大楼和武器制造厂商的合约动辄数十亿美元，早就臭名在外，但是上述合约前所未见：这不是供应军方设备，而是担任军方运作的经理人。

国防部选择性地邀请一些企业，要他们提案为美国军事任务提供非限定的“后勤支持”，这可真是极为笼统的任务描述。此外，合约上没有规定金额，得标厂商只是得到承诺，不管厂商为军方做了什么事情，成本都会由五角大楼负责，加上保证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成本附加”合约。这时是1992年，正是老布什政府执政末期，赢得合约的公司不是别家，正是哈利伯顿公司。诚如《洛杉矶时报》记者米勒(T. Christian Miller)所说，哈利伯顿“击败另外36家竞标厂商，赢得五年合约，或许这点不足为奇，因为草拟计划的公司就是哈利伯顿”。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哈利伯顿在1995年聘请切尼出任新领导人。哈利伯顿旗下的布朗鲁特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军的承包商，但是哈利伯顿在切尼的领导下，角色急速扩大，甚至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切尼主持五角大楼时，哈利伯顿和他签订这款用词不够精确的合约，得以扩张和扩大“后勤支持”的意义，到最后变成负责为美军的海外任务创建整个基本结构。军方只需要提供兵员与武器，从某方面来说，军方变成了表演者，哈利伯顿却是节目主持人。

其结果是在巴尔干半岛首次展现的麦当劳式军事体验：军队派驻国外像是危险的重武装度假之旅。哈利伯顿的发言人解释说：“士兵抵达巴尔干时，最先招呼他们的是本公司的员工，最后跟他们挥别的也是我们的员工。”这段话听起来使哈利伯顿更像邮轮之旅的主办人，而不是军方后勤协调官。这点正是哈利伯顿与众不同的地方：切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战争变成美国服务业经济获利丰厚、欣欣向荣的业务；好比带着微笑侵略他国。

克林顿派出了1.9万名士兵进驻巴尔干半岛，美军基地纷纷设立，就像完全由哈利伯顿兴建与管理、设有门禁的干净郊区迷你城市。哈利伯顿决心把国内所有方便的生活设施都提供给军队，包括快餐店、超级市场、电影院与高科技健身中心。有些高级军官疑虑军队在购物中心花太多时间会影响军纪，但是他们自己也喜欢这些额外福利。一位高级军官告诉我：“哈利伯顿提供的一切都好得很，因此我们没有怨言。”就哈利伯顿来说，让顾客满意是好生意，保证会得到更多的合约，而且因为利润是根据成本的一定百分比计算，成本愈高，利润就愈高。“别担心，这是用成本加成计算的”这句话，是在巴格达绿区才发扬光大、变成名言，但奢侈的战费支出是克林顿时代所开创。切尼只在哈利伯顿任职五年，却把公司向美国财政部收取的费用几乎增加一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23亿美元，同时，哈利伯顿接受的联邦贷款与贷款保证金额增加了15倍。他的努力得到很高的报酬，就任副总统前，“估计自己的财产有1800万美元到8190万美元之间，其中包括约值6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的哈利伯顿股票……整体而言，切尼得到126万股的哈利伯顿公司认股权，其中10万股已经执行，76万股符合赎回规定，166667股在2000年12月生效”。

对切尼来说，把服务业经济推展到政府的核心是家族事业。1990年代末期，他把军事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的郊区住宅时，他太太林恩(Lynne Cheney)担任世界最大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董事，除了领取薪水之外，还赚到认股权。林恩从1995到2001年间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时间正好是洛克希德这类公司转型的重要期间。冷战已经结束，国防经费减少，这些公司因为几乎全部进账都来自政府的武器合约，现在需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洛克希德和军火商同业发展出一种策略，积极争取一种新形态的工作：代管政府并从中牟利。

19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开始接管美国政府的信息科技部门，维护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一大部分数据管理工作。洛克希德在这方面的业务极为深入，以至于到2004年，《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并非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运作，但是美国有极高的比率。是由该公司协助经营……洛克希德帮你分信，计算你的税额，开社会安全支票，计算美国的普查数据，管理太空飞行，监督空中交通，为了管理这一切，洛克希德撰写的计算机程序码比微软还多。”*

*这段期间里，所有生产武器的大公司都打进管理政府的事业。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供应军方信息科技，其中包括供应生物特征身份辨识科技；该公司赢得圣地亚哥郡6.44亿美元的合约，负责管理该郡所有信息科技，这是历来最庞大的类似合约。圣地亚哥郡对计算机科学公司的表现不满，没有续约，却把合约交给另一家生产武器的大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也就是B-2隐形轰炸机的制造商。

这就组成了影响力十足的夫妻搭档：切尼主持哈利伯顿，接管国外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林恩在国内协助洛克希德，接管政府的日常管理。偶尔夫妻会直接竞争，1996年，德州宣布开放企业竞标德州福利计划的运作管理(这个五年期的合约价值高达20亿美元)，洛克希德和切尼担任董事的信息业巨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都竞标这个合约。最后克林顿政府出面干预，阻止招标。克林顿政府通常热心支持外包的做法，却认为决定谁有资格接受福利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不适合民营化。洛克希德和电子数据系统公司都大声抗议，德州州长布什也一样抗议，布什认为福利制度民营化是非常好的构想。

布什担任州长，并没有多少出色表现，但是他在某个领域领先群伦，那就是把人民选他出来负责的各项政府治理功能分配给民间企业，尤其是跟安全有关的功能，从这里已经可以预见他不久之后将发动的民营化反恐战争。在他的监督下，德州民营监狱的数目从26处，增为42处，以致《美国展望》杂志(American Prospect)把布什治理的德州，称为“世界民营监狱产业之首”。1997年，联邦调查局针对离休斯敦40英里的布瑞索里亚郡(Brazoria County)一处监狱展开调查，因为本地电视台播出一卷录像带，显示监狱警卫踢打未加反抗的囚犯的下体，用休克枪射击囚犯，而且放狗咬囚犯。录像带里施暴的警卫中，至少有一位穿着重度矫正资源公司(Capital Correctional Resources)的制服，这家民营公司和政府签约，负责供应此处监狱所需要的警卫。

布什对民营化的热情完全没有受布瑞索里亚事件的影响。几星期后，他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智利期间负责社会安全民营化的部长皮涅拉见面时，似乎有了顿悟。皮涅拉这样描述他们的会面：“根据他的专注程度、身体语言和提问，我立刻知道布什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初衷：社会安全改革可以用来提供美好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创造工人资本家的天地，人人自负盈亏的社会……他极为热心，以致会晤结束时，他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到佛罗里达州，把这一切告诉我弟弟，他也会喜欢这种观念。”

这位未来的总统决心把州政府的功能标售出去，配合切尼主导军方的外包，以及拉姆斯菲尔德为能够预防传染病的药品申请专利，已能看出这三个人合力建构的国家会是什么面貌：一个极度空洞的政府。虽然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没有把这么激烈的计划当成核心政见，却在总统选战期间，暗示过这种设想。“有几十万专职联邦公务员的工作，都可以由民间企业代劳，”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表示，“我会尽量把这些工作发出去公开竞标，如果民间部门能够做得更好，应该让民间部门取得合约!”

9·11与行政部门反扑

布什和内阁2001年元月就职后，美国企业更迫切需要新的成长来源。科技泡沫已经正式破灭，布什政府就任的头两个半月里，道琼指数暴跌824点，布什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大力支出，用公共工程刺激经济，使经济走出衰退。布什的解决之道是解构政府，一方面用减税，另外一方面用利润丰厚的合约，大块、大块地砍掉公共财富，喂饱美国企业。布什的预算管理局长、智库理论家丹尼尔·米尔斯(Mitch Daniels)宣称：“政府的责任不是提供服务，而是要确保有人提供服务，这想法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这种说法也包括灾难的因应。布什任命共和党党工欧尔鲍(Joseph Allbaugh)出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署长，欧尔鲍谈到自己的新职时说，这个负责应对包括恐怖攻击等灾难的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授权计划”。

接着便发生了9·11事件，突然间，若说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要自我了断，似乎变得十分不合时宜。恐怖攻击造成人民惊恐，希望得到强而有力的政府保护，很可能在布什推动政府空洞化计划之际，打断布什的如意算盘。

有一阵子情形似乎就是这样。恐怖攻击10天后，弗里德曼的老友、传统基金会主席傅尔纳率先说出了一句意义重大的话：“9·11改变了一切。”很多人自然以为，改变的一环应该是重新评估反国家的激进目标，傅尔纳和他的意识形态伙伴30年来，一直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推展这种目标。然而，9·11恐怖攻击的本质是安全上的缺失，暴露出20多年来侵蚀公共部门，把政府功能发包给营利事业的恶果。就像水淹新奥尔良暴露了公共建设残败不堪的情况一样，恐怖攻击也揭开了大家放任国家衰弱到危险程度的真相：纽约市警察和消防队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在救难途中当机，飞航管制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飞机脱离航线，攻击分子顺利通过由约聘员工驻守的机场安全检查关卡，这些安检人员当中，有些人的待遇还不如机场美食广场的员工。

弗里德曼式反革命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里根总统攻击飞航管制人员工会，解除民航业管制。20年后，整个空运系统已经民营化，管制完全解除，规模缩减，绝大部分的机场安全工作由待遇低落、训练不足、不属于工会的约聘人员负责。9·11攻击后，交通部负责安全检查的局长作证说，负责航班安全的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大力克扣员工。他告诉布什任命的9·11委员会：“这种压力进而表现在安全的严重缺失上。”一位资深联邦航空局安检官员在9·11委员会中作证说，航空公司对安检的做法是“责备、否认、延误”。

9月10日前，只要机票便宜，供应充分，这些事情似乎都无关紧要。但是9月12日后，叫时薪6美元的约聘人员负责机场安全检查似乎过于随便。接着到了10月，有人把装了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给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引发了可能爆发大规模炭疽热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的民营化看起来又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一家民营药厂独享生产炭疽热疫苗的权利？联邦政府用外包的方式，是否放弃了保护大众不受重大公共卫生急难侵害的责任？大家说的这家民营化药厂拜波公司(Bioport)当时没有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甚至没有得到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营销疫苗的授权，这对整个情势更是火上加油。此外，如果像媒体所报道的一样，炭疽热、天花和其他致命病原菌可以透过信件、食品供应或供水系统传播，那么布什继续推动邮政服务民营化的计划，到底是不是好办法呢？遭到裁员的食物与供水检验人员，会有人请他们回来重新任职吗？

安然公司之类的新弊案爆发后，大家对亲企业共识的反弹更是加强。9·11攻击后三个月，安然宣布破产，导致成千上万的员工丧失退休储蓄，高级经理人却早已根据内线消息出脱股票，换到满手现金。这场危机导致大众对民间企业提供基本服务的信心直线下坠，安然操纵能源价格因而导致几个月前加州大规模停电的消息传出后，更是如此。高龄90的弗里德曼极为担心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卷土重来，甚至抱怨说：“企业家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变成二等公民。”

总裁的地位下坠之际，属于工会的公共部门劳工(弗里德曼反革命中的坏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9·11攻击后的两个月内，大众对政府的信心升高到196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照布什对一群联邦政府员工的说法，这种情形是“因为你们善尽职责”造成的。9·11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是负责第一线反应的下级公共部门员工，包括纽约消防队员、警察和救难人员，其中有403名因为努力疏散世贸中心大楼、协助受害者而丧失生命。突然间，美国人对所有穿制服的同胞又敬又爱，政客努力配合这种新情势，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戴上代表纽约警察和纽约消防队员的棒球帽。

9月14日，布什在顾问所说的“表扬时刻”，跟消防队员和救难人员站在恐怖攻击原点，拥抱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决心摧毁、属于工会的公务员。他当然必须这样做(那一阵子连切尼都戴上安全帽)，但是他不必做得让人这么信服。布什的真实感觉，加上公众欲求一位符合当时情况的领袖，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布什说出政治生涯中最动人的演说。

攻击发生几星期后，布什大肆巡视公共部门，到公立学校、消防队、纪念馆、疾病控制中心去拥抱公务员，感谢他们的贡献和发自内心的爱国心。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指出“我们找到了新英雄”，他不只表扬紧急服务人员，同时也称赞教师、邮局员工和医疗工作人员。在这些场合中，他对从事公益活动的尊敬和褒扬，升高到40年来美国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突然消失，布什总统在每一场演说中，都宣布一些大胆、新颖的公共计划。

攻击发生11天后，《华盛顿邮报》的哈里斯(John Harris)和米尔班(Dana Milbank)信心十足地宣称：“经济低迷再加上反恐新战争的迫切性，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布什总统施政目标的哲学内涵，上任时自称是里根意识形态传人的总统经过九个月后，变成了比较像是罗斯福总统的继承人。”他们进一步指出：“布什正在推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防止经济衰退，他说经济疲弱不振，需要政府支出巨额资金，刺激经济：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也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核心理念。”

图利企业的新政

除了公开宣传和媒体造势之外，布什和他的小圈圈无意改采凯恩斯主义。他们削弱公共领域的决心根本没有动摇，9·11攻击凸显的安全缺失，再度证实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牢不可破(而且自私自利)的信念：唯独民间公司拥有应付安全新挑战的情报与创新。白宫确实准备动用纳税人的巨额税款刺激经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钱绝对不会依据罗斯福总统的模式动用。布什的新政反而完全嘉惠美国企业，每年直接把数千亿美元的公款，交到私人手里；这些钱会以合约的方式移转，很多合约是私相授受，未经竞标，几乎也没有任何监督，就交给由众多产业构成的庞大网络，包括科技、媒体、传播、监禁、工程、教育与医疗产业。*

*合约不经过竞标就发包出去，是布什时代的明显特征。《纽约时报》2007年2月刊出一篇分析，指出“所有‘合约作为’，也就是新合约以及依据现有合约支付款项，如今不到一半有经过完全公开的竞标；2005年时只有48%，远低于2001年时的79%。”

事后回想，9·11攻击之后大众茫然不知所措的那段期间，正是美国本土版的经济休克治疗。布什团队是彻头彻尾的弗里德曼信徒，他们迅速利用困扰美国的这次震撼，推动激进的政府空洞化方针，从作战到灾难反应的一切行为，全都变成追求营利的事业。

这是休克治疗大胆的进化，布什团队没有采用90年代抛售现有公营事业的方式，而是为反恐战争的行为创造出全新的架构，从一开始打造就是民营的。这种做法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白宫利用9·11之后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大幅增加行政部门决策、监督、拘留与发动战争的权力，军事史专家贝齐维奇(Andrew Bacevich)把这种抓权行为叫作“进行中的政变”。然后把刚刚壮大且资金充裕的安全、侵略、占领与重建功能立刻发包外包，交给民间

部门执行并且获利。

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对抗恐怖主义，结果却创造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塑造出由国土安全、民营化战争与灾后重建组成的成熟新经济，负起：在国内外建立并经营民营化安全国家的重责大任。这种全面行动构成的经济刺激，足以填补全球化与网络公司好景破灭后留下的真空。就像因特网启动网络公司泡沫一样，9·11攻击启动了灾难资本主义泡沫。主持诺瓦毕德创投伙伴公司(Novak Biddle Venture Partners)的诺瓦(Roger Novak)说过：“信息科技产业在泡沫之后纷纷倒闭时，猜猜看谁拥有所有的资金？当然是政府。”诺瓦现在经营这家从事国土安全企业创业投资的公司，改口说：“每一档基金都看出这个宝库有多大，每一个人都在问我怎么才能分得一杯羹？”

这是弗里德曼所推动的反革命的巅峰期，几十年来，市场靠着国家的附属机构养活，现在市场准备把国家的核心给吞下去。

奇怪得很，这个过程当中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反而是宣称经济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外交或国内政策的主要动因。“9·11改变一切”的真言，巧妙地掩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企业利益服务；唯一改变的事情是现在可以轻松追求庞大的目标。现在布什政府不必把新政策送到国会，经历结果难料的公开辩论，也不必跟公共部门工会严重对立，可以利用支持总统的爱国阵线，利用新闻界心甘情愿的放弃监督，不必再讨论，可以立刻开始推动计划。就像《纽约时报》2007年2月说的一样：“少了公开辩论或正式决策的约束，包商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第四部门。”布什团队并没有用完整的计划来应对9·11为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填补公共基本建设中的漏洞，反而是为政府规定新的角色，使国家的职责变成不是提供安全，而是以市场价格购买安全。因此，2001年9月11日，攻击事件过后才两个月，国防部聚集了一批号称拥有网络公司经验的“一小群创投顾问”。这项任务是要找出“直接有助于美方投入全球反恐战的新兴科技解决方案”。到了2006年初，这个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已成为五角大楼的官方分支机构：“国防创投促进会”(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它是“相当有效的单位”，持续把国家安全情报送交有政治关系的创投金主，这些人则搜查有哪些新兴公司能制造新的监控设备与相关产品。国防创投促进会的负责人波杭卡(Bob Pohanka)说：“我们就是搜寻引擎。”根据布什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筹募开创新型战争市场所需要的资金，然后从这种创造性的市场中，购买最好的产品，鼓励产业界加强创新。换句话说，政客创造需求，民间部门供应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就这样完全利用纳税人的钱，创造出由国土安全与21世纪战争构成的繁荣经济。

国土安全部是布什政权创造的全新政府部门，它最能够清楚展现这种政府完全外包经营的模式。国土安全部研究单位的副主管亚历山大(Jane Alexander)解释说：“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产业界不生产的东西，我们就买不到。”

另一个部门是反情报活动机构(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 CIFA)，这是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时，在中央情报局之外成立的新情报机构。这个平行的谍报机构把70%的预算，外包交给民间包商，也像国土安全部一样，是以空壳的方式成立。诚如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米尼翰(Ken Minihan)所说：“国土安全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府手中。”米尼翰如同布什政府中的另外几百位高级幕僚，早就辞去公职，转而为欣欣向荣的国土安全产业工作，这个产业正是他以情报头子的身份协助创设的。

从敌人的定义到交战规则，再到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布什政权针对反恐战争范围所规定的每一点，目的都是尽量扩大战争市场的获利能力与永续经营能力。成立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中宣示：“如今恐怖分子可以随时随地，几乎用任何武器攻击。”这个说法大开方便之门，政府要求的安全服务必须随时随地提供保护，对付所有想象得到的风险。而且不见得要证明威胁是真的，才能够发动全面反应；在切尼著名的“只怕万一”想法指导下，就有理由侵略伊拉克，原因是如果某种事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成威胁，美国就必须把这种威胁当成百分之百的确定，必须反应。这种逻辑对各种高科技侦测设备厂商特别有利，例如，因为我们想到可能会遭到天花攻击，国土安全部就把5亿美元交给民间公司，发展和安装侦测设备，对付这种未经证实的威胁。

虽然这场冲突的名称多变，从反恐战争，变成反激进伊斯兰战争、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战争、第三世界战争、漫长战争，又变成世代战争，但是基本形态不变，不受时间、空间或目标限制。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广泛、没有一定形态的特点使反恐战争变成打不赢的主张，但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却是无法反驳的主张：不是可能打胜、昙花一现的战争，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中新颖而永久的一环。

这是9·11之后，布什政府向美国企业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五角大楼似乎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绝、无休无止地送出去，变成企业的营收(一年输送2700亿美元给民间包商，从布什就任以来增加了1370亿美元)；美国情报机

构为了获得外包搜集的情报，一年付给包商420亿美元，比1995年的金额增加一倍以上；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从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间，交给民间包商1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在过去的经济体中并不存在，金额比智利或捷克的国内生产毛额还多。2003年内，布什政府在发给民间公司的合约中，支出了3270亿美元，几乎占了可动用资金的40%。

华盛顿四周的郊区在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灰色的建筑，容纳安全产业的“新创企业”和“育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匆匆组成，情形就像90年代末期的硅谷一样，资金流入这些公司的速度，比摆放办公桌椅的速度还快。同时，布什政府在这种景气热潮期间，扮演任意花钱的创业投资资本家。90年代时，大家的目标是发展出杀手级应用，发展出“下一个更新的新东西”，再卖给微软或甲骨文公司，现在的目标是发展出新的“搜查与锁定”、抓住恐怖分子的科技，再卖给国土安全部或五角大楼。这就是为什么灾难产业除了创造出新创企业和投资基金外，也创造了一大堆新的游说公司。这些游说公司负责为新创公司和国会山庄上应该找的人牵线，2001年时，偏重安全事务的游说公司只有两家，但是到了2006年中，已经增加到543家。国土安全企业巴拉丁公司(Paladin)总经理史帝德(Michael Steed)告诉《联机》杂志(Wired)：“我从90年代初期就投身私募基金业务，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源源不绝的交易热潮。”

恐怖主义的市场

灾难泡沫像网络泡沫一样，以独一无二而混乱的方式膨胀。国土安全产业最初的繁荣之一，出现在监视摄影机；英国装设了420万具这类摄影机，也就是每14个国民就有一部，美国则装设了3000万具，每年拍摄的总长度大约40亿小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来看这40亿小时的片子？于是“分析软件”的新市场应运而生，这种软件业者负责扫描录像带，找出符合已建文件影像的目标(将各种安全系统连接起来，变成了若干获利最丰厚合约的来源，例如空军把价值90亿美元的合约交给好几家公司，包括历史最悠久的策略顾问业者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还有一些最大的国防包商)。

这种发展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脸部辨认软件只有在拍摄对象自行站在摄影机正前方时，才能产生正确辨识，然而，拍摄对象总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摄影机正前方，这样就创造了数字影像加强的新市场。销售分离与加强影像软件的史蒂尔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开始是向媒体公司推销这种科技产品，但是后来的发展显示，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可以赚到更多的营收。而且政府既然推动这么多的侦测活动，包括侦测电话通联记录、监听、金融记录、邮件、侦测摄影机、上网等，排山倒海的数据淹没了政府，因而开创了另一个庞大的市场，也就是信息管理与数据采矿(data mining)市场，以及宣称能够在无数文字与数字之间“建立关系”、锁定可疑活动的软件市场。

90年代里，科技公司不断宣扬没有边界的世界、信息科技力量颠覆权威政权、推倒围墙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内，信息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在这种过程中，民营电话公司与搜寻引擎全面与政府配合，行动电话和浏览网页被日渐威权化的政权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中国政府合作，锁定异议分子的位置，还是AT&T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取得监听命令的情况下，窃听顾客的通信(布什政府宣称已经没有这样做)。这个全球化的重大象征与希望：“边界消失”因此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勃然兴起的边界监视产业，监视方式从光学扫描、生物特征辨识到研议当中的美墨边界高科技围墙，不一而足，这道围墙让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合约。

高科技公司从一个泡沫跳进另一个泡沫时，产生的结果是安全与购物文化怪异的结合。今天反恐战争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威灵特系统(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llure)和选择点(ChoicePoint)销售的生物特征辨识、摄影监视、网络追踪、数据采矿等科技，都是由民间部门在9·11事件前发展出来，作为建立顾客详细数据、开启微营销新领域的方法。这些科技也可以减少雇用超级市场与购物中心的零售员工，因为生物特征辨识科技配合现金卡，就不需要柜台结账人员。大家对这种老大哥式的科技普遍不安，造成很多推展类似科技的计划停止实施，使营销人员和零售商失望。9·11解开了这个市场僵局：突然间，恐怖主义的忧虑超过生活在受监视社会中的恐惧。因此，现在从现金卡或认同卡搜集的数据不但可以当成营销数据，卖给旅行社或嘉普公司(Gap)，也可以当成安全数据卖给联邦调查局，警示“可疑的”行动电话易付卡交易和可疑的中东之旅。

财经杂志《红鲱》(Red Herring)刊出过一篇有力的文章，说明上：述计划中有一项是要判断某个有上百种拼法的名字，是否和国土安全数据库中的名字相同，借以找出恐怖分子。以穆罕默德(Mohammad)这个字为例，软件里包括穆罕默德几百种可能的拼法，可以在一秒钟内搜寻兆位的数据，功能令人惊叹，但是找错人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经常找错要找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多伦多市郊皆是如此。

这种容易出错的情况，使得无能与贪婪(这是布什时代的特征)成为：苦难的来源，从伊拉克到新奥尔良都是如此。这种电子猎捕行动的错误身份辨认，足以让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长相和名字的发音有点相像、甚至对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一无所知的顾家男人，被指认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而且把个人和组织名字列在观察名单的程序，现在也由民间公司处理，交叉比对旅客名单与数据库名单的工作，也由民间企业负责。到2007年6月，国家反恐中心保存的可疑恐怖分子名单上，已经有50万个名字。2006年11月公开的另一个计划、自动标定系统已经针对过境美国的几千万名旅客，定出“风险评估”评分。这项评分从来没有向旅客揭露过，评分的依据是商业化数据采矿所显示的可疑行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包括“旅客购买单程票记录、座位编号、常客记录、行李件数、买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订的餐点”等。被认为可疑的行为和事件都记录下来，累积成为每位旅客的风险评分。

任何人由于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证据而被列在“敌方战斗人员”名单，都可能碰到飞航旅程中断、不发美国入境签证的命运，甚至遭到逮捕，这些证据只是利用脸部辨识软件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错的名字、误解一小片段的谈话。如果“敌方战斗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因为布什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人身保护令，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在法庭上看证据，并且得到公平审判与有力辩护的权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关塔那摩，他很可能会关在哈利伯顿兴建的最高警戒新监狱里，那里共可容纳200人。如果他是中央情报局“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是在米兰街头或是在美国机场换机时遭到绑架的人，那么中央情报局会快速处理，把人送到旗下秘密监狱网络中的一处所谓的黑狱；带着头罩的犯人很可能会搭着波音737客机，客机为了这种任务，重新改装成豪华企业专机。根据《纽约客》杂志的说法，波音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旅行社”，替多达1245次引渡飞行拟定飞行计划，安排地勤人员，甚至代订旅馆。西班牙警察的一份报告解释，这项任务由波音设在圣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国际旅行计划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办理。2007年5月，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这家子公司，该公司则拒绝证实或否认这项指控。

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对侦讯人员，有些侦讯人员不是中情局或军方人员，而是民间包商的员工，根据求职网站生涯情报网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长戈登(Bill Golden)的说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报专家是为包商服务。”如果这些自由之身的侦讯人员要继续拿到利润丰厚的合约，就必须从犯人口中拿到华盛顿的雇主“可以用来起诉犯人的情报”。就像犯人遭到刑讯时，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么话都愿意说；包商也拥有强大的经济诱因，愿意采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不管信息是否可靠。(在拉姆斯菲尔德旗下的秘密特别计划局之类新机构服务的民间情报包商，能够受到布什政府这么倚重，原因之一是这些包商已经证明，他们比政府中的同类单位更愿意扭曲与制造信息，以便符合政府的政治目标；毕竟政府是他们取得下一个合约的来源。)

在反恐战争中利用市场“解决方案”的做法，还有另一种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几乎愿意付出最高的赏金，从任何人手里，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关的信息。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情报人员放话出去，说愿意付3000到25000美元的赏金，奖励大家举发基地组织(Qaeda)或神学士组织(Taliban)的战斗人员。一份美国在阿富汗散发的常见传单上说：“得到你梦想不到的财富与力量。”在律师代表几位关塔那摩犯人向美国联邦法院控告时，这张传单被拿来当成证据，上面写着：“你协助反神学士政权的部队，可以得到几百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你在余生中，照顾你的家人、村庄和部落。”

没多久，巴格拉姆(Bagram)和关塔那摩的牢房就住满了牧羊人、出租车司机、厨师和店员，根据举发他们、收取赏金的人说，这些人全都是高度危险分子。

“你对政府和巴基斯坦情报人员为什么出卖你，把你交给美国人，有什么看法吗？”军事法庭军法官这么问一位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埃及囚犯。

根据已经解密的文字记录，这位囚犯显得很怀疑，回答说：“少来了，老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巴格达，用1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条命，何况是5000美元？”

“这么说是别人出卖你了？”军法官问话时，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

根据五角大楼自己的统计，关塔那摩86%的犯人都是在奖金公布后，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斗人员或谍报人员举发的。到2006年12月，五角大楼释放了360位关塔那摩的犯人，美联社追查到其中245位，205位回到本国后，摆脱了所有的指控。这种记录等于对美国政府以市场导向辨认恐怖分子的方法所产生的情报质量，提出沉痛的控诉。

9·11之前，国土安全产业几乎不存在，只不过几年里，就爆炸性成长到远超过好莱坞或音乐产业。更令人惊异的是，还没有人把安全产业繁荣当成经济中的个别部门来分析和讨论，没有人注意到，不受约束的警察权力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形成空前未有的结合，也没有人注意购物中心与秘密监狱合而为一的事实。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胁的相关信息变成了一种产品，就和某人在亚马逊网站买哈利波特的书，或是某人参加了加勒比海游轮之旅、将来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信息一样，可以随意贩卖，这样的做法会改变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如此不但会产生刺探、刑讯并制作假情报的诱因，也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要让当初造出这整个产业的恐惧与危机感永久持续下去。

在过去，新的经济模式出现时，不论是福特的革命还是信息科技热潮，都会引发极多的分析和辩论，大家会探讨创造财富方式的巨大变化是否也会改变整个文化的运作、改变我们的旅行方式，甚至会改变我们脑部处理信息的方式。新灾难经济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广泛的讨论。大家当然辩论过“爱国法”的合法性，争辩过无限期拘留，以及刑讯与特别引渡做法的问题，但是把这些功能用商业交易方式执行的问题，大家几乎完全避不讨论。辩论的课题仅限于发战争财和贪腐丑闻的个别案例，还有政府疏于适当监督民间包商的常见困扰，很少讨论更广泛、更深入的现象，也就是参加一场完全民营化、永远没有结束之日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灾难经济偷偷避过了大家的监视。80和90年代期间，新经济以极为自豪、极为炫耀的方式自我宣传，科技泡沫尤其为新富阶级建立了前例，媒体推出无数的生活形态特写，报道年轻大胆的总裁站在私人飞机和遥控游艇旁边的样子，也报道他们在西雅图附近山间美丽的豪宅。

今天的灾难体系也创造了这种财富，不过我们却很少听说上面这种故事。200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从反恐战争开始以来，三十四大国防包商总裁领取的平均工资，是9·11之前四年的两倍。”2001到2005年间，这些总裁的平均工资增加了108%，同期内，其他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平均只增加了6%。

灾难产业的利润可能升到网络公司的水平，但是业者通常像中央情报局一样低调。灾难资本家会躲避新闻界，低估自己的财富，知道最好不要吹嘘炫耀。国土安全育成业者奇沙比克创新中心(Chesapeake Innovation)的艾斯纳(John Elstner)说：“我们不会夸耀保护大家免于恐怖攻击的巨大产业欣欣向荣，但是其中确实有庞大的业务，我们公司是其中一环。”

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美国政府隐私权法律顾问的史怀亚(Peter Swire)，说明反恐战争泡沫背后辐辏的力量时说：“政府有加强搜集情报的神圣任务，信息科技产业则迫切需要新市场。”换句话说，你面对的是政商财团主义：大企业和大政府把可怕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管制并且控制公民社会。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异、很疯狂，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钱，我认为这种说法疯狂极了，我认为你应该回学校再教育。

——老布什针对有人指控他儿子侵略伊拉克，是为了替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所做的响应

公务员和民间部门不同，公务员有义务对更大的道德效忠，有责任效忠所有人的集体最高利益，而不是效忠少数人的利益，企业有责任对股东效忠，不是对国家效忠。

——美国审计长沃克(David M. walker)，2007年2月

他分不清公益与私利的区别。

——退伍美国空军上校加德纳(Sam Gardiner)批评切尼，2004年2月

2006年期中选举正热、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美国总统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不公开的典礼中，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有一项附加条款隐藏在1400页的法条中，当时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附加条款授权总统颁布戒严令，“动用包括国民兵在内的军队”，不顾州长的意愿，应付“公共危难”、“恢复公共秩序”、“镇压”动乱。公共危难可能是飓风、群众抗议或是“公共健康急难”，可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在国防授权法立法之前，总统只有在碰到叛乱时才有权宣布戒严。

民主党参议员莱希(Patrick Leahy)的同事都忙于竞选，他成为唯一提出警告的人，他在列入公开记录的谈话中说：“利用军队执法，违反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也指出：“改变原先做法的意义极为重大，但是这种改变几乎没有经过研究，只是偷偷溜进国防授权法。无权管辖这些问题的其他委员会没有机会提出意见，更不可能针对这些立法建议举行听证会。”

除了行政部门因此获得极大的新权力，另外至少还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就是制药业。遇上任何疾病爆发，药厂可以找来军队，保障药厂和药品供应，实施检疫，这是布什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目标。对拉姆斯菲尔德过去担任总裁的吉利德科学公司来说，这是好消息，因为吉利德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克流感的专利。新法加上禽流感爆发的恐惧挥之不去，甚至可能帮助克流感在拉姆斯菲尔德离职后的绝佳表现；吉利德公司的股价在五个月里，上涨了24%。

在塑造国防授权法的条文时，产业利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我们得仔细探究。同样的，以更大的尺度来看，在布什团队一头热侵占伊拉克的行动中，哈利伯顿、贝泰、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之类石油公司等包商的利益，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动机问题不可能精确回答，因为局内人以混淆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而臭名在外，连他们自己似乎也不能划分两者之间的界线。

前《纽约时报》记者金瑟(Stephen Kinzer)在2006年出版的《推翻》(Overtrow)一书中，设法探讨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政客下令与策划外国政变背后的真正动机。他从美国参与的1893年夏威夷政权改变行动开始探讨，一直研究到2003年伊拉克的政权改变，指出其中经常有清楚的三阶段程序。第一，外国政府要求美国公司“缴税，或是遵守劳动法或环境法，有时候这家公司会遭到收归国有，或是必须出售部分土地或资产”，外国政府因而威胁到这家美国跨国公司的获利。第二，美国政客听到这家公司遭到挫折的消息，并将之重新阐释为对美国的攻击：“他们把经济动机变成政治或地缘策略动机，假定任何政权找美国公司的麻烦，或是骚扰美国公司，一定都是反美的、镇压的与独裁的，很可能是希望削弱美国的某些外国势力或利益的工具。第三阶段在政客向大众鼓吹干预的必要时发生，这时事情大致上已经被人说成是善恶之争，是解放受到镇压的穷国、使之摆脱我们认为是独裁政权的机会，因为还有哪种政权会找美国公司的麻烦？”换句话说，美国外交政策大致是集体投射的展现，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精英借此把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当作是全世界的意见。

金瑟指出，直接从企业界转任公职的政客身上，这种趋势表现得最明显。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极有力的国际公司律师，代表世界上若干最富有的公司，处理他们和外国政府的冲突。替杜勒斯立传的几位作者像金瑟一样，都断定杜勒斯根本无法区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

野。金瑟写道：“杜勒斯有两个终身执迷不悟的特点，一是对抗共产主义，二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权利，在他心里，这两件事情混为一体，互相增强。”这点表示他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如果危地马拉政府采取行动，伤害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company)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攻击美国，值得用军事对付。

布什政府里挤满了刚刚从董事会转进公职的总裁，他们推动反恐和保护跨国公司利益两种执迷不悟的妄想时，也同样处在混乱与混淆的情况。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杜勒斯认同的公司都是在外国矿业、农业、银行业与石油业中，拥有巨额国际投资的跨国企业。这些公司通常都有一个直接的目标：希望有个稳定、可以获利的经营环境，也就是宽松的投资法令、顺从的工人、不会遭到突然征收。政变与军事干预是达成这种目标的手段，不是目标本身。

设计反恐战争的原型灾难资本家跟前辈不同，他们是另一种红顶商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其他灾难本身就是目标。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把对洛克希德、哈利伯顿、凯雷集团和吉利德公司有利的事情，跟对美国、甚至对世界有利的事情混为一谈时，就成了一种后果极为危险的投射形式。毫无疑问，有助这些公司获利的事情是灾变，包括战争、流行病、天灾和资源短缺，这就是为什么从布什上任后，这些人的财富都大幅增加。使得上述投射行为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员保有他们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利益，而且程度前所未见，甚至在推动战争和灾难应变民营化的新时代当下，仍然继续保有，因此他们可以在协助释出灾难的同时从中获利。

例如，2006年期中选举共和党惨败后，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新闻界报道指出，他要回到民间部门任职。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曾离开民间企业。他接受布什提名担任国防部长时，像所有公职官员一样，必须把可能受到他在职所做决策影响的持股卖掉。情形很简单，这表示他必须卖掉一切跟国家安全或国防有关的持股，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持有极多跟灾难有关产业的股份，以至于他宣称他不可能在限期前出脱所有持股，而且他因为努力保有一切而陷入违反伦理规则的困境。

拉姆斯菲尔德卖掉了直接拥有的洛克希德、波音与其他国防包商的股票，把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交付盲目信托，然而投资国防与生物科技股的私人投资公司，却仍然拥有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他不愿意认赔、迅速卖掉这些公司，在期限截止时，两次申请延期三个月，在如此高层的政府官员中，这种情形相当罕见。这点表示他担任国防部长整整半年甚至更久后，仍然在为他持有的公司和资产寻找适当的买主。

至于他当过董事长、又拥有克流感专利权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对卖掉。有人要求他在商业利益和公职生涯之间择一，他干脆拒绝。流行病是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完全属于国防部长的职责范围。虽然利益冲突这么明显，拉姆斯菲尔德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却没有卖掉吉利德的股票，一直持有价值介于800万到3900万美元的吉利德股票。

参议院伦理委员会想用标准的利益冲突规定，要他配合办理时，他公开表现对抗到底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信给政府伦理局，抱怨他必须花6万美元的会计师费用，帮忙他处理“极为复杂而且令人困扰”的财产申报表。对于担任公职期间决心紧抱9500万美元股票的人来说，6万美元的处理费并不会太超过。

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美国最高级安全首长时，坚定拒绝停止靠灾难赚钱，这么做在很多方面明确影响他的工作表现。他担任国防部长第一年的大部分期间，一面要设法卖掉持股，一面必须回避范围极大的重要政策决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他必须回避国防部讨论艾滋病的会议。”联邦政府必须决定是否干预好几件轰动一时、涉及顶尖国防包商的并购案与销售案时，拉姆斯菲尔德也必须回避有关的高级谈判，这些案子涉及的厂商包括奇异、汉伟(Honeywell)、诺斯诺普格鲁曼与硅图(Silicon Valley Graphics)等公司。根据官方发言人的说法，他跟上述几家公司确实有财务关系。有位记者询问其中一件案子，拉姆斯菲尔德告诉他说：“到目前为止，我通常都回避这些案子。”

他担任国防部长六年期间，国防部的讨论一转到治疗禽流感的可能，或购买禽流感治疗药品时，他都得离开房间。有一项条款说明他可以用什么方式继续持有这些股票，而根据这项条款，他必须回避“可能直接而且可想而知会影响吉利德公司”的决定。但是他的同事很照顾他的利益，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克流感，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克流感。

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抗的态度的确有价值。如果他在2001年1月上任时就把吉利德股票卖掉，他每股只能卖到7.45美元。但是留着股票，撑过禽流感恐慌、生物恐怖主义的歇斯底里，撑过他任职的美国政府决定巨额投资这家公司，到最后他离开公职时，这支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到2007年4月，股价更涨到84

美元)。这点表示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职位时，的确比他上任时更有钱，就担任公职的亿万富翁来说，这种情形很少见。

如果说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吉利德公司，那么切尼同样不愿意完全切断他跟哈利伯顿的关系，跟拉姆斯菲尔德和吉利德关系的例子不同，切尼的情形一直是媒体极为注意的事情。切尼辞去总裁、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前，协商出退休方案，得到哈利伯顿的一大堆股票和认股权。经过新闻界几次有点难堪的质询后，他同意卖掉哈利伯顿的部分持股，赚到了高达1850万美元的利润。但是他没有完全出脱持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切尼担任副总统后，仍然持有18.9万股的哈利伯顿股票，还有50万股尚未执行的认股权。

切尼仍然抱着这么大量的哈利伯顿股票，表示他担任副总统的期间，每年从持股中收到几百万美元的股息，而且哈利伯顿每年也付给他21.1万美元的延后支付所得，大约等于他担任副总统的薪水。到2009年他卸任而且可以卖出哈利伯顿持股时，从哈利伯顿公司财富的惊人进展，也让他有机会获得极高的利润。伊拉克战争前，这家公司的股价为10美元，三年后涨到41美元，暴涨了四倍多，背后的原因是能源价格飞涨和伊拉克的合约，两件事都直接来自切尼领导美国和伊拉克作战。伊拉克似乎非常符合金瑟的公式。萨达姆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却对美国能源公司构成威胁，因为他才刚跟俄罗斯石油巨擘签约，而且跟法国的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谈判，以致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蕴藏，就这样从英、美两国的手中溜走。萨达姆下台为埃克森美孚、雪佛龙(Chevron)、壳牌，以及英国石油(BP)等石油业巨擘带来机会，这些公司全都为伊拉克的新生意做好了准备；萨达姆下台也为哈利伯顿带来惊人的商机，哈利伯顿已经前进到杜拜，占住地利，准备对所有这些公司销售能源服务。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哈利伯顿有史以来最能够获利的单一事件。

事情一点都不难，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大可以卖光跟灾难有关的持股，消除他们热衷从制造灾难状况中获利的疑虑。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就会错过所属产业的繁荣岁月。有关单位要求他们在私利和公职生涯中选择时，两人都是一再选择利润，迫使政府伦理委员会配合他们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强烈反对发战争财的人，他说：“我不希望美国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场世界性惨剧，变成百万富翁。”我们不由得猜想小罗斯福会怎么看待切尼，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赚到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我们也不知道小罗斯福要怎么看待拉姆斯菲尔德，根据年度财产申报，2004年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忍不住卖掉部分吉利德股票，轻松赚到500万美元，跟他离职后可领取的收益相比，这不过是尝到一点小小的甜头。在布什政府中，发战争财的人不只是极力要求打进政府里面，他们自己就是政府：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爆发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卑鄙、最无耻的贪腐丑闻，例如艾布兰莫夫(Jack Abramoff，共和党说客)用高尔夫球假期，贿赂国会议员；外号“公爵”(Duke)的康宁罕(Randy Cunningham，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把自己的游艇史特公爵号(Duke—stir)当成“贿赂菜单”的一部分，印在正式的国会信纸上，交给一家国防承包商，康宁罕现在正在服八年的徒刑；还有水门大旅馆(Watergate)里有高级妓女参加的宴会；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像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此外，还有政府与产业界之间快速转动的旋转门。旋转门始终存在，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通常都会等到自己服务的政府下台后，才利用自己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获利。但是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国土安全市场源源不绝的财富诱惑力太大了，很多政府官员无法抗拒。因此，众多不同政府机构里的千百位官员不愿意等到任期结束，就急速冲向旋转门。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李普顿(Eric Lipton)的说法，他调查国土安全部这种现象后发现：“老牌的华府说客和监督团体说，现代史上，总统任期结束前，这么高比率的高级官员出走潮，还难得有相同的例子。”李普顿找到94位公务员，都是先在国内安全部门任职，现在已经转进国土安全产业服务。

这种例子太多，无法在书中详细列举，但是有些人特别突出，因为他们是反恐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前司法部长和爱国法背后的主要推手艾希克罗夫(John Ashcroft)，现在主持艾希克罗夫集团(Ashcroft Group)，专门帮助国土安全企业争取联邦政府的合约。国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长李奇(Tom Ridge)现在主持李奇全球公司(Ridge Global)，也担任通信业者朗讯集团(Lucent Industries)的顾问，这家公司是安全产业的重要角色。前纽约市长兼领导9·11攻击因应行动的英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下台四个月，创设了朱利安尼合伙企业(Giuliani Partners)，以危机顾问的身份，推销自己的服务。克林顿和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反恐大将克拉克(Richard Clarke)虽然直言不讳，批评现任政府，却担任好港顾问公司(Good Harbor Consulting)董事长，从事国土安全与反恐怖主义业务。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1995

年之前是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现在则为巴拉丁资本集团(Paladin capital Group)服务，这家私募基金公司投资很多国土安全公司，伍尔西也是国土安全产业主要业者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的副总裁。9. 11时担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长的欧尔鲍，在18个月后离职，创立新桥策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这家公司承诺要成为企业、利润丰厚的政府合约以及伊拉克投资机会之间的桥梁。取代他出任署长的布朗(Michael Brown)任职只有两年，就离职创立布朗有限责任公司(Michael D. Brown LLC)，专门从事应付灾难的准备业务。

布朗在卡特琳娜风灾期间，写了一封臭名在外的电子邮件，问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的幕僚：“我现在可以辞职吗？”此事大致上符合这批人的哲学：在能够发包庞大合约的政府机构任职，时间只要长到能够得到显赫的职衔，足以搜集到什么会大卖的内部信息，然后辞职，兜售你和以前同事的关系。公职生涯已经次要到变成了顶多只是侦查任务，目的是为将来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服务预做准备。

然而，从好几方面来说，跟贪腐与旋转门有关的故事都会留下错误的印象，暗示国家和这个体系之间仍然有清楚的界线，但事实上这条界线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布什当政时期的创新，不在于政客多快从一个世界转进另一个世界，而是在于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权同时政商两栖。珀尔(Richard Perle)和贝克之流的人制定政策、提供最高阶层的建议，像立场超然的专家和政治家一样，对新闻界说话，同时却深深涉入民营化的战争与重建业务。他们彻底体现了政商财团主义的任务，也就是以安全为名，把政治与企业精英彻底合而为一，国家则扮演商业行会的主席，借着合约发包经济，变成商机的最大来源。

过去35年来，无论是智利的圣地亚哥，还是在莫斯科或华府的布什政府，一小撮企业精英和右派政府结合的情形一出现，都会被贬为某种不正当的作为，不论你是黑帮资本主义、寡头政治资本主义，或者如今布什领导的“亲信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现象并非不正当，而是芝加哥学派以民营化、解除管制与打击工会三大坚守原则而发动的圣战所致。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坚拒在他们跟灾难有关的持股和公职之间做出抉择，是真正的政商财团国家已经降生的第一个征象，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征象。

前辈的力量

布什政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依赖外界顾问与自由之身的特使来执行重要功能：贝克、布雷默、基辛格、舒尔兹、珀尔、国防政策委员会与解放伊拉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这种人。布什政府做出诸多重大决策时，国会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最高法院的判决被他们当成不过是温和的建议，而上述这些大致上算是义工的顾问，则发挥了绝大的影响力。

这些顾问会有影响力，原因是他们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不是担任过国务卿、大使，就是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所有的顾问都已经离开政府多年，同时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创立获利丰厚的事业。因为他们被当成包商，不是幕僚，也就与民选或政府任命的政客不同，不用受同样的利益冲突规则约束：其实他们根本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就像灾难管理专家雷德莱纳(Irwin Redlener)告诉我的一样，政府与产业之间的旋转门消失，阳关大道出现，让灾难产业可以利用这些著名前政客的名望为掩护，在政府内部设立事务所。

2006年3月，贝克获得任命，担任顾问团体“伊拉克研究委员会”(Iraq Study Group)共同主席，负责提出未来伊拉克行动新方针的建议，两党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贝克是老派的政客，德高望重，曾经在比较稳定的时代领导过美国。贝克的确是老手，属于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现在这么鲁莽的时代，不过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贝克现在做什么呢？

贝克像切尼一样，他在老布什总统任期快结束时离开公职，靠着他在政府里的关系赚到大钱，尤其是靠着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交到的朋友，赚到特别丰厚的利益。他设在休斯敦的法律事务所贝克博兹公司(Baker Botts)，客户有沙乌地王族、哈利伯顿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Gasprom，其法律事务所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与天然气法律事务所。他也成为凯雷集团的股东，从这家十分神秘的公司赚到大约1.8亿美元。

凯雷靠着销售机器人系统与国防通讯系统，也靠着旗下的USIS公司取得训练伊拉克警察的大合约，从伊拉克战争中赚到庞大利润。总市值560亿美元的凯雷公司旗下，有一家主攻国防事业的私募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近年获利

极高的事业，那就是搜集(投资)国防承包商，推动这些公司上市。凯雷投资长康威(Bill Conway)说：“过去一年半是我们获利最高的时候。”他指的是伊拉克战争最初的18个月。“我们很赚钱，而且赚得很快。”伊拉克战争显然已经变成灾难，却为凯雷的少数投资人，赚到了创记录的66亿美元利润。

小布什把贝克拉回公职生涯，任命他担任伊拉克债务问题的特使，此时贝克并没有出脱凯雷集团或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股权，不顾两家公司在这场战争中拥有直接利益。一开始，好几位评论家指出这些可能的严重冲突，《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社论，呼吁贝克辞掉在凯雷集团和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职位，保存债务特使职位的公正性。这篇社论指出：“贝克先生在获利丰厚的民间企业关系网络中涉人太深，纠缠不清，使他在任何债务重新安排的方案中，看来都像可能的受益人。”社论断定贝克“放弃靠明显跟伊拉克债务有关系的客户赚钱还不够；贝克先生要公正执行新公职，就必须放弃这两家未上市公司”。

贝克遵照政府高官定下的前例，直接拒绝这样做，布什还支持他的决定，让贝克负责游说世界各国政府，宽免伊拉克极为沉重的外债负担。他担任这种角色将近一年后，我取得一份机密文件，证明他涉及的利益冲突比以前所知道的更严重、更直接。这份文件是65页的业务企划案，是由包括凯雷集团在内的银行团，向伊拉克的主要债权国科威特政府发出，这些公司建议科威特利用他们的高级政治关系，向伊拉克索取因为萨达姆入侵而积欠科威特的270亿美元债务；换句话说，贝克的所作所为，跟他担任特使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也就是要说服各国政府取消萨达姆时代的债务。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协助科威特政府保护与实现对伊拉克索赔的建议”，是在贝克接受任命将近两个月后，才呈交科威特政府。文件中提到贝克11次，并且清楚表明，如果科威特政府跟雇用了负责取消伊拉克债务的人的公司合作，将会得到好处。但是其中也有代价，这份文件指出，为了换取这种服务，科威特政府必须在凯雷集团投资10亿美元。这样做是直截了当在销售影响力：付钱给贝克的公司，得到贝克的保护。我把这份文件拿给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学教授兼政府伦理规范专家克拉克

(Kathleen Clark)看，她说贝克涉及“典型的利益冲突。贝克在这项交易中代表双方，他理当代表美国的利益，但他也是凯雷集团的资深法律顾问，凯雷希望协助科威特收回伊拉克欠的债务，得到报酬”。克拉克看过这份文件后，认定“凯雷和其他公司利用贝克目前的职位，向科威特争取会伤害美国利益的合约”。

我谈论贝克的文章在《国家》杂志刊出一天后，凯雷集团退出这个银行团，丧失得到10亿美元的希望；几个月后，贝克出脱凯雷集团的持股，辞去法律顾问的职位。但是真正的伤害已经造成：贝克担任特使的表现很糟糕，没有争取到布什保证、而且伊拉克需要的债务豁免。2005与2006年间，伊拉克付出25.9亿美元，赔偿萨达姆开战造成的损失，这些钱大部分赔给科威特，却是应对伊拉克人道危机、重建国家所亟须的财源；而且在美国企业白白浪费援款、一事无成撤走之后，伊拉克更迫切需要这笔资金。贝克的任务是替伊拉克取消90%至95%的债务，结果只是重新安排偿债期限，这些债务仍然等于伊拉克国内生产毛额的99%。

伊拉克政策的其他层面也交给自由之身的特使，让他们的公司从这场战争赚到创记录的利润。前国务卿舒尔兹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委员会，是2002年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成立的压力团体，任务是协助政府，在民众心中建立打伊拉克战争有理的印象。舒尔兹的确遵命办事，因为他承担的角色跟布什政府有所区隔，他可以完全不必提出证据或事实，就在民众心中激起歇斯底里的心理，认定萨达姆构成的危险迫在眉睫。2002年9月，他以《立刻行动：危险迫在眼前，萨达姆必须下台》为题，投书《华盛顿邮报》，指出：“如果院子里有一条响尾蛇，你不会等到蛇发动攻击，就会先采取自卫行动。”舒尔兹并没有向读者揭露他当时是贝泰公司董事、先前担任这家公司总裁很多年。这家公司后来会从舒尔兹渴望摧毁的伊拉克，得到23亿美元的重建工程合约。因此我们事后来看，似乎应该问舒尔兹呼吁世界“立刻行动”时，是以关切国事的元老政治家的身份说话，还是以贝泰公司的代表、或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代表身份说话？

根据非营利监督团体“政府监督计划”(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执行理事布莱恩(Danielle Brian)的说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线在哪里结束，洛克希德的势力从哪里开始。”要知道洛克希德的势力在哪里结束，伊拉克解放委员会的权限从哪里开始，更是困难。舒尔兹主持的这个宣扬作战的团体是由杰克逊(Bruce Jackson)担任召集人，他三个月前还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策略与规划的副总裁。杰克逊说，“白宫里的人”要求他组织这个团体，但是他召集洛克希德公司的旧同事，组成这个委员会。除了杰克逊之外，洛克希德的代表包括负责太空与战略导弹业务的副总裁库波曼(Charles Kupperman)，以及负责防卫系统的洛克希德董事葛兰姆(Douglas Graham)。虽然这

个委员会的组成是出于白宫的明白要求，希望作为战争的宣传机器，却没有一个委员必须离开洛克希德，或是卖掉自己的股票，这点对委员会成员的确是好事，因为洛克希德的股价靠着他们协助发动的战争，跃涨了145%，从2003年3月的41美元，涨到2007年2月的102美元。

此外还有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基辛格，开启这场反革命的人就是他。《纽约时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2006年的《一概否认之国》(State of Denial)书中透露，切尼每个月和基辛格会晤，布什和基辛格则是大约两个月见面一次；切尼告诉伍德沃德：“他变成布什在外交事务方面最常咨询的外界顾问。我跟基辛格谈话的次数，很可能比跟任何人谈话的次数还多。”

但是在所有这些最高级的会晤中，基辛格代表谁？他像贝克和舒尔兹一样，当过国务卿，但是已经离职30年了。从1982年他创设未上市的神秘公司基辛格公司起，他的工作就是代表一大堆客户，据说客户包括可口可乐、永备化学(Union Carbide)、韩特石油(Hunt Oil)等公司在内，也包括赢得金额最大的伊拉克重建合约的工程巨擘福陆公司(Fluor)，甚至包括他在智利秘密行动中的老同伴ITT公司。因此他和切尼会晤时，身份是元老政治家，还是代表石油与工程业客户的高价说客？

2002年11月，布什任命基辛格主持9·11委员会时，基辛格强烈显示出他是对谁效忠。这个职位可能是任何爱国人士从退休状态复出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受害者家属要求基辛格提出他的企业客户名单，指出这些客户和调查之间可能有利益冲突；他拒绝合作，不愿意做出这种代表公信力与透明度的基本姿态。他没有揭露客户名单，而是辞掉这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基辛格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珀尔在一年后，将会做出同样的抉择。珀尔在里根总统期间曾经任职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请他主持国防政策局。珀尔接任前，国防政策局是无声无息的顾问单位，负责把过去政府的知识传承给现任政府。珀尔把这个单位变成自己的平台，利用自己动人的头衔，在新闻界强力主张对伊拉克先下手再说。他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国防政策局，根据《纽约客》杂志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的调查报告，他以个人的官衔为号召，为自己新创的公司吸引投资。事实上，珀尔是第一批后9·11灾难资本家之一，攻击发生才两个月后，他就设立了创投企业三联伙伴公司(Trireme Partners)，专门投资一些开发国土安全与国防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司。三联公司在一封招揽业务的信中，夸称公司的政治关系：“经营阶层中的三位成员目前任职美国国防政策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顾问。”这三个人是珀尔、他的朋友希尔曼(Gerald Hillman)和基辛格。

波音是珀尔最初的投资者之一，波音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包商，投资了2000万美元，让三联公司得以推展业务。珀尔变成了直言无隐的波音迷，撰写读者投书，支持波音和五角大楼之间引发争议、价值170亿美元的运油机合约。*

*运油机合约成为五角大楼近年最大的丑闻，最后把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和波音公司一位高级经理人拖下水，关进监牢。这位官员在案子即将定案时跟波音磋商，希望找到工作。拉姆斯菲尔德在后来的调查中遭到质疑，问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件有问题的案子？他回答说，他记不得自己在这件耗用17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税金的合约中，确实担负什么角色。“我不记得自己批准过合约，但是我确实不记得没有批准过合约。”拉姆斯菲尔德遭到管理不善的批评，但是他的健忘可能是因为他拥有极多跟国防有关的持股，经常必须回避采购讨论，以避免显现利益冲突造成的恶果。

珀尔虽然把他在国防部的所有关系告诉投资人，他在国防政策局的几位同事却说，他没有告诉他们这家公司的事情。在有关这家公司的听证会上，有一个人说这家公司“在伦理规范的边缘，或是根本不符伦理规范”。最后，所有的冲突问题困住了珀尔，他必须像基辛格一样做出抉择，是继续制定国防政策，还是从反恐战争中获利。2003年3月，就在伊拉克战争刚刚爆发，包商的好运正要开始时，珀尔辞去了国防政策局主席的职位。

最让珀尔生气的是，有人说他之所以赞成用无限度战争总结所有的邪恶，是由于他个人可以从这种主张中获得惊人利益。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布里泽(Wolf Blitzer)质问珀尔，说赫什认为“他设立了可以从战争中获利的公司”。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正确说法，但是珀尔勃然大怒，痛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什，他告诉布里泽：“最接近恐怖分子的东西就是美国新闻界，坦白说，我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从战争中获利；说我的观点跟国防工业投资的潜在报酬隋关，完全是一派胡言。”

这个说法很奇怪，如果你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投资从事安全与国防业务的企业，却设法不从战争中获利，一定会让投资人失望。像珀尔这种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个更大的问题是，这些人在灰色地带生存，在灾难资本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决策官员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洛克希德或波音经理人像珀尔一样，上福斯电视台，主张改变伊朗的政权，他们明显的自私自利会否定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但是大家介绍珀尔时，继续说他是“分析师”、是五角大楼顾问，也可能说他是“新保守派”，但从来没有人说他可能只是能言善道的军火商。

这个华府帮派的成员只要受到置疑，说他们和他们支持的战争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时，他们一定都像珀尔一样回答：整个说法既荒谬又愚蠢，有点像是恐怖分子的攻击。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舒尔兹、杰克逊在内的新保守派(我认为基辛格也是其中一员)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显示自己是蛋头学者或鹰派的务实分子，背后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宏伟的理念，而不是像利润这么俗气的东西。例如杰克逊说，洛克希德不赞同他业外的外交政策工作；珀尔说，他跟五角大楼的关系对他的业务造成伤害，因为“这样表示其中有些你不能说、不能做的事情”。珀尔的合伙人希尔曼坚持说，珀尔“不是理财动物，完全没有追求财务利得的意愿”。费斯(Douglas Feith)担任国防政策次长时宣称：“副总统过去跟哈利伯顿的关系，使政府官员不愿意发包合约，不热衷发包合约，即使实际上应该把合约交给哈利伯顿旗下的凯乐布朗鲁特公司。”

即使是在新保守派最坚定的批评者笔下，这些新保守派看起来都像是真正的坚信者，动机完全是决心维持美国和以色列势力的超强地位，这种决心极为强烈，以致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安全”。这种区分既虚假又健忘，追求无限利益的权利一直是新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核心。9.11以前，激烈民营化的要求和对社会支出的攻击，助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等智库推动以弗里德曼学说为核心的新保守派运动。

新保守派在反恐战争上，并没有放弃政商财团主义的经济目标，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来达成这些目标。华盛顿的鹰派当然决心维持美国的世界帝国角色以及以色列在中东的帝国角色。然而，你不可能把这种军事目标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区隔开来，前者要在国外不断茁壮，在国内维持警察国家，后者则依据这种假设，建立了规模数百亿美元的产业。这种政治和获利目标合而为一，表现最清楚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战场上。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以休克为基础的军事行动有一种风险，可能会碰到“意外的后果”，或是促成意外的反应。例如，大规模攻击一个国家的基本建设，输配电网或经济制度，可能形成极度的艰困状况，引发更强的反弹，而不是削弱敌国的作战意志。

——夏纳罕(John N. T. Shanahan)中校，《休克军事行动》(Shock-Based Operations)，出自《航太控制权》(Air & Space Power)杂志，2001年10月15日

直接刑讯只会造成愤恨、敌意于进一步的反抗……接受侦讯的犯人如果能够熬过痛苦，会变得更难以其他方法处理。结果不是压制犯人，而是重建犯人的信心和成熟度。

——中央情报局《库巴克反情报侦讯》手册，1963年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内向的精神分裂症或忧郁症患者好比用高墙团团围住的城市，所有城门紧闭，拒绝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后，可以和世界重建关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控制轰炸造成的损害程度。

——英国精神病学家怀利(Andrew M. Wyllie)针对电击治疗的看法，1940年

后9.11的世界中，我认为适度使用暴力，可能具有治疗效果。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柯恩(Richard Cohen)撰文支持入侵伊拉克

2004年3月，我抵达巴格达还不到三小时，一切都不太顺利。首先，我们出了机场检查关卡，事先约定的车子没有出现，我的摄影师斯特恩(Andrew Stern)和我必须在已经号称“世界最危险的道路”上设法搭便车。我们抵达位于热闹的卡拉达区(Karada)的旅馆时，迎接我们的是爱尔兰和平运动分子伯明翰(Michael Birmingham)，他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搬到巴格达。我请他帮我介绍几个关心伊拉克经济民营化的伊拉克人。他告诉我们：这里没有人关心民营化，大家只关心生存。

接着我们激烈争论在战区推动政治目标的伦理问题。伯明翰并没有说伊拉克人支持民营化计划，只是说大部分人有更迫切的烦恼，他们担心自己做敬拜的清真寺有炸弹爆炸，或是发现堂兄弟消失在美国管理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他们想的是怎么得到明天的饮用水和洗澡水，不是外围公司是否想把伊拉克的供水系统民营化，然后在一年后把水卖给他们。他主张外人的职责是设法记录战争与占领的实况，不是决定什么事情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我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把这个国家卖断给贝泰和埃克森美孚石油，不是我编造的幻想；在白宫派驻伊拉克的特使布雷默带头推动下，民营化已经进入初期阶段。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美国在多家旅馆的宴会厅里举办商展，拍卖伊拉克的国家资产，形成超现实的场景：穿着护身盔甲的业务员用血肉横飞的故事，吓唬前来参观的商人，美国贸易官员却对大家保证，实际情形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糟糕。“地上还血迹斑斑的时候，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在华府的“第二次重建伊拉克”研讨会上，有位出席者认真地这么说。

在巴格达很难找到有兴趣谈经济的人，其实并不意外。策划侵略伊拉克的人坚决相信休克主义，知道伊拉克人忙着应付紧急事务，可以把伊拉克切割开来拍卖，而且可以把结果当成已经完成的交易。对新闻记者和行动主义者来说，我们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惊人的实际攻击上，忘了得到最大利益的关系人根本不到战场上来，而且在伊拉克可以获取许多利益：伊拉克不但有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蕴藏，也是拒绝依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这种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后，阿拉伯世界变成了最后的一块边疆。

伯明翰和我反复辩论之际，斯特思想到阳台上抽烟，当他打开玻璃门时，房间似乎瞬间被抽成真空。窗户外面是一团像岩浆一样的火球，深红色中夹杂了一些黑色。我们抓起鞋子，穿着袜子，跑下五层的楼梯。大厅里到处都

是碎玻璃，街角的黎巴嫩山大饭店(Mount Lebanon Hotel)变成废墟，跟旁边的房子一起被1000磅的炸弹夷为平地，这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攻击事件。

斯特恩提着摄影机冲到爆炸案现场，我努力克制自己，最后还是跟了过去。我到巴格达才三小时，就打破了自己不追逐炸弹的原则。回到旅馆后，所有独立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都在喝亚力椰子酒(arak)，设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每个人都对着我笑，说：“欢迎来到巴格达！”我看看伯明翰，我们两个都默默承认，刚才的辩论他赢了。战争本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是炸弹决定这里的一切，不是新闻记者。”的确如此，炸弹不只'是把氧气吸进爆炸圈里，也吸引了一切，包括我们的注意力、同情心和怒火。

那天晚上，我想到两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到的杰出记者艾库娜(Claudia Acuna)，她给我一本华尔士写的《作家写给军事执政团的公开信》。她警告我说，极端的暴力可以阻止我们看出暴力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某方面来说，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反战运动上。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的解释很少超过几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石油、以色列、哈利伯顿。我们大部分入决定反战，是反对误以为自己是国王的总统，以及他那位想在历史上留名的英国跟班的愚蠢行为。至于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战争是合理的政策选择、筹划侵略伊拉克的人使出残忍的暴力，是因为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打开中东的封闭经济体，暴力程度和其中的利益正好成正比……我们完全没兴趣。

美国政府向大众推销侵略伊拉克时，立论基础是害怕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毁灭武器，因为照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说法，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的说法”。换句话说，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最小公约数的借口。大部分支持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喜欢比较精确的理由，就是“模范”理论。很多主张这种理论的大师都自认为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根据他们的说法，恐怖主义出现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9.11帕勺劫机者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伊朗用金钱支持真主党(Hezbollah)；叙利亚窝藏哈马斯组织(Hamas)的领袖；伊拉克送钱给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家属。对这些拥护战争的人来说，他们把攻击以色列和攻击美国混为一谈，好像两件事没有差别，这种想法足以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都当成孕育恐怖分子的温床。

因此他们会问，要怎么对付这个产生恐怖主义的地区？受到意识形态遮蔽，他们看不出美国或以色列政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不可能看出这是挑衅行为；他们以为真正原因是这个地区缺乏自由市场民主制度。*

*自由市场浪潮绕过这个地区，原因有好几个。最富有的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赚到的石油财富极多，没有负债，因此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的掌握(例如沙特阿拉伯经济中，有84%由国家控制)。伊拉克因为两伊战争的关系，债台高筑，但是就在全球化时代开始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束，伊拉克因为遭到严格的禁运和封锁，不但没有“自由贸易”，实际上完全没有合法的贸易。

因为无法一次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必须挑出一个国家作为触媒。正如同相信这种理论的头号媒体宣传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美国要侵略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不同模范”，进而在整个地区引发一系列的民主与新自由派浪潮。美国企业研究所大师穆拉其克(Joshua Muravchik)预测，在“德黑兰与巴格达”将“引发遍及伊斯兰世界的海啸”，同时，主要的保守派分子、布什政府的顾问莱丁说，目标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

*不加入华府共识可能足以引发外国侵略的想法，看来可能相当牵强，但是以前有过这种前例。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贝尔格莱德时，官方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极度侵犯人权，震惊世界。但是科索沃战争几年后，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副国务卿兼当时的美国主要谈判官员塔伯特(Strobe Talbott)，说出了一些少有人报道的话，提出远不是那么理想主义的解释：“这个地区的国家设法改革经济、减轻种族紧张、扩大公民社会时，贝尔格莱德似乎乐于继续走相反的方向。南斯拉夫抗拒扩大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趋势(不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痛苦)，是解释北约打这场战争最好的说法。”这段话出现在塔伯特过去的发言人诺里斯(John Norris)2005年出版的《北约、俄罗斯、科索沃的冲突之路》(Collision Course, NATO, Russia, and Kosovo)书中。

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是把对抗恐怖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和举行选举绑在一起，变成单一方案：“清除”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建成庞大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它就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选举结果，这样好比三合一的特餐。布什后来把这种目标简化成简单的一句话：“把自由传播到有麻烦的地区。”很多人把这种情绪误解成过分乐观的民主承诺，但是模范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另一种自由，是70年代带到智利、90年代带到俄罗斯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让西方跨国公司可以饱餐新近民营化国家的自由。布什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战斗结束才八天后，就清楚地说明这件事，宣布“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大计。切尼的女儿、苏联休克治疗历程专家丽丝·切尼(Liz Cheney)负责推动这个计划。

9.11攻击后，侵略某个阿拉伯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模范的想法开始流传，有好几个国家成为可能目标，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或是莱丁属意的伊朗。然而，伊拉克却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伊拉克除了拥有庞大的石

油蕴藏之外，在沙特阿拉伯看来没有以前那么可靠的时候，伊拉克也是适于设立军事基地的中心地点，而且萨达姆动用化学武器对付人民，使他变成大家容易仇视的目标。另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美国人较熟悉伊拉克。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美国最近一次动用几十万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战争结束后12年里，五角大楼一直用这场战争作为研讨会、入员训练以及精心研发战争游戏的范本。有一篇对拉姆斯菲尔德深具启发的论文，就是这种后赛局理论的例子。这篇论文叫作《震慑：达成快速掌控》，是1996年由国防大学一些策略专家写的，这篇论文定位为全方位的军事教条，其实探讨的是如何再打一次波斯湾战争。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退役海军中校乌尔曼(Harlan Ullman)解释说，之所以会推动这个研究计划，原因是有人问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空战指挥官洪纳(Chuck Homer)将军，问他和萨达姆作战时，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应该把针刺向哪里，好让伊拉克军队崩溃。把“震”“慑”这两个名词凑在一起的乌尔曼写道：“震慑意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沙漠风暴战争能够再打一次，我们如何能在一半的时间以内，用比较少的兵力，打赢这场战争？关键在于找到洪纳所说把针刺进去的地方，我们以这些地方为目标，可以让敌人立刻崩溃。”论文作者群相信，如果美军有机会再跟萨达姆作战，一定会非常善于找到这些“插入点”，因为新的卫星科技和精准武器的突破，使美军可以用空前精确的方式，把针刺进去。

选择伊拉克还有另一个好处，美军忙着幻想用有天壤之别的进步科技，再打一次沙漠风暴行动时，伊拉克的军事能力却急速退步，不但受到禁运侵蚀，武器检查计划更使伊拉克军力几乎土崩瓦解。这点表示，和伊朗或叙利亚相比，伊拉克似乎是最容易打胜仗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选择伊拉克作为模范的用意，说得很直率。他写道：“我们不是要在伊拉克扶植国家，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这样说好像是在21世纪里，找一个阿拉伯产油大国、凭空创造出一个国家来，是很自然、甚至是“很高贵”的事情。弗里德曼像很多人一样，原来支持战争，后来却宣称自己预料不到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会带来大屠杀。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可能忽略这种细节。伊拉克不是地图上空旷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伊拉克的文化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带有崇高的反帝国主义自尊、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厚的信仰，大部分成年男性都受过军事训练，如果要在伊拉克“创造国家”，原来已经存在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从一开始，没有说出口的假设就是：原来的国家有很大部分会消失，以便清出空地，进行宏伟的试验；这个构想的核心，一定包括极为激烈的殖民暴力。

30年前，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首次从教科书上跳到现实世界，也希望把国家消灭，然后创造出新的国家。1973年的智利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一样，原意是要当作整个骚动的美洲大陆的模范，而且很多年里，智利确实是模范。1970年代实施芝加哥学派理念的残暴政权很清楚，如果他们理想中的新国家要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诞生，整个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都必须“连根”拨起。

在遭受过政治清洗的国家，大家会集体努力，面对这段残暴的历史：设立真相委员会、挖掘万人冢，开始审判坏人的战争罪行；但是拉丁美洲的军事执政团并非独立行动，很多文件显示，他们在政变前后都受到华盛顿支持。例如1976年阿根廷政变时，成千上万的年轻行动主义者被人从家里抓走，军事执政团得到华府充分的财务支持。(基辛格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做，你应该要快快傲。”)那一年福特担任美国总统，切尼是他的幕僚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国防部长，基辛格的行政助理是一位野心勃勃、名叫布雷默的年轻人。这些人没有面对真相，没有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军事执政团的角色而经历司法程序审判，还继续享受漫长而顺利的事业生涯，事实上，好日子太过漫长，以至于30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准备在伊拉克发动惊人却更凶暴的类似实验。

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把冷战结束到反恐战争开始的期间，说成是“休生养息的岁月，接着是大火熏天的日子”。侵略伊拉克，代表猛然回归自由市场圣战早年的手段：不受任何干涉，使用最厉害的休克手段，强力侵袭并排除建立模范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障碍。

接受中情局资助的精神病学家卡梅伦在“拆解”病人时，会让病人退缩到婴儿状态；他相信，如果一点点休克有助于达成目的，那么更多的休克会更更有用。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来轰炸病人的头脑，包括用电力、迷幻药、感觉剥夺、感觉超载，任何能抹杀旧有东西而得到空白白纸的方法，好让他铭刻新的思想和模式。侵略伊拉克的策略就是这样，只是白纸大多了。策划这场战争的人评估所有的休克手段，决定全部采用，包括闪电战、军事轰炸、配合精巧的心理作战，随后用最快速、最彻底、最空前的政治与经济休克治疗计划。如果有任何抵抗，就把反抗分子一网打尽，再予以“无情的凌辱、拷打”，作为补充手段。

分析伊拉克战争时得到的结论经常是：侵略的部分“成功”，但是占领的部分失败。这种评估忽略了侵略和占领

是一个策略的两面：最初的轰炸意在洗净画布，以便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

战争是场大规模酷刑

对策划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人来说，“在什么地方把针插下去”的答案似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插下去。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五星期内大约发射了300枚战斧巡航导弹。2003年时，一天里就发射了380多枚。3月20日到5月2日的“主要战斗”期间，美军在伊拉克投下的炸弹3万多颗，还有2万枚精密导引巡航导弹：之前生产的所有这种导弹，67%都射向伊拉克。

轰炸期间，巴格达一位三个小孩的妈妈穆沙说：“我非常害怕，没有一分钟不听到、感觉到炸弹炸在某个地方，我觉得伊拉克没有一寸的土地是安全的。”这点表示震慑作战达成了目标。震慑作战公开挑战不得集体惩罚的战争规矩，创造这种学说的人以此自豪，震慑作战不只是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目标，也以“整个社会为目标”：集体恐惧是这种策略的重要一环。

震慑作战还有一个凸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了解战争是有线电视新闻的奇观，能同时表演给好几种观众看，包括敌人、美国人和任何想要制造麻烦的人。震慑作战手册宣称：“这种攻击的视觉效果透过CNN，同步在全世界播出，对联军支持者的正面冲击，以及对潜在威胁者的负面冲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一开始，伊拉克战争就被人认为是华盛顿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所用的语言是火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摇撼整个都市的震动。萨斯金德(Ron Suskind)在《1%教条》(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解释说，对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而言，侵略伊拉克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创造一个实际的范例，告诉任何莽撞到取得毁灭性武器，或是以任何方式藐视美国权威的人，要他们好好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策略比较不像是战争策略，而是“全球性的行为主义试验”。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第一场CNN战役，但是因为全天候24小时现场特播的观念还不很成熟，当时军方还没有把现场转播完全纳入作战计划。

战争总是有一部分是表演，总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但拉姆斯菲尔德利用他在企业界学到的手段和媒体知识，把恐怖营销变成了美国军事理论的核心。冷战期间，担心核武攻击是吓阻策略的核心，但重点在于核导弹留在发射槽里。这次攻击不同，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争动用了核子弹之外的所有力量，展示了意在轰炸感官、左右并且影响情感的大秀，传播持久的信息，目标经过精心选择，力求具有象征价值并且适于在电视上产生冲击。从某方面来看，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理论是他“改头换面”计划的一环，跟常常拖着、要他慢下来的将领所主张“以武力对付武力”的战场策略大不相同，反而和他宣布要对战到永远的恐怖分子相像多了。恐怖分子不会透过直接的对抗争取胜利，而是尝试用可以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惊人画面，同时展现敌人的弱点还有自己制造残忍事件的能力，以便瓦解大众的士气。这是9·11攻击背后的理论，同样也是侵略伊拉克背后的理论。

震慑通常只是表现为压倒性火力的战术，但这个理论的作者其看法深厚多了：他们宣称，震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蓝图，“直接针对敌人的集体反抗意志”，所用的方法是美国军事体系另一个部门熟悉的工具：利用意识剥夺和意识超载，造成迷失与退缩。《震慑》清楚反映中情局的侦讯手册：“用粗浅的话来说，快速主导将会掌控环境，瘫痪敌人的感觉和对事件的了解，或是使敌人在这方面超载。”目标是“使敌人完全失能”。所包括的策略涵盖“实时操纵感官与输入内容……实际上就是‘把灯光开开关关’，让任何可能的挑衅者认清或了解自己的武力、最后是自己的社会，会碰到什么状况与事件”，以及“在特定地区，剥夺敌人沟通与观察的能力”。伊拉克遭受这种大规模酷刑的实验历时好几个月，而且早在炸弹投下前很久就开始了。

加深恐惧

加拿大公民埃拉(Maher Arar)是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2002年他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谍报人员抓走然后送到叙利亚，侦讯他的人用的是历经试验、证实有效的刑讯技巧。“他们要我坐在椅子上，有一个人开始问我问题……如果我回答得不够快，他会指着角落上的金属椅子问：‘你要我用这东西吗？’……我吓坏了，他们不需要动手，我就会说出所有的话，避免遭到酷刑！”埃拉碰到的技巧叫作“展现刑具”，或是照美国军方的术语叫作“加深恐惧”。刑讯的人知道，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囚犯自己的想象；往往只要展现可怕的刑具，就会比动用刑具还有效。

侵略伊拉克的日子愈来愈接近，五角大楼征用美国新闻媒体，让伊拉克的“恐惧加深”，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出一项报道，一开始就说：“他们把这一天叫作攻击日，攻击代表极为惨烈的空袭，会让萨达姆的军队无力或不愿意作战。”节目把《震慑》的作者乌尔曼介绍给观众，乌尔曼解释说：“这会产生一种综合效

果，就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一样，不用几天或几星期时间，而是在几分钟之内产生这种效果。”节目结束之际，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撇清责任：“我向各位保证，这项报道没有国防部认为可能帮助伊拉克军方的信息。”其实他可以讲得更明白：这则报道和同时期其他的报道一样，是国防部加深恐惧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环。

伊拉克人靠着私接的卫星电视或海外亲友的电话，接收这些可怕的消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想象震慑的恐怖。这个阶段本身变成强而有力的心战武器。这次会比1991年糟糕吗？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萨达姆拥有大量毁灭武器，会不会发动核子攻击？

侵略开始前一周，答案出现了，五角大楼邀请华盛顿的军事记者，到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Eglin)空军基地，进行特别的实地参访，亲眼看看特大空中爆炸武器(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 MOAB)的实验，但是军方每一个人都把这种炸弹叫作“炸弹之母”(Mother of AU Bombs)。这种炸弹重2.1万磅，是历来所生产过最大的非核炸弹，照CNN记者麦金泰尔(Jamie McIntyre)的说法，这种炸弹可以产生“1万英尺高的蕈状云，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核子武器

麦金泰尔在报道中说，即使不动用这种炸弹，这个炸弹的存在“仍然可能产生心理冲击”——暗示他默认自己在发动这种冲击所扮演的角色。伊拉克人像关在监牢里接受侦讯的囚犯一样，看到刑具。拉姆斯菲尔德在同一个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清楚展现联军的实力，足以彻底压制伊拉克军队，使之不战而败。”

战争开始后，巴格达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感官剥夺，巴格达的感觉刺激一个接一个被切断；最先失去的是耳朵。

2003年3月28日晚上，美军逼近巴格达时，伊拉克通信部遭到轰炸，变成一片火海，巴格达的4个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大量的碉堡克星炸弹攻击，切断了几百万具电话的通信，以电话交换机中心为目标的攻击继续进行，一共有12处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攻击。到4月2日，整个大巴格达地区，几乎没有一具电话可以通话。*在同样的攻击中，电视与无线电转播站也不能幸免，以致躲在家里的众多巴格达家庭连一点微弱的信号都不可能收到，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听不到消息。

*为什么彻底毁灭巴格达的电话系统？官方的说法是要切断萨达姆和精英特战部队的通信。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侦讯人员针对最高级的伊拉克囚犯，进行深入的“谈话”，发现很多年来，萨达姆一直认为间谍利用电话追踪他，因此过去13年里，他只用过两次电话。如同往常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可靠的情报；会有很多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让贝泰公司建立新的通信系统。

很多伊拉克人说，空袭中造成最大心理伤害的事件是摧毁电话系统，也是最大的折磨。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感觉到炸弹爆炸，却不能打电话到几个街口之外，看看心爱的人是否还活着，也不能向住在国外的亲戚报平安。驻在巴格达的新闻记者被绝望的居民包围，哀求他们借用片刻卫星电话，或是在他们手里塞进电话号码，哀求他们打电话给伦敦或巴尔的摩的兄弟或叔伯：“告诉他一切安好，告诉他说父母都平安，跟他问候，告诉他不必担心。”这时，巴格达大部分药房的安眠药品和抗忧郁药品都卖光了，整个城市找不到半颗安定(Valium, 编按：一种抗焦虑剂，可改善失眠症状)。

接着遭到摧毁的是眼睛。英国《卫报》4月4日报道：“傍晚的轰炸中听不到爆炸声，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突然间，整座有500万人居住的城市陷入无边无际的可怕暗夜中。只有路过汽车的头灯能够消除黑暗，带来一线光明。”巴格达居民困在家里，彼此不能通话，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看不到外面。就像关在中情局黑牢里的犯人一样，整个城市好比加上了脚镣手铐，罩上面罩，接着又被剥光衣服。

安慰物品

在敌意的侦讯中，摧毁囚犯的第一阶段是剥夺囚犯的衣服，拿走能够引发囚犯自我意识的任何物品，也就是所谓的安慰物品。对囚犯特别有价值的物品，如《古兰经》或囚犯重视的照片，经常用公开侮辱的方式处理，传达的信息是“你什么都不是，我们要你变成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这么做的本质就是要剥夺人性。伊拉克人集体经历这种毁灭过程，看着最重要的制度遭到亵渎，历史文物用卡车载走，就此消失。轰炸严重伤害伊拉克，但是接下来不受占领军抑制的抢劫，才是最彻底抹杀国家灵魂的恶行。

《洛杉矶时报》报道：“千百个抢匪砸毁伊拉克国家博物院的古代陶瓷，搬空展示柜，抢走黄金和其他古物，这样根本就是掠夺人类社会的最初记录。博物院17万件无价的收藏品中，80%不见了。”国家图书馆收藏伊拉克出版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博士论文，如今成为焦黑的废墟。宗教事务部大楼烧到只剩骨架，有千年历史、用鲜明图案装饰的《古兰经》消失无踪。巴格达一位中学老师宣称：“我们的国家传统消失了。”当地一位商人谈到国家博物院

时说：“这是伊拉克的灵魂，如果国家博物院不能收回遭到抢掠的珍宝，我会觉得我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被偷走了。”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吉普森(McGuireGibson)说，这样“等于是脑叶切除术，整个文化的深层记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被移除掉”。

还好主要靠着神职人员在抢掠期间，组织抢救队伍，才收回了一部分文物。但是很多伊拉克人仍然相信，切断伊拉克的记忆是故意的，是华盛顿大计的一环，意在切割历史悠久的坚强民族，用美国人自己的模范取代。70岁的阿卜杜拉告诉《华盛顿邮报》：“巴格达是阿拉伯文化之母，他们希望扫除我们的文化。”

战争计划人员很快指出，洗劫是伊拉克人干的，不是外国军队所作所为。而且拉姆斯菲尔德的确没有计划要洗劫伊拉克，但是他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或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予以阻止。这种过错不能光是以疏忽两个字就能打发。

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有13座博物馆遭到抢匪抢劫，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贫穷、对旧政权不满以及普遍的混乱环境，会促使若干伊拉克人用同样的方式反应(尤其是几个月前，萨达姆已经释放所有的囚犯)。重要的考古学家早已警告过五角大楼，在攻击前，必须拟定无懈可击的计划，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3月26日，五角大楼发给联军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根据重要性，列出巴格达16处绝对必须保护的地方，排第二的就是博物馆。其他人也警告并且敦促拉姆斯菲尔德派出一队国际警察随军同行，维护公共秩序，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忽视。

然而，即使没有警察，巴格达也有够多的美军，可以派一些人到重要的文化场址，但就是没有付诸行动。很多报道指出，美军坐在装甲运兵车里，在市区停留，看着货车载着抢来的东西一辆一辆开过去，直接反映出拉姆斯菲尔德“事不关己”的漠视态度。有些单位自动负起阻止抢掠的责任，也有军队加入抢掠的例子。巴格达国际机场遭到军人彻底破坏，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军人砸毁机场的家具后，再转往跑道上的民航机：“美国士兵为了寻找舒服的座椅和纪念品，拆毁了很多飞机的设备，割裂椅子、破坏驾驶舱设备，把每一扇挡风玻璃都砸破了。”估计伊拉克国家航空公司蒙受了一亿美元的损失。在早期争议性很大的部分民营化计划中，这家公司是最先拿出来拍卖的资产。

官方为什么完全无意阻止抢掠，后来两个在占领军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提出了一些解释，一位是布雷默的高级经济顾问麦佛森(Peter McPherson)，另一位是占领军政府高等教育重建部门总监艾格瑞斯托(John Agresto)。麦佛森说，他看到伊拉克人抢走国家资产，包括汽车、巴士、政府部门的设备时，一点也不觉得困扰。麦佛森的职责是担任伊拉克最高级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责任是急遽缩小国家的规模，把国家的资产民营化，这点表示抢匪实际上正好助他一臂之力。“我认为有人夺取国家机器，或是把原本属于国家的货车开走，似乎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民营化，这样很好。”麦佛森是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场老手，坚决相信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把抢掠看成是“缩小”公共部门的一种形式。*

*就是这种抢掠行动让哈利伯顿可以向美国纳税人收取超高的费用，五角大楼也乐于偷偷开一扇窗；或许国防部认为，消失的千百万美元不是失窃，而是萎缩，全都是削弱政府、壮大企业运动中的一环。

他的同事艾格瑞斯托在电视上看到巴格达抢掠横行时，也看到一点希望。他把自己的责任当成“这辈子再也难逢的机会”，他负责从头改造伊拉克高等教育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解释说：把各大学和教育部全都搬空，提供了“干干净净、从头开始的机会”，是让伊拉克学校得到“最好现代设备”的机会。很多人显然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国家”，那么旧国家剩下的一切只是妨碍。艾格瑞斯托过去担任新墨西哥州圣约翰大学(st. John's College)校长，这所大学以《圣经》课程闻名。他解释说，虽然他对伊拉克一无所知，却克制自己，在前往伊拉克前不看跟伊拉克有关的书籍，这样他到达时“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胸”。艾格瑞斯托希望自己像伊拉克的大学一样，完全是空无一物的白纸。

如果艾格瑞斯托看过一两本书，可能会慎重思考是否需要消灭一切，重新开始。例如，他原本可以了解禁运扼杀伊拉克前，伊拉克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教育制度，拥有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1985年时，89%的伊拉克人识字。相形之下，在艾格瑞斯托家乡的新墨西哥州的人口中，有46%的人实际生活中看不懂文字，有20%的人口不会“基本的算术，不能把销售发票上的总额加起来”。*但是艾格瑞斯托极为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似乎不能接受伊拉克人可能希望解救并且保护本身的文化，也无法理解他们可能觉得文化遭到摧毁是锥心之痛。

*艾格瑞斯托重建伊拉克大学系统的工作彻底失败，一无所成地离开伊拉克后，修正了他先前赞成抢掠的态度，说自己是“被现实蒙蔽的新保守派”。这句话和其他细节都出自钱德拉赛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的《绿区：绿宝石城市里的帝王生活》(Green Zone,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这本书清楚记录绿区里的情况。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盲目，是反恐战争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在美国管理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里，有一个房间名叫“爱合”，若狱方认定囚犯不是敌方作战人员，不久就要释放，就会把囚犯带到那里，让他们看好莱坞电影，大吃特吃美国垃圾食物。遭到拘禁的英国人伊卡巴(Asif Iqbal)和两位朋友，被称作“提顿三人帮”(Tipton Three)，他们出狱回国前，获准到爱合好多次。他说：“我们可以看激光视盘、吃麦当劳、吃必胜客(Pizza Hut)，基本上非常放松。在这个区域，我们没有上脚镣手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其他日子我们像平常一样回到牢房！有一次，联邦调查局官员李斯利(Lesley)带来品客(Pringle)马铃薯片、冰淇淋和巧克力，这是我们回英国前最后一个星期的事情。”他的朋友艾贺梅德(Ruhel Ahmed)猜想，这种特殊招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搞错了，拷打我们两年半，希望我们会忘掉这件事”。

艾贺梅德和伊卡巴是在前往阿富汗参加一场婚礼时，遭到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逮捕。他们被痛打、注射不明药物、处在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小时；被剥夺睡眠，强迫剃毛发，剥夺所有的合法权益29个月。却以为可以用品客强大的诱惑力，要他们“忘掉这件事”，而狱方的计划也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难以相信，不过话说回来，华盛顿的伊拉克侵略计划大致就是如此：震撼并且恐吓整个国家，刻意摧毁伊拉克的基础建设，在伊拉克的文化和历史遭到破坏时毫不阻止，然后用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家电和进口垃圾食物打发一切。在伊拉克，这种消灭文化、再用文化取代的循环不是理论而已，全都在几星期内展开。

布什任命的伊拉克临时政府长官布雷默承认，他初到巴格达时，抢掠仍然盛行，秩序根本没有恢复。“我从机场开车进城时，巴格达实际上还在着火呢。路上没有车辆行人，完全没有电，没有石油生产，没有经济活动，连一个执勤的警察都没有。”然而，他对这种危机的解决之道是立刻彻底开放伊拉克的边界，对货物进口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没有签证费、关税、检查，也没有机场税。布雷默到任两周后，宣布开放伊拉克贸易。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严格限制、不能从事最基本贸易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小货车开着抢来的东西，前往约旦、叙利亚和伊朗，寻找买主；同时迎面开来的是一队又一队的平板货车，上面高高堆着好莱坞的数字激光视盘和约旦的卫星天线，准备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路边卸货。就在一种文化遭到焚烧、拆成零件待售时，另一种事先包装的文化涌入，取代旧文化。

准备加入这场边疆资本主义实验的美国企业中，有一家叫作新桥策略公司，这家公司由布什政府的前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署长欧尔鲍创立，他希望利用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协助美国跨国企业分得伊拉克的一杯羹。该公司一位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商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

整个伊拉克就像关塔那摩爱合的囚犯一样，美国人准备用品客和流行

文化来收买，至少这是布什政府的战后计划构想。

世界很乱，必须有人清理。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

谈侵略伊拉克的必要性，2002年9月布什想象出的中东和别人不同，实际上可能跟他对中东相当无知有关。要是他到过中东，看到中东很多功能失常的地方，他可能会灰心。布什没有见过日常实际状况，因而对这个地区可能的样子得以保持一种梦想。

——萨卡里亚(Fareed Zakaria)。《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5节(中文和合本)

伊拉克战争进入损害控制模式已经太久，很容易让人忘掉这场战争应当如何开展的原始设想；但是在占领初期，由美国国务院在巴格达举行的研讨会中，的确有个包装得很好的设想。这场会议有14位俄国和东欧高级政客与官僚参与，包括前财政部长、前中央银行总裁和前副总理。他们在2003年9月飞到巴格达国际机场，然后穿戴作战钢盔和护身盔甲，急匆匆赶到高墙围着的城中城绿区，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府“联军临时政府”(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过去就设在此地，现在则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这些要人贵宾在萨达姆过去的会议中心里，对一小撮有影响力的伊拉克人上课，传授资本主义转型。

波兰前右翼财政部长贝尔卡(Marek Belka)是主要讲者之一，他在布雷默指挥下，已经在伊拉克工作好几个月。根据国务院有关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贝尔卡灌输伊拉克人的信息是：他们必须把握这种混乱时刻，“强力”推动“会让很多人失业”的政策。贝尔卡说，波兰的第一个教训是“没有生产力的国有企业应该立刻卖掉，完全不必花精神用公款解救”。(他没有提到民众的压力迫使团结工会放弃快速民营化计划，波兰也因此免于俄罗斯式的崩溃。)他提到的第二个教训更大胆，这时巴格达沦陷已经五个月，伊拉克陷人人道灾难中，失业率高达67%，营养不良到了失控的程度；唯一能够拖延大规模饥荒的，是伊拉克家庭仍然收到政府补贴的食物和其他民生物资，就像贸易禁运期间由联合国管理的石油交换食物计划。如果加油站有汽油可以供应，他们也可以花几十美分就加满油箱。贝尔卡告诉伊拉克人，这种扭曲市场的赠品必须立刻废除。他强调，“发展民间部门要从取消补贴开始”，这些措施“比民营化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

接着上台的不是别人，就是叶利钦的前副总理盖达尔、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总工程师。国务院要盖达尔到巴格达，似乎认为伊拉克人不知道他因为跟黑道大亨关系密切，也因为政策造成数千万俄罗斯人穷困而声名大坏，在莫斯科已经被人视为贱民。*萨达姆统治期间，伊拉克能够接触到的外界消息有限，不过参加绿区会议的这些人都是刚刚回国的流亡人士，1990年代俄罗斯内爆时，他们看的是美国人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主要角色当中，很多人都是当初要求俄罗斯进行休克治疗的华府原班人马：老布什制定后苏联时代的政策时，切尼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国防部副部长，赖斯是老布什俄罗斯转型的主要顾问。对这些要角和几十位比较不重要的人来说，90年代俄罗斯的经验虽然造成平民的悲惨处境，却经常被当成伊拉克转型可以仿效的模范。

这次奇怪的会议，是由伊拉克临时工业部长陶菲格(Mohamad Tofiq)透露给我，当时新闻界并没有报道。好几个月之后，我们在他的巴格达临时办公室里见面(旧工业部已经变成烧黑的骨架)，他仍然还在嘲笑这次会议。据转述，伊拉克人咒骂穿着防弹背心的客人，告诉他们，布雷默打开边界、无限制地开放进口的决定，已经使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生活严重恶化，如果进一步削减汽油补贴，取消食物补助，占领军就要面对革命。至于明星讲师盖达尔，陶菲格说：“我告诉主办会议的一些人，如果我要在伊拉克鼓吹民营化，我会请盖达尔来，然后告诉他们：‘以前的规矩全都反过来就对了。’”

布雷默开始在巴格达当政的时候，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警告说：“伊拉克得到的休克治疗形式，比在前苏联推动的还激烈。”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根据华盛顿最初的计划，伊拉克会像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一样，变成待开拓的边疆，但这一次排在队伍最前面，等着争取稳赚的几十亿美元的是美国公司，不是伊拉克、欧洲、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痛苦的经济变革，因为在伊拉克跟前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转型不需要IMF官员与满怀幻想的当地政客协调配合，发号施令的是走廊另一边套房里的美国财政部；华盛顿连中间人都省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变成辅助性的角色，美国是前锋，也是核心。布雷默就是政府；一位美军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跟伊拉克政府谈判没有意义，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要跟自己人谈判”。

这些因素使伊拉克的经济转型跟先前实验的国家不同。90年代里，所有小心翼翼、努力不要让“自由贸易”看起来像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做法，现在全被抛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有轻装版的自由贸易，还有刻意保护的谈判，但是如今也有不需代理人或傀儡的重装版自由贸易，直接在先发制人攻击的战场上为西方跨国公司抓取新的市场。

主张“模范”理论的人现在宣称，他们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方出了严重问题，如同斐尔在2006年下半年所说的：“根本错误是把布雷默送到伊拉克。”弗鲁姆同意，华盛顿应该在“伊拉克的重建上，安排某个伊拉克人”。结果华府却把布雷默派去，让他住在萨达姆的蓝绿色圆顶共和宫，接收国防部用电子邮件发来的贸易与投资规章，打印出来，签署之后，用命令强加在伊拉克人身上。布雷默不是沉默的美国人，不是在幕后操纵布局的人，他有着美洲最热门电影明星的模样，喜欢新闻记者，似乎有意炫耀他宰制伊拉克人的绝对权力，喜欢搭乘闪亮的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来回视察，身边由黑水公司提供的美国私人安全佣兵保护，总是穿着已成他象征的固定服装，也就是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笔挺的西装和米色的天柏岚(Timberland)皮靴。皮靴是他儿子送他到巴格达上任的礼物，还附了一张卡片写道：“去踢那些人的屁股，老爹。”

布雷默自己承认对伊拉克一无所知，他告诉过一位访问他的人说：“我一直住在阿富汗。”然而，无知并不要紧，因为他只要搞清楚一件事就够了：他在伊拉克的核心任务是灾难资本主义。

2001年9月11日，他担任保险巨擘马殊集团(Marsh & McLennan)总经理兼“高级政治顾问”。这家公司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的北大楼设有办公室，并在攻击中遭到摧毁。最初几天，公司700名员工不知所终，最后证实有295人死亡。正好一个月之后，就是2001年的10月11日，布雷默创立危机顾问公司(Crisis Consulting Practice)，这是马殊集团的新设单位，专门协助跨国公司为可能的恐怖攻击和其他危机做好准备。布雷默接着宣扬他在里根政府期间担任反恐无任所大使的经历，提供顾客完整的反恐服务，从政治危机保险到公关都包括在内，甚至建议客户应该囤积什么东西。

布雷默早早打进国土安全产业，对他的伊拉克任务来说是理想的准备，因为布什政府采用在9·11事件中首创的反应方式来重建伊拉克：也就是把战后的伊拉克，当成一个令人兴奋、充满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可以赚到惊人暴利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因此布雷默虽然可能踩到了很多人的痛脚，但他的任务却绝对不是要争取伊拉克的民心，而是要让伊拉克准备好，以便推出伊拉克公司。从这种角度来看，他最初恶意十足的决定显然有着清楚的逻辑一贯性。

布雷默取代小心翼翼的加纳(Jay Garner)将军，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首席特使。他在伊拉克的最初四个月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经济改革上，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加起来等于古典芝加哥学派的休克治疗方案。美国侵略伊拉克前，伊拉克经济靠着国家石油公司和200家国有企业支撑，这些公司生产伊拉克的民生基本物资，也生产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包括水泥、纸张和食用油。布雷默履新后的下一个月，宣布这200家公司必须立刻民营化，“把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交到民间手中，对伊拉克的经济复苏至为重要”。

接着布雷默推出新的经济法令，为了吸引新外国投资人参与民营化拍卖，并在伊拉克建设新工厂和零售通路，他制定了一套激进的法令，《经济学人》用溢美的辞藻，说这是“外国投资人和捐助机构在发展中市场梦寐以求的东西”。有一项法律把伊拉克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率从大约45%，一律降为15%(直接从弗里德曼的作业手册中拷贝过来)。另一项法令容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样是为了预防俄罗斯的惨剧再度发生，以免绝佳的资产都落入当地黑道大亨手中。更好的是，投资人可以把在伊拉克赚到的利润全部汇出去；不必转投资，也不用缴税。这项法令也规定，投资人可以签署期限长达40年的租约与合约，到期后可以续约，这点表示未来的民选政府必须承受占领军政府签署的合约。华盛顿没有动手的一个领域是石油业，因为伊拉克顾问警告说，在伊拉克政府就任前，把国家石油公司民营化的任何举动，或是宣称拥有未开发石油蕴藏的所有权，会被伊拉克人视为战争行为。但是临时政府却从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拿走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收入，随心所欲地花掉。*

*其中约有88亿美元经常被人称为“伊拉克消失的数十亿美元”，因为2004年这些钱消失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各部门之间，几乎无影无踪。2007年2月，布雷默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里，为自己的监督不周辩护，他说：“我们的最优先事务，是恢复伊拉克的经济活力，第一步是尽快把钱送到伊拉克人手中。”委员会质问布雷默的财务顾问、退休海军上将奥利佛(David Oliver)，问他消失的几十亿美元哪里去了，他回答说：“是，我了解，我是说这样有什么差别？”

白宫极为重视为崭新的伊拉克经济揭开序幕，因此决定在占领初期推出崭新的货币，这点在运送作业上是重大任务。英国得利来公司(De La Rue)负责印制，钞票由机队运来，用装甲车辆和货车送到全国，至少跑了1000趟；这时，一半的人民仍然没有水可喝，交通信号故障，犯罪猖獗。

虽然执行这些计划的人是布雷默，优先事项却直接由最上层决定。拉姆斯菲尔德在参院委员会作证时，描述布雷默的“全面改革”是创制“自由世界最开明、最诱人的租税与投资法律”。投资人起初似乎很欣赏这方面的努力。几个月内，就传说麦当劳要在巴格达市区开店，这是伊拉克加入全球经济的终极象征；喜达屋豪华旅馆(Starwood)投资的资金几乎已经到位，通用汽车计划在伊拉克新建一座汽车厂。在金融方面，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银行汇丰集团(HSBC)取得合约，要在伊拉克全境开设分行，花旗集团宣布计划，要对伊拉克未来的石油销售，提供巨额的贷款保证。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Lukoil)等石油业巨擘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准备签署合约，要训练伊拉克公务员最新的开采科技和管理模式，相信自己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布雷默的法律意在创造能够激发投资热潮的环境，但这些法律不完全是原创的，它们只是先前休克治疗实验中所用法律的加速推动版。但光是等待法律生效，并不能让布什的灾难资本主义内阁满意。伊拉克的实验进入了大胆的新领域，就是把侵略、占领与重建变成令人兴奋、完全民营化的新市场。这个市场就像国土安全体系一样，是利用庞大的公共资金创造出来的。光是为了启动重建热潮，动用的资金就包括美国国会拨出的：380亿美元、其他

国家提供的150亿美元，以及200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收入。

初期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方案宣布后，论者以赞赏的角度将之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布什也援用这种比喻，宣布重建是“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的同类财务投资”。布什也在占领伊拉克的头几个月里，在电视转播的演说中宣称：“美国以前完成过这种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协助振兴战败国日本和德国，而且在他们建立代议政府时，跟他们并肩作战。”

然而，拨用在伊拉克重建上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最后去向如何，却跟布什引用的历史毫无关系。根据原始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企业因为输送机具和食物到欧洲而获益，但是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很清楚，是要协助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经济复苏，变成自给自足的市场，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培养能够资助国内社会服务的税基：最后的结果很明显，今天德国和日本的混合型经济就是证明。

事实上，布什内阁推动的是反马歇尔计划，几乎在大家所能想象的每一方面，都跟马歇尔计划正好相反。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保证会进一步伤害伊拉克已经严重受创的工业部门，造成伊拉克的失业率飞跃上升。马歇尔计划禁止外国公司投资，避免外国公司利用这些国家的脆弱状态，布什的计划却全力吸引美国企业(只剩下几根骨头，丢给参加“志愿联盟国家”的公司)。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原因是在“美国优越、伊拉克差劲”的露骨种族主义想法支持下，窃占伊拉克的重建资金，而不只是常见的邪恶“贪腐”和“没有效率”而已。

伊拉克工厂完全没有收到这些钱，因此不能重新开张、奠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本地创造就业机会、资助社会安全网。在这个计划里，伊拉克人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大部分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负责发包的这些联邦政府合约，就像是某种盒装的国家组件，在弗吉尼亚州和德州设计，然后在伊拉克组装。就像临时政府一再宣称的，整个计划是“美国人民送给伊拉克人民的礼物”，伊拉克人只要把盒子拆开就成了。组装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工资低廉的伊拉克劳工，因为哈利伯顿、贝泰和加州的工程业巨擘柏诚公司(Parsons)等美国大包商，宁可进口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外国劳工。伊拉克人再度变成又惊又怕的旁观者，首先被美国的军事科技震慑，接着又被美国的工程与管理能力震慑。

临时政府员工甚至美国政府员工的作用，就像国土安全部门产业一样，越来越不重要。布雷默的手下只有1500人，却要统治幅员广大、人口2500万的国家。相形之下，哈利伯顿在这个地区就有5万个员工，其中很多人都是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后，受到民间部门高薪吸引转业的人。

政府力量微弱、民间企业力量强大，再度反映布什内阁利用伊拉克的重建(布什内阁可以完全控制重建，在国内却不能完全控制联邦政府官僚机构)实施完全外包、政府空洞化的构想。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的政府功能中，没有一种功能“重要”到不能发交给包商办理，最好能够交给向共和党提供资金，或是在竞选时能够供应体面工作人员的包商。布什政府常用一句老话，规范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外国势力所有层面：如果任务能够交给私人企业，一定要由私人企业完成。

因此，法律可能是由布雷默签署生效，经济的设计与管理却由民间会计师负责。大型国际会计与顾问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旗下的毕博公司(BearingPoint)取得2.4亿美元的合约，负责在伊拉克建立“市场导向的制

度”；这份合约有107页，提到“民营化”51次，原始合约大部分是由毕博公司草拟。智库获得发挥智力的工作，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得到协助伊拉克公司民营化的合约。民间保安公司和国防承包商负责训练伊拉克的新军队和警察：例如戴恩(Dyncorp)、文奈尔(Vinnell)和凯雷集团旗下的USIS。从事教育事业的公司负责草拟后萨达姆时代的课程、印制新教科书：华盛顿的管理与教育顾问业者首创公司(Creative Associates)，赢得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合约，负责这些事情。*

*首创公司的员工、伊拉克裔美国人拉敏(Ahmedal-Rahim)解释：“当初的构想是我们可以制定出课程，直接送到伊拉克。”结果伊拉克人抱怨“美国搞的东西有些是不可接受的，全都报废了”。

同时，切尼在伊拉克采用哈利伯顿公司在巴尔干半岛开创的模式，也就是把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迷你城市，只是规模变得更大。哈利伯顿除了负责兴建和管理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绿区从一开始就是哈利伯顿管理的城市国家，从道路维修、害虫防治到电影院和迪斯科之夜，一切事情都由哈利伯顿公司负责。

联军临时政府的人力实在太少，无法监督所有承包商，此外，布什政府认为，监督是可以外包办理的非核心功能。因此以2850万美元的代价，聘请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业者西图集团(Ch3M Hill)和柏诚公司合组的合资企业，监督另外四家大承包商。连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的工作都民营化，以价值4.66亿美元的合约，发包给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公司(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但是三角研究公司到底有什么资格能够在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却一点也不清楚。该公司的伊拉克分公司经营阶层主要是高级的摩门教徒，比如像是梅菲尔德(James Mayfield)，他告诉自己在休斯敦的教会，认为应该可以说服穆斯林拥抱《摩门经》，让他们认为《摩门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相容。他在发回国的电子邮件中，想象伊拉克人会替他竖立雕像，把他视为伊拉克“民主之父”。*

*事实上，三角研究公司在好几个城镇阻止当地伊斯兰政党以民主方式取得权力，因此被赶出了伊拉克。

这些外国公司空降伊拉克之时，伊拉克200家国营企业则因为长期缺电而动弹不得。伊拉克过去拥有中东最先进的工业经济，现在伊拉克最大的企业在自己国家的重建工程中，连小小承包商的合约都拿不到。伊拉克企业若要参与这股淘金潮，便需要紧急发电机和一些基本维修材料；以哈利伯顿把军事基地盖成像美国中西部郊区的速度来看，这些需要应该都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伊拉克工业部的陶菲格告诉我，他一再提出供应发电机的请求，指出伊拉克17家国营水泥厂具有优势地位，能够供应重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也能够为数万伊拉克人创造就业机会。结果这些工厂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没有得到合约，没有拿到发电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美国公司像进口劳工一样，喜欢用高达十倍的价格，从外国进口水泥。布雷默发布的经济命令当中，有一条命令特别规定不准伊拉克中央银行融资国有企业(这件事好几年后才有人报道)。陶菲格告诉我，这等于联合抵制伊拉克工业，并不是因为实际的理由，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他说，负责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公共部门”。

伊拉克民间公司无法跟越过开放边界、蜂拥而来的进口产品竞争，因而纷纷倒闭，布雷默的幕僚却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布雷默的副手弗莱舍(Michael Fleischer)在伊拉克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中，证实伊拉克企业面对外国竞争，的确会有很多公司倒闭，不过这正是自由市场美好的地方。他雄辩滔滔地问：“你们会被外国企业打倒吗？答案要看你们自己而定，只有最优秀的伊拉克企业会生存下来。”他的话像盖达尔一样，据报道，盖达尔谈到俄罗斯中小企业因为休克治疗而倒闭时说：“这又怎么样？半死不活的就该死。”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布什的反马歇尔计划完全没有达成原来的目的。伊拉克人不把企业重建当成“礼物”，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现代版的抢掠；美国企业的速度与效率不但没有让任何人觉得惊奇，反而把“重建”的字眼，变成像伊拉克工程师所说的“没有人笑得出来的笑话”。每一次错估形势都造成反抗的水平升高，外国军队则用镇压对付，最后使伊拉克沦落成暴力横行的地狱。根据大部分可信的研究显示，到2006年7月，伊拉克战争已经夺走65.5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要是美国不侵略或占领，这些人不会牺牲。

2006年11月，退休美国陆军军官彼得斯(Ralph Peters)在《今日美国报》上写道：“我们的确给伊拉克人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建立法治的民主制度，但是伊拉克人宁可沉迷于旧有的仇恨，忏悔式的暴力、种族偏执和贪腐文化中。看来怀疑论者说对了：阿拉伯社会不能支持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度。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怎样的政府……暴力造成巴格达街头血迹斑斑，不但是伊拉克政府无能的象征，也象征在有组织人类行为的任何领域中，阿拉伯世界完全无法进步，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崩溃。”彼得斯虽然特别鲁莽，很多西方观察家却得到同样的结论：都是伊拉克人的错。

但我们不能把侵略与占领伊拉克，跟吞噬伊拉克的教派分裂与宗教基本教义分开来看。虽然在战争之前，这些力量的确已经存在，却比美国把伊拉克变成震撼实验场前微弱多了。大家应该记住，2004年2月，美国侵略伊拉克11个月后，牛津国际研究公司(Oxford Research Intemational)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伊拉克人希望拥有世俗化的政府，只有21%的受访者赞成“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14%的人把“宗教政治人物”列为自己偏爱的政治人物。六个月后，占领进入比较暴力的新阶段，另一项访调发现，70%的伊拉克人希望以伊斯兰法律作为国家的基础，至于教派之间的暴力，在占领的第一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听过。第一件重大事故，也就是2004年3月阿舒拉节(Ashoura)期间，什叶派清真寺遭到炸弹攻击，也是美国侵略一整年后的事情。毫无疑问的，占领深化并点燃了这些仇恨。

事实上，今天所有撕裂伊拉克的力量，包括猖獗的贪腐、凶残的教派主义、急剧上升的宗教基本教义和行刑队的残暴，全都跟着布什反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同步升高。萨达姆遭到推翻后，伊拉克迫切需要修补裂痕、重新统一，而且应该这样做。这个过程只能由伊拉克人领导，然而，伊拉克就在这种危险时刻，转型变成割喉竞争的资本主义实验场，这种制度造成个人和小区互相倾轧，剥夺了数十万人的工作和生计，而且用外国占领人员的免责权，取代了正义的追求。

现在伊拉克这么悲惨，不能简单归咎于布什的无能和任用亲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伊拉克人的教派主义或部落主义。这是确确实实的资本主义灾难，是战后贪婪彻底解放造成的噩梦，是因谨慎而忠实执行不受限制的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造成的“彻底失败”。至于伊拉克的“内战”问题和侵略行动背后最核心的政商财团主义计划之间有何关联，还无法详述，只能初步讨论。我认为这个过程是意识形态回过头袭击释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是意识形态的反弹。

大家最清楚的反弹案例是布雷默第一个重大行动造成的，也就是解雇大约50万名国有事业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军人，但也包括医生、护士、教师与工程师。这项行动叫作“去除复兴党行动”，本意原是要清除政府中效忠萨达姆的分子。毫无疑问的，这是动机之一，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裁员规模这么大，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攻击这么凶狠，惩罚不是高官的一般劳工。

这场整肃很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接受弗里德曼建议，推动休克治疗计划，删减政府支出25%，还附带对公共部门进行攻击。布雷默毫不隐瞒他对伊拉克“斯大林式经济”的反感，他用这个名词形容伊拉克国营公司和众多规模庞大的政府部门，而且他也不欣赏伊拉克工程师、医生、电机人员和道路兴建工人的专业技术与累积多年的知识。布雷默知道大家对失业会很生气，但是他的回忆录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想到突然切掉伊拉克的专门职业阶级，会使伊拉克的国家机构无法继续运作，因而妨碍他自己的任务。这种盲动跟反萨达姆的心态无关，完全是基于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只有极度偏向认定政府完全只是负担、公共部门员工全是废物的人，才可能做出布雷默这样的抉择。

这种意识形态的盲目，毫无疑问造成了三种冲击：将技术人员调离现职因而破坏了重建的可能性，削弱了世俗伊拉克人的声音，助长了愤怒人民的反抗。几十位美军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承认，布雷默解散的40万士兵中，很多人直接参与新兴的反抗运动，就像海军陆战队上校韩姆思(Thomas Hammles)所说：“现在你搞出几十万个拥有武器的人(因为他们带着武器回家)，这些人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前途茫茫、又有理由对你生气。”

同时，布雷默做出典型的芝加哥学派决定：大开边界，无限制开放进口，又允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触怒了伊拉克的企业阶级，很多人的反应是用自己剩下的极少数收入来资助反抗运动。调查记者葛兰姆(Patrick Graham)在逊尼三角地区(Sunni Triangle)采访第一年的伊拉克反抗运动后，在《哈泼杂志》(Harper's)上写道：“新的外国投资法律容许外国企业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断很多工厂，触怒了伊拉克企业家，因为外国产品蜂拥而入，他们的收入暴跌……这些企业家知道，暴力是他们唯一的竞争优势，这是很简单的事逻辑：伊拉克的问题愈多，外国人就愈难打进来。”

白宫决心预防未来的伊拉克政府改变布雷默的经济法令，引发了更多意识形态反弹；从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第一项“结构调整”计划以来，就一直用方法“锁住”危机初期做的改革。从华盛顿的观点来看，布雷默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投资法令，如果伊拉克政府能够在几个月后掌权且改写这些法令，那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布雷默大部分的法令处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布什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为伊拉克制定新宪法，而且下定决心，不惜流血，也要完成任务：首先是制定临时宪法，锁住布雷默制定的法律，接着是制定永久宪法，希望达成同样的目的(却失败了)。

很多法律专家对华府一心一意制宪深感困扰。表面上，伊拉克没有迫切的需要，不必从头制定新宪法，伊拉

克1970年制定的宪法虽然遭到萨达姆漠视，但还相当合用，而且伊拉克有其他更为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制宪过程是任何国家(就算是承平时期)可能遭遇到的最痛苦过程，会使每一种紧张、对立、偏见和潜在的不满浮上表面。把这种过程强加在后萨达姆时代分裂而破碎的伊拉克(还强加两次)，大大提高了国内产生纷争的可能性，各种谈判造成的社会鸿沟根本无法弥补，甚至可能造成国家分裂。

很多伊拉克人认为，布雷默把伊拉克200家国营公司民营化的计划，和取消所有贸易限制一样，是美国发动的另一场战争。工人都知道，要让这些公司吸引外国投资人，高达三分之二的劳工一定会失业。我在伊拉克一家大型国营公司听到一个故事，这家公司拥有七座生产食油、香皂、洗碗精和其他基本物资的工厂，让我深深了解宣布民营化制造了多少新的敌人。

我到巴格达市郊的这座厂区采访时，碰到了马穆德(Mahmud)。马穆德很有自信，才25岁，留着干干净净的胡子。他说，美国占领伊拉克六个月后，他和同事听说有个计划要卖掉他们的工作场所，都“深感震惊，如果民间部门买下我们的公司，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裁员，以便赚钱。我们会被迫沦落到很悲惨的命运，因为这座工厂是我们唯一的谋生方法”。包括马穆德在内的17位工人，对未来深感惊恐，就到经营阶层的办公室跟一位经理人争执，接着打起架来，有一位工人打了经理人，经理人的保镖对工人开枪，然后把枪口对着他。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几个月后，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经理人和他儿子上班途中遭到枪击，受到重伤。我们的会晤结束时，我问马穆德说，如果工厂不顾他们的反对，还是要卖掉，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善地笑着说：“有两个选择，不是我们把工厂放火烧成平地，就是我们自己到工厂里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工厂绝对不会民营化。”这是众多初步警告之一，警告布什团队绝对高估了自己用休克手段让伊拉克人屈服的能力。

华盛顿的民营化美梦还有另一个障碍，就是支撑占领本身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临时政府因为排斥所有跟国家有关的东西，联军临时政府用极度不足的人力和资源，从绿区发号施令，推动野心勃勃的计划，尤其是在面对马穆德之类工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施政。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钱德拉赛卡兰说的一样，临时政府的组织空有骨架，只指定了三个人负责推动伊拉克国营工厂民营化的艰巨任务。一位东德来的代表建议这三位孤零零的职员说：“你们根本不必开始。”东德出售国家资产时，指派了8000人负责推动计划。简单地说，临时政府本身就太过于民营化，无法让伊拉克民营化。

问题不只是临时政府人力不足，而且这些人力都缺乏对公共部门的基本信念，缺乏信念完成从一无所有重建国家的复杂任务。诚如政治学家伍尔夫(Michael Wolfe)所说：“保守派无法好好治理，原因跟素食者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红酒炖牛肉一样，如果你认为自己被迫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可能把任务做好。就统治而言，保守主义是灾难的代名词。”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临时政府中的美方官员年轻、没有经验；事实上，一群20来岁的共和党员担负重要职务，监督伊拉克130亿美元的预算。毫无疑问，这批所谓的童子军成员太过年轻，不过这还不是他们最大的毛病。这些人不只是随随便便由政治任命的亲信而已，而是美国针对所有凯恩斯主义遗迹进行反革命的先锋部队，其中很多人都跟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有关，这个基金会从1973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弗里德曼主义的大本营。因此不管他们是22岁跟着切尼的实习生，还是六十好几的大学校长，他们在文化上，都对政府和统治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国内废除社会安全制度和公共教育系统时很有用，但实际上要建立已经遭到摧毁的公共制度时却毫无用处。

事实上，很多人似乎认为这种过程没有必要。负责重建伊拉克医疗保健制度的哈夫曼(James Haveman)，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反对免费的公共医疗，以致他在这个小孩死因70%为腹泻之类疾病的伊拉克、在早产儿保育器是用防水胶带黏在一起的伊拉克，却决定他最优先的任务是让药品流通系统民营化。

绿区缺乏有经验的公务员不是一项疏忽，而是意味着从一开始，占领伊拉克就是政府空洞化的激进实验。等到一辈子在智库里纸上谈兵的人抵达巴格达时，重建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全部发包给哈利伯顿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等公司。绿区的人身为公务员，工作只是管理零用金，负责把包在收缩膜里的整迭百元大钞发给包商。这种情形鲜明地显示出政商财团主义国家可接受的政府角色：就是像输送带一样，把公款输送到民间手中；要做这种工作靠的是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远比丰富的现场经验来得重要。

美国坚持伊拉克采用严格的自由市场制度，不准有国家补贴，也不准有贸易保护，之所以会让伊拉克人这么生气，这种不停的输送带角色是原因之一。弗莱合对伊拉克企业家演讲时解释说：“接受保护的企业永远、永远不会

有竞争力。”然而，哈利伯顿、贝泰、柏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三角研究公司、黑水和所有在伊拉克占重建便宜的美国公司，都是庞大保护主义帮派的一员；美国政府用战争替他们开创市场，甚至禁止他们的对手加入竞争，然后付钱请他们工作，同时保证利润，而且利润全都是纳税人出的钱。弗莱舍面对这种讽刺的状况，似乎完全不受影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核心目的是瓦解新政形成的国家福利制度，现在他们在这种政商财团主义新政中赢得了最后胜利，形成比较简单、比较赤裸裸的民营化形式，甚至不必把大笔的资产移转出去，只要直接让企业大吃特吃国家的资金，不必投资，不必负责任，还有像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这种双重标准具有爆炸性，但同样深具爆炸性的是有系统地把伊拉克人从重建计划中排除。大部分伊拉克人经历了禁运和侵略的痛苦，自然认为自己有权从国家的重建中得到好处：不只是从最后结果得到好处，而且要从过程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得到好处。数以万计的外国劳工拥进伊拉克，为外国包商工作，这在伊拉克人看来就是侵略的延伸。这样不是重建，而是用不同方式伪装的毁灭：彻底消灭伊拉克人引以为国家光荣、又跨越教派的强大本国工业。布雷默统治期间，美国资助的重建工程只雇用了1.5万名伊拉克人，数字低得惊人。我和伊拉克裔美国人席多(Nouri Sitto)在绿区见面时，他告诉我：“伊拉克人认为，所有这些合约都流进外国人手中，这些外国人引进自己的安全警卫和所有工程师，我们被人认为只是旁观者，你还期望什么？”席多搬回巴格达，协助临时政府重建，但是他不愿意说空话。“经济是恐怖主义和不安全最大的原因。”

大部分暴力直接针对外国公司，还有这些公司的工程与员工；有些攻击显然来自以扩大混乱为指导原则的伊拉克国内势力，例如基地组织。然而，如果从一开始，一般伊拉克人就把重建视为全国计划的一环，或许他们会像捍卫自己的小区一样捍卫重建计划，惹是生非的人想达成目的就会困难多了。

布什政府原本只要规定接受美国税款的公司必须进用伊拉克人推动工程，也可以直接把很多工作包给伊拉克公司。实际上，布什政府好几年里都没有采用这种常识性的简单做法，因为这样做跟他们的基本策略冲突，无法把伊拉克变成新兴市场经济泡沫；每个人都知道，泡沫不是依靠规定和管制而膨胀起来的，没有法规才能让泡沫膨胀。因此，包商打着速度与效率的旗号，可以随心所欲雇用任何人、随心所欲向任何国家进口、随心所欲把工程转包给任何公司。

如果在美国侵略后半年内，贝泰公司的水管可以送来干净饮水，家里有奇异生产的电灯照明，病弱的人在柏诚公司新建的医院里得到治疗，街头有戴恩公司训练的警察巡逻，很多公民(不过并非所有公民)应该会压下被排除在重建过程外而产生的怒火。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早在伊拉克反抗势力开始有系统地以重建工地为目标前很久，情形就很清楚，在这么庞大的政府工程中，应用自由放任原则是一场大灾难。

外国公司免于所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大致上可以豁免刑事起诉，掌握保证可以收回成本、赚到利润的合约，因此这些包商的所作所为根本就可以预料到：他们拼命诈欺。伊拉克人称为“头头”的大包商，进行复杂的转包计划，在绿区、甚至在科威特市或安曼(Amman)设立事务所，然后转包给科威特公司，科威特公司再转包给沙乌地人，沙乌地公司发现形势变得太危险时，终于以合约价值的几分之一，转包给伊拉克公司。民主党众议员多尔根(Bvron Dorgan)以巴格达一件空调设备合约为例，指出上述的转包关系：“合约转到小包商手里，再转到另一个小包商手里，经过四层转包，空调设备合约的价款变成付给四层小包商，第四层小包商最后在房间里装上电扇。不错，美国纳税人付出冷气机的价格，钱经过四次转手后，像冰块在房间里移动一样，结果是伊拉克某间屋里装了一架电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人在这段过程中，看着援助资金被人盗用，国家却备受煎熬。

2006年11月，贝泰公司打包离开伊拉克时，把自己无法完成工程的原因归咎于“过重的暴力包袱”。但是早在伊拉克武装反抗造成情势紧张前很久，贝泰公司就已经违约。从重建的第一批中小学起，便招致当地居民不满。2004年4月初，伊拉克陷入暴乱状态前，我参访巴格达中央儿童医院(Baghdad Central Children's Hospital)，这家医院理当由另一家美国包商重建完毕，但是走廊上有很多裸露的污水管，没有一个马桶可以用，负责维修的工人非常穷，穷到没有鞋子穿，他们是小小小包商，就像在自家厨房桌上缝制衣服的妇女，其实是沃尔玛百货(Wal-Mart)的小小小小包商。

诈欺行为持续了三年半，一直到所有负责重建的美国大包商撤出伊拉克为止，他们领走了几百亿美元，大部分工程却没有完成。柏诚公司得到1.86亿美元，要兴建142所卫生诊所，最后只完成了6所。甚至大家当成重建成功题材的工程都遭到质疑，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7年4月，美国检察官到伊拉克调查美国包商完成的八项工程，其中有一所妇产科医院、一套净水系统，却发现“七项工程都已经不能如同当初的设计运作”。《纽约时报》也

报道，2007年伊拉克电力网的发电量远低于2006年。到2006年12月为止，所有主要重建合约接近结束时，司法部总检察长调查87件美国包商在伊拉克涉嫌诈欺的案子，发现占领期间贪腐横行不是管理不当的结果，而是政策决定的结果，因为如果要把伊拉克当成狂野西部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就必须免除所有法律的约束。

布雷默的临时政府不会努力阻止各种弊案、附带交易和骗局，因为临时政府本身就是骗局。临时政府虽然号称是美国占领当局，但是除了名义之外，临时政府是否具有占领当局的特性却不清楚。恶名昭彰的卡斯达公司(Custer Battles)贪腐弊案爆发后，审理法官清晰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两位旧员工出面举发，使这家保安公司遭到起诉，罪名是履行临时政府核发的重建合约(主要是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工程)涉嫌诈欺，诈骗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这个案子的根据是公司内部文件清楚显示该公司做两本账，一本是自己的内账，另一本是向临时政府请款用的账目。退休准将谭特(Hugh Tant)作证时指出，这件诈欺案“很可能是我在军方服役30年来见过最恶劣的案子”。(卡斯达公司涉嫌的很多违法行为中，据说有一件是盗用伊拉克拥有的机场堆高机，将它们重新油漆，然后向临时政府请领租用堆高机的费用。)

2006年3月，弗吉尼亚州一位联邦法官做出对该公司不利的判决，判定该公司犯了诈欺罪，勒令该公司缴交10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这家公司于是拿出一份泄露内情的辩词，要求法官推翻判决，宣称临时政府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美国的法律管辖，包括不受美国的《虚假申报法案》(False Claims Act)约束。这份辩词的意义很重大：布什政府已经豁免在伊拉克营业的公司，使他们不受伊拉克法律约束；如果临时政府也不受美国法律约束，就表示包商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的法律。这次法官的判决对该公司有利：他说，有很多证据显示，卡斯达公司对临时政府“诈欺性地虚增发票金额”，但是他裁定原告“未能证明这些请款是对美国政府提出”。换句话说，在伊拉克经济实验的第一年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只不过是个幻影：伊拉克没有政府，只有一个漏斗把美国税款和伊拉克石油收入转给外国企业，完全无法可管。这一来，伊拉克变成了代表反国家反革命最极端的体现，变成了空洞的国家，就像法院的最后判决，伊拉克是空无一物的地方。

临时政府把几十亿美元转交给包商后，也解散了，原来的职员回归民间部门。弊案爆发时，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绿区可怕的记录辩护，但是伊拉克人却感受到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切肤之痛。贝泰公司宣布撤出伊拉克一周后，伊拉克电力部一位工程师说：“现在的情况糟糕多了，虽然美国公司签订了金额惊人的合约，情况似乎没有改善。”莫苏尔(Mosul)一位出租车司机问道：“什么重建？我们今天得喝没有经过处理的水，水厂是几十年前盖的，从来没有维护过，电力一天只供应两小时，我们现在退步了，因为没有瓦斯，我们现在都到森林里找柴火来煮饭。”

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教派冲突兴起，是最致命的反弹形式，也是重建彻底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占领者显示自己无法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最基本服务，清真寺和地方民兵填补了虚空。年轻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Moqtadaal-Sadr)，特别善于在巴格达到巴斯拉的什叶派贫民窟里，进行他自己特有的影子重建，吸引了忠诚的徒众，也暴露出布雷默民营化重建的失败。他初期利用信徒对清真寺的捐款，后来可能也利用伊朗的协助，设立很多中心，派出电工，修理电线和电话线，安排清运当地垃圾，装设紧急发电机，推动捐血活动和指挥交通。他在占领初期说：“我发现了一个真空，没有人填补真空。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去做。”他也把在布雷默统治下没有希望的伊拉克失业青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黑色制服和生锈的卡拉希尼克夫步枪(Kalashnikovs)，结果就是今天伊拉克教派战争中最有力的部队曼迪军(Mandi Army)，这些民兵也是政商财团主义留下来的负债：如果重建能够为伊拉克人提供就业机会、安全和各种服务，萨德尔就不会有这种新使命，还拥有众多的新信徒。结果，美国企业的失败，奠定了萨德尔成功的基础。

布雷默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必然下场：公共部门员工人数被减到最少，而且大部分是约聘员工，住在哈利伯顿盖的城市国家里，任务是签署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草拟的对企业友善法律，把一袋又一袋的现金发交西方包商。西方包商靠着佣兵保护，自己躲在完全豁免法律追诉的保护网里，四周全都是愤怒的人民，人民逐渐转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因为这是空洞化国家里唯一的力量来源。现在的伊拉克就像俄罗斯的帮派主义和布什的任用亲信主义一样，是五十年来推动世界民营化的圣战所造成，这种产物不但没有跟创造者断绝关系，反而应该视为是背后意识形态最纯净的化身。

在那种情况下，
政府解散人民
另选别人
应该比较容易吧！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解决之道》(solution), 1953年

伊拉克是中东最后一块有希望的边疆。伊拉克钻探的油井中，80%都有发现。

——爱尔兰佩特瑞石油公司(Petrel)总裁何根(David Horgan), 2007年1月

布什政府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伊拉克推动的经济计划，可能引发暴力反弹吗？有一个人应该早就知道可能的不利后果，这个人就是负责执行政策的布雷默。2001年11月，他新创反恐企业危机顾问公司后不久，为客户写了一份政策文件，说明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面对的恐怖攻击风险增加。他在这份名叫《国际企业新风险》的文件中，告诉精英客户，说他们会面对日增的危险，原因在于让他们变得如此富有的那个经济模型。他写道，自由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却也为很多人带来立即的不利影响，自由贸易需要裁员，开放市场，接受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零售商和独占贸易组织带来了惊人的压力”。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秩序的恶化”，进而可能造成美国公司遭到各种攻击，包括恐怖攻击。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如果策划战争的人认为，他们推动的经济计划在政治上不会碰到反弹，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拉克人会主动同意这种系统化的侵占政策，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事情，相信伊拉克人会迷惘、集体退缩、无力应付转型的步调。换句话说，他们依靠的是震撼的力量，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说得很清楚，他说伊拉克经济与军事休克治疗专家的主要思维是：伊拉克人会被美国的火力震撼到无以复加，对萨达姆的下台会高兴得无以复加，“因此可以轻易地引领他们从甲地点到乙地点”。接着经过几个月后，伊拉克人会从战后的茫然中复原，又惊又喜地在阿拉伯世界的新加坡过日子，在若干分析师兴奋地称之为“底格里斯河之虎”的国家中安居乐业。

实际上，很多伊拉克人立刻提出要求，要求在自己国家的转型中拥有发言权，布什政府对这种意外转折的反应，是造成大部分反弹的原因。

破坏民主制度

美国侵略伊拉克那一年夏天，曾经备受打压的巴格达居民日常生活虽然十分艰困，却怀抱着极浓厚的政治参与热情，以至于巴格达呈现一种几乎像是嘉年华会的气氛。大家不满布雷默的裁员、经常的停电和外国包商，但是好几个月以来，这种怒火主要透过突然爆发、不受限制、生气勃勃的言论自由发泄出来。整个夏天里，绿区的几座大门外，每天都有示威抗议，抗议群众中，很多都是要求恢复原有工作的工人；几百家新报纸创刊发行，上面印满了批评布雷默和他的经济计划的文章；教士在星期五的礼拜中讲政治，这种自由在萨达姆统治期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伊拉克全境的都市和省份，都出现自发性的选举。人民终于摆脱萨达姆的铁腕控制，在市政厅集会，选举能够在新时代代表他们的领袖。在萨马拉(Samarra)、席拉(Hilla)和莫苏尔等城市，宗教领袖、世俗的专业人士和部落人民通力合作，定出地方重建工程任务的先后顺序，大大违背宗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即将爆发的最坏预测。会议气氛很热烈，但是基于很多原因，会议气氛也很欢乐：未来的挑战虽然艰巨，但是自由已经成为事实。美国军队相信布什总统所说派军到伊拉克是要传播民主，因此他们在很多例子里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协助安排选举，甚至搭建投票所。

民主热情和明确拒绝布雷默经济计划两件事合而为一，使布什政府处在极为困难的地位。布什政府做过大胆的承诺，要在几个月内，把政权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而且要立刻把伊拉克人纳入决策程序。但是第一个夏天的情形毫无疑问地显示，释出权力等于放弃一场美梦，梦中不但伊拉克会变成模范民营化经济体，而且散布着众多美国

军事基地；经济民族主义太深入人心，尤其是事关最宝贵的国家石油蕴藏时，更是如此。因此华盛顿放弃了民主承诺，转而下令提高休克级别，希望更高一级的休克最后能够发挥作用，达成目的。这个决定把纯粹自由市场圣战带回来绕了一大圈，回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发源地，也就是当初靠着镇压民主、逮捕与刑讯反对人士，以便强化经济休克治疗的国家。

布雷默初上任时，美国计划召集伊拉克社会所有阶层的代表，召开大型制宪会议，并由代表票选临时执政委员会成员。布雷默抵达巴格达两星期后，取消了这个计划，他决定亲自挑选伊拉克统治委员会成员。他在写给布什总统的信息中，描述他选择统治委员会成员的方式好比“瞎子的莽撞与三度空间跳房子游戏的混合体”。

布雷默说过要把统治权力交给统治委员会，但是他再度改变心意。“我跟统治委员会共事至此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是非常好的主意。”他后来解释说，统治委员会成员行动太慢、太深思熟虑，不适合他采用的休克治疗计划。布雷默说：“他们连安排两部汽车游行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根本不能及时做出决定，甚至根本做不出决定。此外，我仍然觉得，交出主权之前，制定宪法非常重要。”

布雷默的第二个问题是全国各省市纷纷举办的选举，到6月底，他到任才第二个月，就放话出去，说所有的地方选举必须立刻停止。新计划是伊拉克的地方领袖要像统治委员会一样，必须由临时政府任命。于是在伊拉克最大教派什叶派最神圣的圣城纳杰夫(Najaf)，爆发了意义重大的摊牌事件；纳杰夫在美军的协助下，正在推动全市选举，截止登记前一天，负责的中校接到海军陆战队少将马蒂斯(Jim Mattis)的电话。公认最权威的伊拉克战史《眼镜蛇二号》(Cobra II)作者戈登(Michael Gordon)和特雷纳(Bernard Trainor)将军写道，马蒂斯说：“选举必须取消，布雷默担心不友善的伊斯兰教候选人会获胜……不愿意让不对的人赢得选举，建议海军陆战队选择他们认为可靠的伊拉克人组成团体，选出市长。美国就是这样控制选举过程。”最后，美军任命萨达姆时代担任陆军上校的人当纳杰夫市长，伊拉克全国各城镇都一样。*

*这是“消除复兴党影响力运动”激起极多怒火的原因之一。下级士兵全都失去工作，必须加入复兴党才能在职业生涯中晋升的教师和医生也一样失业。高级复兴党军官以蹂躏人权闻名，临时政府却任用他们维持各个城市的治安。

在某些例子里，布雷默的禁令发布前，伊拉克人已经投票选出地方民意代表，布雷默悍然下令产生新议会。摩门教徒主导的包商三角研究公司获得授权，负责成立塔吉省(Taji)地方政府，三角研究公司解散好几个月前由当地人民选出的议会，坚持要从头开始。一位伊拉克人不满地说：“我们觉得我们在走回头路。”布雷默坚称他“没有下令全面禁止民主制度，我不是反对民主，但是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太早举行的选举可能有毁灭性，选举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

这时伊拉克人仍然期望华盛顿履行承诺，推动全国大选，把政权直接交给大部分公民选出来的政府。但是2003年11月，布雷默取消地方选举后飞回华盛顿，到白宫参加一些匆匆安排的会议；再回到巴格达的时候他就宣布取消大选，伊拉克第一个“主权”政府要用任命的方式产生，不用民选。

这种转变很可能跟一项民调有关，华盛顿的国际共和党员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这段期间里进行了一次民调，询问伊拉克人，如果有机会，会投票给哪一种政治人物。民调结果对绿区的政商财团主义分子好比警钟：49%的伊拉克受访者说，会投票给承诺要创造“更多政府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创造“更多民间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只有4.6%的受访者说愿意。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留住联军，到相当安全时为止”的政党，只有4.2%的受访者说愿意。简单地说，如果容许伊拉克人自由选举下一任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具有真正的权力，华盛顿就必须放弃这场战争的两大目标，一是在伊拉克设立美军基地，二是让美国跨国企业全面进占伊拉克。

批评布什政权内新保守派分子的人指责说，布什政权的伊拉克计划过度依赖民主制度，天真地相信自决观念。这种说法掩饰了临时政府第一年的实际记录，实际上，民主制度一冒出头，布雷默就把它砍下来了。他上任的头六个月，取消了制宪会议、否决了选举制宪代表的构想，撤销并阻止几十个地方与省级选举，最后又取消全国大选，根本不像是理想主义民主人士的做法。而且，现在把伊拉克出问题归咎于没有伊拉克代表的著名新保守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支持巴格达和巴斯拉街头发出的直接选举呼声。

最初几个月派驻在伊拉克的人当中，很多人认为推迟、削弱民主制度的多项决定和武装反抗的勃兴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争爆发后派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外交官龙恩(Salim Lone)认为，布雷默做出第一个反民主决策是关键时刻。他说：“例如，第一件针对在伊拉克外国人的致命攻击是2003年7月，在美国挑选出第一个领导团体伊拉克统

治委员会后，约旦大使馆随即遭到攻击；不久后，联合国的巴格达总部也遭到炸弹攻击，炸死了很多人……很显然，伊拉克人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比例不满，对联合国支持这个委员会不满。”龙恩在这次攻击中，失去了很多朋友和同事。

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来说，布雷默取消全国大选是严重的背叛，什叶派是伊拉克最大的族群团体，他们在伊拉克忍辱负重几十年后，一定会主导民选政府。一开始，什叶派只是用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反对，例如在巴格达有10万群众游行示威，在巴斯拉有3万人示威。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要、要、要选举。不要、不要、不要官派。”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第二高的教士哈金(Ali Abdel Hakim al-Safi)写了一封信给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我们的主要诉求是透过选举建立宪法机构，不是透过任命。”他宣称，布雷默的新计划“只不过是暴易暴”。而且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一定会遭到失败。布什和布莱尔不为所动，赞扬示威活动是自由开花结果的证据，却强力推动任命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第一任政府的计划。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萨德尔变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什叶派其他主要人士决定参与任命的政府，遵守在绿区里草拟的临时宪法；萨德尔决定脱队，谴责这种程序和宪法没有正当性，而且公开把布雷默比喻为萨达姆。他也开始积极建立曼迪军。很多什叶派教徒在和平抗议失效后，相信如果伊拉克要实现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他们必须用战斗来争取。

如果布什政府信守诺言，迅速把权力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反抗运动的规模会维持在小型、可以控制的状态，不会变成全国性的叛乱。但是信守诺言表示要牺牲伊拉克战争背后的经济目标，这是主导战争的人绝对不愿见到的事情，因此，伊拉克人对美国否认民主制度产生暴力反弹，也必须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反弹。

身体休克

反抗运动声势日增，占领军以加强休克的战术反击，士兵开始在深夜或凌晨破门而入，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屋内，用英语大吼大叫(有些字眼如“去他妈的”、“阿里巴巴”、“本·拉登”大家都听得懂)。女性面对破门而入的陌生人，惊慌的寻找头巾，遮盖头部；男性被强迫戴上头罩，丢上军用卡车，载到监狱和拘留所。占领的头三年半里，估计美军逮捕和拘禁了61500名伊拉克人，采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尽量提高逮捕休克”。到2007年春季，还有19000名伊拉克人遭到拘禁。到了监狱里，还有更多的休克随之而来，包括一桶一桶冰冷的水；露着牙齿咆哮的德国狼犬；又踢又打；有时候，还用通电的电线电击。

30年前，新自由派圣战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手法：所谓的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嫌疑犯被人从家里抓走，蒙上双眼，戴上头套，送进黑牢，面对酷刑和更可怕的场面。现在为了捍卫在伊拉克建立自由市场模范的希望，圣战计划绕了一大圈，完成整个循环。

刑讯的手段激增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拉姆斯菲尔德决心把军队当成现代的、外包的企业来经营。他规划部队的部署时，不太像是国防部长，反而比较像沃尔玛的副总裁，斤斤计较从工资总额中，多减少一些时薪支出。将领起初要求派出50万部队，他砍成不到20万人，却仍然认为有可以精简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分钟，为了满足他内心总裁的意识，又把战斗计划中需要的兵员减少几万人。

虽然他这种即时供应的部队能够推翻萨达姆，但是要应付布雷默用各种命令创造出来的伊拉克形势，也就是要应付公开反叛的人民、应付伊拉克军警撤出后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却一点希望都没有。占领军没有足够的人力恢复街头秩序，被迫退而求其次把上街的人全都关进牢里。历次突袭逮捕的成千上万囚犯送交中情局干员、美军和多数不曾受过训练的私人承包商，由他们进行狠毒的侦讯，找出跟反抗运动有关的信息。

占领初期，绿区招待很多从波兰和俄罗斯来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现在变成吸引另一种休克专家的磁石，也就是精于镇压反抗运动黑暗艺术的专家。民间安全公司的员工中，有很多参与哥伦比亚、南非与尼泊尔肮脏战争的老兵。根据记者史卡希尔(Jeremy Scahill)的报道，黑水和其他民间安全公司雇用超过700名智利军人派驻伊拉克，其中很多都是特战部队主管，有些人曾经在皮诺切特政权下受训、任职。

阶级最高的休克专家当中，有一位是2003年5月抵达伊拉克的美军中校史迪尔(James Steele)。史迪尔在中美洲右翼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在指控为萨尔瓦多行刑队的几个陆军营级单位，担任主要的美国顾问。他较近的

经历是安然公司副总裁，而且原本是以能源顾问的身份前往伊拉克，但是反抗运动勃兴后，他恢复原来的角色，成为布雷默的首席安全顾问。在他主导下，把五角大楼不愿具名人士所说令人恐惧的“萨尔瓦多方案”，引进伊拉克。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高级研究员席夫顿(John Sifton)告诉我，伊拉克凌虐犯人的情形和一般形态不同。凌虐通常出现在交战地区，在所谓的战争混沌时期，此时战场一片混乱，毫无规矩。阿富汗的情形就是这样。席夫顿说：“但是伊拉克不同，凌虐一开始就以专业的方式执行，然后情形越变越差，而不是越变越好。”他认定2003年8月底，也就是巴格达沦陷4个月后，是出现转变的时间点，据他说，那时开始传出凌虐的报道。

根据上述时间表，刑讯室里的休克紧接在布雷默推动最具争议性的经济休克后出现。8月底，布雷默持续整个夏天的立法和取消选举行动进入尾声。由于这些行动把更多人赶到反抗阵营里，临时政府只好派出美军破门而入，希望把反抗运动赶出伊拉克，方式是一次逮捕一个适于从军的男性。

看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后曝光的解密文件，可以清楚看出这种转变的时机。文件可追踪自2003年8月14日，当时伊拉克最高美军总部情报官员庞斯(William Ponce)上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派驻在伊拉克各地的同僚，里面有一段现在已经恶名昭彰的文字：“现在要对这些囚犯毫不留情.....因为上校说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这些人崩溃。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必须开始搜集情报，以便保护同胞不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庞斯请大家提供可以用

在囚犯身上的侦讯技巧，列在他所谓的“愿望清单”当中。各种响应涌入他的电子信箱，里面包括“低压电击”。

两周后的8月31日，关塔那摩湾监狱典狱长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将应邀来到伊拉克，从事“恶魔拷问”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任务。再过两周后的9月14日，伊拉克地区最高指挥官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授权下属，根据关塔那摩模式，采用一系列新侦讯程序，包括刻意的羞辱(叫作“摧残尊严与自尊心”)、“利用阿拉伯人怕狗的心理”、意识剥夺(叫作“灯光控制”)、意识超载(吼叫、嘈杂音乐)和“高压姿势”。桑切斯备忘录发出后不久的10月初，有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拍下了那些声名狼藉、让美军凌虐囚犯定罪的照片。

布什团队用震慑或经济休克治疗方法，都不能让伊拉克人休克和服从，现在休克手段变得更个人化，变成利用《库巴克侦讯手册》中导致囚犯退化的方式。

最重要的囚犯当中，很多人被送到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安全区，由军方重案小组和中央情报局管理。这个地方秘密之至，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去，红十字会完全不知道，连高级军官都不准进入。为了保密，这个地方的代号不断改变，从重案20到重案121，再改成626，后来又改称重案145。

囚犯关在小小的一般建筑里，建筑设计成要创造《库巴克手册》中典型的状况，包括完全剥夺意识。建筑分为五个区域：医疗检验区、看来像客厅的“软性房”(给合作的囚犯)、红房区、蓝房区，以及大家极为害怕的黑房区：黑房区里都是小小的牢房，四面都漆成黑色，四个角落都有扬声器。

这个秘密监狱会曝光，完全是因为在那里任职的一位中士化名佩里(Jeff Perry)，向人权观察组织揭发这个奇怪地方。比较起来，阿布格莱布监狱像精神病院，警卫没有受过训练，采用的方法大部分是在侦讯过程中自己想出来的；中情局的机场监狱却秩序井然，合乎科学，令人毛骨悚然。根据佩里的描述，侦讯人员想要用“强硬手段”对付住在黑房的囚犯时，会到计算机终端机前，印出列举各种拷问手法的清单。佩里回忆说：“一切都已经替你打点好，包括冷热环境控制、闪光灯、音乐等，还有出任务的狗.....你只要看看自己想用什么方法就成了。”侦讯人员列出表格后，就去找上司，请求批准。裴利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张表格上没有签名的。”

他和其他侦讯人员开始担心，这样做会违反日内瓦公约禁止“羞辱与降格待遇”的做法，他和另外三位侦讯人员担心，如果自己的做法曝光可能会遭到起诉，于是就去质问上校长官，“告诉他，我们对这种凌虐觉得不安”。这个秘密监狱极有效率，因此不到两小时内，一群军方律师就带着投影片光I临监狱，说明为什么囚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为什么意识剥夺不是凌虐，尽管中情局自己的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佩里谈到监狱的反应时间时说：“噢，真的是非常快，看来好像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是说，这两小时的幻灯片展示他们都准备好了。”

伊拉克全国各地还有其他监狱，囚犯同样受到库巴克式的意识剥夺手法凌虐，有些监狱甚至让人想起多年前麦吉尔大学的实验。另一位中士谈到位于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凯姆(Qaim)、名叫老虎军事基地的监狱，那里关了20到40个囚犯。据这位中士说，囚犯都被遮住眼睛、上手铐脚镣，放进滚烫的金属货柜里24小时：“不准睡觉、不准吃、

不准喝。”意识剥夺柜子让犯人顺从后，还用闪光灯和重金属音乐轰炸他们。

底格里(Tikrit)特别行动基地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只是那里的囚犯关在更小的箱子里：箱子的尺寸是4英尺乘10英尺，深度是20英寸，对成人来说，箱子太小了，不能站、也不能躺下来，让人强烈联想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那种牢房。囚犯关在如此极端意识隔离的情况，长达一周。至少有一位囚犯也指出，他遭到美国士兵电击，但是士兵都否认；然而，却有明显但是很少人知道的证据显示，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的确采用电击作为凌虐手段。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2004年5月14日，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一个月前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遭到判刑。美国民权联盟取得的政府文件指出，一位士兵“用变压器，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把电线顶着囚犯的肩部”，一直到囚犯受到电击而“跳起舞来”。

恶名昭彰的阿布格莱布照片公布后，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一位囚犯带着头套，站在箱子里，两臂垂下电线，这时军方碰到了奇怪的问题：负责调查凌虐囚犯事件的陆军犯罪调查司令部发言人解释说：“我们碰到几位囚犯宣称自己就是照片里的人。”这些囚犯当中，有一位是当过市长的阿里(Haj Ali)。阿里说他也被人戴上头套，站在箱子里，身体缠绕了电线。但是他的说法跟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警卫不同，警卫宣称这些电线没有通电，阿里却告诉公共电视网：“他们用电力电击我时，我觉得好像眼球都要爆出来了。”

阿里像几千个狱友一样，没有被起诉就从阿布格莱布监狱释放出来，狱方告诉他“抓错人了”，然后把他推上卡车送走。红十字会说，美国军官承认在伊拉克遭到拘留的人当中，70%到90%是被“误逮”。根据阿里的说法，美国管理的监狱中出现的这些人为错误，有很多受害者寻求报复。“阿布格莱布是叛乱分子的温床.....一切的侮辱和拷打使他们几乎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谁能怪他们呢?”

很多美国士兵了解也害怕这种反应。82空降师一位中士说：“也许他原来是好人，噢,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关系，他现在变成了坏人。”这位中士曾经派驻法鲁加(Fallujah)郊外的美军基地，也就是自夸为“疯狂杀人营”的部队驻地，守备一座特别凶狠的临时监狱。

伊拉克人管理的监狱里情况更糟。过去萨达姆总是十分依赖拷打来维持权力。如果在后萨达姆时代，拷打要销声匿迹，新政府必须集中力量致力取缔拷打。然而，美国却在训练和监督伊拉克新的警察部队时，立下了更低的标准。

2005年1月，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在伊拉克人管理、美国监督的监狱和拘留所里，拷打是“有系统的事情”，包括使用电击。第一装甲骑兵师一份内部报告宣称，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经常采用“电击和窒息法，以便取得口供”。伊拉克狱卒也采用拉丁美洲拷问法中独一无二的象征：牛只电击棒。2006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马哈穆德(Faraj Mahmoud)的案子，说狱卒“把他全身剥光，吊在天花板上，用电击棒电他的生殖器，电得他从墙壁上弹了起来”。

2005年3月，《纽约时报》杂志记者梅斯(Peter Maass)混入史迪尔训练的一个特警突击队单位，采访萨马拉一处由公共图书馆改建的恐怖监狱。他在里面看到囚犯蒙着双眼，戴着手铐脚镣，有些人遭到痛打，也看到血渍“从桌子侧面滴下来”。他听到呕吐声，也听到他形容为“可怕的尖叫声，就像疯子或被人逼疯的人发出的尖叫声”。还有清楚听到两声枪响，“从拘留所的里面或后面传来”。

萨尔瓦多的行刑队恶名昭彰，因为他们不但利用谋杀清除政治犯，也利用谋杀向广大的民众发出恐怖的信息。路边出现手足不全的尸体，等于告诉广大的小区：如果有谁犯了禁忌，可能会变成下一具尸体。遭到拷打的尸体上，经常留下代表行刑队身份的标志，例如曼诺布兰克旅(Mano Blanco Brigade)、或梅西米兰诺贺南德兹旅(Maximiliano Hernandez Brigade)。到2005年，这种信息已经变成伊拉克路边常见的景象：囚犯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伊拉克内政部有关的特战部队监狱，尸体被人发现时头上有一处弹孔，双手仍然铐在背后，或是脑壳上有电钻钻出来的很多个洞。2005年11月，《洛杉矶时报》报道，巴格达殡仪馆“每周在固定时间会收到几十具尸体，很多尸体的手腕还用警用手铐铐着”。殡仪馆会留下金属手铐，还给警方。

在伊拉克，也采用比较高科技的方式传达恐怖信息。《正义战胜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the Grip)是很多人看的电视影集，这部影集在美国人资助的伊拉克电视网播出，是和萨尔瓦多化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合作摄制的。好几位获释的囚犯说明这部影集的拍摄方法：在小区扫荡随意抓来的囚犯加以痛打、拷问，还威胁要对他们的家人不利，因此囚犯都愿意承认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包括律师后来证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罪行。然后电视摄影机出场，记录囚

犯“承认”自己犯下叛乱、偷窃、同性恋和欺骗等罪行。伊拉克人每晚在电视上，看着显然遭到刑讯、脸上淤血和浮肿的犯人认罪。萨尔瓦多化的特战部队领袖郁比特(Adnan Thabit)告诉梅斯：“这部影集对平民有很好的影响。”

新闻界初次提到“萨尔瓦多方案”10个月后，这种做法最为可怕的影响就很清楚了。起初由史迪尔训练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后来归属伊拉克内政部，为内政部工作，梅斯质问内政部在上述图书馆里看到的情形时，内政部坚持说：内政部“不容许本部管理的囚犯遭到任何人权侵害”。但是2005年11月，内政部地牢里找到了173位伊拉克人，有些人遭到极为严重的拷打，以致皮开肉绽，有些人脑壳上有电钻钻过的痕迹，牙齿和脚趾甲被人拔掉。获释的囚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出来，他们列出一张名单，指出有18个人在内政部地牢里遭到拷打死亡。

我研究卡梅伦1950年代进行的电击实验时，看到他的同事精神病学家罗威(Fred Lowy)的谈话：“弗洛伊德学派学者发展出极多巧妙的方法，可以一层、一层地剥洋葱，到达问题的核心；卡梅伦希望直接钻进去，根本不理会有多少层，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层次全都存在。”卡梅伦认为，他可以破坏病人的所有层次，重新开始；他梦想创造全新的人格，但是他的病人没有重生，却变得困惑不已，受到伤害，甚至崩溃。

伊拉克的休克治疗专家破坏了这些层次，希望找到难以找到的空白石板，据以创造新的模范国家。结果他们只找到自己创造的废墟，找到千百万生理和心理受残害的人民：受到萨达姆和战争的破坏，受到自相残杀的破坏。布什阵营的灾难资本家没有把伊拉克清扫得一干二净，只是激怒了伊拉克；他们没有找到历史被清算之后留下的白纸一张，却找到古老的派系战争，每一次攻击，不管是攻击卡巴拉(Karbala)或萨马拉的清真寺、攻击市场、政府部门或是医院，都会引发古老的派系战争和最新的仇杀。国家像人一样，不能用强力的休克归零后再启动，国家只会崩解、不断地崩解。

如此状况当然需要更多的破坏，需要提高破坏的剂量，按住破坏钮更久、造成更多的痛苦，投下更多的炸弹，动用更多的拷打。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曾经预测，可以轻易地把伊拉克人从一个地方带往另一个地方，后来他断定，真正的问题是太软弱。他说：“联军用人道的方式作战，实际上造成了人民比较难凝聚的情况，而不是比较容易团结。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人民筋疲力尽，深受过去的事情震撼；但是伊拉克的情形正好相反，非常快速地战胜敌军部队，表示伊拉克人民并不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被驯服：美国现在要应付没被吓坏、也没被震倒的伊拉克人民。”到2007年1月，布什和顾问仍然相信，可以用一次强力的“急速升高震慑”的方式，也就是彻底清除萨德尔军这个“暗中破坏伊拉克政府的癌症”，控制住伊拉克。根据急速升高策略所做的报告，目标是以“成功扫除巴格达中心”为目标，萨德尔的部队转移到萨德尔市(Sadr City)后，也要“用武力彻底扫清这个什叶派的堡垒”。

1970年代，政商财团主义圣战兴起时采用的手段，已被法院判决为刻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刻意屠杀某一类的人口。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更可怕，不只屠杀整个类别的人口，而是屠杀整个国家；伊拉克正在消失、正在土崩瓦解。就像平常一样，首先消失的是躲在面纱和门户后面的女性，接着是学校里的学童消失，到2006年为止，三分之二的学童留在家里。接着是专业人员消失，医生、教授、企业家、科学家、药剂师、法官、律师开始消失。从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估计已经有300位伊拉克学者遭到行刑队暗杀，包括好几位系主任；成千上万的学者逃走。医生的情况更糟糕，到2007年2月，估计有2000位医生遭到杀害，有12000位医生逃走。2006年11月，联合国难民总署估计，每天有3000个伊拉克人逃出伊拉克；2007年4月，难民总署指出，有400万伊拉克人，也就是七分之一的伊拉克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只有几百个难民获准移居美国。

伊拉克的产业全部崩溃后，唯一欣欣向荣的本土产业是绑架。2006年才过了三个半月，伊拉克就有将近2万人遭到绑架。国际媒体只有在西方人遭到绑架时，才会注意这件事，但是遭到绑架的绝大多数是伊拉克专业人员，他们在上下班途中遭到绑架，他们的家人若不拿出数万美元的赎金，就得到殡仪馆认尸。拷打也是蓬勃发展的产业，人权团体记录了很多案例，都是伊拉克警察向囚犯家属索取几千美元，交换不再拷打囚犯。这是伊拉克本土的灾难资本主义版本。

布什政府选择伊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国家，本意并非如此。美军占领之初，大家兴高采烈谈论干净的白纸和重新开始。然而，过不了多久，追求干净的梦想就恶化成“把萨德尔市或纳杰夫的伊斯兰主义连根拔起”，把法鲁加和拉马迪(Ramadi)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癌症”割除，不能清除的东西就用武力扫平。

想在别人的国家建立模范社会，后果就是这样。清除行动事先很少经过计划，碰到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拒绝放弃过去，干净白纸的美梦才会演变成它的另一个分身，也就是焦土政策；这时全面创造的美梦变成了全面毁灭的行动。

伊拉克现在淹没在无法预期的暴力中，正是极为乐观的伊拉克战争策划人员创造的结果；在“为新中东建立模范”这种乍看无害、甚至有点乐观的说法中，已经注定了这种命运。伊拉克解体的根源，是因为有个意识形态需要创造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新故事。创造不出这么干净的白纸时，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开始用爆破和激升剂量，然后再度激升剂量和爆破的方式，希望创造出应许之地。

失败是成功的新面貌

我搭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每一个座位上都坐满了逃离这场暴乱的外国包商。当时是2004年4月，法鲁加和纳杰夫都遭到围攻，光是那一星期里，就有1500位包商员工撤离伊拉克，还有更多人会撤退。同时，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政商财团主义圣战的第一次全面失败。美国除了没有动用核子弹之外，已经用每一种休克武器把伊拉克炸成粉碎，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制伏这个国家，这场实验显然已经失败。

现在我却不敢这么肯定。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个计划的若干部分造成了灾难，布雷默到伊拉克是要建立企业乌托邦，结果伊拉克变成了可怕的反乌托邦，随便去参加一场企业聚会，都可能遭到私刑处决、活活烧死或砍头。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到2007年5月，据报有超过900位包商人员遭到杀害，“超过12000人在战斗或工作现场受伤”。布雷默花了极多精神吸引的投资人没有出现，汇丰银行没有来，宝洁和通用汽车的合资事业没有成立。新桥策略公司先前吹嘘：“一家沃尔玛可以攻占全国”，现在承认“短期内麦当劳不会来开店”。贝泰的重建合约没有轻松换成长期经营供水与电力系统的合约。到2006年下半年，整个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民营化重建工程，几乎全都就地放弃，证明已有某些相当剧烈的政策逆转。

调查伊拉克重建案的美国特别检查总长鲍文(stuart Bowen)指出，在某些直接发给伊拉克公司的合约中，执行状况比较有效率，成本也比较低，也能激励伊拉克经济，因为这种合约让伊拉克人能够就业。实际上，资助伊拉克人重建自己的国家，比雇用笨重的跨国公司有效率，因为跨国公司不了解伊拉克，也不懂伊拉克的语言，还要用日薪900美元的佣兵保护自己，而且合约预算的管理费用高达55%。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担任医疗顾问的鲍尔索克斯(Jon C. Bowersox)提出了下列激烈的看法：他说，伊拉克重建的问题在于想要从零开始，重建一切。“我们可以深入其中，完成低成本的复原，而不是想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伊拉克的医疗制度。”

五角大楼出现更激烈的变化。2006年12月，国防部宣布新计划，要提升伊拉克国有工厂的设备和经营，之前布雷默还认为这些工厂是斯大林式的倒退而拒绝供应紧急发电机。现在五角大楼了解，不从约旦和科威特进口水泥和机械零件，可以向日渐衰弱的伊拉克工厂采购，让数以万计的人有工作做，而且可以把营业收入送进工厂四周的小区里。负责伊拉克企业转型的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布尔克莱(Paul Brinkley)说：“我们更深入研究一些工厂，发现这些工厂跟我们想象的不同，根本不是荒废的苏联时代企业。”但是他没有承认有些同事开始叫他斯大林主义分子。

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齐亚瑞里(Peter W. Chiarelli)少将解释说：“我们必须让愤怒的年轻人就业……失业率稍微降低，将会大幅降低持续进行的派系杀戮。”他忍不住又补充说：“经过四年后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对我来说，这是重大问题，跟作战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重要。”

这些转变是否代表灾难资本主义的末日？根本不是。等到美国官员终于了解，自己不需要从零开始重建崭新的新国家，知道提供伊拉克人就业机会比较重要，知道让伊拉克工业分享数十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比较重要，用来推动重建的所有资金已经花得一千二净。

同时，在这种新凯恩斯主义顿悟的过程当中，伊拉克却遭到历来最严重的趁火打劫行动伤害。2006~12月，由贝克领导的民主共和两党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大家等待已久的报告，呼吁美国“协助伊拉克领袖，改组国家石油工业，建成商业企业”，而且“鼓励国际社会和国际能源公司投资伊拉克石油部门”。

白宫漠视伊拉克研究小组的大部分建议，却没有忽略这项建议：布什政府立刻行动，协助伊拉克草拟激进的新石油法，容许壳牌和英国石油之类的公司签署30年合约，可以保留在伊拉克获得的石油利润，金额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在伊拉克这种容易开采石油的国家，这是前所未闻的优惠条件，而且对于95%政府税收来自石油的伊拉克，这样做好比判决伊拉克永远沦人贫穷的噩运。这种建议极不受欢迎，连布雷默在占领的第一年里，都不敢这样做。但是现在因为混乱日益严重，这种做法也出现了。石油公司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有道理，为什么可以把这么高

比率的利润汇出伊拉克时，宣称原因是安全受威胁。换句话说，灾难促成了这么激进的法律。

华盛顿采取行动的时机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华盛顿推动石油法立法时，伊拉克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教派战争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平均每周有1000个伊拉克人遭到杀害。萨达姆刚刚被美国人以邪恶而令人生气的方式处死，同时，布什派出“激增”的军队到伊拉克，根据“比较不受限制”的交战规则作战。对大石油公司来说，这时的伊拉克动荡得太厉害，根本不是从事重大投资的时候，因此伊拉克对新法律没有迫切必要，除非是为了利用混乱时机，逃避公众对伊拉克所面临争议性最大的问题进行讨论。很多民选的伊拉克民意代表说，有关方面正在研拟新法律，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被纳入草拟过程中。石油观察团体平台组织(Platform)研究人员穆迪特(Greg Muttitt)说：“我最近参加伊拉克国会议员的聚会，问他们有多少人看过这项法律。20位国会议员当中，只有一位看过。”穆迪特说，如果法律通过，伊拉克“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这时伊拉克没有能力定出有利的交易”。

伊拉克一些主要工会宣称，“石油业民营化是不能跨越的红线”，工会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项法律，说是趁着伊拉克仍然遭受占领、还在努力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时机，抢夺伊拉克的“能源库存”。2007年2月伊拉克内阁通过的石油法比预期还糟糕：对外国公司可以汇出伊拉克的利润金额，没有定出限制，对于多少家外国投资人可以跟伊拉克企业合作，或是雇用伊拉克人在油田工作，也没有特别规定。最可耻的是，新法排除了伊拉克民选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在未来的石油合约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创设了新的机构：联邦油气委员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委员会要以“国内外石油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顾问。换句话说，这个非民选机关在非特定外国人的建议下，对所有和石油有关的事物，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拥有全部的权力，可以决定伊拉克是否签署合约。事实上，这项法律等于规定：把伊拉克公众拥有的石油蕴藏，也就是伊拉克主要收入来源，豁免民主控制，改由有钱有势的石油独裁机构管理和经营，这一机构将与残破无效率的伊拉克政府共存。

说这样抢夺资源无耻之至，一点也不夸张。伊拉克恢复部分安定时，石油利润是资助国家重建唯一的希望。趁着国家四分五裂之际，抢夺这种未来的财富，是灾难资本主义最无耻的行为。

伊拉克的混乱还有另一个少有人讨论的后果：混乱拖得愈久，外国势力就变得愈民营化，最后形成作战方式和人道灾难处理办法的新模范。

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激进民营化意识形态，就在这种地方得到丰厚的报酬。布什政府坚决拒绝在伊拉克战争中增加人力，不管是增加部队人力，还是增加受到政府控制的官员人数，这点对布什政府的另一场战争，也就是把美国政府外包的战争，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好处。这种圣战虽然不再是布什政府公开宣扬的主题，却仍然是背后的主要动力，而且这场圣战的推动，比布什政府所有比较公开的战斗加总起来还成功多了。

因为拉姆斯菲尔德把这场战争设计成即时供应的侵略行动，士兵派去伊拉克只是从事核心战斗任务，而且因为他派兵到伊拉克的第一年，就把国防部和荣民事务部的员工裁掉了5万人，民间部门正好填补每一个阶层留下的空缺。实际上，这种结构的意义是：伊拉克陷入混乱之际，更复杂的民营化战争工业开始形成，充实只剩下骨架的军队——不论是在伊拉克从事地面任务的军队，还是在美国本土的华特里德医疗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治疗士兵的部门。

所有需要增加军队规模的解决方案，都遭到拉姆斯菲尔德坚决拒绝，军方只好设法从其他渠道找到更多士兵，投入战斗任务。民间安全公司因此涌入伊拉克，执行过去由士兵负责的任务，包括提供高层官员的保安、基地警卫以及保护其他承包商。民间保安公司进驻伊拉克后，为了因应乱局，角色进一步扩大。黑水公司当初获得的伊拉克合约只是为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但是美军占领伊拉克一年后，黑水公司已经全面走上街头战斗。2004年4月，纳杰夫的萨德尔起义行动中，黑水公司实际上取得了指挥权，指挥负责战斗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曼迪军进行长达一天的战斗，杀害了几十个伊拉克人。

美军开始占领伊拉克时，估计伊拉克有1万名二等兵，已经远远超过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人数。三年后，美国政府统计局的报告发现，从世界各地派驻到伊拉克的二等兵高达4.8万人。佣兵是仅次于美军的最大士兵团体，比盟军其他国家派出的士兵还多。财经新闻说，这种情形叫作“巴格达繁荣”：接受过去人人讨厌的民间影子部门，把这个部川完全纳入美国和英国的作战机器中。黑水公司席用积极的华盛顿说客，把“佣兵”这个字眼从公共辩论的词汇中删除，也把公司变成彻头彻尾的美国品牌。根据黑水公司总裁普林斯(Erik Prince)的说法：“这点可以回溯到我们公司的铭言：我们为国家安全机制服务，就像联邦快递(FedEx)提供的邮政服务一样。”

战场转移到监狱里后，军方极缺受过训练的侦讯人员和阿拉伯语译员，因此不能从新抓到的囚犯口中得到情报。军方迫切需要更多的侦讯人员和译员，就向国防承包商CACI国际公司求助。CACI原来取得的合约中规定，公司在伊拉克的任务是提供军方信息科技服务，但是合约中跟任务有关的文字很模糊，足以把“信息科技”扩大解释到涵盖侦讯。这种弹性是故意的安排：CACI是新一代的承包商，专门担任联邦政府的临时代理机构，公司拿到文字宽松、随时可以变化的合约，并维持大量待命的潜在员工，准备从事可能出现的任何任务。CACI的员工不需要通过严格的训练规定，也不需要像政府员工一样通过安全调查。打电话给CACI，就像订购新的办公室用品一样容易；片刻之内，几十个新侦讯人员就可以抵达伊拉克。*

*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人监督承包商的作业。美军执行调查阿布格莱布监狱址闻的报告断定，美国甚至没有派出政府官员到伊拉克，负责监督侦讯人员的做法，更没有派人到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因此“很难有效进行合约的管理”。撰写这篇报告的陆军上将赞伊(George Fay)断定，政府的“侦讯人员、分析师和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应付合约侦讯人员充斥的现象，也没有受过训练，不能管理、控制和惩罚这些人员。情形很清楚，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没有适当监管合约表现的可靠做法”。

从混乱中得到最大利益的公司是哈利伯顿。哈利伯顿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就取得一项合约，负责扑灭萨达姆军队撤退时造成的油井大火。大火其实没有发生，哈利伯顿的合约就扩大解释涵盖新任务：提供伊拉克全国所需要的燃料。这个任务非常巨大，因此“哈利伯顿买光了科威特所有的油罐车，另外还进口了好几百辆”。哈利伯顿打着让士兵去从事战斗任务的名号，另外接下几十项军方的传统任务，包括军用车辆与无线电的维修。

随着战争拖延不决，连大家长久以来认为该由军方负责的兵员招募，都迅速变成营利事业。到2006年，信佳集团(Serco)或武器巨擘L3通信公司(L-3Communications)旗下的民间征才公司，开始为美军招募新兵。很多负责募兵的民间业者从来没有服役过，但是每召到一名士兵，就会得到奖金，因此有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吹嘘说：“如果你想吃牛排，你就必须把人送进军队里。”拉姆斯菲尔德当国防部长，也助长了军事训练外包的热潮，库比克防卫应用(Cubic Defense Applications)和黑水之类的民间企业，负责用实战训练和战争游戏训练士兵，把士兵带到民间拥有的训练设施，在模拟的村庄里练习逐屋战斗。

拉姆斯菲尔德极为沉迷于民营化理念，这已在2001年9月10日的演讲中首度表明；士兵因为受伤或是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回国时，是由民间医疗公司负责治疗。创伤极为严重的伊拉克战争为这些公司带来了意外横财。其中一家叫作健康网络(Health Net)的公司，在2005年变成《财富》五百大企业排名的第七位，主因是有很多受伤的士兵从伊拉克回国。另一家叫作IAP全球服务(IAP Worldwide Services Inc.)的公司赢得一项合约，接管华特里德军方医院的很多业务。据说这所医学中心的医疗照护质量严重恶化，主因就是民营化造成超过100位技术高明的联邦员工离职。

民营公司角色的急剧扩大，就像伊拉克突然实施新石油法一样，没有被当成政策问题，没有经过公开辩论，拉姆斯菲尔德不必和联邦政府员工工会正式决战，也不必跟高级将领激辩。一切都在匆忙间成为既成事实，正是军方所说的任务偏离。战争拖得越久，变得越像是民营化的战争，很快的，这种情形就变成了新的战争方式。危机是促成繁荣的动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统计数字清楚说明了严重的企业任务偏离现象。1991年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每100位士兵，只有1位承包商人员。2003年初，美国开始侵占伊拉克时，这个比率已经跳到每10个士兵，就有1个承包商人员。美国占领伊拉克三年后，这个比率升高到3个人当中有1个承包商；不到一年后，美国占领伊拉克进入第四年时，每1.4个美军士兵，就有1位承包商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只包括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的承包商人员，不包括联盟其他国家或伊拉克政府的员工，也不包括公司设在科威特和约旦、把工作转包给小包商的承包商工作人员。

派驻在伊拉克的英国士兵，数量远不如英国民间安全公司派到伊拉克的工作人员，士兵的数量只有民间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布莱尔首相2007年2月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出1600位士兵，新闻界立刻报道说：“公共部门希望‘佣兵’能够填补士兵留下来的缺口，这些佣兵都是属于直接领取英国政府报酬的公司。同时，美联社估计，在伊拉克的承包商人员大约有12万人，数量几乎和美军数目相同。用规模来说，这种民营化战争已经压倒联合国。联合国2006至2007年的维持和平预算为52.5亿美元，只比哈利伯顿在伊拉克索取的合约金额200亿美元的四分之一略多，最新的估计显示，光是佣兵产业，一年的产值就高达40亿美元。

因此，对伊拉克人和美国纳税人来说，伊拉克重建的确是彻底失败，但对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却绝对不是这样。伊拉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9.11攻击，但是这场战争代表的意义不只是新经济在暴力中诞生。这一点是拉姆斯菲尔德“转型”计划中的智慧结晶：因为毁灭和重建的每一个层面都外包办理和民营化，开始投掷炸弹、停止投弹以及恢复投弹时，都会创造经济繁荣，形成毁灭和重建、破坏与创造的封闭获利循环。对于哈利伯顿和凯雷集团之类精明而有远见的公司来说，毁灭和重建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部门。*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往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该公司从2007年初起，开始“在年营业额一兆美元的健保市场并购企业”，也吃下工程巨擘太平洋建筑工程公司(Pacific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这波并购热潮代表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中病态垂直整合的新时代，洛克希德占住优势地位，不但可以从制造武器和战斗机中获利，也可以从重建武器所摧毁的地方中获利，甚至可以靠着治疗自己武器伤害的人而得到好处。

布什政府采取几种重要却少有人批评的措施，把在伊拉克打造的民营化战争模式制度化，使民营化战争变成外交政策中恒久不变的一环。2006年7月，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总检察长鲍文发表报告，讨论从多家包商的失败惨剧中“学到的教训”，断定问题起源于规划不足，要求创设“由包商人员组成、便于部署的预备队，这种预备队要受过训练，善于在意外作业状况中，快速执行救灾与重建契约”，而且“事先审核由包商组成、拥有特殊领域重建专门技术的多元化团队”。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常设的包商大军。布什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支持这个构想，宣布创立全新的平民预备队。他说：“这种预备队的运作很像军方的预备队，可以雇用拥有关键技术的平民，在美国需要他们时，担任海外任务，从而减轻军方的负担。这样也会让全美国不穿制服的人民，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斗争中服务。”

美国占领伊拉克一年半后，国务院设立了新机构“重建稳定署”(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每一天，该署都付钱给民间包商，策划从委内瑞拉到伊朗在内等25个国家的详细重建计划，这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成为美国所主导的毁灭目标。企业和顾问公司根据事前签订的合约，组成团队，做好准备，在灾难爆发时能够立刻采取行动。对布什政府而言，这是自然的演变；布什政府宣布有权发动无限制的先发制人攻击毁灭后，又在先发制人重建方面取得先机：准备重建还没有被摧毁的地方。

因此到了最后，伊拉克战争的确创造了一种经济模范，这种经济体不是新保守主义分子炫耀的底格里斯河之虎，而是民营化战争与重建的模范；这种模范很快就变成可以出口的项目。在伊拉克战争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边疆都受到地域的限制，俄罗斯、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就是这样。如今只要再爆发下一个灾难，就可能为芝加哥学派圣战打开新天地。

因为你能够重新开始，基本上，你可以获得领先优势，重新开始，这样是很大的优势。你有这种机会是特权，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制度，或是受到有一两百年历史的制度拖累。从某方面来说，阿富汗可以用最好的构想和最好的技术知识重新开始，的确是阿富汗的优势。

——美国财政部长欧尼尔 (Paul O' Neill) 在美军攻占喀布尔后的演说，2002年11月

第十九章 净滩“第二次大海啸”

像巨型推土机一样的海啸铲平了海岸线，为开发商带来梦想不到的机会，开发商也迅速掌握机会。

——麦当斯 (Seth Myclans). 《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3月10日

我在夕阳西沉时走到海滩上，希望在渔民驾船驶向墨绿色的大海、开始一天的作业前，能够碰到一些渔民。这时是2005年7月，海滩上几乎空无一物，但是还有几艘手工油漆的木筏，其中一艘木筏旁边有一个小家庭，正在做出海前的准备。40岁的罗杰穿着无袖上衣，裹着纱笼，坐在沙子上面，跟20岁的儿子伊凡一起缝补纠缠不清的红色渔网。罗杰的太太珍妮塔绕着小船，手里拿着一小罐冒烟的香，摇来摇去，她解释这种仪式是“为了祈福和祈求平安”。

不久前，这个海滩和斯里兰卡海岸沿线几十个这样的海滩一样，还是紧急救援任务的现场，因为这里经历了近年最具毁灭性的天灾：2004年12月26日的大海啸，夺走25万人的性命，造成这个地区250万人无家可归。我在大海啸发生之后六个月，来到受害最严重的斯里兰卡，希望看看这里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有什么异同。

和我同行的旅伴库马里 (Kumari) 是科伦坡的行动主义者，曾经参与救难和重建工作，她同意在我采访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地区时，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我们的旅程从阿鲁加姆湾 (Arugam Bay) 开始，这里是斯里兰卡岛东海岸的一座渔村，也是没落的度假村，政府重建小组把这里当成“美好重建”计划的橱窗。

我们在此遇见罗杰，没过多久他就提出十分不同的说法。他说这个计划是“把渔民从海滩上赶走的计划”，而且这个大规模驱赶人民的计划，远在大海啸来袭之前就已定案，但是大海啸像极多其他灾难一样，被人利用，推动十分不受欢迎的计划。罗杰告诉我们，15年来，他和家人都在阿鲁加姆湾上的茅屋里度过捕鱼季节，离这里没多远。他们和几十户其他渔民家庭一样，把船放在茅屋旁边，把捕获的鱼放在香蕉叶上，在柔细的白沙上晒干。他们和观光客相处愉快，其中大部分是澳洲和欧洲来的冲浪客，住在海滩附近的旅舍，屋前挂着破旧的吊床，卡在棕榈树上的喇叭传出伦敦的俱乐部音乐。餐厅购买刚下船的鱼货，渔民多彩多姿的传统生活形态，为最能吃苦耐劳的旅客提供他们所追寻的真实风土民情。

长久以来，阿鲁加姆湾的旅馆和渔民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原因之一是斯里兰卡内战不断，没有哪种产业能够茁壮到超越极小的规模。斯里兰卡东海岸曾经爆发过一些最惨烈的战斗，因为北部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和科伦坡的斯里兰卡中央政府，都宣称拥有东海岸，却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这个地方。要到阿鲁加姆湾，必须穿越迷宫一样的检查哨，冒着陷在枪林弹雨或碰到自杀炸弹攻击的危险 (据说泰米尔猛虎发明了会爆炸的自杀腰带)。所有导览书籍都包含严正警告，劝大家避开斯里兰卡动荡不安的东海岸，这里的浪头非常适于冲浪，但是只有最坚定的冲浪客，才会花精神来这里。

2002年2月，科伦坡和泰米尔猛虎签署了停火协议，突破上述僵局。停火不完全等于和平，比较像军事行动中依然紧绷的暂停期间，偶尔会穿插爆炸案或暗杀案。虽然情势这么不稳定，但是道路一开通，导览书籍就开始把东海岸捧成下一个普吉岛，是冲浪胜地，拥有美丽的海滩、稀奇古怪的旅馆、芳香扑鼻的美食、满月时刻举行的舞会……寂寞星球 (Lonely Planet) 宣扬这里是“举行派对的热门地点”。阿鲁加姆湾成了行动中心，同时，检查哨的开放表示全国各地的渔民，可以大批回到包括阿鲁加姆湾在内这片最多产的东岸水域。

海滩上的人群开始增加，阿鲁加姆湾被划为渔港，但是当地旅馆老板开始抱怨，说茅屋阻挡了旅馆的视线，晒鱼的臭味让旅馆的房客作呕 (一位荷兰移民来的旅馆老板告诉我，“的确有气味污染这回事”)。有些旅馆主人开始游

说当地政府，要求把渔船和茅屋迁移到另一个海湾，迁移到比较没有外国人的地方。村民开始反弹，指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住了好几代，阿鲁加姆湾不只是渔港而已，也是渔民的淡水和电力来源，是渔民子女上学和买主购买海产品的地方。

海啸来袭前六个月，冲突几乎就要爆发，某天半夜海滩上烧起了一场无名火，24栋渔民居住的茅屋烧成灰烬。罗杰告诉我，他和家人“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财物、渔网和绳索”。库马里和我跟阿鲁加姆湾很多位渔民谈话，所有渔民都坚称这是人为纵火，他们把矛头指向摆明了要把海滩据为己有的旅馆老板。

如果火灾真正的用意是要吓走渔民，结果却适得其反；渔民留在家园的决心变得比以前更坚定，失去茅屋的渔民很快重建家园。

海啸来袭，做到了火灾做不到的事情，把海滩清理得一干二净，所有脆弱的建筑都被冲走，每艘小船、每一栋渔民茅屋、每一栋游客小屋和平房，全都一样。这个小区的人口只有4000，大约有350人罹难，大部分都是像罗杰、伊凡和珍妮塔一样靠海讨生活的人。然而，在垃圾和尸体底下，留着旅游业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就是原始的海滩、清除掉所有人为障碍的度假胜地。整个海岸都一样：一旦垃圾清除，剩下的就是乐土。

紧急状况消退，渔民重回旧地，迎面而来的警察禁止他们重建。“这是新规定”，他们得知海滩上不准盖房子，一切至少必须离高潮线200米。大部分人愿意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盖房子，但是那里没有土地，因此渔民无处可去。不只阿鲁加姆湾设置了“缓冲区”，整个东海岸都一样，海滩变成了禁地。

海啸大约夺走了3.5万名斯里兰卡人的性命，造成将近100万人无家可归，像罗杰一样驾着小船捕鱼的人，占受害者的80%；在某些地区，这种比率接近98%。数十万人为了得到食物配给和少少的救灾津贴而搬离海滩，住进内陆的临时收容所。很多收容所都是铁皮盖的狭长丑陋棚屋，热气无法宣泄，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很多人抛弃棚屋，在外露宿。久而久之，收容所变成又脏又乱、疾病丛生的地方，还有面貌凶恶、挥舞着枪械的士兵来回巡逻。

政府的表面文章说，缓冲区是安全措施，意在防止另一次海啸来袭时再度爆发惨剧。表面上，这样说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旅游业。政府反而鼓励旅馆，在以前渔民生活和捕鱼的宝贵海滩上扩建。度假村不受缓冲区规则的限制，纷纷落成；不管建筑多么精美或是多么接近海边，只要把工程归类为“修理”，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整个阿鲁加姆湾的海滩上，都有建筑工人忙着盖房子。罗杰忍不住要问：“旅客难道不怕海啸吗？”

对罗杰和其他渔民来说，缓冲区看起来只不过是借口，让政府可以做海啸来袭前想做的事情，把渔民驱离海滩。渔民过去从海中捕获的鱼类足以养家活口，但是对世界银行之类机构计算的经济成长没有贡献，而且渔民原来盖茅屋的土地，显然可以作为更有利的使用。我抵达后不久，一份名叫“阿鲁加姆湾资源开发计划”的文件流入新闻界手中，证实了渔民小区最担心的事情。联邦政府已经委托一群国际顾问公司，研究阿鲁加姆湾重建蓝图，结果就是上述重建方式。虽然海啸摧毁了海滩上的房屋，整个小镇大致上还安然无恙，开发计划却要把阿鲁加姆湾夷为平地，重新大兴土木，把拥有嬉皮魅力的滨海小村变成高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变成拥有五星级度假村、一晚300美元的豪华生态旅游农舍、水上飞机码头还有直升机起降场。这份报告主张把阿鲁加姆湾当成模范，让附近30个新“旅游区”学习，把过去战乱频仍的斯里兰卡东海岸，变成南亚的里维拉(Riviera)。

艺术家画的透视图和建筑蓝图中，看不到大海啸受难者，看不到过去住在海滩上几百户渔民家庭。这份报告说明要把村民迁移到比较适合的地方，迁移到好几公里之外，却远离海洋的地方。更糟糕的是，这个耗资8000万美元的再开发计划所用的资金，是以协助海啸受难者名义募集到的善款。

在大海啸后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国际捐助的，就是这些渔民家庭哀哀痛哭的脸孔，就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渔民悲伤的脸孔：堆积在清真寺里的尸体是他们的亲属，哭着辨认淹死婴儿的是他们的母亲，被大海卷走的是他们的子女。但是对阿鲁加姆湾这样的小区来说，所谓“重建”，不过是刻意摧毁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窃取他们的土地。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整个重建过程会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剥削的人继续遭到剥削”。

重建计划曝光后，引发了全国性的怒火，阿鲁加姆湾居民的愤恨更是无以复加。我们一到当地，库马里和我就碰到几百个示威人士构成的团体，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沙丽、纱笼，带着希贾布面纱或头巾(hijab)，穿着人字拖。他们在海滩上聚集，正要开始示威游行，要走到旅馆前面示威，然后到地方政府所在地的薄图威市(Pottuvil)抗议。

群众走到旅馆去时，一位穿着白色T恤、拿着红色麦克风的年轻人领导示威群众，进行一问一答的抗议。年轻人高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群众就大喊：“观光旅馆！”接着年轻人大叫：“白人……”群众就高喊：“滚出去！”(库马里很不好意思地把泰米尔语翻译给我听。)另一位肤色经过日晒浪打的年轻人接下麦克风，高声喊着：“我们要、我们要……”群众的回答跟着传出：“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还我渔港！”“还我捐款！”年轻人又喊着：“饥荒、饥荒！”群众回答：“渔民面临饥荒！”

到了区政府大门前，游行领袖谴责他们选出的代表背信忘义、贪污腐败，把捐给渔民的钱拿去“买女儿的嫁妆和太太的珠宝”。群众谈到区政府优待僧加罗人(Sinhalese)，歧视穆斯林，谈到“外国人从我们的痛苦中获利”。

他们的怒吼似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在科伦坡跟斯里兰卡观光局长柯莱赛文(Seenivasagam Kalaiselvam)谈话，柯莱赛文是中年官僚，有一个坏习惯，喜欢提到政府当局花了几百万美元打造的“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profile)。我问他，阿鲁加姆湾之类地方的渔民会有什么命运。他往藤椅的椅背一靠，解释说：“过去海岸地带有很多不合法、没有依据观光计划兴建的建筑。海啸过后，观光业碰到的好处是大部分非法建筑都受到海啸影响，全都消失了。”他解释说，如果渔民回来重建，“我们会被迫再度拆除……海滩会保持干净”。

开始时不是这样。大海啸来袭几天后，库马里第一次来到东海岸时，还没有半个官方援救人员到达现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救难人员、医疗人员和挖掘坟墓的人。分裂这个地区的种族障碍突然消失。她回忆说：穆斯林信徒跑到泰米尔人那边，帮忙埋葬死者，泰米尔人跑到穆斯林信徒这边吃饭、喝水。斯里兰卡内陆的每个家庭，一天送来两个午餐餐包，餐包十分珍贵，因为内陆居民都很穷。这样做不是要求回报，只是觉得“我必须协助邻居，我们必须协助兄弟姐妹、女儿和母亲，就是这样而已”。

全国各地掀起类似的跨文化救援，泰米尔青少年从田里开来拖拉机，协助寻找尸体，基督徒儿童捐出学生制服，以便改成穆斯林葬礼中的白色寿衣，印度教妇女也捐出白色的沙丽。似乎海啸的潮水和瓦砾都具有让人谦卑的极大力量，除了摧毁房子、冲垮道路之外，也洗刷了难以化解的仇恨、血腥的世仇和上次谁杀了谁的记录。库马里跟和平团体合作多年，希望跨越各种鸿沟，却无法达到目标，看到大家用这么光辉的人性应付这么惨烈的悲剧，的确让他感动极了。斯里兰卡人在国家遭逢最大压力时，没有无休无止的讨论和平，而是实际上发挥着和平精神。

看来斯里兰卡也可以靠着国际协助，完成重建工程；起初协助不是来自反应迟钝的各国政府，而是来自在电视上看到惨祸的个人：欧洲学童举办糕饼义卖和搜集瓶罐义卖，音乐家举办众星云集的音乐会，宗教团体搜集衣服、毛毯和捐款。然后各国公民要求本国政府比照他们的善心，提供官方协助，六个月内，全世界募集了130亿美元的善款，写下世界记录。

最初几个月里，重建资金大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带来紧急食物、饮水、帐篷和具有一片倾斜屋顶的临时住宅；富国派出医疗队，发送物资。各地出现收容所，让大家等待永久住宅兴建时，有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以住。捐款的确足以盖好这种住宅，但是六个月后我到斯里兰卡时，进度完全停顿，几乎没有一栋永久住宅盖好；临时收容所开始看起来不像应急避难所，比较像不可挽回的贫民区。

援助人员指责斯里兰卡政府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竖立起路障：首先宣布缓冲区，接着拒绝另外提供住宅用地，然后委托外国专家进行无数的研究、写出宏伟的计划。官僚争辩不休之际，大海啸的幸存者在闷热的内陆收容所里苦苦等待，靠着粮食配给过活，他们离海岸太远，不能恢复捕鱼。大家经常把重建延误归咎于繁文缛节和管理不善，事实上，其中牵涉了极为庞大的利益。

海啸前废弃的计划

早在大海啸来袭前两年，改造斯里兰卡的宏伟计划就已经定案。内战结束后计划便已展开，又是那几个玩家要来搅局，规划把斯里兰卡纳入世界经济，最主要的角色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世界银行和世银的分支亚洲开发银行。大家达成共识，认定斯里兰卡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变成少数还没有受到时髦全球化运动殖民的最后国度。以斯里兰卡这么小的国家来说，保存下来的野生动物相当多，包括豹子、猴子和几千只野生大象；海滩上看不到高楼大厦，山区点缀着很多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庙宇及圣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说，最棒的是“一切都包含在像西弗吉尼亚州一样大小的地方”。

根据这个计划，提供游击队绝佳掩护的斯里兰卡丛林要开放，接纳喜欢冒险的生态旅客，让他们骑着大象，像在哥斯达黎加一样，在树荫下像泰山一样荡来荡去。共同造成极多血腥的各种宗教可以加以改造，滋养西方游客的心灵需求：和尚可以经营禅修中心，印度教妇女可以在旅馆表演多姿多采的舞蹈，印度医学中心可以减轻酸痛。

总之，亚洲其他国家可以继续保留血汗工厂、电话服务中心和狂热的股市；各国产业巨子需要地方恢复元气时，斯里兰卡会欢迎他们过来。正因为其他毫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前哨国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如果想要享受豪华与荒野、冒险与贴心服务结合的完美体验，钱不是问题。外国顾问相信，斯里兰卡的未来要靠安缦酒店(Aman Resorts)之类的连锁度假村；安缦酒店最近才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开设两处极为漂亮的度假村，房间一晚要800美元，每一个套房都有可以跳水的游泳池。

美国政府极为看好斯里兰卡成为高级旅游胜地的潜力，也极为看好斯里兰卡为连锁度假村和观光业者带来的所有商机，因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推动计划，把斯里兰卡观光业组织起来，成为强而有力、华府说客式的游说团体。斯里兰卡推广观光的预算从每年不到50万美元，增加到大约1000万美元，也是国际开发总署的功劳。同时，美国大使馆推动具有前瞻性的“竞争力计划”，目标是要促进美国在斯里兰卡的经济利益。这个计划的主任是满头白发的经济学家华利(John Varley)，他告诉我，他认为斯里兰卡观光局谈到要在2010年前，每年吸引100万个旅客，眼界太小，“我个人认为，他们可以吸引此数两倍的旅客”。在斯里兰卡主持世界银行业务的英国人哈罗德(Peter Harrold)告诉我：“我总是认为，拿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来比拟最适当。”

毫无疑问，高级观光业是可靠的成长市场，以每晚房价平均405美元的豪华旅馆来说，2001到2005年间，总收入增加70%，表现相当优异，尤其是这段期间涵盖了9.11后的衰退、伊拉克战争和燃料成本飞跃上涨，表现确实不错。从很多方面来看，观光业惊人成长，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普遍胜利所造成极端不平衡的副产品。现在不管整体经济状况如何，都有大量新发迹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组成精英阶层，华尔街把这个阶层视为“超级消费者”，能够独力创造消费需求。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美邦公司(Smith Barney)全球股票策略部门主管柯布尔(Ajay Kapur)，一直鼓励客户投资他所说的一篮子“富豪股”，包括宝格丽(Bulgari)、保时捷(Porsche)、四季大饭店(Four Seasons)和苏富比(Sotheby)等公司。“我们相信，富豪经济会继续发展，得失衡将继续扩大，富豪股应该一直会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斯里兰卡完成使命，成为富豪企业的游戏场前，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快速大幅改善。首先，要吸引顶尖的度假村经营者，政府必须降低私有土地所有权的障碍(斯里兰卡大约80%的土地属于国有)。斯里兰卡需要比较“有弹性”的劳动法律，让投资人可以为度假村找到足够的员工。斯里兰卡也需要推动基础建设现代化，兴建公路、精美的机场、改善供水与电力系统。然而，斯里兰卡过去因为购买武器而债台高筑，政府无法独力推动建设快速升级，只能寻求常见的交易，就是同意开放经济，推动民营化与公私合营，换取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所有这些计划和条件都清楚记录在重建斯里兰卡计划中。世界银行批准的这个休克治疗计划在2003年初定案，本地的主要支持者是名叫迪塔维拉(Mano Tittawella)的斯里兰卡政客兼实业家，他的外表和意识形态都非常像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奇(Newt Gingrich)。

斯里兰卡重建计划像所有休克治疗计划一样，以推动快速经济成长为名，要求大家做很多的牺牲。几百万人必须离开传统乡村，交出海滩，接待游客，交出土地，以便兴建度假村和公路。能够存活下来的渔业，要由以深水港为基地的大型企业化拖网渔船主导，不是从海滩推下海的木制小船。斯里兰卡当然也会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格达的类似例子一样，国营公司会大量裁员，各种劳务的价格要提高。

拥护这个计划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很多斯里兰卡人根本不相信值得作出这种牺牲。这时是2003年，对全球化过分乐观的信心早已消失，经历过惨痛的亚洲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战争的后遗症也是障碍，几万个斯里兰卡人在“建国”、“家园”和“领土”的号召下，牺牲了性命。现在和平终于来临，政府却要求最贫穷的国民放弃小得可怜的土地和财产，放弃菜园、简陋的房子和小船，好让万豪酒店(Marriott)或希尔顿大饭店(Hilton)兴建高尔夫球场(村民可以到科伦坡去当街头小贩)。看来这是很差劲的交易，斯里兰卡人也发出不平之鸣。

斯里兰卡人起初用一波强硬的罢工和街头抗议，拒绝重建斯里兰卡计划，然后在选举中以决定性的态度拒绝这个计划。2004年4月，斯里兰卡人抗拒所有外国专家和他们的本地合作伙伴的属意，投票选出中间偏左派系和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分子、誓言要废弃整个斯里兰卡重建计划的派系，组成联合政府。当时还没有推动包括自来水和供电在内的中央民营化计划，兴建公路的计划也在法院里遭到挑战。对于梦想建设富豪乐园的人来说，这是重大的挫败；2004年原本是对投资人友善的民营化新斯里兰卡元年，现在所有算计都落空了。

这场可怕的选举过后八个月，大海啸来袭。感叹重建斯里兰卡计划寿终正寝的人立刻知道大海啸的意义，新选任的政府必须向外国借贷几十亿美元，重建在海啸中遭到摧毁的住宅、道路、学校和铁路；外国债权人很清楚，面临毁灭性的危机时，连最坚决的经济民族主义分子都会突然变得很有弹性。至于态度比较强硬的农民和渔民，过去设置路障、发动大规模示威，破坏外国人先前整理和开发土地的乡村居民，噢，此刻这些斯里兰卡人有别的事要忙。

海啸后的第二次机会

科伦坡的民族主义政府立刻行动，向控制援助资金的富国，证明斯里兰卡政府准备放弃过去的立场。总统库马拉东加(Chandrika Kumaratunga)原本靠着公开反对民营化的政见当选，现在她宣称，对她来说，大海啸是一种宗教顿悟，协助她看出自由市场的希望。她到受大海啸摧残的海岸视察，站在瓦砾堆中宣布：“我们国家有幸拥有这么多天然资源，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一定认为‘够了、够了’，而且从所有层面痛击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要我们团结合作。”这是全新的解释，大海啸是上天的惩罚，惩罚斯里兰卡没有把海滩和森林全部出卖。

忏悔的仪式立刻开始，大海啸侵袭后才四天，政府完成了一项立法，为公民强力反对多年的供水系统民营化奠定基础。现在全国还泡在海水里，死人还没有埋葬，当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这回事，时机非常像伊拉克通过新石油法一样，政府也选择这种极为艰难的时刻，提高汽油价格，使生活变得更艰难：这个举动意在向贷款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说明科伦坡政府在财政上负责的态度；科伦坡也开始拟定法案，计划分拆国家电力公司，开放民间经营。

代表小渔船业主的斯里兰卡国家渔业团结运动(National Fishenes Solidarity Movement)领袖库马拉(Herman Kumara)指出，重建是企业全球化的第二次大海啸。他认为，这样做是趁着小渔民受到最大伤害、最脆弱的时候，刻意剥削小渔民，就像战争之后的掠夺一样，因此第二次的海啸在第一次海啸之后急速来袭。他告诉我：“大家过去激烈反对这种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在难民营里饿得发昏，只想到明天要怎么活下去；他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可去，丧失了收入来源，不知道将来要靠什么维生。政府在如此情况下推动这个计划，等大家复原后，会发现过去政府决定的事情，但是到时候伤害已经造成。”

华盛顿的贷款机构能够快速行动，利用这次海啸，原因是他们以前做过极为类似的事情；后海啸灾难资本主义的彩排，在米契飓风(Hurricane Mitch)后的一次很少有人评估的事件中已经进行过。

1998年10月，米契在中美洲滞留了整整一个星期，横扫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海岸与山区，淹没村庄，造成9000多人死亡。如果没有外国慷慨的援助，这几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不可能自救；援助的确来了，但是代价高昂。米契侵袭后两个月，洪都拉斯全国还埋在瓦砾、尸体和烂泥里，国会却通过法律，批准机场、海港和公路民营化，而且快速推动国营电话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和供水系统等多个部门的民营化计划。国会也推翻了进步的土地改革法律，让外国人买卖房地产变得更加容易，并且计划强行通过由开矿业者草拟的极度重商的矿业法，降低环保标准，同时还为驱逐妨碍新矿开采的人们创造了有利条件。

邻国的情形大致相同，同样是米契侵袭后的两个月内，危地马拉宣布出售电话系统的计划；尼加拉瓜也一样，还加上出售电力公司与石油部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电信业)出售案中，施加压力，把出售案定为今后三年、每年大约释出4700万美元援助款的条件，而且把出售案跟减免尼加拉瓜44亿美元外债的案子搭上关系。”电话民营化当然跟飓风后重建毫无关系，只有在华盛顿金融机构灾难资本主义分子的内部逻辑中才有关系。

随后几年，出售案完成，经常是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成交。买主大致上都是其他国家原本由国家经营、已经民营化的公司，他们现在在全球各地搜寻新并购标的，以便提高自己公司的股价。已经民营化的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吃下了危地马拉的电信公司，西班牙能源公司费诺沙联合公司(Union Fenosa)买下了尼加拉瓜的能源公司，已经民营化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买下了洪都拉斯所有四个机场。尼加拉瓜只以3300万美元的代价把电话公司40%的股权卖掉，但是普华会计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估计，这些股权价值8000万美元。危地马拉外交部长1999年到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时宣称：“破坏也为外国投资带来机会。”

2004年南亚大海啸来袭前，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要把米契飓风模式提升到下一个水平，目标不只是一要通过个

别的新法律，也希望由企业直接控制重建。任何国家遭到大海啸这种巨灾侵袭，都需要全盘的重建计划，需要最明智地利用拥入的外援，确保资金送到该接受资金的人手中。但是斯里兰卡总统承受华盛顿贷款机构的压力，决定不委托手下民选的政客负责规划，而是在海啸夷平海岸才一周后，就创设了全新的机构，叫作国家重建项目小组。这个小组取代斯里兰卡国会，全权负责拟订并执行新斯里兰卡的大计。项目小组由斯里兰卡银行业和产业界最有权势的企业主组成，但不是任何产业的企业主都能进入项目小组；项目小组十位成员中，有五位直接经营海滩观光业，代表斯里兰卡最大的度假村。项目小组里没有渔业或农业代表，没有一位环保专家或科学家，甚至没有灾后重建专家。小组召集人迪塔维拉是过去的民营化大老，他宣称：“这是建立模范国家的大好良机。”

创立项目小组代表新形态的企业政变，代表利用天灾力量完成的政变。就像在极多其他国家一样，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在斯里兰卡，遭到正常民主规则阻止，2004年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全国国民通力合作应付国家急难，政客迫切希望取得援助资金时，可以暂时把选民清楚表达的意愿搁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非民选产业界的直接统治，这是灾难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例子。

不管怎么说，项目小组的企业领袖只花了10天，而且没有离开首都，就拟出国家重建的完整蓝图，涵盖住宅兴建与公路建设等事项。就是这个计划规定设置缓冲区，又好心地豁免旅馆不受缓冲区限制。项目小组也挪用援助资金，兴建高速公路，兴建灾难爆发前遇到极大阻力的工业化渔港。斯里兰卡土地运动人士费尔南多(Sarath Fernando)告诉我：“我们认为，这个经济计划是比大海啸还严重的灾祸，这是为什么我们先前这么努力抗拒，阻止这个计划，还在上次选举中击退这种计划。但是现在，大海啸来袭才刚刚过了三星期，他们又拿出同样的计划，显然已经事先做好准备。”*

*赞南度是土地与农业改革运动领袖，这个斯里兰卡非政府组织联盟在大海啸之后不久，开始呼吁进行“人民重建程序”。

华盛顿用伊拉克那一套如今已见怪不怪的重建援助手法，也就是把金额超大的合约交给自己的公司，支持斯里兰卡的项目小组。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巨擘西图集团拿到过285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监督在伊拉克重建的其他主要包商；虽然西图集团在巴格达的重建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却还是在斯里兰卡拿到3300万美元的合约(后来增加为4800万美元)，主要是负责兴建企业化船队所需要的三座深水港，另外在阿鲁加姆湾兴建一座新桥，计划的一环是把阿鲁甘变成“观光客乐园”。这两个计划都以海啸救灾的名义进行，但对大海啸的主要受害者来说却是大祸，因为拖网渔船把他们要捕的鱼捕光，旅馆业又不希望他们重回海滩。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援助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造成伤害。”

我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竞争力计划”主持人华利，为什么美国政府把援助资金，花在一定会让海啸幸存者流离失所的计划上。他解释说：“你不应该限制援助只能流到海啸受难者手中……应该让援助造福全斯里兰卡，让援助促进成长。”华利把这个计划比喻成高楼大厦的电梯：电梯第一次载人时，载了一群乘客，把他们送到最顶端，他们在那里创造财富，让电梯可以回到地面，接更多人上来。在底层等候的人必须了解：电梯总有一天会回来载他们。

美国政府唯一直接花在小渔民身上的钱，是赠与100万美元，提升像仓库一样的临时收容所，让小渔民在海滩重新开发期间居住。这点清楚显示，铁皮和塑合板盖成的收容所，虽然名义上只是临时住所，实际上却注定会变成永远存在的贫民窟，就像南方国家大部分大都市周边的贫民区一样。各界当然不会推动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来协助住在这些贫民区里的人，但是大海啸的受害者理当不同，全世界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他们丧失家园和生计，他们悲惨无助的命运激发全球的同情，认为需要而且应该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不是透过经济利益扩散的方法，而是把援助直接交到他们手中。但是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知道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过不了多久，一个又一个大海啸幸存者会丧失独特性，化为全世界几十亿个没有脸孔的穷人之一，大多住在没有饮水的铁皮屋里，这种铁皮屋的扩散就像一晚800美元的旅馆激增一样，大致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大家都能接受的特性。

我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最荒凉的内陆难民营中，碰到一位叫作雷努佳(Renuka)的年轻妈妈，她虽然衣衫褴褛，却仍然风姿动人，她就是华利所说等待电梯的人。雷努佳最小的女儿才六个月大，是大海啸来袭后两天出生的。她怀着九个月的身孕，拿出超人的力量，抓着两个小男孩，逃离淹到脖子的海水。但是如此英勇求得一线生机之后，她和家人现在却在无名地点的一小块土地上悄悄挨饿。非政府组织好心捐赠的几艘独木舟使景象更凄凉：这里离海岸三公里远，大家甚至没有自行车可以代步，独木舟只不过是残酷地让人想到过去的生活。她要求我们带信息给想要帮助大海啸幸存者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有东西要给我，请把东西交到我手里。”

斯里兰卡不是唯一受到这种第二次大海啸侵袭的国家，抢夺土地、强制立法的类似故事也从泰国、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传出。在印度的泰米尔那都省(Tamil Nadu)，大海啸幸存者变得穷困之至，以至于多达150位妇女被迫出卖肾脏，换钱买东西吃。一位援助工作人员对《卫报》记者解释说，省政府“宁可把海岸拿来盖旅馆，结果却造成人民陷入绝望”。所有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国家都定出“缓冲区”，防止村民在海岸重建，却释出土地加速开发。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Aceh)，缓冲区有两公里宽，但是政府最后被迫废除这个命令。

大海啸来袭后一年，监督外援花用情形、备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协会”(ActionAid)发表了深入访调5个国家、5万名海啸幸存者的结果。同样的形态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禁止居民重建，但是旅馆却得到极多的奖励；临时收容所是可怕的军事化管理拘留所，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永久性的重建；整个生活方式遭到连根拔起。这个协会断定，种种失败都不能归咎于沟通不良、资金不足或贪腐等常见的小奸小恶；所有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而且是刻意造成的。“政府在提供土地，兴建永久性住宅方面极度失职，”这份报告断定，“在土地遭到掠夺、海岸小区遭到排挤、优待商业利益等方面，政府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成为共犯。”

然而，谈到海啸后的投机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可能是大家最不了解的受灾国，政府对于只是把穷人从海岸赶走，并不满意，甚至利用大海啸，想把人民从国内大部分可以居住的地区赶走。

马尔代夫是由大约200个有人岛构成的岛链，位于印度外海，是个观光产业共和国，意义跟若干中美洲国家过去号称香蕉共和国一样。马尔代夫的出口产品不是热带水果，而是热带休闲。国家岁人中，高达90%直接来自海滩度假营收。马尔代夫推销的休闲特别颓废、特别迷人，将近100个岛是“度假岛”，岛上青翠的绿地被四周的白色沙滩海湾包围，岛屿完全由旅馆、游轮公司或富有的个人控制。有些岛屿出租期达50年。最豪华的马尔代夫岛屿满足精英客户的需要，例如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荷姆斯(Katie Holmes)就到马尔代夫的小岛度蜜月。马尔代夫不只是用美景和潜水吸引人，私人岛的卖点是能够提供彻底与世隔绝的享受。

这些水疗度假岛受到传统渔村建筑的“启发”，竞相在自己的高脚茅屋里，运用最新奇的富豪玩具和特殊享受，希望把对方踩在脚下，例如装设博士牌(Bose)环绕音响家庭娱乐设备，在户外浴室装设飞利浦史塔克(Phmppe starck)设计的豪华用具，床单柔细到几乎一摸就会散开。各个岛屿也竞相消除土地和大海的界线，可可棕榈岛(Coco Palm)的度假村建在泻湖上，有绳梯从码头伸到水底。四季大饭店的卧房“漂浮”在海洋上，希尔顿夸耀它盖在珊瑚礁的第一座海底餐厅。很多套房附有女佣房，某一座私人岛上还有马尔代夫管家一天24小时无微不至的服务，照顾的小细节包括了“马丁尼酒要用摇的还是要搅拌”。这种007情报员才享受得到的度假村别墅，一晚房价高达5000美元。

这个欢乐王国的统治者是亚洲掌权最久的加尧姆(Maumoon Abdul Gayoom)总统，他从1978年起开始执政。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政府监禁反对党领袖，涉嫌拷打为反政府网站写文章的“异议分子”。因为批评者都关在犯人岛上，加尧姆和手下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全副精神放在旅游业上。

大海啸来袭前，马尔代夫政府就一直希望增加度假岛的数目，满足日增的豪华度假需求。政府碰到常见的障碍，也就是人民反对。马尔代夫人大都靠着捕鱼为生，很多人住在散布在岛屿环礁上的传统村子里，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若干挑战，因为让游客看到在海滩上剥鱼皮的乡村景观实在不符合马尔代夫的观光景致。早在大海啸来袭前，加尧姆政府就一直努力游说国民，搬到几个比较大、人口比较多、游客很少造访的岛屿。理论上，这些岛屿是要为居民提供更好的保护，避开全球暖化造成的海水水位升高。但是连善于镇压的政权，都很难把数以万计的人民从世居的岛屿上连根拔起，“人口集中”计划大致上并不成功。

大海啸之后，加尧姆政府立刻宣布，这次巨灾证明很多岛屿“不安全、不适合居住”，然后发动远比以前更积极的迁村计划，宣布任何人如果想得到国家提供的海啸重建协助，必须搬到五个号称“安全岛屿”的地方。很多个岛上的全部人口已经撤离，还有更多岛上的人口要撤走，以便释出更多土地，供观光业使用。

马尔代夫政府宣称，它会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支持并资助的安全岛屿计划，是由于人民要求住在“比较大且比较安全的岛上”。但是很多岛屿居民说，如果基础建设能够修好，他们宁愿留在家乡的岛屿。就像行动援助协会所说，“大家别无选择，只能搬走，因为这是得到住宅与生活更新补助的先决条件”。

更可笑的是，一碰到旅馆，政府担心的安全理由就完全消失，而这些不可靠的建筑都是设在低矮的岛屿上。度

假村不但不必为了安全理由撤离，而且加尧姆政府在2005年12月，也就是大海啸侵袭一年后，宣布有35个新岛屿可以出租作为度假岛，租期最长50年。同时，在所谓安全的岛屿上，失业率急速升高，新旧居民之间爆发暴力争执。

军事化的都市更新

从某方面来说，第二次大海啸只是令人特别震惊的经济休克疗法：因为海啸有效地把海滩夷为平地，使得通常要花很多年的迁移和都市更新过程，实际上在几天或几星期内就完成；过程就像数以万计肤色黝黑的穷人(世界银行认为渔民“没有生产力”)心不甘、情不愿地搬走，把地方让给极为富有、肤色大都很白的人，也就是能够创造高收益的观光客。全球化的两个经济极端，也就是看来好像活在不同世纪，而不是不同国家的两个极端，突然间在相同的海岸线上爆发直接冲突，一方要求工作权，另一方要求游玩权，在本地警察和私人保镖的枪杆子支持下，海滩上爆发了军事化的都市更新和阶级战争。

有些最直接的冲突在泰国发生。泰国开发商在海啸来袭后24小时内，就派出武装私人警卫，围住他们垂涎已久、希望建成度假村的土地。有时候，警卫甚至不让幸存者在老家寻找子女的尸体。泰国海啸幸存者与支持者团体连忙开会，应付土地遭到夺占的问题。这个团体最初发表的声明宣称：“对商人与政客的联盟而言，海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好机会，因为海啸实际上把海岸地区的小区夷为平地，扫除了先前妨碍他们兴建度假村、旅馆、赌场和

养虾场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所有海岸地区现在都是开放的土地!”

好一个开放的土地。在殖民时代，这种土地有一个准司法的名称，叫作无主荒地。如果有关单位宣布土地是空地或“荒地”，就可以强占下来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土地上的居民消灭。在受到大海啸袭击的国家里，开放土地的观念受到这种丑陋的历史意义影响，让人想起谋财害命和用暴力“开化”原住民的史实。我在阿鲁加姆湾海滩上碰到的渔民尼甲姆(Nijam)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实际的差别。“政府认为我们的渔网和鱼货难看而脏乱，这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退出海滩的原因。为了满足外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同胞当成化外之民。”瓦砾堆看来似乎是新的无主之地。

我跟尼甲姆见面时，他正跟一群刚刚从海上返航的渔民在一起，他们的眼睛因为受到海水泼溅而充满血丝。我提到政府计划把小渔民搬到另一个海滩，好几位渔民挥着宽阔的渔刀，誓言“召集村民、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的土地。一位名叫阿不都(Abdul)的渔民说，他们当初曾说欢迎餐厅和旅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交出一些土地，他们就希望拥有全部”。另一位叫曼殊尔(Mansoor)的渔民指着头上让我们遮阴、强劲到能够对抗海啸力量的棕榈树林说：“这些树是我的高曾祖父母种的，我们为什么要搬到另一个海滩?”他的一个亲戚发誓说：“除非大海干枯，否则我们不会搬走。”

海啸后的重建援助大量涌入，理当为承受极多苦难的斯里兰卡人带来建立永久和平的机会。但实际上在阿鲁加姆湾和整个东海岸，似乎又要开始另一种争夺战，看看锡兰人、泰米尔人或穆斯林信徒是谁能够压倒别人，从援助资金中得到好处，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真正的好处都流入外国人手中，却牺牲所有的本地人。

我开始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沉重感觉，就像风向变化一样，这里会不会变成沦落在永久破坏中的另一个“重建”国家。一年前，我在伊拉克听到非常相似的怨言，说重建对库德族(Kurd)和若干什叶派信徒有利。我在科伦坡碰到好多位援助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多么喜欢在斯里兰卡工作，多么不喜欢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里的人还把非政府组织看成中立、甚至有用的团体；“重建”还不是肮脏的字眼，但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我在首都科伦坡看过一些海报，上面草草画着西方援助工作人员把钱塞进自己口袋，斯里兰卡人却饿肚子。

大家不满重建进度，怒火都发在非政府组织上，因为处处可见这些人，海岸每一个空着的地方都贴着他们的标志；然而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梦想赶上巴里岛计划的政府官员，却很少离开都市里的办公室。情形变得很讽刺，因为援助工作人员是唯一提供过一点协助的人；但之所以落人这种处境，也因为他们提供的协助实在少得可怜。援助网络已经变得太大而远离它想服务的人民，以至于援助网络员工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形态，变成一种全国风行的批评目标。我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批评一位和尚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式的野外生活”：也就是住在高档旅馆和海滨别墅里，开着已受千夫所指的全新白色休旅车。所有援助工作人员都开这种车，太宽、马力太大，斯里兰卡狭窄的泥土路容不下这个庞然大物。这种车子整天隆隆驶过难民营，强迫每个人呼吸这种车子掀起的灰尘，他们所属组织的标志，例如乐施会(Oxfam)、世界展望会、拯救儿童组织的标志，在车上的旗帜里飘扬，好像他们是从遥远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里来访的客人一样。在斯里兰卡这么热的国家里，这些装着暗色玻璃，配备强力冷气机的休旅

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已，也是行进中的微气候。

我看着大家的不满升高，忍不住想到，要不了多久，斯里兰卡就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情势会变成重建看来有如抢劫，援助工作人员则成为攻击目标。我离开后不久，这种事情就发生了：17位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饥饿联盟服务、从事海啸救灾的斯里兰卡人，在东岸港口城市特林可梅里(Trinco llee)的办公室里，遭到集体杀害。怒火也引发了新一波的激战，海啸重建完全停顿。很多援助组织在另外几件攻击事情发生后，担心员工的安全，离开了斯里兰卡，其他非政府组织把重心转移到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以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东部以及泰米尔人控制的北部得不到援助。这种决定更让大家觉得重建基金没有公平利用。2006年下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公布后，更是如此。这项研究发现，虽然海啸摧毁的大部分住宅仍然是废墟，总统在南部的选区却是例外，那里高达173%的住宅已经重建完毕。

仍然留在东海岸、又在阿鲁加姆湾附近的援助工作人员，现在要应付新一波流离失所的民众，处理因为暴力事件被迫离开家园的数万民众。《纽约时报》报道：“原本受雇重建受海啸摧毁学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改为替受到战争影响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兴建厕所。”

2006年7月，泰米尔猛虎宣布停火正式结束；重建停顿，战争恢复。不到一年后，超过4000人在海啸过后的战斗中丧身。整个东海岸只有少数被海啸摧毁的住宅重建完成。但是几百、几千栋新建筑外表已经弹痕累累，新装的玻璃窗被炸药炸得粉碎，全新的屋顶被炮火击毁。

把海啸当成灾难资本主义商机的决策，对内战的死灰复燃有多大影响，实在是很难计算，因为和平总是摇摇欲坠，各方面都互不信任。然而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如果和平要在斯里兰卡生根，和平的好处要超过战争的利益，包括超过战争经济带来的有形经济利益，也就是军队照顾士兵家属、泰米尔猛虎照顾属下战斗人员与自杀炸弹客家属的利益。

大海啸后，世人慷慨解囊，带来了难得一见、创造真正和平红利的机会。数量惊人的援助物资可以期待一个比较公平的国家，重建残破小区的方式可用来重建互信，也能重建道路和桥梁。结果斯里兰卡像伊拉克一样，得到的是渥太华大学政治学者巴里斯(Roland Paris)所说的“和平惩罚”：政府实施割喉式竞争的经济模式，使大部分人民在最需要安抚并能减轻压力时，过着更痛苦的生活。外国提供给斯里兰卡的和平模式，本质上就是另一种战争：无休止的暴力承诺会带来土地、主权和光荣。政商财团主义式的和平除了害他们在短期内一定会失去土地，除了提供华利所说终究会有电梯下来的幻想之外，还提供了什么东西？

芝加哥学派圣战获胜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出占人口总数25%到60%的永久下层阶级。圣战总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种大规模驱逐人民、破坏文明的战争经济模型，强加在已经受到灾祸蹂躏、受到种族冲突惊吓的国家时，更是特别危险。就像凯恩斯很多年前所说，这种惩罚式的和平会有政治后果，包括爆发更血腥的战争。

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忘了”灾难一视同仁”这句行之已久的谎话。忘了灾难会把行进路线上的一切夷为平地、无论尊卑贵贱的谎话。瘟疫会锁定无依无靠的人，会锁定被迫在危险路线上讨生活的人，艾滋病也不例外。

——马瑞斯(Hein Marais)，南非作家，2006年

卡特琳娜不是无法预测的灾祸，是把责任外包给民间包商、放弃本身所有责任的政治结构带来的惨祸。

——贝拉风德(Harry BeLaFonte)，美国音乐家兼民权运动者，2005年9月

2005年9月第二周，我来到新奥尔良，为仍然半淹在洪水中的新奥尔良拍摄记录片，同行的还有我先生艾威，以及之前跟我一起前往伊拉克的安德鲁。晚上六点，宵禁开始，我们还开着车在路上打转，摸不着方向。交通号志完全坏了，一半的路牌被暴风吹倒，或是歪七扭八。瓦砾和积水挡住了很多条路，大部分人像我们一样，在障碍物中努力找路前进，想要出城，却不知道要怎么走。

车祸很严重：我们全速前进时，在一个主要路口中间遭到侧撞，我们的车子失控，撞上交通号志，撞开路边铁铸的护栏，停在走廊上。幸好两部车上坐的人伤势都很轻微，但是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被人绑在担架上送走。我处在撞击后的晕眩状态中，知道不管救护车把我送到哪里，都不会是好地方。我想到新奥尔良机场临时诊所可怕景象，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太少，以至于撤到那里的老人瘫倒在轮椅上，几小时都没有人理会。我想到稍早才经过的新奥尔良主要公立医院慈善医院(CharityHospital)急诊室，这所医院在飓风来袭期间泡在水里，医院员工在停电的情况下，努力维持病人的生命。我请求医事助理员让我下车，我记得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一定是昏了过去。

救护车抵达我所看过最现代化、最安静的医院时，我醒了过来。奥克斯纳医学中心(Ochsner Medical Center)跟挤满难民的机场临时医院不同，提供“让心神安宁的医疗照护”，这里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数目远超过病人。事实上，干净的病房里，似乎只有少数其他病人。我在几分钟内，就住进宽敞的私人病房，几位医疗人员处理我身上的割伤和淤伤，三位护士立刻送我去照颈部X光；一位彬彬有礼的南方人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一些玻璃碎片，缝了几针。

对于熟悉加拿大公立医疗制度的我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经验；往往要等40分钟才能见到我的家庭医生，如今这一切高规格待遇却是发生在新奥尔良市区，位于美国近代史上最大公共卫生灾难的原点。一位斯文的行政人员走进病房，说明“我们美国人要自费购买医疗，很可惜，这种医疗真的很差，好希望能有你们那种制度。你只需要填这张表格”。

如果不是因为宵禁，我应该在几小时内就会出院。我和一位私人保安警卫一起在大厅里等待时间过去，他告诉我，“最大的问题是有毒瘾的人，他们的毒瘾发作，想要冲人药房”。

因为药房紧紧关着，一位实习医生很好心，塞给我几颗止痛药。我问他，飓风全力吹袭时，这家医院的情况如何。他说：“谢天谢地，我没有值班，我住在新奥尔良市外。”

我问他，是否到过避难所，协助治疗病人，这个问题似乎使他吓了一跳，也让他有点尴尬。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很快改变话题，谈一些我想比较安全的问题，例如慈善医院的命运。那家医院资金极为不足，在飓风来袭前，几乎就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大家开始猜测在水灾后，慈善医院可能再也不会开张。他说：“那家医院最好能够重新开张，我们这里无法治疗那些病人。”

我心里想到，这位和蔼的年轻医生和我刚才得到的精致医疗照护，具体表现了形成卡特琳娜飓风可怕灾难的文化，表现了使新奥尔良放任最穷困居民淹死的文化。这位实习医生从私立医学院毕业，来私立医院当实习医生，受到的训练使他根本没有把新奥尔良没有医疗、人数极多的非裔美国居民当成可能的病人。飓风来袭前就是这样，而即使在整个新奥尔良变成超大的急诊室后，也仍然是这样：他同情难民，但事实上他仍然不把难民视为可能的服务对象。

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后，奥克斯纳医院和慈善医院之间的重大差别，突然被摊开呈现在世界舞台上。经济地位稳

固的人叫车出城，住进旅馆，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十二万新奥尔良无车阶级要靠国家撤离，他们苦苦等待救援，救援根本没有出现，他们绝望之余，发出求救信号，或是拆下冰箱门，当成木筏划走。这种景象震撼了世界，因为即使大多数人可以忍受日常的不公平，比如谁可以得到卫生治疗、谁的学校设备精良，普遍的想法仍然以为灾难理所当然。大家理所当然认为，爆发巨大灾难时，国家(至少富有的国家)应该出面救助人民。新奥尔良传出的景象显示，一般人的种种信念(灾难是割喉式竞争资本主义的暂停时间，人民会团结一致，国家会全力动员)已被国家抛弃，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公共辩论。

卡特琳娜飓风后，似乎有短短两三星期的时间，新奥尔良大淹水会引发这种经济理念的危机，这种经济理念无情攻击公共部门，使人祸大为恶化。本来就住在新奥尔良的政治学家李德(Adolph Reed Jr.)写道：“这场风灾在一个地方，突然解开了新自由主义的谎话和神话造成的后果。”如此揭发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堤防从来没有修理过、失灵的公共运输系统资金不足；新奥尔良市的防灾做法只是分发激光视盘，告诉大家，如果飓风来袭，大家应该离开这个城市。

再看看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这个单位是布什政府设想由企业经营政府的实验室。2004年夏季，早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前一年多，路易斯安那州就向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提出要求，希望该署提拨资金，让路易斯安那州研订强力飓风来袭时详尽的防灾应变计划。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拒绝了 this 要求。布什执政期间，“减轻灾难计划”(降低天灾毁灭力量的政府预先措施)预算遭到删减，但是在同一年夏天，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却把50万美元的合约交给民间企业创新应急管理公司(Innov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要求该公司为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和新奥尔良市提出重大风灾紧急应变计划。

这家民间公司花钱毫不手软，召集了100多位专家研讨，钱用完时，又回头找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要钱：最后，制定这个计划的花费倍增为100万美元。该公司提出大规模撤离居民的计划，其中涵盖所有事情，包括提供饮水、指示附近小区找出空停车场，以便立刻改为拖车停车场，容纳难民；但是假想中的飓风真正来袭时，想得到的全都做不到。原因之一是该公司交出报告八个月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担任署长的布朗解释说“没有钱可以做后续追踪工作”。这种情形是布什所建立不对称国家的典型状况：一边是脆弱无力、资金不足、没有效率的公共部门，另一边是资金充裕的企业基础设施部门。把合约交给包商时，金额完全没有限制，要钱推动国家基本功能时，国库却是空的。

就像在伊拉克的美国占领政权是空壳一样，卡特琳娜飓风来袭时，国内的美利坚联邦政府也是空壳。事实上，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完全在状况外，甚至找不到困了2.3万个难民的新奥尔良巨蛋体育场。然而全世界的媒体已经进入这个没有食物、没有饮水的体育场采访好几天。

对某些抱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人来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的这幅“完全无能政府的”景象，会引发他们的信心危机。后悔坚持新保守主义的真正信徒凯利(Martin Kelly)，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写道：“新奥尔良堤防崩溃对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就像柏林围墙崩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一样深远。希望所有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会有很长的时间考虑我们思维中的错误。”连新保守主义忠贞分子高德柏(Jonah Goldberg)都恳求“大有为政府”出面救灾，他说：“城市沉入海里，暴乱如此嚣张，此时政府或许应该负起责任。”

在弗里德曼主义真正信徒聚集的传统基金会，却看不到有人这样反省。就像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言论版上所写的一样，卡特琳娜飓风是悲剧，却“也是机会”。2005年9月13日，新奥尔良堤防崩溃14天后，传统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找来秉持相同意识形态的专家和共和党议员，研讨会提出“因应卡特琳娜飓风与汽油价格高涨的新自由市场构想”报告，总共列出32项政策，每项政策都直接出自芝加哥学派的剧本，所有政策都包装成“减轻风灾政策”。前三项政策建议首先是“在灾区自动停止实施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现行工资法”，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包商发出足以让工人生活的工资；第二项是“把整个受灾地区，变成实施单一税率的自由企业区”；第三项是“把整个地区变成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特区(提供全面的租税奖励，免除政府管制)”。另一项建议是要求政府发给父母教育券，好在私立学校使用。一周之内，布什总统宣布实施这个研讨会提出的所有措施。他最后被迫恢复劳动标准，但是包商大致上都不理会。

这个研讨会另外提出了很多项获得总统支持的构想。气候学家认为，飓风频率增加，跟海洋水温上升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无法阻止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呼吁美国国会，撤销墨西哥湾海岸的环保法规、同意在美国新设炼

油厂、批准“在极地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进行钻探”。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强气候变化，但是布什考虑立刻以因应卡特琳娜风灾为名，支持这些措施。

几周之内，墨西哥湾沿岸就像伊拉克一样，变成了“包商经营政府”实验的国内试验场。夺得最大合约的公司是大家熟悉的巴格达帮；哈利伯顿旗下的凯乐布朗鲁特公司取得600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重建墨西哥湾沿岸的军事基地。黑水公司受雇保护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员工不受抢劫威胁。冈为在伊拉克施工差劲而臭名在外的柏诚公司，得到在密西西比河兴建一座大桥的合约。所有取得伊拉克合约的顶尖包商：福陆(Fluor)、萧氏工业(Shaw)、贝泰、西图集团，在堤防破裂十天后，都得到政府的合约，提供难民行动住宅，最后这些合约价值总计高达34亿美元，却根本没有经过招标。

当时很多人指出，风灾过后才几天，情形就变成好比巴格达的绿区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基地拔起，空降在墨西哥湾区。两者相似之处不容否认。萧氏工业为了推动卡特琳娜风灾后的业务，雇用了美国陆军伊拉克重建办事处的前主任。福陆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深项目经理调到新奥尔良洪水灾区，该公司一位代表解释说，“我们在伊拉克的重建工程慢了下來，因此可以调派一些人，负责我们在路易西安纳州的工程。”承诺要把沃尔玛和7-Eleven引进伊拉克的新桥策略公司主管欧尔鲍，担任上述多项合约的说客。两个地方的重建工程太相似了，因此刚从巴格达回来的一些佣兵难以适应。记者安德斯(David Enders)问新奥尔良一家旅馆外的武装警卫，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风吹草动，佣兵回答说：“没有，这里很像绿区。”

还有不少地方也很像绿区。国会调查人员调查总值87.5亿美元的合约时，发现“严重高估费用、支出浪费或管理不善”。(在伊拉克所犯的的错误，立刻一模一样、原封不动又出现在新奥尔良，这应该可以反驳占领伊拉克只是一连串不幸事故与错误加上执行者无能又缺乏监督的说法。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时，就该想到有可能所谓的错误根本不是错误。)

新奥尔良的情形像伊拉克一样，包商没有放过任何获利机会，超大殡葬集团企业国际服务公司(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布什选举基金的主要捐赠者)旗下的肯扬公司(Kenyon)，得到搜寻街道与住宅中尸体的合约。肯扬公司的搜寻工作进行特别缓慢，尸体在烈日下曝晒很多天，却又禁止急难工作人员和本地志愿殡葬业者伸出援手，帮忙寻找，因为处理尸体侵犯了肯扬公司的商业领域。该公司每处理一位受难者，平均向国家收取12500美元，后来还有人指控该公司处理错误，许多尸体没有挂上正确的标志。水灾爆发将近一年后，还有人在阁楼上发现腐烂的尸体。

新奥尔良救灾还有另外一点很像绿区，那就是能否取得合约似乎跟有无相关经验无关。拿到5亿美元合约，负责清除瓦砾的埃希布利特公司(AshBritt)据说连一部倾卸车都没有，而是把所有工作发包给小包商。更惊人的是，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付出520万美元委托一家公司，在新奥尔良郊区的圣伯纳教区(St. Bernard Parish)为急难工作人员兴建基地营。基地营建筑进度严重落后，而且根本没有完工。包商遭到调查时，才发现这家名叫灯塔救灾(Lighthouse Disaster Relief)的公司其实是宗教团体。灯塔救灾公司董事何德瑞斯(Gary Heldreth)牧师坦白承认，“我所做过最接近这种事情的事情，只是在我的教堂里举办青少年娱乐营。”

美国政府就像在伊拉克一样，再度扮演兼具提款和存款功能的自动柜员机。企业利用大型合约提款，然后不是用可靠的工程回报政府，而是用竞选捐款、下次选举时提供忠诚的工作人员作为回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大服务业包商从2000年起，花了将近3亿美元进行游说，一共捐赠了2300万美元的竞选基金。”布什政府为了回报包商，在2000到2006年间，花在包商身上的金额大约增加了2000亿美元。)

还有一些事情看来很眼熟，就是包商避免利用本地人；本地人可能认为新奥尔良重建不但是工作机会，也是治疗和恢复小区活力的方法。华盛顿原本可以轻易地在每一个风灾重建合约中，规定公司必须以适当的工资，雇用本地人，协助本地人恢复正常生活。结果，湾区居民像伊拉克人一样，看着包商用纳税人的钱和宽松的规定，创造经济繁荣。

结果可以预料到，所有层层转包的包商各自拿到应有的利润后，实际施工的人拿到的钱少得可怜。例如，作家戴维斯(Mike Davis)追查后发现，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付给萧氏工业每平方英尺175美元，请他们在受损的屋顶上贴防水布，不过防水布是由政府提供的。所有的小包商拿走应有的利润后，实际贴防水布的工人每平方英尺只拿到两美元。戴维斯写道：“换句话说，包商食物链中每一个阶层都吃得脑满肠肥，只有最底层实际施工的人例外。”

有一项研究指出，新奥尔良重建工程的工人当中，有四分之一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劳工，所有外国劳工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赚的钱远比合法劳工少。有些外籍工人在密西西比州提出集体诉讼，迫使好几家公司吐出几十万美元的短付工资，有些外国劳工根本没有拿到工资。在哈利伯顿旗下凯乐布朗鲁特公司的一处工寮里，据说雇主(经过层层转包后的小包商)半夜把没有身份证明的外国劳工叫醒，告诉他们移民局官员要来检查。大部分外国劳工都逃走了，以免遭到逮捕，否则他们最后可能关进凯乐布朗鲁特公司承包兴建的新移民监狱。*

*没有人针对新奥尔良劳工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新奥尔良草根性利益团体先进计划组织(Advancement Project)估计，新奥尔良的外劳中，有60%被拖欠工资。

有关方面打着重建和救灾的旗号，对弱势阶级的攻击还不止于此。为了弥补以合约和租税抵减方式流入民间公司的几百亿美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2005年11月宣布，必须删减联邦预算400亿美元，遭到删减的项目包括学生贷款、老人医疗和食物券等计划。换句话说，美国最穷的公民补贴包商两次：第一次是卡特琳娜救灾行动变成胡乱发包，包商却没有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也没有提供有用的公共服务；第二次是削减直接帮助全国失业与穷苦劳工阶层的计划，以便支付包商虚增的费用。

不久以前，灾难是社会平等化的时期，是极度分裂的小区抛开歧见、团结一致的难得时刻。但是灾难日渐变成相反的状况，是形成未来残酷无情分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和门第可以买到生存。

巴格达的绿区最赤裸裸表现出这种世界秩序。绿区拥有自己的电力输配网、电话与下水道系统、石油供应，以及备有干净手术室的现代化医院，一切都由五米厚的围墙保护。绿区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绿区就像超大的堡垒化嘉年华游轮，停泊在暴力与绝望的大海中、停泊在整个伊拉克构成的沸腾红区中。如果你能够上船，上面会有游泳池边的饮料、差劲的好莱坞电影和诺地乐牌(Nautilus)运动器材。如果你不是被选到的人，可能光是因为站得太靠近围墙，就会遭到射杀。

在伊拉克的每一个地方，都赤裸裸表现出不同阶级的人有极不相同的价值感。西方人和伊拉克同事进入属于他们的街道时，会经过检查哨，他们的住宅前面有防暴墙、防弹衣和随传随到的私人警卫。他们在伊拉克旅行时，坐在带有威胁性的装甲护航车队里，车里的佣兵枪口指着窗外，奉行“保护主人”的主要命令。他们的每一种行动都大刺刺地传达同样的信息：我们是被选到的人；我们生命宝贵的程度不知道高出多少。伊拉克的中产阶级攀附在低一级的阶梯上，有钱买到本地民兵的保护，有钱付给绑匪，让家人获释；但是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根本得不到保护，他们走在街上，随时可能遭到暴力攻击，他们和下一颗汽车炸弹之间，只隔了薄薄的一层布。在伊拉克，幸运的人穿克夫勒(Kevlar)防弹衣，其他的人只佩挂祈祷念珠。

起初我以为只有伊拉克战区才有绿区现象，观察其他灾区多年后，终于了解只要有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光临的地方，都会出现绿区现象，同样赤裸裸地划分出国内人和圈外人、受到保护的人和注定该死的人。

新奥尔良也发生这种情形。洪水后，已经分裂的新奥尔良变成有铁门保护的绿区和动荡红区之间的战场，这不是洪水侵袭造成的后果，而是总统采用“自由市场解决方案”造成的后果。布什政府拒绝用急难救助基金支付公共部门的薪水，已经失去税基的新奥尔良在卡特琳娜风灾后几个月里，解雇了3000名员工，其中有16位是新奥尔良都市计划部门员工；这样有点“去复兴党化”的意味，就在新奥尔良迫切需要规划人员时把他们裁掉。因此数百万美元的公款流入外界顾问公司手中，很多顾问公司是强而有力的不动产开发商。几千位老师当然也遭到解雇，为几十所公立学校变成私立学校奠定基础，就像弗里德曼所要求的一样。

风灾过后将近两年，慈善医院还是没办法重新开张，法院系统只能勉强运作，民营化的恩特基电力公司(Entergy)还没有恢复全市的供电，却威胁要大幅提高电价，因此从联邦政府取得两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引发物议。公共运输系统遭到掏空，几乎失去一半员工。庞大的公共住宅计划弃而不用，空无一人，联邦住宅主管机关计划拆掉其中的5000栋。就像亚洲观光业游说团体一直希望搬走海滩上的渔村一样，新奥尔良强而有力的观光业游说团体一直垂涎公共住宅计划，其中很多块建地靠近新奥尔良观光景点法国区(French Quarter)的精华土地。

贾卡利(Endesha Juakali)曾经协助有关人士，在封闭的公共住宅计划之一的圣伯纳公共住宅(St. Bernard Public Housing)外面设立抗议营。他解释说：“他们长久以来就看中圣伯纳的住宅，但是只要有人住在这里，他们就无可奈何，因此他们趁着小区居民最脆弱无力的时候，利用风灾作为腾空小区的方法……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盖比较大的住宅和公寓大楼，唯一的问题是土地上有这么多穷困的黑人！”

新奥尔良公共部门和很多学校、住宅、医院、运输系统和缺乏清洁饮水的各区一样，没有重建，而是被人以风灾为借口，大举抹杀。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初期，美国有一大片地区失去制造业基础，沦为工厂纷纷关门、小区无人照顾的没落地带。卡特琳娜飓风后的新奥尔良，可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新形态的荒废都市，成为老旧公共建设与极端气候合力摧毁的发霉城市。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2007年指出，美国在维持公共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学校、水库等方面极为落后，要花费超过1.5兆美元、耗时五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然而，这种支出却遭到删减。同时，全世界的公共建设都面临空前未有的压力，受到频率和强度升高的飓风、热带气旋、洪水和森林火灾的威胁。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到，将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里，年久失修的脆弱公共建设遭到灾难破坏，然后逐渐荒废，城市提供的核心服务绝对不会修复或更新。同时，有钱人会撤退到有门禁管理的小区里，他们的需要会有民营化的供货商满足。

2006年飓风季节展开时，这种未来的迹象已经明显呈现。只不过一年之间，灾难因应产业呈现爆炸性成长，很多新公司踏入市场，承诺要在下一次超级飓风侵袭时，提供安全与保障。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帮帮忙喷射航空公司”(HelpJet)别出心裁，创设了一家比较有野心的企业，该公司自称是“第一家提出飓风逃难计划，把飓风撤离变成高级度假的航空公司”。飓风来袭时，这家公司会为会员订好五星级高尔夫度假村、水疗度假村或迪斯尼乐园的假期，然后用豪华喷射客机，把需要撤离的人迅速从飓风区载走，“不必站在队伍中等候，不必跟群众争执，只是把问题变成假期的第一流体验……享受那种感觉，不必像平常一样在飓风来袭前慌忙撤离”。

被排除在外的人有不同的民营化解决之道。2006年，红十字会和沃尔玛签约，成立新的合伙组织。佛罗里达岛链急难管理主管瓦格纳(Billy Wagner)说：“他们有能力、有资源。”他是在佛罗里达奥兰多(Orlando)举行的全国飓风大会上说出这些话，这个大会是业界快速成长的年度专业展，参展公司销售的东西或许可以在下次灾难来袭时派上用场。展出“自动加热餐食”的厂商布兰福(Dave Blandford)也在会议上指出：“有些参展厂商告诉我：‘老兄，这是非常大的生意，也是我的新生意，我不再从事园艺业了，我要改行当飓风瓦砾处理包商。’”

灾难经济大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这点主要拜民营化战区重建热潮之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担任“主要包商”的业界巨擘因为把得自政府合约的大部分收入，当成公司的经常费用使用，而遭到政治抨击：根据有关机关2006年针对伊拉克包商所做的稽核，这种费用所占比率介于20%到55%之间。这些费用大都相当合法，而且其中有很大的金额投资在企业的基本设施上，例如贝泰购买的众多推土设备，哈利伯顿的机队和货运车队，还有L3通讯、CACI和布斯艾伦汉米尔顿等公司建立的侦监设备。

最惊人的是黑水公司投资的准军事设备。黑水公司1996年才成立，却利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取得的稳定合约，建立起一支由2万名佣兵组成的私人军队，随时可以应召部署，另外还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价值4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庞大军事基地。根据一份文件的说法，黑水现在拥有下述能力：“迅速成长的后勤作业，可以用比红十字会还快的速度，运输重量100吨或200吨的独立人道救援方案。设在佛罗里达的航空部门，拥有26种不同的飞行平台，包括战斗直升机到庞大的波音767喷射机。公司甚至拥有一艘飞船、全美最大的战术驾驶训练场……还有一座20英亩大的人造湖，湖中配备货柜船、模拟的船舶轨道和舷窗，货柜船浮在浮坞上，用来训练如何登上有敌意的船舶。一个警犬训练营，目前在世界各国部署了80组警犬……还有一个长1200码的靶场，专门用来训练狙击手。”*

*这种产业有一个地方最令人担心，就是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党派之私。例如黑水公司跟反堕胎运动和其他右派政策立场关系密切，几乎完全只捐款给共和党，而不是像大部分大企业一样，对两党都下注。哈利伯顿的政治捐款中，87%流向共和党，西图集团的比率70%。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将来有一天，政党在选战中会雇用这些公司侦测对手，或是利用这些公司从事连中央情报局都觉得太龌龊的秘密任务。

美国一份右派杂志把黑水公司称为“为好人服务的基地组织”，这种比喻非常清楚，只要是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地方，就会在国家之外形成不断激增的军事组织。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值得意外：由不相信政府的人重建国家，结果一定都脆弱无力，因而为替代的保安部队创造市场，不论你是真主党、黑水公司、曼迪军，或是新奥尔良街头的帮派。

这种私人拥有的地下军事结构出现后，影响力远远超出警戒范围。从整体看布什年代形成的包商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大家看到的是十分清楚的国中之国，这种国中之国能力完善，实际的国家却柔弱无力。这种企业影子国家的建立，包括员工的训练，几乎完全都是利用公共资源(黑水公司的营收90%来自国家的合约；影子国家绝大部分的员工过去是公务员、政客和士兵)，但是这种庞火的结构完全由私人拥有和控制。公民出钱成立这种结构，却绝对无

法主张拥有这种地下经济或影子国家的资源。

同时，真正的国家却失去能力，没有包商的协助，就无法执行核心功能。真正的国家设备老旧，最高明的专家已经流向民间影子国家。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必须聘请一家包商，负责把合约发包给其他包商。同样地，陆军要更新本身的发包规则手册时，也得把工作委托给大包商MPRI公司办理，因为陆军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中情局有极多员工流向民营化的地下间谍部门，以至于被迫禁止包商在中情局的餐厅里招募员工。《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位最近退休的项目官员说，他排队买咖啡时，民间包商跟他接触过两次。国土安全部决定在美墨和美加边界兴建“影子围篱”时，该部副部长杰克逊(Michael P. Jackson)告诉包商：“这是不寻常的邀标……我们请你们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办本部的业务。”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解释说，国土安全部“没有所需要的能力，不能有效的规划、监督与执行[安全边界行动]计划”。

布什统治期间，国家仍然拥有政府的所有模样，包括威严的建筑、总统的记者会和政策辩论，但是政府不再真正统治，就像耐吉公司俄勒冈州比佛顿(Beaverton)总部的员工不再缝制跑鞋一样。

目前这帮政客决定把人民选举他们出来执政的责任，有系统地外包办理，影响远超过一任政府。市场一旦创造出来，就需要保护，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企业愈来愈觉得：国家和非营利事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从企业观点来看，政府或慈善事业完成传统的角色，就是妨碍业者取得可以获利的合约。

2006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得到涵盖国防工业巨擘业者的顾问委员会协助，发表一篇报告，名叫《遭到忽略的国防：动员民间部门支持国土安全》，文中提出警告：“联邦政府同情而冲动地对天灾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影响管理风险的市场策略。”这份报告认为，如果人民知道政府会出面援助，就不愿付钱购买民间企业提供的保护。同样地，卡特琳娜风灾一年后，成员包括福陆、贝泰与雪佛龙等公司的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邀请美国30家超大企业总裁开会，自称灾难反应伙伴组织(Partnership for Disaster Response)的30家公司在会议上，抱怨非营利部门在灾难后“偏离任务”，显然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捐赠建筑材料，而不是由业者向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购买，妨碍了业者的市场。同时，佣兵部队公司也极力宣称，他们的设备比较精良，比联合国更适于在苏丹的达佛执行维和任务。

业者突然表现这么积极的态度，主因是企业界都知道，由联邦无底洞般的合约构成的黄金时代不可能延续多久。美国政府已经因为以赤字协助建立民间灾难经济而快速陷入经济危机。这表示不久之后，合约金额就会大幅减少。2006年下半，国防工业分析师开始预测：未来10年里，国防部的采购预算可能萎缩多达25%。

灾难泡沫破灭时，贝泰、福陆和黑水之流的公司会失去大部分主要营收来源，却仍然拥有用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所有高科技设备，但是他们需要寻找新事业模式，找到新事业分摊高成本。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下一个阶段十分清楚：在紧急灾难不断增加，政府无力承担救难费用，人民又苦于政府无能时，这些地下企业王国会把自己的灾难救助设备租还给能够以市场价格承租的人。他们拥有的一切，从搭乘直升机从屋顶逃走、饮水到难民营里的床铺，全都待价而沽。

财富已经为若干人提供了逃离大部分灾难的救生舱：财富为容易发生海啸的地区采购了早期预警系统，为下一次的禽流感爆发囤积了克流感，买好了瓶装水、发电机、卫星电话和可以租用的警察。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期间，美国政府起先想要向公民收取撤离费用，不过最后被迫放弃。如果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进，人民困在新奥尔良屋顶的影像，不只代表美国尚未解决的种族不平等历史，也预示灾难种族隔离的全部未来，将来灾区里的人能否幸存，要看他们能否负担逃生费用而定。

展望未来的生态与政治灾难，我们总是以为大家都会合力面对灾难，认为需要一位领袖，能够看出我们正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可不敢这么肯定。有这么多政治与企业精英对气候变化如此乐观，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确信自己负担得起从最可怕灾难中逃生的费用。或许这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布什的支持者当中，有这么多人是相信末日论的基督徒。这种情形不只显示他们必须相信自己拥有逃生舱口，可以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逃走；末世升天(Rapture)还是一个寓言，显示他们在世间建立的是自寻毁灭与灾难的系统，在这之后会有私人直升机和飞机降下来，把他们和朋友载到神圣的安全国度。

包商急于开发替代的稳定营收来源之际，有一条路是对其他企业提供不受灾难侵袭的保护，这是布雷默到伊拉克上任前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把跨国企业拉进安全泡沫，即使企业所在的国家分崩离析，企业仍然可以顺利运

作。纽约或伦敦很多大型办公大楼的大厅中，已经可以看出业界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例如进入大楼时必须经过机场式的安检，加上佩挂有相片的身份证明和X光机等。但是业界的野心大多了，包括推动全球电信网络、紧急医疗与电力民营化，并且有能力在重大灾害期间部署与运输全球反应人力。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看出的另一个潜在成长领域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推动警察与消防部门委托民间安全公司办理。2004年11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在伊拉克法鲁加市区为军队执行的任务，一样可以在雷诺市为警察执行。”

业界预测，未来十年里，这些新市场会急速扩张。曾经担任三角洲部队秘密行动任务指挥官、后来成功转型为管理顾问的罗勃(JohnRobb)，坦白预测这些趋势将来会有什么发展。他在《快速公司》杂志(FastCompany)上发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指出“反恐战争的结果是新颖、却比较有弹性的国家安全事务新做法：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公民与私人公司为中心……安全会变成你在什么地方居住、你为谁工作等答案所组成的函数，很像已经分配给医疗的角色一样”。

罗勃写道：“富人和跨国企业会变成我们这种集体系统拯救出来的客户，他们会选择聘请私人军事公司，如黑水和三棚公司(Triple Canopy)，保护他们的住宅与设施，并且依据日常生活，建立保护性的架构。从巴菲特旗下的网络喷射公司(Netjets)之类的分时航空公司演变出来的平行运输网络，会满足这批客户的要求，以蛙跳的方式，把他们从一个设备精良又安全的起降点，载运到下一个起降点。”这种精英世界大致上已经成型。但是罗勃预测，中产阶级很快会跟进，“形成分摊安全成本的郊区安全体制，这种郊区好比堡垒，会装设并且维持备用发电机与通讯设备，由受过公司训练的私人民兵巡逻，而且拥有现代化的应变系统”。

换句话说，这是郊外绿区形成的天地，至于在这种安全阵地以外的人，“他们必须满足于国家残存体系的遗迹，他们会被吸引到美国城市，接受无所不在的监视，接受边缘化或完全不存在的服务，对穷人来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避难”。

罗勃描述的未来听起来很像新奥尔良的现状。新奥尔良的瓦砾堆中出现了两种大不相同、大门深锁的小区：一种是所谓的急难村，就是荒凉、偏僻、满地碎石子的拖车营地，这是低收入难民住的地方，由贝泰或福陆公司的包商兴建，由私人保安公司管理和巡逻，住客受到限制，新闻记者不得进入，难民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大门深锁的小区，位在新奥尔良富人居住的地区，例如奥都本区(Audubon)和花园区(Garden District)，提供似乎和国家完全分离的各种功能。风灾过后几周内，那里的居民就有饮水供应和强力紧急发电机，病人在私人医院治疗，小孩上新的私立学校。他们像平常一样，不需要公共运输。在新奥尔良郊区的伯纳德教区，戴恩公司负责大部分的管理，其他小区就直接雇用保安公司。在这两种私人国度之间，就是新奥尔良版的红区，红区里谋杀率飞跃上升，像是著名的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沦为充满末日恐怖的无人地带。卡特琳娜侵袭过后的那年夏天，饶舌歌手少年乐团(Juvenile)主唱的流行歌道尽了全部气氛，“我们住在像海地一样没有政府的地方”——失败的国家美国。

本地律师兼行动主义者桂格里(Bill Quigley)说：“新奥尔良发生的现象，只是全美同样现象比较集中、比较生动的版本。我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地方极为类似新奥尔良，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荒废的小区、荒废的公共教育设施、公共住宅、公共卫生诊所和罪犯正义。除非我们全力阻止，不支持公共教育、医疗和公共住宅的人，会继续把全美国变成下九区。”

这种过程已经进行很久。在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富裕的共和党小区，可以看到另一种灾难种族隔离主义的景象。这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缴交的房屋税，被人拿去补贴那里的低收入非裔美国人小区学校和警察深感不满，就投票决定自行成立森地泉市(Sandy Springs)，好把税收拿来为十万公民提供各种服务，不必透过比较大的富尔顿郡(Fulton County)重新分配。唯一的问题是森地泉市没有政府结构，需要无中生有，从头建立有关收税、都市计划到公园与娱乐的事务。2005年9月，也就是新奥尔良遭到洪水侵袭的同一个月里，营建与顾问巨擘西图集团找上森地泉的居民，提出独一无二的建议：一切由我们代劳。西图集团要价每年2700万美元，保证替森地泉从头建立完整的城市。

几个月后，森地泉成为第一个“合约城市”。只有四个人直接为新市政府工作，其他人全都是约雇人员。为西图集团主持这个计划的贺塞康(Rick Hirsekom)说：“森地泉是没有政府治理程序的一张白纸。”他告诉另一位记者说：“我们同业里，从来没有人完成过这种规模的城市。”

《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报道：“森地泉雇用企业员工，管理自己的新城市，真是颇为大胆的实验。”不到一年内，合约城市风潮席卷亚特兰大的富裕小区，变成“北富尔顿郡的标准程序”。附近小区学

习森地泉，也投票要自立为城市，而且把政府外包办理。一个叫米尔顿(Milton)的新城市立刻聘请西图集团办理这件事，毕竟西图集团已经有经验了。很快地，新成立的城市掀起整合运动，希望组成自己的郡，这点表示，他们缴交的税款没有一块钱会流入附近的贫困小区。这个计划碰到激烈的反对，反对的人是这块建议中的独立领土之外的政客，他们说，没有这些税款的话，他们再也不能负担郡里的大型公立医院和公共运输系统；他们也说，郡的分裂会在一边创造出失败国家，另一边则是服务过多的国家。他们所说的情形听起来很像新奥尔良，也有点像巴格达。

在亚特兰大这些富裕的郊区里，30年来政商财团主义在光天化日之下掏空国家的圣战已经完成，不只是每一种政府服务都外包办理，连政府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治理的功能也外包办理。这种新领域由西图集团开拓可以说是特别适宜，该公司在伊拉克取得数亿美元的合约，负责执行监督其他包商的政府核心功能。大海啸侵袭斯里兰卡后，西图集团不但为斯里兰卡兴建港口和桥梁，也“负责基础建设计划的整体监督”。卡特琳娜飓风后，西图集团在新奥尔良取得5亿美元的合约，负责兴建急难村，而且已经做好准备能够在下次灾难中取得同样合约。西图集团是在特殊状况下推动国家民营化的大师，如今它也推动正常情况下的国家民营化。如果说伊拉克是极端民营化的实验室，现在实验期显然已经结束。

大型分隔围篱不是劳改营世界的东西，而是属于高速公路隔音墙、体育馆豪华包厢、非吸烟区、机场安全区和“大门深锁小区”……大型围篱把富人的特权和穷人的嫉妒显露在外，让贫富双方都觉得尴尬。这点不表示围篱没有效。

——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资深编辑。2006年11月

几十年来，凡俗之见都认为，整体的混乱会耗损世界经济的力量。个别震撼与危机当然可以利用，作为强制打开新市场的工具，但是在初期的震撼达到目标后，需要相对的和平与稳定，才能追求永续经济成长。大家普遍认为，这是90年代这么繁荣的原因：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体自由化，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错综复杂、更互相依赖，彼此轰炸对方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然而，在2007年瑞士达弗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政治与企业领袖对一种似乎嘲讽这种凡俗之见的状态百思不解，这种状态叫作“达弗斯两难”。“《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伍尔夫(Martin Wolf)把这种状态说成是“世界经济顺利发展、政治情势问题重重之间的对比”。他说，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震撼，包括2000年后的股市崩盘；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暴行；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政策引发的摩擦；实质油价涨到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杜哈回合谈判中断；伊朗发展核子能力雄心引发的冲突”，但是世界经济却处在普遍共同成长的黄金时期。简单地说，世界乱成一团，眼前看不到稳定，全球经济却大声叫好。不久之后，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把这种政治与经济几乎完全分离的现象，形容成“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你跟国际关系专家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时代，然后你跟潜在的投资人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这种令人困扰的趋势也表现在所谓的“大炮与鱼子酱指数”(guns-to-caviar index)经济指标。这个指数追踪喷射战斗机(大炮)与主管座机(鱼子酱)的销售状况。大家发现，17年来，喷射战斗机销售热络时，豪华主管座机的销售会下降，反之亦然，也就是主管座机销售成长时，喷射战斗机的销售会减少。当然，总是有一些发战争财的人会靠着出售大炮致富，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你不可能在暴乱与不稳定的情势中创造蓬勃经济成长，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种老生常谈已经不正确。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这个指针显示，喷射战斗机和主管座机的支出同时快速增加，这点表示在世界变得更不和平之际，获利也大幅累积。印度经济飞跃成长，是奢侈品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小小的军产体系扩张，变成庞大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全球不稳定不只嘉惠少数军火贩子，也为高科技安全部门、重型营造业者、治疗伤兵的私人健康照顾公司、石油与天然气部门创造惊人的利润，当然也为国防包商创造庞大的利润。

这种营收规模的确足以助长经济繁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光是在2005年，就赚了美国纳税人250亿美元，该公司一位副总裁主持的委员会曾经大力鼓吹侵略伊拉克。民主党众议员韦克曼(Henry Waxman)指出，这个金额“超过10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包括超过冰岛、约旦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内生产毛额，也比美国商务部、内政部、中小企业局与政府整个立法部门的预算总和还多”。洛克希德本身就是“新兴市场”，洛克希德之类的公司股价上涨(2000到2005年间上涨三倍)，是美国股市能够从9·11事件后长期崩盘中脱困的原因之一。2001到2006年间，一般股票的股价表现不如大盘，代表国防、国土安全与航天股票的史贝国防指数(Spade Defense Index)每年却平均上涨15%，是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涨幅的7.5倍。

在伊拉克加速发展的民营化重建事业模式获利极高，进一步助长了达弗斯两难。包括大型工程公司在内的重型建设股，在战争与天灾后，都会捞到利润极高、不必竞标的合约，2001到2007年4月间，重型营建股的股价上涨250%。如今重建已是非常大的生意，因此每一次新灾难造成毁灭后，都会伴随着热门的初次公开发行股票热潮：跟伊拉克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300亿美元，跟南亚大海啸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130亿美元，跟新奥尔良与墨西哥湾区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跟黎巴嫩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76亿美元。

恐怖攻击通常会造成股市暴跌，现在却受到市场热烈欢迎。2001年9月11日后，纽约股市重新开盘时，道琼工

业股价指数立刻暴跌685点，和2005年7月7日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天四颗炸弹炸翻伦敦公共运输系统，炸死数十人，炸伤几百人，美国股市当天收盘还上涨，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上涨7点。随后在8月的某一天，英国执法机关宣布，逮捕计划爆炸飞往美国班机的24位嫌疑犯，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上涨11.4点，主因是国土安全股飞跃上涨。

石油业也赚到暴利：2006年，光是埃克森美孚公司就赚到400亿美元的利润，创下世界企业史上最高的获利记录。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如雪佛龙，也不遑多让。石油业像国防、重型营建与国土安全企业一样，财运随着每一次战争、恐怖攻击与五级飓风而改善。石油业除了赚取主要产区不安定带来的短期价格上涨利益外，也一直努力把灾难变成自己的长期利益，方法包括：确保阿富汗重建资金中，有一大部分用在兴建新油管所需要的昂贵道路建设工程上(其他重大重建计划大都拖延下来)；或是在伊拉克仍然陷在熊熊大火时通过石油法；或是靠着卡特琳娜飓风，计划设立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第一批新炼油厂。油气业和灾难经济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是很多灾难的根本原因和受益者，因此可以视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荣誉附属成员。

无需密谋

近年频频爆发的灾难转化成极为惊人的利润，促使世界各地很多人得到相同的结论，就是富国和强国一定刻意制造灾难，以便加以利用。2006年7月，针对美国居民所做的全国性访调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政府与9·11攻击脱不了关系，或是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恐怖分子，“因为政府希望美国在中东开战”。近年大部分的灾难爆发后，类似的怀疑都会跟着出现；卡特琳娜飓风过后，路易西安纳州难民营里谣言四起，说堤防并没有崩溃，而是遭到秘密炸毁，目的就像伊斯兰国家组织(Nation of Islam)领袖范瑞汉(Louis Farrakhan)说的一样，是要“摧毁新奥尔良的黑人区，同时确保白人区不淹水”。我在斯里兰卡时，经常听说大海啸是美国引爆的海底爆炸所造成，这样美国可以派军到东南亚，完全掌控东南亚地区的经济。

事实真相没有这么恶毒，却更加危险。经济体系如果要不断成长，除了要坚决反对几乎所有认真的环境管制，本身就会稳定地制造一系列灾难，不管是军事、生态还是金融灾难。市场喜欢纯粹投机带来的短期暴利，使股市、汇市和不动产市场变成制造危机的机器，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和网络泡沫崩溃，全都指出这一点。我们普遍对肮脏的非再生能源上瘾，使其他急难事故不断爆发。从1975年起，天灾增加了4.3倍，为了控制稀有资源而发动的战争(不只是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而已，也包括奈及利亚、哥伦比亚和苏丹强度比较低的动乱)，会进一步造成恐怖分子的反弹(200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恐怖攻击的次数增加了7倍)。

由于天气和政治温度都升到沸腾的地步，未来的灾难不需要靠阴谋策划。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走向，灾难会不断发生，强度会愈来愈惊人。因此，产生灾难可以留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做，这个领域是这只手确实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虽然灾难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刻意阴谋策划制造巨灾，以便从中获利(不过伊拉克可能是明显的例外)，却有很多证据显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产业非常努力，以便确保目前的灾难趋势不受挑战，延续下去。大型石油公司长年资助否定气候变化的运动；过去十年来，估计埃克森美孚花在这种运动上的资金，已经达到1600万美元。这种现象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知道灾难承包商和精英意见领袖之间互动的人却少多了。华府几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和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都接受武器与国土安全承包商的大力资助，这些研究机构不断描绘世界是黑暗、充满威胁的地方，有问题只能用武力对付，也可以让承包商从中获利。国土安全部门也日渐和媒体公司结合，形成具有奥威尔式影响的发展。2004年，数字通讯巨擘雷西内西公司(LexisNexis)出资7.75亿美元买下资料采矿业者赛新公司(Seisint)，后者在监控方面和联邦与州政府密切合作。同一年里，拥有国家广播公司的奇异公司买下内视公司(In Vision)，内视公司主要生产具有高争议性的高科技炸弹侦测设备，用在机场与其他公开场所；2001到2006年间，内视公司获得国土安全部的合约金额高达150亿美元，超过所有其他公司得到的类似合约。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势力，打进媒体，可能是新形态的企业综效；这种做法是90年代极为流行的垂直整合。这在企业经营上的确很有道理：我们的社会愈惊慌，愈相信每一座清真寺里都潜伏着恐怖主义分子；新闻的收视率飙得愈高，厂商卖的生物特征辨认与液体炸弹侦测设备越多，兴建的高科技围篱越多。如果说，没有边界的开放“小世界”是90年代获利的保证，到了新千禧年，西方世界困在具有威胁性的堡垒中，遭到圣战分子围攻的噩梦也扮演同样的角色。灾难经济蓬勃发展，关系到极多的财富——从武器、石油、工程、监视到专利药品的庞大财富。

唯一可能威胁这种繁荣的是，世界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气候稳定与地缘政治和平。

以色列与长期灾难种族隔离国家

分析师努力了解达弗斯两难后，逐渐得到新的共识。并非市场已经变得不受不稳定影响，至少不完全如此。实际的状况是大家极为期望灾难持续不断出现，以致不断适应的市场发生改变，以符合这种新现状：不稳定就是新的稳定。大家讨论9·11后这种经济现象时，经常把以色列当成范例。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碰到自己特有的小型达弗斯两难：战争与恐怖攻击持续增加，但是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却跟着动乱升高，涨到创记录的水平。7月7日伦敦爆炸案发生后，一位股票分析师在福斯新闻台(Fox News)上指出：“以色列人天天应付恐怖威胁，股市却年年上涨。”就像全球经济状况一样，大部分人同意以色列的政治状况乱得可以，经济却从来没有这么强过，2007年的成长率媲美中印两国。

以色列这种大炮与鱼子酱模式这么有意思，原因不只是以色列经济很有弹性，善于面对重大的经济震撼，例如2006年与黎巴嫩的战争，或是2007年哈马斯组织接管加沙；而且也是因为以色列创造了直接因应暴乱升高而大幅扩张的经济。以色列工业对灾难这么安心，原因并不神秘。美国和欧洲企业了解全球安全繁荣的潜力之前很多年，以色列科技公司就忙于开创国土安全产业，今天仍然继续主导这个领域。以色列出口协会估计，以色列有350家公司专门从事国土安全产品的销售，2007年还增加了30家新公司。从企业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使以色列成为9·11后市场竞争和模仿的模范。然而，从社会与政治观点来看，应该把以色列当成别的东西、当成可怕的警讯。以色列即使对邻邦发动战争、在占领的土地上提高暴行，却仍然能继续享受繁荣，这恰恰显示了把经济建立在战争持续不断、灾难继续加深的基础上，是多么危险的事。

以色列有能力结合大炮与鱼子酱，是过去15年经济本质剧烈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对于和平希望的幻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上次中东和平出现浓厚的希望，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以色列有一大批选民相信，继续冲突不是办法，共产主义已经崩溃，信息革命正要开始。当时以色列企业界普遍认为，血腥占领加沙与西岸，加上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使以色列经济前途陷入险境。以色列企业看到全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爆炸性成长，对自己受到战争限制深感厌烦，希望成为高获利、无国界世界的一环，不再困于区域性斗争。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跟巴勒斯坦人谈判出某种和平协议，以色列的邻邦会取消联合抵制，以色列很有机会成为中东的自由贸易枢纽。

1993年，当时的以色列商会联合会总裁吉勒曼(Dan Gillerman)大力支持这种立场。“以色列可能不只变成另一个国家而已，而是可能变成整个地区的策略性运筹与营销中心，就像中东的新加坡或香港，多国公司会以这里为总部.....我们说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我们必须迅速调整，否则会错过这种一辈子才有一次的经济机会，空留余恨。”

同一年，当时的外交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对一群以色列记者解释说，和平现在势所难免，不过却是很特别的和平。佩雷斯说：“我们不是追求政治和平，而是对市场和平有兴趣。”几个月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揭开了奥斯陆协议的序幕。世界各国欢欣鼓舞，三个人合得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接着一切就出了大问题。

奥斯陆协议阶段可能是以巴关系中最乐观的时期，但是两人著名的握手不代表签署协议，只是同意开始和谈程序，所有最急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阿拉法特处在十分不利的谈判地位上，必须谈判自己重回以色列占领区的问题，而且他在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定居者甚至巴勒斯坦人自决的问题上，都没有争取到协议。谈判人员宣称，奥斯陆策略的基础理念是开放国界，加入全球化列车，推动“市场和平”，其他一切就会顺利发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都会体会到日常生活明显的改善，为将来谈判中的“政治和平”创造比较友善的环境。这点至少是奥斯陆协议承诺的事情。

很多因素促成后来的谈判破裂，以色列人通常把原因归咎于自杀炸弹和拉宾遭到暗杀。巴勒斯坦人指出，以色列人在奥斯陆协议期间，疯狂扩张非法屯垦区，情形就像巴拉克(Ehud Barak)领导的以色列劳动党政府外交部长班纳米(Shlomo Ben-Ami)说的一样，证明和平程序的基础“是以新殖民主义精神为基础”，目标是在“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终于达成和平协议时，会有互相依赖的状况，会有两个实体之间结构上不平等的状况”。有关谁破坏和平过程，或和平到底是不是这种程序真正目标的辩论，早已为人熟知，而且大家十分深入探讨过。然而，促使以色列退回到单

边主义态度的两个因素却少为人知，而且很少有人讨论，两个因素都跟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圣战在以色列造成的影响有关。一个因素是苏联犹太人涌入，这是俄罗斯休克疗法实验的直接后果；另一个因素是以色列的出口经济转变，从以传统商品与高科技产品为主，变为极度依赖反恐相关知识技术与设备的销售。两个因素都大大破坏了奥斯陆程序：俄罗斯犹太人抵达，降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劳工的依赖，使以色列可以封锁占领的土地；高科技安全经济快速扩张，使以色列最强而有力的富裕部门胃口大开，主张放弃和平，拥抱长期持续扩张的反恐战争。

因为不幸的历史巧合，奥斯陆时期开始时，正好是俄罗斯进行芝加哥学派实验到最痛苦阶段的时候。1993年9月13日，以巴双方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三周后，叶利钦派出战车，放火焚烧国会大厦，开始了他所推动经济震撼最残忍无情的阶段。

1990年代期间，大约有100万犹太人离开前苏联，搬到以色列。这段期间来自前苏联的移民，现在占以色列犹太人总人口的18%以上。这么大量的人口快速移入像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冲击之大绝对不容忽视。以比例来说，这样等于安哥拉、柬埔寨和秘鲁所有人口都打好包袱，同时移民美国一样，以欧洲来说，这样等于所有的希腊人都移民法国。

第一波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时，很多人是经历终身的宗教迫害后，决定住在犹太人的国家。然而，最初这一波移民之后，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急剧增加，而且和俄国经济休克疗法加在俄国人身上的惊人痛苦直接相关。后来这几波苏联移民不是怀抱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人(很多人宣称自己是犹太人时，显得相当无力)，而是绝望的经济移民。1992年，在莫斯科以色列大使馆外面等待的一位移民告诉《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是我们出身哪里。”苏联犹太复国论坛发言人坦白承认，这些移民“不是受到以色列吸引，而是觉得自己被苏联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恶化赶走”。到现在为止，最大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93年叶利钦政变时，正好以色列开始和平程序。这一波之后，另外有60万人从前苏联旗下的国家移民以色列。

这种人口变化，颠覆了和平协议已经不稳定的走向。苏联难民抵达前，以色列不能长期跟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切割，因为如果失去巴勒斯坦劳工，以色列经济不可能继续生存。就像加州失去墨西哥劳工，经济就得停摆一样。每天大约有1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在加沙和西岸的家，前往以色列清扫街道、铺设道路，同时，巴勒斯坦农民和商人在货车上装满货物，开进以色列和属于以色列的其他领土出售。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以色列也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发展自主贸易关系。

然后，就在奥斯陆协议生效时，这种十分互相依赖的关系突然切断。在这个关键时刻，移民以色列的数十万俄罗斯人和巴勒斯坦劳工不同，巴勒斯坦人出现在以色列，会要求以色列归还抢走的土地，要求平等的公民权，挑战犹太复国计划。俄罗斯移民明显提高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比率，大为振奋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廉价劳工的新来源。突然间，特拉维夫有力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上开展新时代。1993年3月30日，以色列开始实施“闭关”政策，关闭以色列和占领区之间的边界，一次经常关闭几天或几星期，使巴勒斯坦人不能再到以色列工作和卖东西。封锁开始时是临时措施，表面上是因应恐怖主义威胁的紧急反应，却很快就变成新现状，以色列占领区不但跟以色列隔绝，而且彼此之间也互相隔绝，靠着更复杂、更恶劣的关卡制度监督管理。

世人称颂1993年是新希望时代的序幕，但实际上，这一年里，占领区土地却从以色列境内下层阶级居住的破烂宿舍，变成令人窒息的监狱。同期内，也就是从1993到2000年间，住在占领区的以色列定居者数目倍增。很多地方过去是草草开辟的屯垦前哨，现在变成堡垒化的翠绿郊区，拥有限制进入的道路，也有着要增加以色列领土的明确目标。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以色列也继续取得西岸重要的水源，除了供应定居点，也把稀少的水源转调回以色列。

新移民在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也很少人检讨。很多前苏联居民在休克治疗贬值中，看着终身储蓄化为乌有，抵达以色列时身无分文，很容易就受到吸引而前往占领区，那里的房子和公寓便宜多了，还提供特别贷款和奖金。有些最有野心的定居点，例如位于西岸，拥有一所大学、旅馆和德州式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艾利尔(Ariel)，积极在前苏联招募移民，派出移民探子，设立俄语网站。艾利尔靠着这个方法，人口增加了一倍，今天看起来好像小莫斯科，商店招牌同时写着希伯来文和俄文，一半居民是从前苏联来的新移民。以色列团体“立刻和平组织”(Peace Now)估计，住在非法定居点的以色列公民中，大约有2.5万人是这种人，该组织也指出，很多俄罗斯人“不十分了解要去那里”，就移民到以色列。

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用活泼有力的方式，达成了以繁荣取代冲突的诺言。1990年代中期和晚

期，以色列企业对全球经济发动猛攻，专精通信与网络科技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特拉维夫和海法变成了中东硅谷。在网络泡沫高峰期间，以色列国内生产毛额中，15%由高科技产业创造，出口产品中，大约一半是高科技产品。根据《商业周刊》的说法，以色列是“全世界对科技最依赖的国家”，依赖的程度是美国的两倍。

在这次科技繁荣中，新移民再度发挥了决定性的角色。90年代移民以色列的几十万苏联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科学家的人数，比以色列立国80年里科技学院教出来的科学家还多。很多移民是冷战期间撑起苏联的科学家，就像以色列一位经济学家说的一样，这些科学家变成了“以色列科技产业的火箭燃料”。班纳米描述以巴双方在白宫握手后的岁月时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突破性的经济成长和开放市场时代。”

开放市场理当嘉惠冲突的双方，但是除了阿拉法特身边的贪腐高官外，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后的繁荣中明显缺席。最大的障碍是闭关政策，这个政策从1993年开始实施14年来，一直没有取消。根据哈佛大学中东专家罗伊(Sara Roy)的说法，1993年边界突然关闭，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她接受访问时说：“闭关政策是签署奥斯陆协议以后的岁月中，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的单一因素，是对已经遭到拖累的经济伤害最大的措施。”

工人不能上工，商人不能卖东西，农民不能下田。1993年里，占领区每人国民生产毛额遽减将近30%；1994年，巴勒斯坦穷人增加了33%。深入研究闭关政策对经济影响的罗伊说，到1996年，“巴勒斯坦的劳动力中，高达66%不是失业，就是严重低度就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奥斯陆协议根本不是“市场和平”，而是市场消失、工作机会减少、自由度下降。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定居点扩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跟着减少，就是这种完全站不住脚的状况把占领区变成火药库。2000年9月，沙龙(Ariel Sharon)到耶路撒冷参访穆斯林所说的崇高圣所(al-Haram al-Sharif)、犹太人所说的神殿山(Temple Mount)，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

以色列人和国际媒体大致认为，和平过程会崩溃的原因是，2000年7月巴拉克在戴维营提出的建议，是巴勒斯坦人所能得到最好的交易，但阿拉法特拒绝了以色列人的善意，证明他根本没有真心追求和平。经过这次经验和第二次起义后，以色列人对谈判失去信心，选择沙龙出任总理，开始兴建以色列人所说的安全栅栏、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种族隔离墙：由水泥墙和钢制篱笆构成的围墙网超过1967年的绿线边界，贪心地深入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把占地极为广大的定居点纳入以色列国境，也把若干地区30%的水源纳入以色列。

毫无疑问，阿拉法特希望得到更好的协议，而不只是在戴维营以及2001年1月在塔巴(Taba)所提出的草案，但是这些草案也不像大家宣传的那么宝贵。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宣传自己在戴维营草案中，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慷慨，草案对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迫离开家园与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却几乎完全没有补偿，而且根本没有满足巴勒斯坦人要求白决的最低权利。2006年，在戴维营和塔巴都担任以色列政府谈判代表的班纳米打破党派界线，承认“戴维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是错过的机会，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会拒绝戴维营草案”。

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特拉维夫在2001年后放弃认真的和平谈判，这些因素跟阿拉法特传说中不肯让步、或沙龙创造“大以色列”的个人雄心一样有力。其中一个因素跟以色列的科技经济崛起有关。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精英希望以和平换取繁荣，但是最后他们在奥斯陆协议后的岁月里建立的繁荣，对和平的依赖远低于他们原来的想象。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中的利基变成信息科技，表示经济要成长，关键是输出软件和计算机芯片到洛杉矶和伦敦，而不是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出口笨重的商品。科技业是否成功，跟以色列和阿拉伯邻邦是否维持友善关系，或是否不再占领占领区无关。然而，科技经济崛起只是以色列致命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2000年网络经济崩溃后出现，以色列主要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找到新的利基。

以色列是世界上对科技依赖最大的国家，受到网络泡沫崩溃的打击也比其他国家大，当时以色列的经济立刻就直线下坠。2001年6月，分析师预测，大约有30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会倒闭，数万人会遭到裁员；特拉维夫经济报纸《环球报》(Globes)在头条上宣称，2000年是“1953年以来以色列经济最差劲的一年”。

《环球报》指出，以色列没有出现更严重的衰退，唯一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迅速强力干预，把军事支出提高10.7%，其中部分资金是靠删减社会服务支出而来。政府也鼓励科技业多元化发展，从信息与通讯科技，转而发展安全与监视科技。在这段期间里，以色列国防军扮演类似企业育成中心的角色。年轻以色列士兵在服兵役时试验网络系统和监视设备，退伍回归平民生活后，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事业计划，设立很多新创企业，经营从“搜寻与锁定”数据采矿、监视摄影机到恐怖分子描画的业务。9·11之后的几年，这些服务与设备的市场出现爆炸性成长，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公开主张新的国家经济设想：网络泡沫提供的成长要由国土安全繁荣取而代之。这是利库德

党(Likud Party)鹰派立场和激烈芝加哥学派经济制度的完美结合，具体表现在沙龙的财政部长纳坦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新中央银行总裁费歇尔(Stanley Fischer)两个人身上，费歇尔正是国际货币基金在俄罗斯和亚洲推动休克治疗计划的主持人。

到2003年，以色列已经开始强劲复苏；到2004年，以色列似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惨烈崩盘后，表现几乎胜过所有西方国家。成长主要来自以色列很精明，把自己定位为国土安全科技的大卖场。以色列的时机拿捏十分完美，世界各国政府突然迫切需要猎捕恐怖分子的工具，也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物情报知识。在利库德党的领导下，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自我宣传以色列靠着几十年对抗阿拉伯与穆斯林威胁的经验与技能，是拥有领先优势的国土安全展示国。以色列对北美和欧洲的宣传直截了当：你们刚刚开始的反恐战争，是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打的战争，让我们的高科技公司和民营间谍公司告诉你们怎么做。

照《福布斯》杂志的说法，以色列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寻找反恐科技必须朝拜的国家。从2002年起，以色列每年至少为世界各地的国会议员、警察头子、警长和企业总裁，举办六次庞大的国土安全研讨会，会议的规模和范围年年扩大。传统旅游因为安全恐惧的关系持续萎缩，而这种官方的反恐旅游则填补了一部分的缺口。

2006年2月的某一次研讨会期间，以色列人以“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幕后之旅”的名义，招待联邦调查局、微软公司和新加坡大众捷运系统等机构的代表，到以色列最热门的旅游地点如国会、神殿山和哭墙等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游客都检查和称赞堡垒式的保安系统，考虑怎么把这些东西用在国内。2007年5月，以色列邀请美国几座大型机场主管，到特拉维夫附近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举办研讨会，探讨这座机场采用的先进旅客描画与筛检系统。加州奥克兰国际机场飞航主管葛罗斯曼(Steven Grossman)解释说，他来参加会议是因为“以色列以维持本国安全闻名”。有些活动相当可怕、相当戏剧化，例如2006年的国际国土安全大会时，以色列军方负责操演复杂的惨案仿真，照主办单位的说法：“仿真的是起源于内斯锡安市(Ness Zion)、结束于阿萨福哈罗非(Asaf Harofeh)医院的大规模伤亡惨案。”

这些会议不是政策研讨会，却是利润丰厚的专业展览，目的在于展示以色列安全公司的能力。因此，2006年时，以色列反恐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成长15%，预测2007年会成长20%，每年出口总值达到12亿美元。2006年，以色列国防相关项目的出口达到34亿美元，创下新高记录，远高于1992年的16亿美元，使以色列变成世界第四大军火交易国，甚至比英国还大。以色列科技股(大多是安全相关股)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的文件数，超过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以色列在美国注册的科技专利件数，超过中印两国的总和。以色列的科技部门大都与安全有关，目前占以色列出口总值的60%。

以色列著名的投资银行家罗森(Len Rosen)告诉《财富》杂志：“安全比和平重要，在奥斯陆协议期间，大家希望和平带来成长，现在大家追求安全，希望暴力不会妨碍成长。”他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以色列和世界各国提供“安全”的企业，是以色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说反恐战争产业解救了摇摇欲坠的以色列经济，就像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协助拯救了全球股市一样，一点也不夸张。

下面是反恐产业影响力的一些事例：

- 打到纽约市警局的电话会用以色列奈斯系统公司(Nice Systems)创造的科技记录和分析。奈斯公司也替洛杉矶警方和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监控通信，也为里根国家机场(Ronal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和另外几十家顶尖客户提供监视摄影机。

- 伦敦地铁系统内拍摄到的影像，是用威灵特影像监视摄影机记录，威灵特公司属于以色列科技巨擘康华思公司(Comverse)。威灵特的监视设备也用在英国国防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国会山庄和蒙特利尔的大众捷运系统。该公司的监视设备与服务卖到50多个国家，也协助家得宝(Home Depot)和目标(Target)之类的大公司监视员工。

- 洛杉矶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等城市的员工，都带着电子“智能卡”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是以色列超康公司(Super Com)制造，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长伍斯里(James Woolsey)赫然是这家公司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欧洲某一个国家曾经找上超康，打算推动全国性的身份证计划。另一国委托超康公司，进行“生物特征护照”的先导计划，这两个行动都具有高度争议性。

- 美国若干最大的电力公司计算机网络采用的防火墙，是由以色列科技巨擘检查哨公司(Check Point)生产的，但是这些公司都决定不透露公司名字。根据检查哨公司的说法，《财富》500大企业，有89%公司采用检查哨的安全解决方案。

- 2007年超级杯开打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员工都接受了辨认“坏人、而不只是辨认可疑事物”的训练，采

用的教材叫作行为形态辨认心理系统，这种系统是以色列新时代安全解决方案公司(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发展出来的。该公司总裁是以色列班古里昂机场的前安全主管。近年和新时代签约、训练员工了解旅客描画技术的机场包括波士顿、旧金山、格拉斯哥、雅典、伦敦希斯洛等机场。冲突频繁的尼日河三角洲港口员工也受过新时代公司的训练，荷兰司法部员工、自由女神像警卫和纽约市警局反恐局干员也一样。

- 新奥尔良富有的奥都本小区在卡特琳娜飓风后，决定建立自有的警力，聘请了以色列直觉射击国际公司(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的私人保安人员。

- 加拿大联邦警察部门皇家骑警的探员，受过国际安全指导公司(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ructors)的训练，这家公司设在弗吉尼亚州，专门从事执法人员和士兵的训练。这家公司宣传自己拥有“难得的以色列经验”，讲师都是“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家警察反恐单位与国家安全局出身的以色列特战部队高手”。该公司的精英客户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海豹部队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

- 2007年4月，在美墨边境任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特别干员通过八天的密集训练课程，课程是由戈兰集团(Golan Group)安排的，戈兰集团的创办人是前以色列特战部队军官，在七个国家里配置了超过3500位员工。该公司营运主管皮尔森(Thomas Pearson)解释说：“基本上，我们的训练课程涵盖以色列的安全巡逻。”训练课程涵盖从徒手肉搏、目标联系，到“驾着休旅车实际从事预习”。戈兰集团目前设在佛罗里达州，但仍然继续营销公司是来自以色列的优势，也生产X光机、金属探测器和来复枪。该公司的客户除了很多政府和名人外，也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德士古(Texaco)、利瓦伊斯(Levi's)、索尼(Sony)、花旗集团和必胜客。

-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需要新保安系统时，选择了马佳尔公司(Magal)设计的系统，马佳尔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安全围篱”的两家公司之一。

- 将来波音公司在美墨和美加边界，兴建预计要投资25亿美元、配备电子感应器、无人飞机、监视摄影机和1800座高塔的“虚拟围篱”边界时，艾彼特公司(Elbit)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艾彼特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争议极大的围篱的另一家公司，这座围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计划”，已经耗资25亿美元。

愈来愈多国家把自己变成堡垒(印度和克什米尔边界、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都要兴建围墙和高科技围篱)，“安全栅栏”可能成为最大规模的灾难业务市场。因此，艾彼特和马佳尔公司并不在乎以色列的围墙在世界各地引发极多负面印象，事实上，两家公司认为这种负面宣传是免费广告。马佳尔公司总裁艾文艾斯拉(Jacob Even-Ezra)解释说：“大家认为，我们是少数有经验实地测试这种设备的业者。”9·11以后，艾彼特和马佳尔的股价都上涨一倍以上，对以色列国土安全股票而言，这是标准的表现。号称“监视摄影空间元祖”的威灵特公司在9·11之前完全没有获利，但是2000到2006年间，该公司靠着监视繁荣，股价上涨三倍以上。

以色列国土安全公司表现优异，早已为股市观察家熟知，却很少当成地区政治因素来讨论，其实应该如此。以色列政府决定把“反恐”当成出口经济重心，和以色列放弃和平谈判的时间完全一致，这并非巧合。而且，以色列实行明确策略，不把以巴冲突视为具有明确土地与权利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战，而将之视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环，是对抗一心一意追求毁灭的不理性狂热势力之战。以色列采取这种策略和放弃谈判的时机也完全相符，这种情形同样不是巧合。

这个地区的冲突从2001年开始升高，经济绝非主因；显然双方都不缺助长暴力的素材。但是在这种对和平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经济在某些时点，一直是平衡力量，促使不愿谈判的政治领袖开始谈判，就像199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样。国土安全繁荣改变了这种压力的方向，创造了对持续暴乱继续大力投资的另一个有力部门。

以色列就像过去芝加哥学派推动实验的边疆国家一样，9·11后的急速成长，也表现在国内贫富之间社会快速阶级化的特征上。安全产业快速成长，伴随着一波民营化和削减社会福利计划资金的政策，几乎使劳动党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创造的经济成就化为乌有，也造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弊病。2007年时，24.4%的以色列人活在贫穷线下，35.2%的儿童是贫童；相形之下，20年前只有8%的儿童是贫童。这种繁荣的好处没有利益均沾，只为以色列少数人带来暴利，尤其是造福于跟军方与政府水乳交融的有力部门(也有大家熟悉的所有企业贪腐弊案)，因此追求和平的重要诱因完全遭到抹杀。

以色列企业界的政治取向大幅改变。今天吸引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的设想，不再是以色列会成为区域贸易枢纽，而是个超先进的堡垒，在众多决心坚定的敌人包围下仍然能够生存。这种态度的转变在2006年夏季表现得最明显，当时以色列政府把原本跟真主党之间的换囚谈判变成全面战争。以色列最大企业不只是支持这场战争，还资助这场战争。以色列新近民营化的超大银行路米银行(Bank Leumi)分发保险杠贴纸，上面印的口号是“我们会战胜”和“我们十分强大”。当时以色列记者兼小说家雷欧(Yitzhak Laor)写道：“这场战争首度成为主要行动电话公司建立品牌的机会，这家公司利用这次战争，推动庞大的促销攻势。”

以色列工业显然不再有害怕战争的理由。2006年8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毁灭性的战争，特拉维夫股市却继续上涨，和1993年大家认为冲突会妨碍成长的情形截然不同。2006年最后一季，哈马斯组织赢得选举后，和以色列在西岸与加沙的血腥冲突升高，但以色列整体经济却创造高达8%的成长，是同期间美国经济成长率的三倍以上。同时，巴勒斯坦经济在2006年萎缩10%到15%，贫穷率升到接近70%。

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一个月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办了一场投资以色列的特别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以色列公司超过200家，很多公司都从事国土安全业务。同时，黎巴嫩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摆，大约140家工厂(从组合屋、医疗产品到乳品的各种生产厂商)，都忙着清理以色列炸弹和导弹击碎的瓦砾。纽约这场研讨会不受战争影响，发出乐观的信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欢迎与会代表时宣布：“以色列对企业开放、总是对企业开放。”

仅仅十年前，根本不能想象这种战争繁荣，当时身为以色列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吉勒曼，还呼吁以色列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中东的新加坡”。现在他变成以色列最积极煽风点火的强硬主战派，大力推动扩大并升高战事。他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说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甚至不符事实；不过几乎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却是非常正确的说法。因此这场战争不只是以色列的战争，也是全世界的战争。”

在全世界发动无休无止的战争，这帖药单和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对新生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相同。任何国家都无法打赢这种战争，但战胜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堡垒国家内部创造“安全”，再用围墙外无休无止的低水平冲突支持。从某方面来说，这种目标和前进伊拉克的民间安全公司目标相同，就是巩固周边阵地的安全。看看森地泉市，就可以窥知由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经营，大门深锁的未来堡垒是什么样子。然而，把这种程序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却是以色列。以色列把整个国家变成堡垒化的小区，大门深锁，被永远封锁在外面红区的人民包围。一个社会如果失去追求和平的经济诱因，反而大力投资战斗，从无休无止和无法战胜的反恐战争中发财，就会变成上述的模样；其中一部分看来像以色列，另一部分看来像加沙。

以色列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以色列创造的这种社会并不独特。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折磨人的低强度冲突状况中会欣欣向荣，这点似乎是从新奥尔良到伊拉克所有灾区的目标。2007年4月，美军开始实施一个计划，要把巴格达好几个动荡的小区变成“大门深锁的小区”，四周由检查哨和水泥墙围起来，而且用生物特征辨识科技追踪里面的伊拉克居民。居民阿哈米亚(Adhamiya)看着自己住的小区被围墙封锁起来，预测说：“我们会变得像巴勒斯坦一样。”美军发现巴格达绝不可能变成杜拜、新奥尔良不会变成迪斯尼乐园后，开始实施备用计划，准备把伊拉克变成另一个哥伦比亚或尼日利亚，变成战争连绵不绝的地方。作战主力是民间士兵和准军事部队，战争水平压低到足以把天然资源从土地里开发出来，配合佣兵保护油管、产油平台和水资源。

大家常常拿加沙和西岸的军事化贫民区，拿他们的水泥墙、通电围篱和检查哨，跟南非要求黑人住在贫民区、离开贫民区时必须持有通行证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南非律师杜家德(John Dugard)是巴勒斯坦地区人权问题的联合国特派专员，他在2007年2月如此表示：“以色列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实施的法律和执行方式，的确很像种族隔离制度。”两者相似的地方很明显，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南非的黑人家园基本上是工作营，是严密监控黑人劳工，以便以廉价的成本要黑人到矿场工作的方法。以色列打造的制度目的正好相反，是要让劳工无法工作，是由开放式居留营构成的网络，拘禁几百万被归类为多余人口的民众。

巴勒斯坦人不是世界上唯一被如此归类的群众：几百万俄罗斯人在自己国内也变成多余人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逃离俄罗斯，希望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和尊严生活。南非的种族隔离虽然已经废除，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快速扩张的贫民区草寮里，他们在新近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南非，也是多余的人口。这样把25%到60%人口抛弃的做法，是芝加哥学派圣战的特征；这种做法从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南锥国家处处散布的“难民村”就是例子。南非、俄罗斯和新奥尔良的富人兴建高墙，把自己围起来；以色列把这种做法进一步提升，在危险的穷人四周兴建高墙。

结论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我希望告诉你们。希望告诉集中住在玻利维亚这里的我的印第安兄弟，五百年来的反抗运动并非徒劳无功。这种民主、文化的斗争是祖先们奋斗的一部分，是原住民反殖民领袖柯塔利(Tupac Katari)战斗的延续。是格瓦拉战斗的延续。

——莫拉雷斯(Evo Morales)宣誓就任玻利维亚总统后发表的谈话。2006年1月22日
人民最清楚。知道自己小区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细节。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拉塔库(Pichit Ratakut)，亚洲灾难准备中心执行理事。2006年10月30日

西班牙裔小区的人民建立这个城市两次：白天我们替富人盖房子，到了晚上和周末，我们团结一致，盖我们自己的家、盖我们的小区。

——安提塔诺(Andres Antittano)，加拉卡斯居民。2004年4月15日

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后，很多篇追悼文字都充满了恐惧的感觉，担心他的去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弗里德曼最忠诚的信徒柯克兰(Terence Corcoran)在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上，问起这位经济学家发动的全球运动是否可能延续下去。“身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最后雄狮，弗里德曼留下了一片真空……在世者没人拥有同样的地位。若没有新一代坚定、有魅力、有能力的智者领导，弗里德曼终生奋斗和宣扬的原则能够长存吗？很难说。”

那年的11月，不受限制资本主义的追求陷入困境，柯克兰悲观的评估不足以道尽其境况。弗里德曼在美国的传人，也就是发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新保守派，正处在历史最低潮。1994年共和党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党的地位，是这个运动的最高峰；弗里德曼去世前九天，共和党再度败北，民主党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共和党在2006年期中选举中败北有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政治贪腐、伊拉克战争处理失败，以及获胜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韦伯(Jim Webb)说得最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美国已经偏向“以阶级为基础的制度，偏向美国从19世纪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制度”。在上述每一种因素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如民营化、解除管制和减少政府服务，都奠定了共和党败选的基础。

1976年，这场反革命最早受害者之一的勒特里尔坚持说，芝加哥学派在智利造成的大规模财富分配不公，“不是经济上的负债，而是暂时性的政治成就”。勒特里尔显然认为，独裁者的“自由市场”规则达成了目标：不是创造出十分和谐的经济，而是把富人变成超级巨富，把有组织的劳工阶级变成可以弃之不顾的穷人。在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每一个地方，这种阶级化的形态一再出现。1970年时，阿根廷最富有的10%人口所得，是最贫困10%人口所得的12倍，到了2002年，富裕和贫穷阶级的所得差距增加到43倍之多。智利的“政治成就”的确推广到全球，2006年12月，弗里德曼去世后一个月，联合国一项研究发现：“世界最富有的2%成年人拥有全球家计财富的一半以上。”美国的这种变化最明显，1980年里根开始发动弗里德曼式圣战时，企业总裁的所得是一般劳工的43倍，到2005年，总裁赚到的钱是劳工的411倍之多。对总裁来说，1950年代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开始的这场反革命的确成功，但胜利的代价却是大家普遍对自由市场的核心承诺失去信心、对增加的财富应该由大家分享的理念失去信心。诚如韦伯在期中选举时说的一样：“滴漏效应经济并没有出现。”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人口中的一小撮人取得这么多的财富，并不是靠着和平的过程，而且经常不是靠着合法的过程。柯克兰质疑这个运动领导阶层的才干，问得很对，但问题并非只是没有名义上的领袖能够填补弗里德曼的地位，而是许多领导世界众多地区市场自由化、摆脱所有限制的人，当时困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丑闻和刑事犯罪调查中；丑闻和调查涵盖最早期在拉丁美洲的实验、到最近在伊拉克的实验。芝加哥学派存在的35年历史中，都是靠着有力企业人士、信念坚定的改革派和强人政治领袖之间的密切合作来推展目标。到2006年，这三个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不是关在牢里，就是遭到起诉。

第一个把弗里德曼休克疗法付诸实施的皮诺切特，当时遭到软禁(不过他在遭到贪腐或谋杀罪嫌审判前死亡)。弗里德曼死后隔天，乌拉圭警方逮捕博达维里，罪名是涉嫌在1976年杀害四位著名的左派分子，当时博达维里领导乌拉圭，在乌拉圭残暴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聘请弗里德曼的同事和学生担任高级顾问。阿根廷法院剥夺了前军事执政团领袖的豁免权，判决前总统维德拉(Jorge Videla)和海军上将马赛拉无期徒刑。阿根廷独裁统治期间，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在民主政治期间实施全面休克治疗计划的卡瓦洛也遭到起诉，罪名是“公共行政管理诈欺”。

卡瓦洛2001年和外国银行签订债务协议，耗费了阿根廷数百亿美元。冻结卡瓦洛1000万美元个人财产的法官认定，卡瓦洛施政时，“绝对知道”施政的有害后果。

玻利维亚前总统桑契斯曾经在自己的客厅里，完成所谓的经济“原子弹”，现在也因为多项罪名遭到通缉，罪名包括射杀抗议人士、涉嫌违反玻利维亚法律和外国瓦斯公司签约。在俄罗斯，不但哈佛帮遭到诈欺罪定罪，而且在哈佛帮协助推动的民营化计划中，很多靠着良好关系一夜赚到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大亨，不是入狱就是流亡外国。石油业巨擘尤科斯公司前首脑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服八年徒刑，他的同事和大股东聂夫斯林(Leonid Nevzlin)流亡以色列，另一位企业大亨顾新斯基(Vladimir Gusinsky)也一样。声名狼藉的贝瑞索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伦敦定居，担心遭到诈欺罪逮捕，不能回莫斯科。但是这些人全都否认犯罪。布雷克(Conrad Black)因为拥有报业集团，成为在加拿大推广弗里德曼主义最有力的宣传家，但是他在美国遭到何林杰国际公司(Hollinger International)股东控告诈欺；检察官说，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银行”。另外，美国安然公司的雷伊(Ken Lay)于2006年7月死亡，死前已经因为阴谋与诈欺定罪，可以说是能源业解除管制不利影响的范例。弗里德曼学派思想家诺吉斯特(Grover Norquist)说过“我不想废除政府，只希望把政府的规模缩小到可以拖进浴室、在浴缸里淹死”，因而让进步人士十分愤慨，他这时也因为深深陷入配合华府说客艾布兰莫夫发挥影响力以图利的丑闻中，无法自拔。不过他还没有遭到起诉。

从皮诺切特、卡瓦洛、贝瑞索夫斯基到布雷克，虽然每一个人都试图说自己是莫须有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但这份绝对说不上完整的问题名单，却代表严重背离新自由派创造的神话。新自由派推动经济圣战时，努力用正直与合法自我粉饰。现在这层虚饰被公开剥除，暴露出经常靠着丑陋犯罪助长而成的严重贫富不均制度。

除了司法上的问题外，还有一片乌云隐隐出现。原本极为完整、足以产生意识形态共识的幻象开始消失。早期的受害者华尔士认为，芝加哥学派在阿根廷取得的优势只是倒退，不是永久的失败；军事执政团采用的恐怖手段虽然使阿根廷成为遭到震撼的国家，但是华尔士知道，从本质来看，这种震撼是暂时状态。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到射杀前，曾经估计要花20到30年的时间，恐怖的效果才会消失；阿根廷人将会重新站定脚跟，恢复勇气和信心，准备再度为经济与社会平等奋斗。到了2001年，也就是24年后，阿根廷爆发示威抗议，反对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紧缩经济措施，然后在短短的三星期里，迫使五位总统下台。

这段期间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到大家不断宣称：“独裁统治刚刚结束了！”当时我不了解大家这种欢欣鼓舞说法的意义，因为独裁政治已经结束17年，现在我想我了解了，休克状态终于消失了，就像华尔士预测的一样。

随后几年里，反抗休克的风潮蔓延到过去推动休克治疗的很多国家，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和黎巴嫩。大家从坦克和电击棒(配合突然的资本外逃与严苛的经济紧缩)造成的集体恐惧当中解脱，要求实施更民主的制度，要求对市场实施更多的控制。这些要求成为弗里德曼主义的最大威胁，因为这种要求挑战弗里德曼主义最核心的理念：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同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构成要素。

布什政府仍然极为坚定，希望继续维持这种错误的联盟，因此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中，列出下列文字：“在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的重大斗争中，最后自由的力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成为国家追求成功唯一可以依靠的永续模型。”这种说法有美国的全部军力作为后盾，却不足以对抗公民利用各种自由，抛弃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的浪潮，连美国也一样。2006年期中选择后，《迈阿密先锋报》(Miami Herald)一则头条新闻的标题说得好：“民主党靠着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大获全胜。”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发现，64%的美国公民认为，政府应该保证医疗制度能够涵盖全民，而且受访者“表示极为愿意妥协”，以便达成这个目标，包括愿意每年多缴500美元的税。

在国际舞台上，最坚决反对新自由派经济学的人一次又一次赢得选举。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打着“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见，得到63%的选民支持，第三度当选总统。布什政府虽然企图把委内瑞拉抹黑为假民主，这一年的一项民调却发现，57%的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感到满意。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这么高的支持度仅次于乌拉圭；乌拉圭左派联合政党广大阵线党(Frente Amplio)胜选后，推动一系列公民投票，阻止大规模的民营化计划。换句话说，这两国的投票形成了对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公民对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恢复了信心。和这种热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经济政策大致不变、忘记竞选时所做种种承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民调一再显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降低，反映出来的是选举投票率下降、对政客的怀疑十分严重，还有宗教基本教义派兴起。

2005年内，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之间在欧洲爆发了更多的冲突；欧洲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全国公民投票中，拒绝了欧洲宪法。法国是其中一国。法国人认为欧洲宪法是企业至上秩序的法典，这次公民投票是法国公民第一次有机会，针对自由市场规则是否应该统治欧洲的问题直接说出答案。结果法国公民抓住机会说不。就像巴黎作家兼行动主义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说的一样：“大家真的不知道整个欧洲会这样压缩，全部都写在一份文件里……一旦大家开始引用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里头究竟是什么名堂，发现宪法化是怎么回事。而且宪法不能修改、不能修正，大家都吓得要死。”

大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用反动和种族主义的方式，强力拒绝法国人所说的这种“野蛮资本主义”。美国人对中产阶级萎缩的怒火轻易地转移方向，变成要求建立边界围篱。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主持人陶布斯更把晚间新闻时段变成反对“非法外国人入侵，对美国中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运动，指责外国人抢夺就业机会、散布犯罪、带来“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这样把外国人当成代罪羔羊，引发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示威抗议，超过100万人参加2006年的一系列抗议大游行，这是经济震撼受害者表现无畏无惧新精神的另一个迹象。)

2005年荷兰的欧洲宪法公投同样遭到反移民团体劫持，变成比较不像反政商财团主义秩序的投票，比较像是投票反对波兰工匠涌入西欧压低工资的可怕现象。促使法国和荷兰很多选民投票的原因是“担心波兰水电匠”入侵，或是照欧盟前执行委员雷米(Pascal Lamy)的说法，是“水电工人恐惧症”。

同时在波兰，大家对90年代造成极多人十分穷困的政策反弹，也促使波兰表现出一系列令人困扰的恐惧症。团结工会背叛推动工运的劳工时，很多波兰人转而投入新组织，最后把超级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推上执政地位。波兰现在由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总统统治，卡钦斯基是脱离团结工会的行动主义者，担任华沙市长时，因为禁止同性恋尊严日游行，参加“正常人尊严活动”而闻名*；卡钦斯基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加洛斯罗(Jaroslaw，现任总理)大致上靠着攻击芝加哥学派政策的言论，赢得2005年的大选。他们的主要反对者承诺要废除公共退休金制度，推行15%的均一税，两者都直接取材自弗里德曼学派的剧本。这对双胞胎兄弟指出，这种政策会劫贫济富，让大企业 with 收受贿赂政客组成的核心发财。不过法律与正义党执政后，把目标转向比较容易攻击的人，如同性恋、犹太人、女性主义分子、外国人和共产党徒等。就像波兰一位报纸编辑说的一样：“他们的计划，绝对是控诉过去的17年。”

*这种偏见并非波兰独有。2007年3月，伦敦市长李文斯顿(Ken Livingstone)警告：“同性恋权利的反动风暴，吹袭整个东欧。”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普京时代同样是对休克治疗时代的反弹。俄罗斯还有几千万变穷的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成长的好处，政客要激起民众怒火、反对90年代初期的问题并不难。大家经常说，这些问题是外国人的阴谋，目的是要让苏联帝国屈服，把俄罗斯交给“外国人管理”。虽然普京对几位企业大亨采取的司法行动大都是象征性行动，同时，新一代的“国家企业大亨”依附克里姆林宫崛起，但很多俄罗斯人一想到90年代的混乱，就会感谢普京恢复的秩序，不顾愈来愈多新闻记者和其他批评者神秘死亡、秘密警察似乎享受全部免责权的事实。

因为社会主义仍然和数十年来打着社会主义名号的暴政息息相关，大众的怒火除了透过民族主义和原型法西斯主义发泄，没有多少管道可用。以种族为基础的暴力事件每年大约增加30%，到了2006年，几乎每天都发生这种事件。“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口号得到将近60%人口的支持。反法西斯主义行动人士傅多文(Yuri Vdovin)说：“当局完全了解自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缺点很多，不足以提供大多数人民可以接受的生活状况，但是，所有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宗教的人、肤色不对的人或其他种族背景的人。”

十分讽刺的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推动休克治疗所造成的痛苦影响，经常被人解读为防止德国魏玛时代重演的唯一方法，也就能防止纳粹思想兴起。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随意把数千万人排除在外，重演了同样可怕的爆炸性状况。有尊严的人民认为自己遭到外国势力侮辱，希望把目标对准人口中最脆弱的人，以便恢复国家光荣。

在芝加哥学派最早的实验室，拉丁美洲反弹的方式显然让人觉得比较有希望。反弹不是针对脆弱的人，而是从根本针对排他性的经济意识形态；而且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东欧的情况不同，拉丁美洲有一种无法压制的热情，想要试验过去遭到推翻的理忿。

虽然布什政府宣称，自由市场在20世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败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但很多拉丁美洲人却十分清楚，在东欧和亚洲若干地区失败的是威权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已在许多地方实施，不仅是社会主义政党靠着选举取得执政地位，还包括以民主方式经营管理的工作场所和土地拥有权：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艾米丽亚—罗马涅区(Emilia—Romagna)历史性的合作经济，都是这样。1970到1973年间，阿连德就是希望在智利推行

这种糅和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版本。戈尔巴乔夫有一个比较不激进的类似设想，希望依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把苏联变成“社会主义灯塔”。在南非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激发梦想的《自由宪章》，是一脉相承的第三条路：不是国家共产主义，而是市场和国有化的银行与矿场共存，所得用来兴建舒适的小区与体面的学校，借以追求经济与政治民主。1980年创立团工会的工人保证不和社会主义斗争，而是支持社会主义，最后工人赢得以民主方式管理工作场所和国家的权力。

新自由派时代有一个卑鄙的秘密，那就是上述理念从来没有在比较大的理念战场中遭到挫败，也不是在选举中遭到反对，而是在政治上重要的关键时刻遭到镇压。秉持这些理念的人如果激烈抗拒，就会遭到公然的暴力，遭到皮诺切特、叶利钦镇压。否则就是遭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所说的“巫毒政治”背叛，例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斯登索罗当选后推动秘密经济计划，大规模绑架工会领袖；非洲民族议会透过秘密协商，放弃《自由宪章》，改采姆贝基秘密之至的经济计划；或是团结工会的忠实支持者在胜选后为了换取纾困，因而屈服于经济休克疗法。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平等的理念极为深入人心，极难在公平的战斗中挫败，因此才会从一开始就采用休克主义。

华府总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威胁比集权共产主义还大，要破坏共产主义的名声、把共产主义当成敌人很容易。1960和1970年代期间，华府对付深入人心、构成妨碍的发展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时，喜欢把这些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刻意忽略两者间的明显差别(今天美国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结合所有反对力量对付恐怖主义)。这种策略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出自芝加哥学派发动圣战初期，深深埋藏在解密后的智利政府档案中。美国虽然透过中央情报局出钱，发动宣传攻势，把阿连德描绘成苏联式的独裁者，但阿连德胜选真正让华府担心的地方，表现在1970年基辛格交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胜选的例子，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冲击，对意大利尤其如此；甚至会成为典范，传播到其他地方，被人模仿，进一步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和美国的地位。”换句话说，在阿连德的民主第三条路扩散前，必须把阿连德拔除。

他代表的梦想却从来没有遭到挫败，而是像华尔特所说的一样，是遭到暂时性的镇压，被恐惧打入地下。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从数十年的震撼中恢复时，旧理念再度百花齐放、出现基辛格极为担心的“模仿扩散”现象。从2001年阿根廷崩溃以来，反对民营化成为南美大陆明确的主张，力量足以造成政府上台或下台；到2006年下半年，这种反对实际上形成了骨牌效应。鲁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竞选巴西总统连任胜利，主因是他把大选变成针对民营化的公民投票。他的对手出身1990年代大卖巴西国有财产的政党，为了应付鲁拉，他出现在公开竞选场合时，样子好像是全国房车竞赛协会(NASCAR)的社会主义代表，穿着夹克、戴着棒球帽，上面贴满还没有卖掉的公营公司标志，选民却不为所动。鲁拉的政府虽然贪腐丑闻缠身，令人失望，仍然得到61%的选票。不久之后，尼加拉瓜前桑定游击队(Sandinistas)领袖欧提佳(Daniel Ortega)在竞选中，主打全国经常停电，赢得选举；他宣称，问题的根源是国营电力公司在米契飓风后卖给西班牙联合能源公司。他声嘶力竭地告诉群众：“父老兄弟们，你们每天忍受出卖这些国产的影响！谁把联合能源公司引进尼加拉瓜？当然是富人的政府，是为野蛮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府。”

2006年11月，厄瓜多总统选举变成同样的意识形态战场。43岁的左派经济学家柯利亚(Rafael Correa)击败香蕉大亨兼号称全国首富的诺博亚(Alvaro Noboa)。柯利亚用扭曲姐妹(Twisted Sister)唱的《我们不接受》作为正式竞选歌曲，呼吁全国人民“打倒所有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他当选总统后宣称自己“不是弗里德曼的粉丝”。这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已经就职将近一年，已经派出军队，把天然气田从跨国企业“强盗”手中夺回，还进一步推动矿业部门部分国有化。同期间，墨西哥2006年的选举因为弊案频传，结果人民成立史无前例的“地下政府”，和政府对抗，还在街头和墨西哥市政府大厦外面的广场上投票。墨西哥欧萨迦省(Oaxaca)的右派政府派出镇暴警察，镇压要求提高年薪的教师罢工，引发了全省性的起义，和贪腐的政商财团主义省政府对抗了好几个月。

领导智利和阿根廷的政客，都自称反对本国所实施的芝加哥学派实验，不过他们采用的替代路线到底有几分真实性，仍然值得深入探讨，然而，这种象征本身就代表胜利。阿根廷总统科钦纳(Nestor Kirchner)内阁中的好多位部长，包括科钦纳本身，都曾经在独裁统治期间遭到监禁。2006年3月24日，也就1976年军事政变30周年纪念日时，科钦纳在母亲们为失踪子女每周守夜一次的5月广场上，对示威群众演说：“我们回来了。”他指的是70年代遭到恐怖镇压的一代。他说，聚集在广场上的极多群众当中：“有3万个失踪先烈的脸孔，今天重回这个广场。”智利总统巴奇雷(Michelle Bachelet)是皮诺切特恐怖统治期间成千上万受害者中的一位。1975年，她和妈妈监禁在格雷莫笛村(Villa Grimaldi)的隔离牢房遭到拷问，木制的隔间小到犯人只能缩成一团。她的军官父亲因为拒绝参与政变，遭到皮诺切特的手下杀害。

2006年12月，弗里德曼死后一个月，拉丁美洲领袖在玻利维亚科察班巴市(Cochabamba)，举行历史性的高峰

会，这个城市的人民很多年前曾经起义反对供水民营化，迫使贝泰公司离开玻利维亚。莫拉雷斯揭开高峰会序幕时，引用厄瓜多尔作家贾利安诺的名著《拉丁美洲淌血的矿脉：五个世纪的掠夺》(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誓言要愈合“拉丁美洲淌血的矿脉”。莫拉雷斯引用的这本书以感性的笔调，记录拉丁美洲因为遭到暴力掠夺，从富裕的大陆变成贫穷大陆的情形。阿连德居然大胆推动智利铜矿国有化，试图关闭对外开放的矿脉，因而遭到推翻前两年，正巧是这本书初版的1971年。阿连德遭到推翻开启了疯狂掠夺的新时代，南美大陆发展主义人士兴建的众多设施都面临废弃、拆除和出售的命运。

今天拉丁美洲人民忙着恢复多年来遭到暴力打断的计划，很多新政策听来很熟悉，包括重要经济部门国营化、土地改革、教育、识字率与医疗的重大新投资。这些政策不是革命性的理念，却代表政府无怨无悔、协助追求平等的设想，也代表明确反驳弗里德曼1975年对皮诺切特说的：“在我看来，相信可以用别人的钱行善是极大的错误。”

拉丁美洲当代的群众运动，显然吸取了长期强硬路线的经验，却不是直接复制过去的例子。所有差别中，最明显的差别是深切了解必须寻求保护，避免遭到过去的休克冲击，包括避免遭到政变、外国休克治疗专家、美国训练的刑讯专家，以及80和90年代债务休克与货币崩溃的冲击。拉丁美洲的群众运动发挥力量，推动众多左派候选人赢得选举，现在正在学习怎么在自己的组织模式中建立避震器。例如，群众运动组织没有60年代那么中央集权化，现在想靠着消灭若干领袖来瓦解整个运动比较难。查韦斯虽然搞起声势惊人的个人崇拜，又采取行动集中国家层级的权力，委内瑞拉的进步网络同时却高度分权，权力透过成千上万个街坊委员会和合作社，分散在草根和小区阶层。把莫拉雷斯推上台的玻利维亚原住民运动用同样的方式运作，而且明白表示，他们不是无条件支持莫拉雷斯，除非莫拉雷斯谨守民主路线，否则立刻会失去他们的支持。这种组织方式使查韦斯能够熬过2002年的政变企图，存活下来。群众革命遭到威胁时，他的支持者从加拉卡斯周围的贫民区拥进首都，要求查韦斯复职。这种群众动员的方式在70年代政变中，从来没有见过。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采取大胆措施，预防将来由美国支持、企图危害他们既有民主胜利的政变。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和乌拉圭政府全都宣布，不再派遣学生到“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去，这所学校现在叫作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设在乔治亚州的班宁堡(Fort Benning)，是声名狼藉的警察与军事训练中心。拉丁美洲有极多恶名昭彰的杀手，在这里学习最新的“反恐”技术，然后立刻受命对付萨尔瓦多的农民和阿根廷的汽车工人。玻利维亚似乎决心切断跟这所学校的关系，厄瓜多也一样。查韦斯已经明白表示，如果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极端右派分子实现对莫拉雷斯政府的威胁，委内瑞拉军队会协助捍卫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柯利亚决心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目前南美洲最大的美军基地设在厄瓜多尔的曼塔港(Manta)，这里是美国针对哥伦比亚发动“反毒战争”的集结待命地区。柯利亚政府已经宣布，有关这个基地的协议2009年到期后，厄瓜多尔决定不再续约。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艾斯皮诺沙(Maria Fernanda Espinosa)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国内不需要任何外国部队。”如果美军失去了基地或训练计划，发挥休克治疗的力量会大为减弱。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做了更好的准备，知道怎么应对市场震荡造成的休克。最近几十年里，资本可以迅速外移是最具破坏性的力量之一，商品价格突然暴跌，可能摧毁整个农业部门。但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这些休克，留下像鬼城一样的工业郊区、也留下数量惊人的休耕农地。因此新左派在这个地区的任务变成收拾全球化留下的残局，重新利用；这种现象表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巴西的无土地农民运动组织(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这个组织150万农民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合作社，重新开垦没人利用的土地。在阿根廷，这种现象表现最清楚的地方是“企业复活”运动：200家破产企业在员工的努力下死而复生，变成以民主方式经营的合作社。合作社不必担心碰到投资人撤资造成的经济震撼，因为投资人已经离开。从某方面来说，这种重新利用的实验是新形态的灾后重建，是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缓慢灾变中重建，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伊拉克、阿富汗与墨西哥湾区的重建模式截然不同。拉丁美洲重建计划的领袖是受到灾难影响最严重的人，因此，他们的自发性做法看来很像真正的第三条路，一点也不足为奇。这种路线正是第三条路，是芝加哥学派在全球各地以震撼方式极为有效排除的路线，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推动合作社列为最优先的施政项目，允许合作社优先取得政府的合约，而且提供合作社经济诱因，鼓励合作社彼此交易。到2006年，委内瑞拉大约有10万家合作社，雇用的员工超过70万人。很多合作社是把国家基础建设的一小部分，例如收费站、高速公路维修、医疗诊所……交给小区经营，这种做法和政府外包的理念正好相反；不是把国家的一部分卖给大企业，因而丧失民主控制。利用这些微少资源的人获得管理资源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创造就业，也能够创造比较积极因应顾客的公共服务。查韦斯的很多批评者当然嘲笑这种做法是施舍和不公平的补贴。但是同期内，哈利伯顿连续六年，把美国政府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光是用伊拉克合约

的名义，就提走200多亿美元，在墨西哥湾或伊拉克，还拒绝雇用当地员工，然后为了对美国纳税人表示感谢，还把企业总部(连同所有附属的税务与法律利益)搬到杜拜。相形之下，查韦斯直接补贴平民，看起来远不如哈利伯顿那么激进。

拉丁美洲要对抗未来休克与休克学说的侵害，最有力的防卫之道是摆脱华盛顿金融机构的控制，这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加强合作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成立玻利维亚美洲之路组织(ALBA, Boliv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 反击美洲自由贸易区，使政商财团主义分子希望把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变成自由贸易区的梦想寿终正寝。虽然ALBA才刚成立，却像巴西社会学家萨德(Emir Sader)说的一样，承诺要变成“真正公平贸易的典范：每个国家提供自己最擅长生产的東西，换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因此玻利维亚以稳定的低价提供天然气；委内瑞拉把得到大量补贴的石油供应给比较贫穷的国家，而且和别国分享开发油气蕴藏的技术；古巴派出几千位医生到拉丁美洲所有国家，提供免费医疗，同时在古巴的医学院里训练其他国家的学生。这种做法和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学术交换不同，当时拉丁美洲学生学习的是唯一的僵硬意识形态，回国后，在南美大陆一起实施。这种做法主要的好处是ALBA基本上是易货制度，各国自行决定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不是由纽约、芝加哥或伦敦的交易员替他们决定价格。这样交易就安全多了，不会像过去一样，深受摧毁拉丁美洲经济的价格突然波动伤害。拉丁美洲在混乱的金融领域中，创造了一个经济相当平静与可以预测的区域，在全球化时代，是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加强整合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真的面临财务困难，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或美国财政部求助。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种情形很幸运，因为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说得很清楚，华府仍然积极采用休克主义，“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的反应必须强化每个国家的经济决策责任”。这份文件声称：“重新聚焦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强化市场制度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市场纪律。”这种市场纪律只有在他国政府向华盛顿求助时，才能执行；就像费歇尔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说的一样，国际货币基金只有在会员国提出要求时，才能提供协助，“但是国家短缺资金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求助”。不过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油价高涨的关系，委内瑞拉已经变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放款国，让这些国家不必再看华盛顿的脸色。

这种情形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巴西长久以来因为债台高筑，受到华盛顿的重重约束，现在却拒绝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签订新约。尼加拉瓜正在谈判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的事宜，委内瑞拉已经退出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连华盛顿过去的“模范学生”阿根廷都加入这个趋势。阿根廷总统科钦纳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阿根廷的外国债主曾经告诉他：“你必须和国际货币基金签约，才能清偿债务。”我们告诉他们：“先生，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希望还债，但是绝对不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签约。”因此，在南美大陆上，80和90年代力量极为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不再是什么强权。2005年，拉丁美洲国家积欠的债务占国际货币基金全部放款金额的80%；到2007年，南美大陆向国际货币基金借的钱只剩下1%。只不过是两年间，就出现这么惊人的变化。科钦纳宣称：“摆脱国际货币基金后，还能活着，而且是过很好的生活。”

这种变化已经扩散到拉丁美洲以外的地方，短短三年里，国际货币基金全世界的贷款金额已经从810亿美元，萎缩成118亿美元，剩下的资金几乎全都是贷给土耳其。过去国际货币基金把危机当成获利机会，现在在非常多个国家里，都被人视为贱民，开始萎缩。世界银行也面临同样悲惨的命运，2007年4月，厄瓜多尔总统柯利亚透露，他已经停止向世界银行贷款，而且采取特别的措施，宣布世银代表是不受欢迎人物。柯利亚解释说，两年前，世银利用1亿美元的贷款，打败原本要把石油收益重新分配给厄瓜多尔穷人的经济立法。柯利亚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我们不再接受这个国际官僚机构的勒索。”同时，莫拉雷斯宣布，玻利维亚要退出世界银行的仲裁法院，因为这个机构容许跨国企业控告伤害它们利润的国家政府。莫拉雷斯说：“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从来没有打赢过官司，我想世界各国也一样，跨国企业总是赢得官司。”2007年5月，沃尔福威茨被迫宣布辞去世界银行总裁职位时，情形很清楚：世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解救自己严重的信用危机。沃尔福威茨事件发展期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现在世界银行经理人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时“都遭到嘲笑”。再考虑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破裂(很多人因此宣称“全球化已经死亡”)，这三个以经济必要性为名义，推展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机构，如今变得前途茫茫，可能无法继续生存。

我们有理由可以认定，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应该在拉丁美洲发展到最先进的阶段。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休克实验室落脚的地方，有最多的时间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多年的街头抗议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最后得到的力量不但可以接管国家的权力，也开始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迹象显示，其他旧有的震撼实验室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2005到2006年间，南非贫民区因为备受忽视，决定抛弃长久以来忠于非洲民族议会的传统，开始抗议执政党背

弃《自由宪章》的承诺。外国记者指出，从黑人城镇起义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种起义了。

任何策略如果是利用强力休克创造的机会为基础，都极为依赖惊异因素。休克状态的定义是：快速进行的事件与解释事件的信息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已故的法国理论家布什亚(JeanBaudrillard)说，恐怖事件是“超量的现实”；这么说来，9·11攻击起初只是纯粹的事件、只是原始的现实，没有经过故事、叙述或任何可以拉近现实与理解落差的东西处理过。如果没有故事，我们就像9·11之后的很多人一样，非常容易受到准备利用混乱状态达成目的的人伤害，我们一接触针对休克事件表达看法的新故事后，我们就接受了再教育，一切就开始变得又有道理了。

刻意造成休克与退缩的监狱侦讯人员很了解这种程序。中情局的手册中，强调隔离犯人和有助犯人建立新故事的任何事物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事物包括犯人自己的感官输入、与其他犯人甚至包括和警卫的沟通。1983年的中情局手册指出：“犯人应该立刻隔离，从逮捕那一刻起，就必须维持生理与心理的隔离。”侦讯人员知道犯人会交谈，会互相警告可能的命运，会互相传递纸条。一旦发生这种情形，抓人的那一方就失去优势；他们仍然拥有造成犯人身体痛苦的力量，却失去了操纵和“破坏”犯人，使犯人困惑、迷惘与惊异的最有效心理工具。没有这些因素的话，就不会有休克。

比较大的社会也一样，一旦大家深入了解其中的机制，整个社会会变得更难以用惊异震撼、更难以困惑，变成能够对抗休克。9·11以后，灾难资本主义极为暴力的特性取得控制力量，原因之一是由于比较小的休克，如债务危机、货币崩溃、被历史背弃的威胁大致上因为过度使用，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力量。但是，今天连战争与天灾之类惊人的休克，也并非总是能够引发足以实施不必要经济休克疗法的迷失水平。世界上有太多人有过直接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方法怎么运作，跟别的囚犯交谈过，传递过纸条；惊异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了。

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后，国际贷款机构规定：提供黎巴嫩重建援助的条件是黎巴嫩必须实施自由市场改革。几百万黎巴嫩人对这种要求的反应是明显的例子。不管怎么说，这个阳谋应该都行得通，黎巴嫩从来没有这么迫切需要资金，即使在战争之前，黎巴嫩已经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攻击道路、桥梁和机场跑道，大约又造成了90亿美元的新损失。因此，2007年1月，30个富国代表在巴黎开会时，承诺要提供76亿美元的重建贷款和捐赠，各国代表自然认为，不管援助附带了什么限制，黎巴嫩政府都会接受。这些条件很常见，包括电话与电力民营化，提高燃料价格，减少公共服务，提高已经引发争议的消费税。黎巴嫩经济学家韩丹(KamalHamdan)估计，加税和涨价会使家庭支出增加15%：这是典型的和平惩罚。至于重建本身，当然是要交给灾难资本主义的国际大公司，不能规定必须雇用本地人或转包给本地公司承做。

有人问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么全面的要求是否构成外国干预黎巴嫩事务。她回答说：“黎巴嫩是民主国家，不过黎巴嫩也必须进行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攸关重建是否能够进行。”黎巴嫩总理辛尼欧拉(FouadSiniora)在西方的支持下，轻易同意了这些条件，还轻松地说：“民营化不是黎巴嫩发明的。”为了进一步表示他愿意配合，他聘请跟布什关系良好的监视巨擘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负责中介黎巴嫩电信事业民营化。

然而，很多黎巴嫩公民却显然比较不合作。虽然很多人的家还倒在一片废墟中，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由总工会和包括伊斯兰真主党等政党发动的大罢工。示威群众坚持说，如果接受重建资金表示要提高受到战争蹂躏人民的生活费用，根本就不能叫作援助。因此，辛尼欧拉虽然在巴黎一再向捐款国保证，但罢工和路障却使全国陷入停顿状态，这是第一个针对战后灾难资本主义发动的全国性起义。示威群众也采取静坐抗议的方法，静坐抗议进行了两个月，把贝鲁特市中心变成了帐篷城市和街头嘉年华的网络。大部分记者认为，这些活动是真主党在展现实力，但是纽约《每日新闻》(Newsday)中东采访办事处主任贝西(Mohamad Bazzi)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活动的真正意义：“这么多人在市区露营，背后最大的动机不是伊朗或叙利亚，也不是逊尼派对抗什叶派，而是困扰黎巴嫩什叶派几十年的经济不平等，是穷人和劳工阶级的起义。”

静坐示威地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黎巴嫩人这么能够对抗休克。抗议在居民称为索立迪尔区(Solidere)的贝鲁特市中心进行，这个地区里的一切，几乎都是由名叫索立迪尔的民间开发公司兴建和拥有。索立迪尔区是黎巴嫩上次重建的成果，1990年代初期，黎巴嫩经过十五年的内战后，国力耗损、债台高筑、没有钱可以重建。亿万富豪企业家(后来出任总理)哈利利(Rafiq Hariri)提出建议：把整个市中心核心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他，让他和他新设的不动产公司索立迪尔，把市中心变成“中东的新加坡”。2005年2月在汽车炸弹爆炸案中死亡的哈利利，把还没有倒下的所有建筑物几乎全部铲平，把市中心变成一块白纸，小艇码头、豪华公寓大楼(有些大楼还附设大轿车用的升降机)和豪华购物中心取代了古老的露天市场。这个商业区里的一切，包括建筑物、广场、保安人

力，几乎都属于索立迪尔公司。

对外界来说，索立迪尔是黎巴嫩战后重生的闪亮象征，但是对很多黎巴嫩人来说，索立迪尔总是像一种全像摄影。在这个超现代化的市中心外面，贝鲁特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从电力到公共运输之类的基本建设，内战在很多建筑物外表打出来的弹孔根本没有修补。真主党就是在闪亮市中心四周备受忽视的贫民区里，建立了忠诚的群众基础；真主党设置了发电机和发射台，推动垃圾清运，提供安全。破败郊区居民闯进索立迪尔的国度时，经常被哈利利的私人警卫丢出去，因为他们会吓坏观光客。

贝鲁特社会运动人士哈土姆(Raida Hatoum)告诉我，索立迪尔开始重建时，“大家都非常高兴战争结束了，街头开始重建了，等到我们发现所有街道都被政府卖掉，变成私人土地时，已经太晚了，我们不知道那些钱是贷款，我们将来还得还债”。这样猛然惊醒，发现最可怜的人民必须负担只对少数精英有利的重建费用，使黎巴嫩人变成了解灾难资本主义运作的专家。就是这种经验协助黎巴嫩在2006年的战争后适应和组织，示威群众选择在索立迪尔泡沫内部进行大规模静坐抗议，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在维京超大商店(Virgin megastore)和高档咖啡厅外露营。(一位抗议人士说：“如果我在这里吃一份三明治，我会破产一星期。”)抗议群众这样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表示他们不希望另一次索立迪尔式泡沫和残败郊区混合重建，不希望看到堡垒化的绿区和怒火冲天的红区，而是需要全国性的重建。一位抗议人士问：“我们怎么可能再接受这个抢劫我们的政府?接受兴建这个市区、欠下这么惊人债务的政府?这笔债谁要还?是我要还，我死后，是我儿子要还。”

黎巴嫩抗拒休克的力量不只表现在抗议上，也表现在影响深远的平行重建工作上。停火后几天，真主党的街坊委员会就考察过很多遭到空袭的房子，评估损害，而且已经发给每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1.2万美元现金，让他们租一年的房子加上购买家具。就像独立记者诺圭拉(Ana Nogueira)和高莎莉(Saseen Kawzally)从贝鲁特报道的一样：“这是卡特琳娜飓风生还者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得到补助的六倍。”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在电视演说中告诉全国人民：“你们不需要恳求任何人帮忙，不必到任何地方排队。”这些话在卡特琳娜飓风幸存者听来，就好像美妙的音乐一样。真主党的援助没有透过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放；真主党也没有像在喀布尔那样兴建五星级旅馆，或是像在伊拉克一样为警察训练专家兴建奥运级的游泳池。斯里兰卡海啸幸存者雷努佳告诉我，她希望别人帮忙她家人的方式是把援助直接交给他们，真主党的做法就是这样。真主党也把小区成员纳入重建工作中，聘用本地建筑工人(他们用工作换取搜集到的废金属)，动员1500位工程师，并且组织义工队伍。所有这些援助表示炮击停止一周后，重建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

美国媒体几乎一面倒，嘲笑这种行动是贿赂或依附主义，是真主党试图在引发破坏国家的攻击后，购买民众的支持(弗鲁姆甚至说，真主党发的钞票是假钞)。毫无疑问，真主党是在从事政治操作，也是在行善。伊朗的资金使真主党可以这么慷慨，但在这种效率当中，同样重要的是真主党是在地组织、是从重建小区崛起的政党。真主党和外国重建企业机构不同，不是利用进口的管理人员、民间保安人员和译员，不是把遥远国度外国官僚机构的设计强加在本地小区中。真主党能够快速行动，原因是真主党了解每一个小巷、了解每一台临时发报机，也知道可以靠谁把工作做好。如果黎巴嫩居民感谢这种结果，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就是索立迪尔区。

我们并非总是用退化来应对休克，有时候，我们面对危机时会快速成长。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就明显表现出这种冲动，当时四颗炸弹炸毁通勤列车和马德里几座铁路车站，炸死将近200人。艾斯纳(Jose Maria Aznar)总统立刻上电视，要全国公民谴责巴斯克(Basque)分离主义分子，也支持他参与伊拉克战争。他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希望跟在西班牙全境散布死亡这么多次的杀手谈判，只有坚定的决心才能终止攻击。”

马德里著名的报纸编辑索乐(Jose Antonio: Martines Soler)说：“西班牙人对这种谈话的反应很差，我们仍然听到弗朗哥(Franco)的回音。”索乐曾经在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遭到迫害：“艾斯纳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告诉人民，他站在正确的一方、正义站在他那边，不同意他的人就是他的敌人。”换句话说，9·11恐怖攻击后，美国人在布什总统身上看到的“坚强领导”特质，在西班牙人看来却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恶兆。这时离西班牙全国大选只有三天，选民想起恐惧主宰政治的时代，用选票逼退艾斯纳，选择决心从伊拉克撤军的政党。这种情形和黎巴嫩一样，对过去休克的集体回忆，使西班牙人能够对抗新的休克。

所有休克治疗专家都刻意消除记忆，卡梅伦一直认为，他必须消除病人心灵中的一切，才能重建病人的心灵。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觉得不必阻止强盗抢劫伊拉克的博物院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或许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达成任务。但是就像卡梅伦医生过去的病人卡斯特纳一样，自己用纸张、书籍和清单构成的错综复杂结构，可以重

建记忆，可以创造新的故事，个人和集体记忆都会变成最有力的避震器。

虽然主管机关在非常多的地方，成功地利用2004年的海啸，但是同样受到海啸侵袭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泰国，记忆却成为有效的反抗武器。泰国有几十个沿海村庄被海啸夷为平地，但是泰国的情形跟斯里兰卡不同，很多泰国乡村在几个月内就重建成功。其中的差别不是政府不同，泰国政客和其他国家的政客一样，都急于利用海啸作为借口，赶走渔民，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大型度假村。但是泰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村民十分怀疑政府的所有承诺，拒绝在难民营里耐心等待官方的重建计划。数以千计的居民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他们自称的“重新占地”。他们手里拿着工具，大步前进，走过开发商雇用的武装警卫，开始在旧房子的所在地划界，有些村子的村民立刻开始重建。在大海啸中失去大部分家人的孔瓦迈(Ratree Kongwatmai)说：“我愿意为这块土地牺牲性命，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泰国原住民莫肯族(Moken)渔民演出了最大胆的重新占地行动。莫肯族也叫作“海上吉普赛人”，几个世纪以来，泰国政府都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因此他们不再心存幻想，不会以为好心的政府会用一块适当的土地，交换政府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海岸土地。攀牙省班东华村(Ban Tung Wah Village)居民的演出特别具有戏剧性，泰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说：“村民自行集结，走向老家，用绳索把遭到摧毁的村子圈起来，象征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露营，主管机关很难把他们赶走，尤其是媒体还密切注意灾后重建。”最后村民和政府谈好条件，放弃一部分海滨土地，交换其余祖传土地的法律保障。今天重建后的村子是莫肯族文化的橱窗，设有博物馆、小区中心、学校和市场。现在下级地区官员来班东华村，学习怎么推动“人民管理灾后重建”，同时，满载研究人员和大学巴士来到这里，研究“原住民的智慧”。

遭到海啸侵袭的整个泰国海岸上，这种直接重建变成了标准。小区领袖说，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人民从占领土地的优势，谈判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把这利，做法叫作“用手谈判”。泰国的幸存者也坚持不同形态的援助，不接受施舍，却要求提供工具，自行重建。例如，数十位泰国建筑系学生和教授自愿协助小区成员，设计新房子，画出重建计划；造船大师训练村民，自行建造比较精密的渔船。结果小区变得比海啸侵袭前还强而有力，班东华与班乃来(Baan Nairai)泰国村民建造的高脚屋漂亮而结实，和外国包商提供的闷热组合屋相比，高脚屋比较便宜、比较大、也比较凉爽。泰国海啸幸存者小区联盟草拟的宣言说明其中的哲学：“重建工作应该尽量由本地小区自行推动，禁止包商参与，由小区负责建造自己的房子。”

卡特琳娜飓风侵袭一年后，泰国草根重建运动领袖和新奥尔良飓风幸存者代表团之间，进行了令人惊异的交流。美国访客参观了好多个重建好的泰国村庄，对村民快速重建完成深感讶异。新奥尔良“幸存者村庄”(Survivors' village)创办人贾卡里(Endesha Juakali)说：“我们在新奥尔良等待政府替我们办理，但是你们在这里全都自行负责。”他保证：“我们回去后，你们的模式是我们的新目标。”

新奥尔良小区领袖回国后，新奥尔良确实掀起直接行动的风潮。贾卡里自己所住小区还是一片废墟，却纠集本地包商和义工，组成小组，清理小区里每一栋遭到洪水损害的房子内部，然后进展到下一阶段。他说，到海啸灾区考察，让他得到“很好的看法，知道新奥尔良人民必须抛开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抛弃市政府和州政府，开始主张‘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不管政府，而不是依赖政府，开始重建我们的小区’”。同样到亚洲考察的华盛顿(Viola Washington)回到自己住的新奥尔良珍特利(Gentilly)小区后，态度也完全不同了。她“把珍特利分成很多个区段，为每一个区段组织代表委员会，任命领袖，开会讨论重建的需要”。她解释说：“我们和政府对抗，设法拿回我们的钱时，不希望自己无所事事、不努力找回自我。”

新奥尔良还有更多的直接行动。2007年2月，布什政府打算拆除的公屋计划居民团体开始“重新占领”自己的旧房子，定居下来。义工协助清理公寓，帮忙出钱购买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彼特公屋计划(C. J. Peete)居民威廉斯(Gloria Williams)宣称：“我家就是我的堡垒，我要收回来。”重新占领变成了小区庆祝会，还有一个新奥尔良的铜管乐队来助兴，他们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逃过了自称重建的庞大文化推土机。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人民自行重建的所有案例：参与行动的人说，他们不只是修理房子，也是在自我治疗。这样说很有道理，熬过重大休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面对可怕的力量，父母失去拯救子女的能力，配偶人天永隔，提供保护的家园变成了死亡陷阱。要从无助中恢复，最好的方法是出力自助助人、是得到参与小区重建的权利。新奥尔良下九区马丁·路德国民小学助理校长说：“我们的学校重新开学，代表这个小区很特别，我们不只是因为住得近而紧密结合，也是靠着精神、血缘和回家的愿望团结在一起。”

人民重建运动代表了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特性对立的精神，后者永远追求白纸和白板，好在上建立模范国家，与之相反，人民重建运动就像拉丁美洲的农业与工厂合作社一样，天生就具有即兴的特质，将就利用有幸存活下来的人，利用没有遭到扫除、破坏或偷走的所有生锈工具。地方人民重建运动与天国的幻想不同，不是巨灾横扫一切后，让真正信徒逃避的世外桃源；地方人民重建运动的起点是认定大家无法逃避自己创造的重大乱象，而且已经有足够多的东西遭到毁灭，包括历史、文化和记忆。这种运动并不追求从零开始，而是宁可从一片残垣败瓦中开始。如今政商财团主义圣战急剧没落，因而改用加强休克，希望破除日渐增强的抗拒，在此情形下，重建运动指出了介于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之间的一条道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唯一激进的地方就是强烈的务实精神，他们植根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认为自己只是修理匠，乐于接受残存的东西，好好修理和补强，使一切变得更好、更公平。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建立适应能力，应付下一次来袭的休克。